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思想剧场

第2版
——
2nd edition

[英]彼得·伯克——著 李康——译 Peter Burke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目 录

前 言 - i

第二版序言 - i

第一章 理论家与史学家 - 1

一 聋子之间的对话 - 4

二 史学与理论的分野 - 7

三 对过去的摈弃 - 17

四 社会史的兴起 - 21

五 理论与史学的会聚 - 26

第二章 模型与方法 - 33

一 比较 - 35

二 模型与类型 - 43

三 计量方法 - 55

	四 社会显微镜	_62
第三章	核心概念	_71
	一 角色与展演	_77
	二 性与性别	_83
	三 家庭与亲缘关系	_88
	四 共同体 / 社区 / 社群与认同	_93
	五 阶级与地位	_99
	六 社会流动与社会区隔	_104
	七 消费与交换	_108
	八 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_115
	九 庇护人、受护人与腐败	_118
	十 权力与政治文化	_124
	十一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_128
	十二 中心与边缘	_133
	十三 霸权与反抗	_142
	十四 社会抵抗与社会运动	_149
	十五 心态、意识形态与话语	_154
	十六 传播与接受	_164
	十七 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混生性	_169
	十八 口传性与文本性	_176
	十九 神话与记忆	_182

第四章	核心问题	_187
	一 理性与相对主义	_190
	二 共识与冲突	_198
	三 事实与虚构	_201
	四 结构与行动者	_206
第五章	社会理论和社会变迁	_227
	一 斯宾塞的模型	_230
	二 马克思的模型	_244
	三 第三条道路?	_249
第六章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_275
	一 去稳定化	_279
	二 去中心化	_288
	结 论	_303
	书 目	_307
	索 引	_361
	译后记	_380



前 言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我刚刚步入学术生涯，自告奋勇去教授一门讲“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课程，理由是在书写有关社会的历史之前，先去了解什么是“社会”，是个不错的想法，而学习一个主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教授它。教这门课也招来了汤姆·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的一项邀约，他让我撰写一部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书，并于1980年由艾伦与昂温（Allen and Unwin）出版公司刊行，以向两个学科的学生们介绍他们在对方那里可能找到的最具价值的东西。十多年后，政体（Polity）出版社又给我机会对此书进行修正、增订和改写。

如今的第二版以新书名问世，以更准确地传递书的内容。初版序言指出，社会人类学“在本论著中扮演的角色比书名所表现的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有一些讨论。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许有理由期待在讨论社会

理论时涵盖更大的范围，包括传播学、地理学、国际关系、法学、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宗教研究之类的学科或分支学科，并且几乎不可能排除诸如批判理论、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之类的跨学科研究，甚至是哲学（不妨将其定义为关于理论的理论）。

如此拓展论著的范围，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个领域太宽泛，一己之力无法掌控。尽管我在过去30年间在社会理论方面的阅读颇为广博，也对其如何可能运用于书写历史一直有所思考，但我自己的史学经验却显然是有限的。我一向专治16、17世纪欧洲的文化史与社会史，对于其他大陆、其他时期和其他学科的了解充其量也只是拼拼凑凑。因此，我所选择的具体例证往往是自己的研究与教学中比较熟悉的，哪怕其代价是一定程度上的失衡。

要评述所有这些领域的进展，难以避免个人立场。本书是以已故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常说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视角撰写的，所谓“总体史”，并不是巨细靡遗地阐述往昔，而是强调人类不同探究领域之间的关联。

还有一个语言上的问题。既然讨论已经拓宽，该用什么术语来取代“社会学”呢？写成“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未免累赘。而谈论“社会科学”在过去是符合习惯的，可要是你不相信研究社会的学人也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型（假设有那么一种统合的模型），那就尴尬了。“史学与理论”作为书名也挺吸引人，不过可能使人错误地期待这是一本更有哲学味的书。

因此，我决定使用“社会理论”这个术语（应当理解为包括“文化理论”）。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选择并不意味着这种假定，即在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中，能够引起历史学家兴趣的就只有一般性理论。这些学科中使用的概念、模型与方法，有一些也能用于研究过去，同时，将有关当代社会的个案研究与千百年前的情形做比较，也可能大有裨益。

决定这样来拓展这本书，仿佛决定要扩建一栋房子。它牵涉到大量的重建工作。事实上，更准确的讲法可能是，第一版的少数片段已经融入了本质上新启的构架。所征引的研究有许多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尽管如此，我也尽可能不要过于追逐新潮。我依然相信，马克思与涂尔干、韦伯与马林诺夫斯基——恕不一一列举——依然对我们深具教益。

本书初版是在萨塞克斯大学的跨学科合作氛围下著成的。新版则是十多年来的剑桥生涯的成果，诸位同事对此颇多助益。Ernest Gellner、Alan Macfarlane、Gwyn Prins 以及伊曼纽尔学院聚会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小组都会认识到，我从他们的激励、批评和拓展阅读建议中深受启发。而在英国之外也有一批同行，包括 Antonio Augusto Arantes、Anton Blok、Ulf Hannerz、Tamás Hofer、Vittorio Lanternari 与 Orvar Löfgren。重写工作始于柏林科学院（Wissenschaftskolleg），多有受惠于那里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尤其是 André Béteille 对书稿的建设性意见。John Thompson 在过去几年里负责我的社会学再教育，他和我的妻子 Maria Lúcia 细心校读了倒数第

二稿。若无他们的协助，我或许仍能兑现诺言，却不能始终精准表达自己的意思。

柏林—圣保罗—剑桥，1990—1991

第二版序言

本书初版问世已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事情，当时题为《社会学与历史学》。就连第二个版本，即《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至今也有 13 年了。当时的历史学家逐渐对社会理论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对他们来说，注解中征引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心理学家已经不再非同寻常。如此一来，最初是作为一种特定史学取向的宣言书而撰写的本书最后却变成了某种教科书。

而在过去的 25 年里，社会理论本身也发生了变革。有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像一批历史学家一样，促成了一场“文化转向”。其结果是，在这些篇章中，文化的地位更为凸显。比如说，对巴赫金和贡布里希的讨论更为详细，托马斯·库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也使我在“问题”一章中加入了新的一节，讨论强调理性与注重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家之间的冲突。

文献业经更新，以涵纳 1992 年到 2004 年间出版的一批著作和论文。还增写了新的几节，来处理社会资本与后殖民主

义等在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丰富的专著与文章的话题。而在其他章节中，也都写入了新的实例。为了给这些增写腾出篇幅，也做了少量删削。文献清掉了一些比较陈旧的条目，正文中偶尔也会删掉一些过时的例证。

剑桥，2004

第一章

理论家与史学家



本书试图回答两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社会理论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而历史学对社会理论家又有何用处？我之所以说这两个问题“貌似简单”，是因为这种表述掩盖了某些重要的分别。不同的历史学家，或者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了不同理论的用益。这些理论有的被当成一个统摄全局的框架，有的被视为破解特定问题的手段。另有些历史学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强硬地抗拒理论。将理论同模型和概念相区分，或许亦有裨益。会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的历史学家还是相对较少的，更多的人会采用模型这个词，至于概念，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区分，并不等同于历史学与社会学，或者与其他学科如社会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区分。这些领域内的一些学人做的是个案研究，理论所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另一方面，有的历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会满怀热情地讨论理论议题，哪怕是在倾诉不满，就像爱德华·汤普森在其引发论争的名文中所称的“理论的贫困”（E. P. Thompson 1978）。别忘了，过去几年在社会学、人类学和

政治学研究中产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概念，正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率先运用的。一是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y），一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E. P. Thompson 1991: 185—258 [初版于1971]；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2 但不管怎么说，大体上，在其他这些学科里进行研究的人使用起概念和理论，要比历史学家更频繁，更明确，更重视，也更自傲。正是这种对于理论的态度上的差异，酿成了历史学家与其他学人之间的诸般冲突和误解。

一 聋子之间的对话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其他人尤其如此）并非总是和睦相处的邻居。他们当然是智识上的邻居，因为两个学科的从业者都（像社会人类学家一样）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言，他们不同于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或者政治研究或宗教研究领域的专家。

社会学可以定义为对作为单数的人类社会所作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做出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作为复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所作的考察，侧重于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历时而变的情形。这两种思路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更为可取。

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发现某一社会在哪些方面独具一格。变化会逐渐结构化，而结构又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有些社会学家所称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过程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Giddens 1979, 1984)。(亦参下文边码第140页)¹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有机会使对方摆脱不同类型的局部主义(parochialism)。历史学家很可能陷入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局部主义，他们通常专注于某一特定的区域，逐渐会把自己的“区域”看作是完全独特的，而不是看成一系列在别处均有类似表现的因子的独特组合。社会理论家则是在更具比喻性的意义上表现出局部主义，即当他们只基于当代经验对“社会”进行归纳，或在讨论社会变迁时不考虑长期过程时，就产生了一种时间上而非地点上的局部主义。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互求全责备。不幸的是，他们都往往以一种相当粗陋的刻板印象看待彼此。即便时至今日，在有些历史学家眼里，社会学家仍然是用粗鲁而抽象的行业黑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毫无时空感，将个体生搬硬套塞入刻板范畴，最糟糕的是，还把所有这一切勾当说成是“科学的”；³而在社会学家这一边，传统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属于业余而短视的事实辑录者，缺乏体系、方法或理论，其“数据库”之不精确，恰与他们在分析上的无能力相称。简言之，尽管双语使用

1. 本书正文所注明的参见页码均为英文原著页码，亦即中译边码。本书所有注解均系中译者注。

者的人数不断增长——下文将讨论他们的研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仍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对话，正像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58）曾经指出的那样，往往沦为“聋子之间的对话”。

要理解为何状况若此，不妨将不同的学科看成是特色分明的职业甚至亚文化，各有其语言、价值、心态或思维风格，并由各自的培养或“社会化”过程所强化。例如，社会学家被培养成去关注或梳理一般规则，往往剔除例外的东西；而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关注具体细节，其代价就是牺牲一般模式（B. Cohn 1962；K. T. Erikson 1970）。

从历史角度来看，显然双方都犯了时代错置的毛病。直到不久前，许多社会理论家看待历史学家，还仿佛后者基本只关心叙述政治事件，仿佛19世纪史学大家利奥波德·冯·兰克那一套路数仍然大行其道。无独有偶，少数历史学家谈起社会学，还当它囿于奥古斯都·孔德的时代，还处在19世纪中期，只见宏大概括，却没有系统的经验研究。那么，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或者更一般地说，史学和理论之间，这种对立是怎样形成的？原因何在？它又是如何被克服的？原因何在？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属于历史问题，我将在下一节给出历史的回答，聚焦于西方人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三个历史时段：18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20年代前后。

二 史学与理论的分野

18世纪时，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根本没有争执，原因简单明了。那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尚不存在。法国法学理论家夏尔·德·孟德斯鸠，苏格兰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以及律师兼史学家约翰·米勒，后来都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争相尊奉（Aron 1965: 17—62; Hawthorn 1976）。实际上，他们有时会被描述为社会学的“创建先贤”。然而，这样的标签却会误导人，让人觉得这些人着手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而他们从未表达过这一意图。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被称为经济学创立者的亚当·斯密身上，他其实生活在与弗格森和米勒一样的圈子里。

将上述四位学者都称作社会理论家或许更为贴切。他们对所谓“市民社会”的讨论，其方式之系统，堪比于从柏拉图到洛克等更早的思想家对国家的讨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1767）、米勒的《等级差别的起源》¹（1771）以及斯密的《国富论》（1776）都关注一般理论，关注米勒所谓的“关于社会的哲学”。

1. 作者此处书名似误将“origins”写作“observations”。

这些作者探讨了经济体系及社会体系，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体系”（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统治类型”），或斯密著作中的“商业体系”（与“农业体系”相对而言）。他们依据社会维持生存的主要方式的不同，共同区分出四种主要的社会类型：狩猎、畜牧、农业以及商业社会。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也使用了同样的核心概念，该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口倾向于不断增长，直至达到维持生存的手段极限。

将这些社会理论家说成是注重分析的历史学家，或者借用18世纪的术语，是“哲学性的”历史学家，也许同样到位。斯密《国富论》的第三篇讨论了“财富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部欧洲经济简史。孟德斯鸠撰写了一部有关罗马的繁盛与衰败的历史专著；弗格森论述过“罗马共和国的进程及终结”；米勒论述过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则追随他之前的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人口史上。

与此同时，不那么关注理论的学者也从政治和战争等传统历史主题，逐渐转向研究社会史，即商业、艺术、法律、习俗和“风俗”的发展。比如说，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讨论了自查理曼时代以来欧洲的社会生活。该书并非直接基于原始材料，但却做出了大胆而新颖的综合，是对伏尔泰首先命名的“历史哲学”的一大贡献。另一方面，德国官员尤斯图斯·默泽尔的《奥斯纳布吕克史》（*History of Osnabrück*,

1768)则是依据一手档案撰写的地方史,同时也是把社会理论应用于历史分析的早期范例。默泽尔显然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从而受到鼓励,去探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体制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照 Knudsen 1988: 94—111)。

此外,吉本的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既是政治史,也是社会史。该书有关匈奴和其他蛮族入侵者的章节强调“游牧民族”的风俗的一般特征,显露出他与弗格森和斯密的观点有承继之处(Pocock 1981)。对于吉本而言,这种从特殊中看到一般的能力,正是他所谓的“哲学性”历史学家的著述特点。

百年过后,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却不如启蒙运动时期那么对称了。历史学家不仅逐渐远离了社会理论,而且也远离了社会史。19世纪后期,西方最受尊崇的历史学家是利奥波德·冯·兰克。他虽未断然拒绝社会史,但其著作却基本聚焦于国家。在他及其追随者的时代,政治史又恢复了过去的支配地位。这些追随者比他们的领路人更有甚之,追随者往往就是这样(Burke 1988)。

之所以出现这种从社会领域中撤出的趋势,可以有好些方面的说明。其一,这一时期正值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将历史学看作一种促进国族统一的手段,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或者像不那么具有同情理解的观察家可能会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国族主义宣传的手段。这一时期也正值新兴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等较古老的国家,仍因地区性传统不一而处于分裂

状态。各级学校里的国族历史教学促进了政治整合。政府乐意扶持的历史学很自然是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在德国尤其密切。

对于复归政治的第二点说明是学术上的。与兰克相连的史学革命首先是史料和方法上的革命，是从利用已有的史书或“编年史”转向利用政府的官方记录。历史学家开始经常查阅档案，并发展出一系列越来越精致的技术，评估他们找到的文档的可靠性。他们声称，自己的历史著作就此比前人的手笔更加客观、更加“科学”。这种新的学术理念的传播与19世纪史学学科的专业化有密切联系，当时相继创立了历史学的第一批研究机构、专业期刊和大学科系（Higham, Krieger and Gilbert 1965: 320—358; Boer 1996）。

相比于关注国家的兰克派史家的研究，社会史学者的研究就显得不够专业。对于在实践中仍然被当作剩余领域来对待的东西，称之为“社会史”也确实恰如其分。G. M. 屈维廉给社会史下的定义可谓声名不佳，说它是“撇开政治的民众史”，但这无非是将默认的预设变成了明确的表达。就连托马斯·麦考莱的《英国史》（1848）中关于17世纪晚期社会的著名篇章，也被当时一位评论家不留情面但并非毫不公正地说成是一家“古董店”，因为道路、婚姻、报纸等各种不同的话题纷至沓来，又看不出任何明显的章法。

无论如何，政治史（至少在专业圈内）被认为比研究社会或文化更切实或更严肃。J. R. 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1874）

聚焦日常生活，因而对战争和条约甚少着墨，此书发表后，据说他以前的导师 E. A. 弗里曼如此评价：如果格林能完全抛弃那些“社会性的内容”，原本可以写出一部出色的英国史（参看 Burrow 1981：179—180）。

这些偏见并非英国特有。在德语世界，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后来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在问世之时却并不成功，或许是因为该书依据的不是官方记录，而是文学素材。法国历史学家努马-德尼·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杰作《古代城市》（1860）主要关注古希腊和罗马的家庭，在当时相对属于例外，因为他一方面得到了专业同行的认真对待，同时还能明确主张，历史学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即真正的社会学。

简言之，兰克的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出乎意料，但极其重大。既然新的“文档”研究法最适合研究传统政治史，贯彻这种方法就使得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越来越狭隘，某种意义上甚至比他们 18 世纪的前辈更为老套。其中有些人拒绝社会史，因为它不能被“科学地”研究。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出于相反的理由排斥社会学：因为它太科学，意思是太抽象、太一般，无法考虑个体和事件的独特性。

这种对社会学的排斥立场，在 19 世纪晚期的一些哲学家的著述中表达得最为明确。尤值一提的是威廉·狄尔泰的著作。狄尔泰既研究哲学，又撰写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Geistesgeschichte*）。他主张，奥古斯特·孔德与赫伯特·斯宾塞

的社会学（就像赫尔曼·艾宾浩斯的实验心理学）都属于伪科学，因为其中提供的是因果说明。他提出了一种著名的区分，一方是科学，旨在从外部做出说明（*erklären*），另一方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旨在从内部形成理解（*verstehen*）。从事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研究的学人使用的是因果关系的词汇，而人文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学人所使用的语言则应当是“经验”。贝内代托·克罗齐也持类似的立场。他以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但他也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之一。1906年，他拒绝了一项在那不勒斯大学设立社会学教席的请求，因为他认为社会学只是一门伪科学。

至于社会理论家这方面，尽管他们仍在研究过去，但对历史学家却越来越持批评态度。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既是社会政治理论领域的里程碑，又是基于一手文献的原创性史学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不论是对经济学理论，还是对经济史而言，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它探讨了劳工立法、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对农民的剥夺等等（G. Cohen 1978）。尽管马克思的研究并未引起当时的历史学家多大关注，但后来却强有力地影响了史学研究的实践，在1945年到1989年尤其如此。至于古斯塔夫·施莫勒，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名气更大的是作为历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像托克维尔、马克思和施莫勒这样把理论与对具体历史情境细节的兴趣结合起来的人，还是比较罕见的。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一些新兴学科中，更常见的是关注长期趋势，尤其是关注时人所称的社会“进化”。比如说，孔德相信，社会史，或他所谓的“没有个人名字、甚至没有民族名字的历史”，对于社会理论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他率先将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学”。他毕生的研究可以被称为“历史哲学”，因为究其根本，它是把过去划分为三个时代：宗教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科学时代，而当时的另一个口号“比较方法”，其实也是历史的，因为它将每个社会（其实就是每一种风俗或人造物）都置于进化阶梯之中（Aron 1965: 63—110; Burrow 1965; Nisbet 1969: 第六章）。

进化法则的模型将不同学科关联起来。经济学家讲述的是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发展。法学家讨论的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民族学家把社会变迁呈现为从“野蛮状态”（或曰人类的“野性”状态或“自然”状态）向“文明”的进化。而像斯宾塞这样的社会学家，则运用从古埃及到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历史实例，刻画他所谓的从“军事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Peel 1971）。

此外，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也对所谓“自然民族”（people of nature, Naturvölker）作了极其相似的研究。拉策尔关注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冯特关注的是他们的集体心态。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

（1890）的主题，就像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的《原始心态》（1922）一样，是从巫术到宗教、从“原始人”到文明人的思维的进化。尽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强调“原始”因素在文明化的男人（以及女人）精神中的残存，但他的《图腾与禁忌》（1913）和《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之类论著却表明，他是这种进化论传统的晚期代表，在这些论著中，弗雷泽（等人）的思想扮演着显著角色。

进化通常被视为趋向更好的方向，但也并非始终如此。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体与社会》（1887）中，以怀旧的情绪，描绘了从传统的面对面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现代匿名化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该书只是一系列分析旧秩序消亡原因的著作中最明显地表达出怀旧情绪的一部。这只是一系列类似研究中最直白的一例，它们都既分析了旧秩序消逝的原因，也表达了对于它的怀旧之情（Nisbet 1966；参看 Hawthorn 1976）。

理论家们虽然重视过去，但对历史学家却往往表现得缺乏敬意。例如，孔德就曾语带鄙视地谈到他所谓的“那些盲目编纂无聊轶事的人出于非理性的好奇心非常幼稚地搜罗起来的毫无价值的细节”。斯宾塞则声称，社会学与历史学比肩观之，“宛如大厦巍然而立，周遭乱石碎瓦杂然堆积”，“历史学家所能承担的最高职责，不过是对各国各族生活的叙述，为某种‘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因此，说得好听些，历史学家是为社会学家搜集原始素材；说得难听些，历史学家与社会学

家毫不相干，因为前者甚至无法为建筑大师提供恰当的材料。再引斯宾塞一句：“帝王将相的生平传记（我们的孩子们除了这些也没学啥）对于有关社会的科学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启示。”（Peel 1971: 158—163）

能够幸免于这种普遍指责的历史学家寥寥无几，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甫斯特尔·德·库朗日，他对古代城市的研究上文已经述及；还有英国法律史家 F. W. 梅特兰，他将社会结构看成是由权利和义务所规范的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其观点对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在 20 世纪早期，大多数社会理论家既对历史抱有兴趣，又摈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著述。其中相当一批人就是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是专治古代世界的历史学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比如法国地理学家保罗·韦达·白兰士、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和苏格兰人类学家弗雷泽。

还有一些人则试图将对某一具体文化的过去的研究和对其现在的研究结合起来。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研究温哥华地区的印第安人夸扣特尔（Kwakiutl）部落时，就是这么做的。而地理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其著名的法国西部“政治图绘”（*tableau politique*）中也用了类似的方法，研究当地环境与居民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主张“正像存在地理区域或经济区域一样，也存在政治区域”，并将投票模式与宗教归属及地产拥有情况作了比较。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三位社会学家，即帕累托、涂尔干和韦

伯，都是饱览史籍的学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总论》¹（1916）细致讨论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及罗马，并从中世纪意大利史中撷取例证。埃米尔·涂尔干则致力于通过将社会学与历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相区分，为这门新学科开辟出一片领地。他本人曾师从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研读历史，并将自己一本专著献给后者。他还写过一部有关法国教育史的专著。而他在自己主编的《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上也确立政策，刊发历史著作的评论，只要这些评论关注的东西不像事件史那样“肤浅”（Lukes 1973）。

10 至于马克斯·韦伯，他的历史学知识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确实是非凡出众的。他在撰写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之前，就撰有中世纪商贸合作组织和古罗马农业史方面的著作。古典学大师特奥多尔·蒙森就将韦伯视作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当韦伯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理论后，他也没有放弃对于过去的研究。他既向史学汲取材料，又向史家借取概念。例如他著名的“克里斯玛”概念（*charisma*，参见下文边码第93页），就是源于教会史专家鲁道夫·索姆关于早期教会“克里斯玛式组织”的讨论。而韦伯所做的就是将这一概念世俗化，赋予其更普遍的适用性。

20世纪社会学名家中最富历史意识的学者，理应来自当时欧洲最富历史意识的文化。实际上，韦伯很少将自己看成是

1. 目前大陆中译本《普通社会学纲要》（三联版）是此书的普及删略本，因此大量历史例证看不到了。

一名社会学家。他晚年时有一次接受慕尼黑大学的一个教席，却只是淡淡地表示：“从聘书上看，现在我倒成了一个社会学家。”在他看来，自己要么是一名政治经济学家，要么是一位比较历史学家（Roth 1976；Kocka 1986）。

三 对过去的摒弃

涂尔干于1917年去世，韦伯于1920年去世。出于各种原因，新一代社会理论家背离了过去。

吸引经济学家的有两种恰好相对的方向。其中一些人，比如法国的弗朗索瓦·西米昂、奥地利的约瑟夫·熊彼特，俄国的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通过收集历史统计数据来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周期。而在这种对于过去的兴趣中，有时还夹杂着上文提到斯宾塞时说起的那种对于历史学家的蔑视。像是西米昂就曾发表过一篇引起论战的文章，抨击他所谓的历史学家这种部落崇拜的三样“偶像”：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及编年史偶像，摒弃他和另外一些人首先命名的“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学”（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并以一项关于亨利四世时代法国工业的研究为例，强烈反对把经济研究纳入政治框架的倾向。而他自己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框架则包括了扩张与收缩的阶段更替，或者按照他的叫法，A阶段与B阶段的更替（Simiand 1903）。

11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背离过去，趋向于一种以纯数学为样板的“纯粹”经济理论。研究边际效用和经济平衡的理论家越来越无暇顾及古斯塔夫·施莫勒及其学派所用的历史方法。一场著名的“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使这一专业分化为两种极端：历史主义者和纯理论家。

此外，各路心理学家，像是《儿童的语言和思维》（1923）的作者让·皮亚杰，《格式塔心理学》（1929）的作者沃尔夫冈·柯勒，都转向不适于研究过去的实验方法。他们摒弃了图书馆，代之以实验室。

与之相似，社会人类学家不再阅读旅行家、传教士和史学家的相关报道，而是发现了对其他文化进行“田野调查”的价值。例如，弗朗兹·博厄斯曾经对夸扣特尔多次作长时间探访（Boas 1966）；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从1906年至1908年生活在（孟加拉湾内的）安达曼群岛，以便研究当地的社会结构；而布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在1915年至1918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新几内亚附近的）特罗布里恩群岛。

也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极其强硬地主张，田野调查是首屈一指的人类学方法。他声称：“人类学家必须舍弃他那些舒适的位置：传教营地、政府机构或种植园主居所的凉台上的长椅。”只有深入乡村，踏足“田野”，他才能“了解本地人的观点”。以马林诺夫斯基为榜样，田野调查成为每一位人类学家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Stocking 1983）。而社会学家也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而不是凉台上的长椅），开始越来越多地从

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

若要寻找转向当下——就像历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称的“社会学向当下的退却”——的生动事例，不妨看看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1892年，它在芝加哥大学创立。它的首任系主任阿尔比恩·斯莫尔求学德国时，既师从过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也跟经济史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学习过。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罗伯特·E. 帕克的领导下，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转而研究当代社会，尤其是研究他们自己所在的城市，它的贫民窟、犹太区、移民、帮派、流浪汉等等。帕克写道：“博厄斯和洛威这样的人类学家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风俗时所使用的这种耐心细致的观察方法，如果用于考察芝加哥的小意大利区（Little Italy）或下北区（Lower North Side）盛行的习俗、信仰、社会惯例以及整体生活观念，甚至可能更有收获。”（Park 1916: 15；参看 Matthews 1977；Platt 1996：尤其是第261—269页）

12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是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有针对性选择的受访者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分析。调查研究成了美国社会学的支柱。社会学家们得出自己的数据，并认为过去“对于我们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基本上无关紧要”（Hawthorn 1976: 209）。

对这种牺牲过去转而研究当下的变化趋势，或许可以给出几种不同的说明。社会学本身的重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而在美国（尤其是在芝加哥），与欧洲相比，过去并不那么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那么明显。社会学家也许会辩称，对过去的摒弃，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越来越自成体系、越来越专业化脱不开干系。这些领域里的研究者与历史学家一样，在这段时间也纷纷开始创设各自的专业学会和专门期刊。要形成新的学科认同，就必须摆脱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而获得独立。

另一方面，观念史学家也许会强调一种学术趋向，即“功能主义”的兴起。在18和19世纪，对于习俗或社会制度的说明通常是从历史的角度给出的，使用的是“扩散”、“模仿”或“进化”之类的概念。这种历史大多是思辨性或“臆测性”的。受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启发而找到的新的替代选择在说明这些习俗和制度时，看的是它们在当下的社会功能，是每一个要素对维持整体结构所做出的贡献。基于有关物质世界或人体的模型，社会被构想成一个均衡（equilibrium）系统（均衡是帕累托爱用的术语）。而在人类学领域，这种功能主义立场被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所采纳，后者摒弃过去，视之为“业已彻底完结的东西”，与社会的实际运行毫不相关（Malinowski 1945: 31）。

很难说是田野调查的普及导致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恰恰相反。一旦陷入功能主义者的习语，你就会说，新的说明和新的研究方法两相“契合”。遗憾的是，它们也强化了社会理论家对过去丧失兴趣的倾向。

当然，我本意并不是要抹杀功能主义人类学、实验心理学

或数理经济学之类令人敬畏的学术成就。这些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在它们的时代很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也是针对早先理论和方法确实存在的缺陷所做出的回应。例如在研究当代的部落社会时，与先前那种思辨性的进化历史研究相比，田野调查提供的事实基础要可信得多。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进展，就像以兰克为代表的那种史学风格一样，也自有其代价。新兰克派历史学家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在方法上比前人更严格，但格局也更为狭隘。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他们没有能力以与新的专业标准相匹配的方式去处理，就会忽略不计，甚至有意排斥。但是，注定迟早会出现精神分析学者所说的那种“被压抑者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

四 社会史的兴起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过去渐渐失去兴趣的同时，历史学家却开始创造某些东西，似乎在回应斯宾塞提倡“社会的自然史”的呼吁。19世纪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越来越对新兰克派史学感到不满。

卡尔·兰普雷希特是批评者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人，他斥责德国的史学既有体制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转而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这里所说的其他学科包括

冯特的社会心理学和拉策尔的“人文地理学”，他们都是兰普雷希特在莱比锡大学的同事。兰普雷希特以特有的率直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科学。”他将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思路应用于自己的多卷本《德国史》（1891—1909年），该研究在涂尔干的《社会学年鉴》上得到好评，但来自更为正统的德国历史学家的反应则是嘲讽多过批评，不仅指责它不够精确（事实上颇多错谬），也抨击它所标榜的物质论和化约论（Chickering 1993）。

14 然而，后来被称为“兰普雷希特之争”的论战如此激烈，这表明他真正的罪过在于对兰克式或新兰克式的正统提出质疑。后来成为马克斯·韦伯追随者的奥托·欣泽，属于少数几个认真对待兰普雷希特所倡导的史学的历史学家，视之为“超越兰克的进步”，超越了兰克对于历史巅峰也就是伟人的关注。欣泽写道：“我们想了解的不仅是山脊与巅峰，也有山基；不只是表面的巍峨与深邃，更是整个大陆板块。”

1900年前后，绝大部分德国历史学家还没有想过超越兰克。马克斯·韦伯在从事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著名研究时，倒是能够借鉴那么几位对类似问题有兴趣的同行的研究，然而或许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位，维尔纳·桑巴特和恩斯特·特勒尔奇，所承担的教席分别是经济学和神学，而不是历史学。

兰普雷希特想要打破政治史的垄断地位的努力归于失败。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和法国，振兴社会史的运动却得

到了更正面的回应。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发起了一场与兰普雷希特类似的反对传统史学的进攻。他写道，“必须全方位地考虑人的活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块领域都不能脱离其他领域而孤立地求得理解。”

特纳与兰普雷希特一样，也被拉策尔的历史地理学所触动。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虽然引来争论，却是对美国各项制度的划时代阐释，把它们看成是对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回应。他还另文探讨了其所称“地域”(sections)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所谓地域，换言之即区域(regions)，例如拥有各自经济利益和资源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F. J. Turner 1893)。与特纳同时代的詹姆斯·哈维·鲁滨孙则是其所称“新史学”的另一位有说服力的倡导者。这种史学要关注所有的人类活动，并从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里汲取思想。

在法国，20世纪20年代，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引领了一场运动，倡导“新型历史研究”。他们创立的期刊《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毫不留情地批判传统史家。与兰普雷希特、特纳和鲁滨孙一样，费弗尔与布洛赫反对政治史的支配地位。他们雄心勃勃，要替之以他们所说的一种“更为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这种历史会涵盖一切人类活动，不太关注对事件的叙述，而更重视对“结构”的分析。此后，15“结构”这个术语成为被称为“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的

钟爱用词（Burke 1990）。

尽管费弗尔和布洛赫各有偏好，但两人都希望历史学家向毗邻学科取经。两人都对语言学感兴趣，也都读过哲学家兼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有关“原始心态”的研究。费弗尔特别关注地理学和心理学；就心理学理论而言，他倾向于自己朋友夏尔·布隆代尔，拒绝接受弗洛伊德。他还钻研了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但拒绝接受后者的决定论，更偏向韦达·白兰士的“可能论”（possibilist）方法，该方法强调环境使人能够做什么，而不是限制人做什么。另一方面，布洛赫则更接近埃米尔·涂尔干及其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莫里斯·哈布瓦赫，撰有关于记忆的社会框架的著名研究）的社会学。他也像涂尔干一样关注社会结合与集体表象，也致力于比较方法。

1944年，布洛赫被德国行刑队枪杀，而费弗尔却侥幸熬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法国史学体制的老大。实际上，他作为重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院长，不仅有能力推动跨学科协作，而且使历史学在各门社会科学当中赢得了霸主地位。费弗尔的政策被他的接班人费尔南·布罗代尔所继承。布罗代尔写的一部著作饱受赞誉，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论著，不仅如此，他还博览经济学和地理学文献，并坚定地信奉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某种共同市场。他坚信，历史学和社会学尤其应该相互接近，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实际研究者都努力或应该努力将人类

经验视为一个整体 (Braudel 1958)。

至于其他国家, 在 20 世纪上半叶, 同样有可能找到受理论指引的社会史学者。例如巴西的吉尔伯托·弗雷雷, 他曾在美国师从弗朗茨·博厄斯, 既可以说是一位社会学家, 也可以说是一名社会史学家。他最为人知晓的还要算是论述巴西社会史的三部曲, 即《主人和奴隶》(1933 年)、《豪宅与陋屋》(1936 年) 及《秩序与进步》(1959 年)。弗雷雷的研究引起了争议。经常有人批评他倾向于把自己所在的伯南布哥 (Pernambuco) 的地区历史等同于整个国家的历史, 从“大宅”(尤其是大宅里的男性, 虽说并非尽皆如此) 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 低估了巴西种族关系的冲突程度。

另一方面, 弗雷雷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富于创新, 也得以比肩布罗代尔 (正是后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执教于巴西圣保罗大学, 并在那时发现了弗雷雷的研究)。他是探讨语言史、食物史、身体史、儿童史及住房史之类话题的先驱之一, 并将它们看成是对过去社会做出一体化说明的组成部分。他在史料使用方面也有引领之功, 率先利用报纸来撰写社会史, 并把社会调查资料用于史学研究。为了写作他有关 19、20 世纪的巴西史第三卷, 他使用调查问卷, 研究了数百名 1850 年至 1900 年出生的人, 他们据说能代表该国各主要社会群体 (Freyre 1959)。

16

五 理论与史学的会聚

不过，仅举数例即可说明，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间，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是彻底不相往来的。1919年，荷兰史学大家约翰·赫伊津哈出版了自己研究14、15世纪文化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该书借鉴了一些社会人类学家的观点（Bulhof 1975）。而在1929年，新创刊的《社会经济史年鉴》编委会中，就包括政治地理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及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939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发表了他深具历史意识的商业周期研究，而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亦出版了如今被公认为经典的《文明的进程》。1949年，毕生倡导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关联的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发表了一部著作，研究昔兰尼加（Cyrenaica）的赛努西教团（Sanusi）的历史。

无论如何，到了20世纪60年代，如涓滴之水的例证汇成了溪流。仅举其中最为知名的数例，诸如萨缪尔·N. 艾森斯塔德的《帝国政治体系》（1963）、西摩·M. 李普塞特的《第一个新国家》（1963）、查尔斯·蒂利的《旺代》（1964）、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以及埃里克·沃尔夫的《农民战争》（1969），这些都表达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理论家与社会史学家之间的共同使命感（Skocpol

1984: 85—128; D. Smith 1991: 22—25, 59—61)。

自那以来，这一趋势依然延续。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类学家，尤值一提的是克利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1980) 和马歇尔·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1985)，在他们有关巴厘岛、夏威夷等地方的研究中都贯彻了历史的向度。一批英国社会学家，特别是厄内斯特·盖尔纳、约翰·霍尔和迈克尔·曼，复兴了 18 世纪追求“哲理性历史”的规划：秉承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研究世界历史的传统，旨在“区分不同的社会类型并说明类型之间的转变”(J. A. Hall 1985: 3; 参看 Abrams 1982)。与此等量齐观的，还有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¹，研究自 1500 年以来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

人们已经提出“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出现频率低得多的)“历史经济学”等术语，既描述历史学融入这些学科，也刻画后者被应用到史学研究 (Kindleberger 1990)。如此会聚到同一学术领域，有时会导致边界争端(比如历史地理学的终点何在? 社会史的起点又在哪里?)，甚至会攒出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现象，但这种会聚也使得人们可以在共同的事业中践行不同的技能和看法。

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日渐密切，原因显而易见。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日益加剧的社会变迁几乎是逼迫

1. 此书的两个中译本分别译作本名与《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着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予以关注，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最初做田野调查的地区，发现它们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发生了转型。那些研究人口爆炸的人口学家，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及工业发展条件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发现自己研究的其实是随着时间流逝的变迁，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历史；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考察范围被引向更遥远的过去。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大规模转移，从传统的政治史（叙述统治者的作为和政策）转向社会史。诚如一位批评这一潮流的论者所言：“原本居于这一专业中心的东西现在沦落到边缘了。”（Himmelfarb 1987: 4）原因何在？或许得有一种社会学角度的说明。许多人为了在社会骤变时期确定自己的方向，觉得越来越有必要寻根溯源，更新自己与过去，尤其是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过去的联系，这里的共同体包括他们的家庭、城镇或村庄、职业，以及他们的族群或宗教团体。

18 本书序言表明，无论是一些社会史学家的“理论转向”，还是一些理论家的“历史转向”，都应大力欢迎。17世纪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一篇名文中既尖锐抨击了只会搜集数据的蚂蚁型经验主义者，又辛辣批评了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粹理论家。而培根推崇的典范是蜜蜂，它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加工。他的寓言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史，也适用于历史研究及社会研究的历史。没有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当下。

当然，史学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并不只有一种可能。有的历史学家接受某种理论，并尝试在自己研究中遵循它，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如此。这种努力本身具有某些张力，但有时也会结出硕果。有关实例，不妨看看爱德华·汤普森的思想历程，他有时自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者”（Kaye and McClelland 1990）。

其他的历史学家是对理论感兴趣，但并不被其所束缚。他们运用理论来意识到问题，换言之，是要发现问题，而非找到答案。比如说，一些历史学家读了马尔萨斯之后受到推动，即使不接受后者的观点，也会去考察人口与维持生存手段之间变化不居的关系。这种对于理论的兴趣丰富了史学实践，在最近这一代人身上尤其如此。

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指出，我们并未生活在一个学术黄金时代。正像学术活动史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解决旧问题的尝试本身又带来新问题。其实，已经有人提出，用“会聚”来描述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用词不当，因为它“太简单、太空泛，不能准确地表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Abrams 1982: 4）针对这种异议，有人也许会回应说，会聚其实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术语，它只是表明双方正在相互接近。它根本不表示有什么相遇，更没有表示共识。

事实上，和解有时也会招致冲突。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塞的著作《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1959）分析了19世纪早期兰开夏郡织工的家庭结构和工作状况，并在此过程中

间接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可此书的出版却引发了爱德华·汤普森的愤怒，后者指斥“社会学”无法理解“阶级”这个术语指的19 的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进程（E. P. Thompson 1963: 10；参看 D. Smith 1991: 14—16, 162）。

过去几年中，有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好像是平行铁轨上的两列火车背道而驰，而不是相向而行。例如，当历史学家发现功能说明时，人类学家却已开始对这些感到不满（Thomas 1971，以及 H. Geertz 1975 的评论）。反之，当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事件的重要性，许多历史学家却已经摒弃“事件史学”而转向研究潜在结构（M. Sahlins 1985: 72）。

参与竞争博取关注的理论种类前所未有地多，这使得局面更为复杂。例如，社会史学者不可能只将注意力局限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他们至少还需要考虑其他形式的理论是否有可能与自己的研究相关。地理学是一位古老的盟友，但也是近些年来迅速变化的学科，历史学家从中可以学到，要更加重视空间或“场所的力量”，无论他们研究的是城市、边疆还是社会及文化“流动”（Agnew and Duncan 1989；Amin and Thrift 2002）。此外，文学理论在影响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同时也影响了历史学家，所有的人都愈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本中存在文字惯例，他们遵循着这些规则，却不曾认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White 1973；Clifford and Marcus 1986；Atkinson 1990）。

我们正处在一个界限模糊、学术边界开放的时代，这样的

时代既让人激动，也令人困惑。不但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且在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征引米哈伊尔·巴赫金、皮埃尔·布尔迪厄、费尔南·布罗代尔、诺贝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和克利福德·格尔兹。而在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乃至其他群体之间，兴起某种共同话语，也正在此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内部，实际上是每一门学科内部，共同话语也渐趋衰微。

甚至就像社会史之类的分支学科，如今也面临着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危险，一方关注大趋势，另一方注重小规模个案研究。尤其在德国，两方过去和现在都处于冲突之中，一方是所谓的“研究社会的历史学家”(societal historians, *Gesellschaftshistoriker*)，比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另一方是“微观历史”的践行者，像是汉斯·梅迪克。

尽管存在这种分裂的趋势，但依然能明显看出，有众多关于模型和方法的根本争论波及不只一门学科。下一章的宗旨就是来讨论这些论战。

20



第二章

模型与方法



本章关注的四种整体思路，在许多学科中都能找到，只是在其中一些学科中颇具争议。首先讨论的是比较，然后是模型的运用，接下来是计量方法，最后是社会“显微镜”的运用。

一 比较

比较在社会理论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事实上，涂尔干明言，“比较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门特殊的分支，而就是社会学本身。”他特别强调，对于“共变”(concomitant variation)的分析有如某种“间接实验”，使社会学家可以从对一个社会的描述转向分析该社会为何采取某种特定形式。

涂尔干区分了两种比较，两种他都提倡。其一，是比较结构类似的社会，或者按照他很能说明问题的生物学类比，“同种”(of the same species)的社会；其二，是比较具有本质差异的社会(Durkheim 1895: 第六章；参看 Bêteille 1991)。涂尔干对于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在法国的情

形，可谓显而易见。

22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往往拒绝比较，理由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特殊、独特、不可复制。然而，针对这种经典的异议，也有一种同样经典的回答，它出自马克斯·韦伯1914年在有关城市史的论战中对于历史学家格奥尔格·冯·贝娄的回应：“史学应当确定中世纪城市之类的对象的特殊之处，这一点我们绝对有共识；但是，我们只有首先找出在其他城市（古代的、中国的、伊斯兰的）中缺失的要素，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转引自 Roth 1976: 307）

对于比较思路，美国社会学家莱因哈德·本迪克斯所称的“对照概念”（Reinhard Bendix 1967）可谓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看出缺少了什么；换言之，才能理解某种特定的缺失的意义所在，比如中国文化中缺乏原罪观念。这正是维尔纳·桑巴特的名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意旨所在（犹如日后的为何非洲没有封建制、英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美国没有足球之类的研究）（Goody 1969; McKibbin 1984）。这也是韦伯自己有关城市的论著的基本策略，他主张，只有在西方世界才能找到真正自治的城市（Sombart 1906; Weber 1920: iii, 1212—1374; 参看 Milo 1990）。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这两种方法，即特殊化与一般化（或历史性的与理论性的），其实是互补的，两者都依赖于比较，不管是直接比较还是间接比较。美国历史学家杰克·赫克斯特曾经将知识分子分为“堆合者”（lumpers）与“析离者”

(splitters), 认为具有分辨力的析离者相比于把离散的现象看成一堆集合的人还是高出一筹 (Hexter 1979: 242)。诚然, 没有人想当粗鲁的堆合者, 没有能力做出精细的区分, 可是, 从表面离散的现象当中看出共同之处, 当然和从表面类似的现象当中看出如何不同有着同样宝贵的学术素质。无论如何, 没有比较, 就不可能知道从哪里着手析离。

在最先追随涂尔干和韦伯的历史学家当中, 就有马克·布洛赫与奥托·欣泽。欣泽从韦伯那里学来了比较方法, 不过, 他的分析还是局限于欧洲。他聚焦于韦伯所称的“法理型”或“科层制”政府形式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分别如何发展, 关注的话题像是委任官员 (commissarius) 兴起的意义, 这种官员并非买官而得 (那是近代早期欧洲的惯例), 因此国王可以随意更换 (Hintze 1975: 267—301)。

至于马克·布洛赫, 他的比较方法取自涂尔干及其追随者, 尤其是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 (Sewell 1967; Rhodes 1978; Atsma and Burguière 1990: 255—334)。他对该方法的界定与他们类似, 也区分了“邻居”之间的比较与彼此时空相隔遥远的社会之间的比较。他基于类似的理由倡导比较方法, 因为这样可以使历史学家“在令人兴奋的追寻原因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Bloch 1928; 参看 Détienné 1999)。

布洛赫的比较研究中有两项特别知名。《国王神迹》(1924年) 比较了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两个邻居, 两国的统治者都被认为拥有治愈瘰癧病 (scrofula) 的力量, 只需要触碰患者即

可。《封建社会》（1939—1940年）考察了中世纪欧洲，但也有讨论日本的章节。布洛赫点出了骑士（knight）与武士（samurai）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也强调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是武士对于其主公（master）的单边义务，一是欧洲的领主（lord）和封臣（vassal）之间的双边义务，如果上级伙伴没有尽到他那一份承诺，下级伙伴有权利反叛（参看 P. Anderson 1974: 435—461）。

二战之后，随着发展经济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政治学之类的分支学科蓬勃兴起，比较研究势头强劲，在美国尤其如此。1958年，《社会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创刊，这就是这股潮流的组成部分（Atsma and Burguière 1990: 323—334）。尽管有许多专业史家依然对比较方法心怀疑虑，但还是有可能指出几块领域，是这种方法已经证明成果丰硕的。

例如在经济史领域，学者们往往以比较视角来看待工业化过程。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出版过讨论德国与工业革命的著述，追随其脚步，历史学家们也探问，其他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国家是遵循还是偏离英国模型，而像德国和日本之类的后起者是否享有相对于其先行者们的优势（Veblen 1915；Rostow 1958；Gershenkron 1962）。

在政治史领域，吸引最多关注的是有关革命的比较研究。这种风格最知名的作品包括巴林顿·摩尔有关“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分析（Barrington Moore 1966），个中涉及甚

广，从17世纪的英格兰到19世纪的日本；西达·斯考切波有关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与1911年的中国的研究（Skocpol 1979），这是她“揭示类似因果模式”的三个个案；以及更为晚近的杰克·戈德斯通的著作（Goldstone 1991），书中探讨了早期现代欧洲、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革命与叛乱。

摩尔对比较方法的使用最见成效的，是通过这种手段来检验一般性说明（他感兴趣的是那些不符合一般性的东西，就好像韦伯感兴趣的是那些缺失的东西）。用摩尔自己的话来说：

24

比较方法可以充当一种粗略的否定性核查，检验公认的历史说明……了解了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德国农业精英与工业精英结盟，也就是广受讨论的钢铁与黑麦的联姻，对于民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你就会好奇，为什么在美国，与此类似的钢铁与棉花的联姻，却没有防止内战的爆发（Moore 1966：第xiii—xiv页）。

在思想史方面，比较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运用得更多一些。比如说，李约瑟作为一名转向汉学的前生物化学家，关注的是说明中国为何未能发生科学革命，而古代史专家乔弗里·劳埃德则比较了希腊与中国理解世界的模式异同（J. Needham 1963；参看 Huff 1993；G. E. R. Lloyd 2002）。

在社会史方面，在马克·布洛赫的启发下，有关封建制的比较研究继续蓬勃发展，既有关于欧洲和日本的讨论，也

包括针对印度和非洲的研究。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提出（Goody 1969），正是由于存在爱攻击马的舌蝇，西非才未能发展出封建制之类的东西，这正是韦伯所谓“缺失的东西”之类研究中最有意思的实例之一。

婚姻模式比较是人口学家约翰·哈伊纳尔一项著名研究的主题，他对比了西欧的晚婚体制与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做法，前者与新婚夫妇需要另立家户有关。哈伊纳尔（Hajnal 1965）又激发了其他一些比较研究，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古迪的一部论著（Goody 1983），他认为，西欧的体制是中世纪教会的产物，它不鼓励亲友通婚，想以此增加从未婚者那里承继财产的机会。此外，历史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运用与韦伯很相似的分析策略，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试图通过比较英国与从波兰到西西里等欧洲其他许多地方的异同，界定英国社会的英国性（个人主义、暴力倾向较低、与资本主义特别契合的文化，如此等等）（Macfarlane 1979, 1986, 1987）。

25 在这份简短的例证清单上再加几个并不困难，但它们或许已经足以表明，比较史学已经产生了不少配得上名声的实质性成就。但它也有其危险所在，尤其是以下两点。

第一种危险，在于过于轻易地接受预设，认为各社会沿循某种无法避免的阶段序列逐级“进化”。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19世纪学者所使用的比较方法，究其根本，就在于识别某个特定社会业已达到的阶段，并将其置入社会进化的阶梯。而在今天的许多学者看来，这种预设似乎不再站得住

脚（参看下文边码第 144 页）。因此，问题变成了在做比较分析时，既避免进化主义，又避免静态立场，韦伯的分析往往就力求这么做；要考虑到社会可能经历的路径（path）不同，或者按照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称法，“轨迹”（trajectories）不同。

其二，还有种族中心论的危险，指出这样一种危险，很可能显得奇怪，因为比较分析一向让人想到，西方学者对各种非西方文化的意识不断增强。尽管如此，这些学者也往往将“西方”当作规范，其他文化都是对它的偏离。

以印度的拉贾斯坦王国的“封建制”为例，这则带有警示性的故事，想成为比较史家的学人或许都得牢牢铭记。1829 年，詹姆斯·托德，一位供职于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向公众展示了他所称的“拉贾斯坦封建体制速写”。托德依据历史学家亨利·哈拉姆此前不久的《中世纪欧洲状况考察》（Hallam 1818），对这两种社会表面上的类似之处大事渲染。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哈拉姆，未能注意到，在印度的个案中，所谓“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家庭关系更为重要（Thorner 1956；参看 Mukhia 1980—1981；Peabody 1996）。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确定究竟和什么进行比较。19 世纪的那些比较方法学者，像是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关注特定文化性质或习俗之间的相似性，却忽视了这些习俗各自的社会背景，而后者往往彼此迥异。有鉴于此，这些学者的分析会像托德的记叙一样，被抨击为浮于表面（Leach 1965）。

26 那么替代选择是什么？功能主义者（参看下文边码第128页）会主张，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社会中的“功能等价项”（functional equivalents）。比如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就注意到，在日本的经济成就（早从17世纪开始）与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和新教教义之间关联的假设之间，存在歧异之处。他提出，日本佛教的某种特定类型发挥了类似的功能，即鼓励类似于“新教伦理”的勤勉工作、节俭生活的精神（Bellah 1959）。

话说回来，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又发现自己面临其他问题。“功能等价项”这个概念只是“功能主义”这个学术套装的一部分，而这个套装已经遭到了强烈抨击（参看下文边码第130页）。无论如何，功能等价项的例证并不总是像贝拉所举的那么清楚明了。我们如何确定什么算是可堪比较呢？批评这种思路的人喜欢说，“你不能拿苹果和橘子相比较”，但在研究社会的时候，谁来确定什么算是橘子，什么算是苹果呢？

比较面临着某种两难。如果我们只比较特定的文化特征，我们就已经限定了某种精确的东西，可以指出其存在还是缺失。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沦为浮于表面。另一方面，如果追寻可堪比较的东西，会导致在不同的整体社会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对于在纷繁多样的方面彼此不同的社会，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出有益的比较或对比呢？

如果我们看看一个著名的实例，阿诺德·汤因比的鸿篇巨

制《历史研究》(Toynbee 1935—1961; McIntire and Perry 1989; McNeill 1989), 宏大层面上的比较也会明显暴露出问题。汤因比的比较单元是整体的“文明”, 他区辨出世界历史上大约 20 个这类文明。当然, 他得将每一个文明化约为一小群特征, 以便使比较成为可能。正如其批评者很快指出的那样, 他也不得不在不同文明之间设置人为界限。

对这样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 汤因比还缺乏足够的概念工具, 这使得事情愈发艰难。帕斯卡尔像个孩子似的自己发明了一套几何学, 汤因比也差不多, 自己创造了一套概念, 像什么“挑战与回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 “退缩与回归”(withdrawal and return), 或是“外部无产者”(external proletariat)——这个术语巧妙借用了马克思的概念, 意在说明“蛮族”如何侵入帝国——但这些术语并不足以支撑其宏大艰巨的任务。你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当时的社会理论更熟悉一些会对他的分析大有助益。比如说, 涂尔干原本可以引导他看到比较方法的一些问题, 埃利亚斯(参见下文边码第 148—150 页)能让他看到视文明为进程的观念, 而韦伯能让他领略如何运用模型与类型。

二 模型与类型

“模型”(model)的初步定义, 不妨表述为一种思维建构,

- 27 它能将现实简化，以便理解现实。它就像一幅地图，其之所以有用，端赖于彻底省略现实的某些成分。它将现实的数量有限的要素或“变量”整合成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系统，其中各部分相互依赖。不妨这样描述“模型”使得我们可以说即使是历史学家，执着于特殊性的历史学家，也随时都使用模型。比如说，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叙事性阐述，也是一种模型，因为它肯定得简化事件，也要强调事件之间的统合，以便讲述一个可以理解的故事。

然而，更严格地使用“模型”这个术语，或许更见益处。我们不妨为这种有关模型的模型增加一个要素：这是一种简化现实的思维建构，意在凸显反复出现的、一般的和典型的东西，表现为一组特征或属性。因此，模型与“类型”（type）成了同义词，这或许并无不妥，因为“typos”就是希腊语里的“mould”或“model”。马克斯·韦伯说“理念型”（Ideal Types, Idealtypen），现代社会学家会说“模型”（Weber 1920: i, 212—301）。成为一种模型的例证的，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革命”，因为自此之后就开始使用这个术语了。

下文将反复出现的一个例证，是两种有关社会的相互对立的模型，一是“共识”模型，一是“冲突”模型。“共识模型”与埃米尔·涂尔干相挂钩，强调社会纽带、社会团结、社会结合的重要性；而“冲突模型”与卡尔·马克思相维系，侧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普遍存在。这两种模型都显然属

于简化处理。但这两种模型也都蕴含着重要的洞见，这一点同样显而易见，至少对于当下的研究者是这样。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不存在冲突的社会，而没有团结，也根本不可能有社会。同样，正如我在稍后的章节中会展示的那样，不难发现，秉承其中一种模型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看起来会忘记另外一种。

有些历史学家会否认与模型有任何勾连，并且如前所见，声称自己的工作就是研究特殊事件，尤其是那些独特的事件，而不是做出普遍概括。然而，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使用模型，只不过就像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使用散文，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这么做。比如，他们通常会对特定的社会做出一般性的陈述。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Burckhardt 1860）就明确地关注作者所称的“反复出现的、持续存在的、具有典型性的因素”。刘易斯·纳米尔在其《乔治三世即位时的政治结构》一书中，考察了18世纪的英国“人们为何进入国会”。在最近一百年左右，历史学家发现难以避免“封建制”、“资本主义”、“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之类一般性术语。他们为了回避“模型”这个词，往往会允许自己谈论某种“体制”（system），“封建（体）制”这个措辞就可以回溯到18世纪；或者谈论中世纪庄园之类现象的“经典”形式或“教科书”形式。

德国经济史家沃纳·桑巴特曾在一篇颇具争议的名文中（Sombart 1929）告诫经济史学者，他们需要自觉地使用经济学理论，理由是这样才可以从研究孤立的事实，转向考察体系

（参看 Hicks 1969：第一章）。而这些体系一般都会以简化模型的形式加以讨论。因此，尽管经济史学家使用“重商主义”这个术语，但正如瑞典学者埃利·赫克舍尔所言，“重商主义从未以存在科贝特或克伦威尔这样的人的意思存在于世。”它就是一种模型，事实上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Adam Smith 1776）中使用的两种模型之一，后者在书中提出了“农业体制”和“商业体制”这一著名对立（Heckscher 1931：1）。

“资本主义”是另一个经济史家极难舍弃不用模型。俄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的经典研究中所分析的“农民经济”亦是如此（Chayanov 1925；参看 Kerblay 1970）。而城市国家这种经济组织类型，同样描述成强调反复出现的特征的模型形式比较好。比如说，城市对于周遭乡村在政治上所享有的支配地位，往往伴随着以低价榨取一定份额的食物，因为城市政府更担心的是因为缺少粮食而造成的城市骚乱，而不是农民反叛（Hicks 1969：第42页以下；参看 Burke 1986：140—152）。

文化史乍看起来是最不适合采用模型来研究的领域，然而……诸如“文艺复兴”“巴洛克风格”“浪漫主义”之类的术语，如果不是指称一组特征，又能是什么？或者以“清教主义”为例。借用赫克舍尔的话，不妨说，清教主义从未以存在新教布道家理查·薛伯斯（Richard Sibbes）或约翰·班扬这样的人的意思存在于世。但要用这个术语来指称一组特性的聚合，像是强调原罪、专断的上帝、预定论、苦行道德，以及

对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式解读，或许也很有用。就现代早期英国的情形而言，这种精确的定义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你只要对跨文化比较感兴趣（比如比较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最好是效仿厄内斯特·盖尔纳，使用“一般清教主义”（generic puritanism）这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苦行主义、原教旨主义，但不包括像原罪这样的特征（Gellner 1981: 149—173）。29

转向政治领域，我们会发现，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都已经觉得“革命”成了一种无法舍弃的模型，并往往将之与“叛乱”观念相对立（后者被界定为一种针对个体或虐待的反抗，而不是一种改变整体体制的尝试）。他们为时空相距遥远的多场革命给出了类似的说明。其中有些学者还使用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著名的社会学假设。根据这一假设，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在最糟糕的时期，倒是更多发生在状况趋于恶化的时期，更准确地说，是在特定群体的期望与其对于现实的感知之间出现歧异的时候。

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业已提出，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共同之处（但也是使之有别于那些不太成功的叛乱之处），就是以下两种因素的融合：一是“外部更为发达的国家”给国家造成的“压力增强”，一是“助长农民广泛反叛地主”的农业结构。这些国家陷于“交叉压力”之间：一面是国际强权竞争愈演愈烈，另一面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约束了政府所能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杰克·戈德斯通在有关现代早期欧洲与亚洲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生态变迁至关重要，它导致

人口变迁，并就此导向“国家崩溃”（Skocpol 1979，相关批评参看 Aya 1990：73—75，90—92；Goldstone 1991）。

回到相邻的比较：历史学家往往尝试对某个特定时期相邻国家的制度变迁进行普遍概括，并且想出“新君主国”“都铎王朝的政府革命”“绝对主义的兴起”“19世纪政府革命”之类的用语。从比较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变迁都更像是从马克斯·韦伯所谓“家产制”到其所称“科层制”政府管理形式变迁诸阶段的局部例证（Weber 1920：iii，956—1005）。

韦伯的这种区分已经激发了相当一批历史研究，涉及从拉美到俄国的众多区域。（研究的实例参看 Pintner and Rowney 1980；Litchfield 1986。比较思路可参 Mann 1986—1993：第二卷，第444—478页。）或可从以下六个相互对立的属性的角度来梳理：

30

家产制

1. 司法界域不定
2. 非正式等级秩序
3. 非正式培训与考核
4. 兼职官吏
5. 口头命令
6. 有所偏倚

科层制

1. 司法界域限定
2. 正式等级秩序
3. 正式培训与考核
4. 全职官吏
5. 书面命令
6. 无所偏倚

这种区别并非好体制与坏体制之别，甚至也不在于高效

体制与低效体制之别（虽说“效率”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是在科层体制下才兴起的）。重要的是，两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完好“契合”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它们各有其益处，也各有其代价。科层制的无所偏倚（impartiality）意味着平等（equality）意义上的公正（fairness），但也意味着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对于个体之间的差异，抱持一种制度化的无所系怀。遵循规则或许能增进效率，但也可能降低效率，让人们囿于“官僚作风”。与科层制相维系的，是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国家的视角”（Scott 1998），即对于信息的理性和标准化，以服务于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计划，伴之以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蔑视，并往往导致灾难。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对模型心存疑虑，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相信，使用模型会导致忽视历时变化。有时候确实如此。比如，韦伯就曾经遭到公允的批评，说他在讨论“清教主义”时忽视了变化，仿佛从16世纪的让·加尔文到18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这套价值体系一成不变。

然而，模型是能够融入变迁的。比如说，可以不聚焦于科层制，而是科层化的过程。对照模型（antithetical models）或许是概括复杂变迁过程的特征的有益方式，比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或者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些标签当然只是描述性的，并没有说出变迁是如何发生的，但已经有了许多确定典型变迁序列的尝试，就像下文（边码第142页）将详细讨论的“现代化”模型或理论。

31 使用模型，却不承认自己正在这样做，或者不曾意识到这些模型的逻辑地位，有时会置历史学家于无谓的困境之中。有些著名论战就是源于某位历史学家对另一位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模型的误解，以下两例个案研究或许能有所体现：其一，保罗·维诺格拉多夫爵士与 F. W. 梅特兰曾经广为人知的关于中世纪庄园的论战。维诺格拉多夫提出：

普通庄园的结构始终不变。在领主的领导之下，我们发现有两层人口，一是维兰（villeins），一是自由佃农（freeholders）。而庄园所占据的土地也相应分为直领地（demesne land, 其产出直接归领主）和“贡地”（tributary land）。全体人口组成一个村庄共同体，其中心是庄园法庭或称领主法庭（halimote），兼具议事与审判之职能。我的考察将必然遵循这种典型的布局。（Vinogradoff 1892：223—224）

这就是在无数黑板上被勾绘过的“经典的”中世纪庄园。然而，梅特兰在其同样经典的批评中（Maitland 1897）提出，“要描述一种典型的‘manerium’（庄园）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功绩”。他揭示道，在维诺格拉多夫识别出的那组特征中，每一项特征都会在一些实例中付之阙如。有些庄园没有维兰，有些庄园没有自由佃农，有些没有直领地，有些没有法庭。

在这些方面，梅特兰绝对是正确的。维诺格拉多夫对于自

己的概括的逻辑地位似乎并不确定（请注意，引语中第一句的“始终”到最后一句转成了“典型”）。但假如意识到自己是在使用模型，他便有可能更有效地回应梅特兰的批评。

关键在于，不妨根据每组实体——在本例中就是庄园——的归属标准，区分出两种模型。在这一点上，使用技术术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区分出“一元的”（*monothetic*）实体与“多元的”（*polythetic*）实体。所谓一元组，即“根据定义，拥有独特的一系列属性是归属资格的充要条件”。而所谓多元组，即归属资格并不依赖于单一的属性。组被定义为这样一系列属性，每一个实体都拥有其中绝大部分属性，而每一个属性也都被绝大多数实体所共享（R. Needham 1975）。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的角度来描述这种情形。母亲与儿子，兄弟与姐妹，彼此相似，但这些相似性或许不能化约为任何一项根本特性。

应当明白，梅特兰对于维诺格拉多夫的批评乃是假定，后者是在谈论所有的庄园，或是诉诸一元组来界定“典型的”庄园。如果当时有这一概念可用，维诺格拉多夫原本可以说自己的模型是多元组的，以此回应梅特兰这种批评。那样的话，他要做的就是展示出，自己的特性集合中每一种属性都由绝大多数庄园所共享。有位苏联历史学家对13世纪剑桥地区的庄园做过统计研究，他的确发现，其中超过50%符合维诺格拉多夫的类型，拥有直领地、维兰地和自耕地（Kosminsky

32

1935)。

至于第二个例证，我们不妨来看看“阶级”模型。即使不是所有社会，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也都存在财富及地位和权力等其他有利条件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要描述主宰这种分配的原则，以及这些不平等所生成的社会关系，没有一种模型是很难办到的。社会行动者本身就常常使用空间比喻，无论他们说的是某种社会“阶梯”或“金字塔”，还是“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或者把个体或群体描述成“仰视”或“俯视”其他个体或群体。社会理论家也同样如此。“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基础与上层结构¹）”就是从地质学与建筑学借来的比喻。

社会结构最知名的模型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提出的模型，尽管其实他在《资本论》中讨论“阶级”的章节只剩寥寥数行，然后接着令人心痒难熬的编者注“此处手稿中断”。人们不断尝试，像拼图游戏一般，从马克思其他著述中辑录只言片语，凑在一起，补充缺失的章节（Dahrendorf 1957: 9—18）。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特定功能的社会群体。地主、资本家和除了自己双手其他一无所有的工人是三大社会阶级，对应于古典经济学中三大生产要素：土地、资本与劳动。这些阶级功能不同，这使得他们利益相互冲突，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因此，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

1. 即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

争的故事。

这一模型最常遭到的抨击，也是最欠公允的抨击，就是说它过于简化。可模型的功能就是简化，以使现实世界更能被理解。比如说，研究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史学家基于官方档案，比如人口普查资料，发现用于描述人口的是一些令人困惑的行业范畴。要对英国社会做出整体概括，就必须设法将这些范畴归拢成一些更为宽泛的类别。马克思就提供了一些宽泛的范畴，并且说明了自己做出选择的标准。他赋予了社会史“骨架”，这正是后者有时被指责为缺乏的东西（Perkin 1953—1954）。诚然，他强调自己眼中三大阶级之间的差异，这会以牺牲这类群体内部的诸多变异为代价，他也忽略了边缘性的个案，比如自我雇用的人们，他们难以归入他的范畴，但对于某个模型，只能期望进行这类简化处理。

33

更让人担心的是，马克思的模型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简单明了。评论者们已经指出，他在几种不同的意涵上使用“阶级”这个术语（Ossowski 1957；Godelier 1984：245—252）。有些情况下，他区分了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然而，另有些情况下，他又只区分了两大阶级，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冲突的对立双方。有时候，马克思会使用广义的阶级定义，由此，罗马时期的奴隶与平民、中世纪时的农奴与学徒期满的雇工都属于同一阶级，与贵族、领主、行会师傅等相对立。而另有些时候，他又采用狭义的阶级定义，由此，法国农民在 1850 年时还不算

一个阶级，因为他们缺乏阶级意识，换句话说，缺乏一种彼此之间超越地域边界的团结感。根据他的说法，他们只是彼此相似但各自分离的个体或家庭的某种聚合，就好像“一袋马铃薯”。

阶级意识值得再作一点讨论。这个用语意味着，阶级是一种几近涂尔干意涵上的共同体。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阶级内部，是否会像阶级之间一样存在冲突。有鉴于此，阶级内部独立的“集团”的观念就被引入了马克思的分析。“被强加”或“被指派”的阶级意识这样的术语被塑造出来，以便讨论一种特殊阶段的“工人阶级”，即其成员缺乏必要的团结意识。我必须承认，我不觉得这种所谓无意识的意识的观念有何帮助。阶级“利益”这样的语言肯定更为明确，不那么有误导性。

最近大约20年以来，历史学家使用“阶级”这一术语的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他们过去往往当它是一桩社会事实，而现在，他们认为它本质上或主要是一种语言现象。在研究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那里，这种变化最为明显。有关“阶级语言”的研究可以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只是到了80、90年代，语言在意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就是在社会阶级的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才开始受到强调（Briggs 1960；G. S. Jones 1983；Joyce 1991；Feldman 2002；尤见第201—206页）。这个转变当然属于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当中更为整体性的“语言学转向”的一部分，聚焦于“话语建构”，

不仅是阶级的“话语建构”，而且是部落、种姓与国族的“话语建构”（详参下文边码第 175 页）。

三 计量方法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见，维诺格拉多夫与梅特兰之间的争论是靠清点庄园来解决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然而，计量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运用，在整个上一代人那里都是某种争论主题。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倡导这些方法的人自信满满，咄咄逼人，批评其他路数“纯属凭印象说话”，要运用科学的语言（而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的人所使用的房间也可以被称为“实验室”），宣称历史学家别无选择，必须学习电脑编程。但到了 80、90 年代，出现了对这种风潮的反动，导致“微观史学”（详参下文边码第 38 页）兴起。时至今日，或许进行更为平衡的分析的时机已经成熟。

34

计量研究方法其实源远流长。古罗马时期就有对帝国的定期人口普查，而在 18 世纪的法国，还会刊布不同城市的谷物价格。经济学家早就开始基于价格、生产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来构造自己的分析。而经济史学家在 19 世纪也已开始仿效他们。

比较新颖的想法，也是依然存有争议的想法，是认为计量方法也能用于研究其他形式的人类行为甚至是态度。比如说，

社会学家发放调查问卷，进行他们所称的“调查分析”；或是对一群人实施访谈，其数量要大到足以从统计上分析搜集的答案。心理学家也使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政治学人研究投票统计数据，这种路数也被称作“选举学”（psephology）；还进行民意调查，这也是一种社会调查。人口学家研究不同社会的出生率、结婚率、死亡率的变化。更具争议的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人进行所谓的“内容分析”，其形式往往是对报纸、杂志、书籍或电视节目进行量化研究，考察有多少篇幅被分配给某项特定的话题，特定的关键词出现得多么频繁，如此等等。

有不少历史学家追随了这些路径。吉尔伯托·弗雷雷（Freyre 1959）在撰写其19世纪晚期巴西历史时，向几百位那个时期出生的健在者发放了调查问卷（包括总统热图里奥·瓦加斯¹，但他未能应答）。内容分析法或“词汇测量法”（lexicometry）也被用于历史档案，比如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城
35 乡各地发出的陈情书的辑录。历史人口学家清点教区登记簿及类似史料来源中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个人电脑的兴起也推动了历史学家使用计量方法，他们不再需要去制作穿孔卡片，咨询编程专家，虽然说几乎就在同时，针对这些方法的反对之声也愈益壮大，认为这些都是伪科学（详参下文边码第38页）。

话说回来，计量方法可不是只有一种。其中有一些对历史

1. Getulio Vargas, 1882—1954年，两次任巴西总统（1930—1945；1951—1954）。

学家来说更为适合。系列统计分析可谓根据历史学家的需要量身定做。它能够以时间为基轴揭示下列事项的变化，比如谷物的价格，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意大利选举中共产党的得票率，每年莱比锡书展上拉丁语书籍的数量，波尔多居民参加复活节礼拜日圣餐会的人数比例，等等，这就是法国人所称的“系列史”（serial history, *histoire sérielle*）。

不管怎么说，“量化历史”（quanto-history）也好，“计量史学”（cliometrics）也罢，称法有很多，形式也是多样的。以历史调查分析为例，可以明显区分出总体调查和样本调查。对罗马元老院和英国议会做研究可以研究其所有成员的生平，这种方法叫做“集体传记分析”（prosopography）。在这类案例中，研究对象是整个群体，或统计学家会说的“总体”。这种方法适用于研究相对较小的精英集团，也适用于信息较少的社会，这样的话，研究这些领域的史学家就应该去收集所有能找到的数据。

另一方面，研究工业社会的历史学家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往往超出自己可以处置的能力范围，因此不得不靠抽样方法来推进。抽样技术就是17世纪晚期以降的统计学家发展起来的，以求估算比如伦敦或是法国的人口，而不用费劲耗费成本进行全面调查。问题变成选择一个能够“代表”总体的小群体。

比如说，吉尔伯托·弗雷雷尝试找到1000位特别的巴西人，要出生于1850年至1900年间，能代表该国各主要地域群体和社会群体，尽管他并未说明用什么方法来选择这一样

本。保罗·汤普森根据男女性别、城市乡村、北方南方等等维度的比例关系，与当时全国普遍的比例关系相符（从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计算得出），实施“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选取了500位经历过爱德华时代的人进行访谈（Freyre 1959；P. Thompson 1975：5—8）。

36 其他计量方法更为复杂。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新经济史”，其不同于旧经济史之处，就在于它注重测量整个经济体的表现，计算过去的国民生产总值，尤其是1800年以来的西方国家，统计数据和从前相比，更加丰富，也不那么靠不住了（Temin 1972）。这些史家的结论也往往呈现为某种经济“模型”的形式。

不妨回到布罗代尔，权作一桩简单的例证。他是这样描述16世纪晚期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的。人口：6千万。城市人口：6百万，或10%。生产总值：每年12亿达克特（ducats），或人均20达克特。粮食消费：6亿达克特，生产总值的一半。穷人（年收入低于20达克特的人被定义为此类）：人口的20%到25%。政府税收：4千8百万达克特，换言之，低于平均收入的5%（Braudel 1949：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节）。

这种整体描述就是一种模型，因为（正如其自承）布罗代尔并不拥有整个区域的统计数据，不得不基于局部数据进行外推，而这些局部数据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样本。研究工业经济体的历史学家拥有比较丰富和精确的数据，其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可以表述为方程式的形式，模型更像是配方，因为有可能

针对给定的产出，规定投入（劳动、资本等等）的具体数量。这类模型可以借助某种实验即计算机模拟来加以检验。历史人口学家也已经利用了计算机模拟。

在有些史学领域，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价格和人口变动的考察，不运用计量方法是不可能的。在学科的有些领域使用这些方法，会促使其他历史学家慎用“多少”“兴衰”之类的词语，先扪心自问，在做出无疑属于量化的陈述之前，是否有量化的证据。这种路数也使比较方法的优势更趋明显，更加彰显两个社会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两个社会当中像是城市化程度和识字率之间可能有的相关关系。

话说回来，计量方法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资料来源并不像通常假定的那样精确或客观。不难指出，一项普查会包含种种错误和遗漏，更宽泛地说，它的许多基本范畴（“佃仆”“公民”“穷人”等等），无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点上多么有用，也是不精确的（Burke 1987: 27—89）。比如，社会阶级就不像纷繁多样的植物物种那样客观。它们与各群体看待自身或他人的刻板印象化的方式大有关系（详参下文边码第112页）。

不过，使用计量方法的人的巨大困难，还在于众所周知，37可以测量的“硬”数据与不可测量的“软”数据存在差别。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曾经实施过大量社会调查，按照她令人遗憾的评论：“情况往往是软数据更为价值，而硬数据更容易获取。”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寻找“可以依赖的硬

事实来充当软事实的合格指标。”

所谓指标，不妨定义为某种本身可以测量、但可以关联到不可测量的东西或随之变化的东西（因此就有了相关性 [correlation] 或协变性 / 协方差 [co-variance] 这样的技术术语）。有些学者已经表明自己在寻找指标方面非常机敏。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 F. S. 蔡平（F. S. Chapin）宣称，特定家庭起居室里的家居陈设，通常与该家庭的收入和职业存在相关性。因此，在测量社会地位时，起居室陈设就成了一项指标。在所谓“起居室量表”上，举例来说，一部电话或收音机得分就很高（+8），而一台闹钟的得分就很低（-2）。

但还有一个问题，收入和职业是否是“地位”的精确指标（而不是模糊的标示），而“地位”本身又是一个颇为不精确的概念（详参下文边码第62页）。同样，乍看起来像是个指标的，有可能证明自有其变异规则。曾有一段时间，研究识字率的历史学家相信，诸如结婚登记簿上的签字等是反映阅读能力的好指标，哪怕不能反映写别的任何东西的能力。但到了晚近，人们产生了怀疑。有学者指出，有的人会阅读但没有能力签名（因为有的学校教人阅读但不叫人写字），甚至有的人本来会写字，但为了不让不识字的配偶难堪，自己也就画个押了事。这些异议都不是无法克服的，但它们的确再次凸显出从硬数据到软数据的转化存在诸多困难（Tóth 1996: 61—62）。

宗教社会学家必须处理的问题甚至更为尖锐：要找到指标来测量宗教信仰的强度或正统性。在基督教世界，这样的指标

往往紧扣参加大小教堂礼拜的数据，或是在法国或意大利这样的天主教国家，追踪复活节领圣餐的人数。有位机敏过人的法国史家甚至试图通过衡量教堂圣像前消耗蜡烛重量的减少，来计算 18 世纪普罗旺斯地区宗教热情的衰减（Vovelle 1973）。

诸如此类的统计指标都有各自的故事，这一点基本没啥疑问，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区域之间有相当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相当的变化，有时还颇为突然。至于历史学家是否有能力解读这样的故事，那另当别论。如果我们打算用圣餐领取的统计数据来研究特定地区的宗教虔诚的强度，就需要了解对于所涉民众而言，复活节圣餐仪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还需要了解其他事项）。我们难以确知，19 世纪奥尔良地区的农民是否也和正统教士一样，认为尽到自己“复活节义务”很重要。如果他们并不分享这些认识，那就不能把缺席圣餐仪式作为去基督教化的一项指标。要测量某个共同体的宗教热度究竟是炽热、冷淡还是温吞，绝非易事。

从投票统计数据来推断政治态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事实上，“系列”这个观念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它有赖于事先预设，所研究的对象（遗嘱、粮食价格、去教堂做礼拜等等）的形式、意义之类都不会因时而变。但这些文档或实践又如何能够在漫长的时期中保持不变呢？而如果测量工具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你又如何能够测量变迁呢？

有鉴于此（以及其他原因），出现对于人类行为研究中使用计量方法的某种反对也就不无道理了。倡导这类方法的那些

宏大主张也面临更多的质疑。当然，也不该夸大这种反对之声的强度。历史学家使用集体传记分析的普及程度或许前所未有的，也难以否认比较过去不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尝试或进行家庭重构的价值。同样，对于替代思路的探寻也已启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始终最少使用计量方法的民族志已经成为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决意追随的模型。与这种民族志路数相维系的，是对于小型对象的深度研究。

四 社会显微镜

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一样，也普遍采用计量方法，关注千百万人的生活，聚焦于分析整体趋势，按照社会学家凯伊·埃里克森（Kai Erikson）的讲法，“从十二层楼上”俯瞰社会生活。不过，到了70年代，其中有些人从望远镜转向显微镜。社会学家追随社会人类学家的引导，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微观社会分析，而历史学家也更多地转向所谓“微观史学”。

39 有三项著名研究大大促进了微观史学的地位上升。其一，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研究巴厘岛斗鸡的论著。格尔兹借用杰里米·边沁的“深层游戏”（deep play）概念（换言之，争夺的赌注更高），认为斗鸡是“根本上属于对地位的关注”的戏剧化”。他就此从其所称的“显微例证”转向对于整

个文化的解释 (C. Geertz 1978: 912—954; 尤其是第 432、437 页)。¹ 这篇文献被历史学家频繁引用, 对于理解微观史学而言至关重要。

另两项研究关注的是过去: 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Le Roy Ladurie 1975), 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Ginzburg 1976)。两者都是基于宗教裁判所审讯可疑异端分子的笔录, 金兹伯格将这些文献比作录像带, 因为不仅被审讯者所说的话, 而且他们的举止细节, 甚至在酷刑下的呻吟, 都被逐一记录在案。有时还有人将宗教裁判官与人类学家做比较, 两者都是地位尊贵的局外人, 他们向普通人提出的问题常常使后者不明所以 (Rosaldo 1986)。

不妨将金兹伯格的书记作把微观史学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例证, 因为它致力于重构观念, 并且只是一个人的宇宙观, 并且是区区 16 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位名叫“梅诺其奥”(Menocchio) 的磨坊主。而在勒华拉杜里这边, 他描述的是 14 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他注意到, 受到宗教裁判所传唤的来自蒙塔尤村的异端分子嫌犯就不下 25 位, 于是决定用这些人的证词来撰写一部关于村庄本身的研究, 讨论该地区的畜牧经济、家庭结构、女性地位, 以及有关时间、空间、宗教等等的地方性观念。

1. 原文如此, 此处著作年份和具体页码均显然有误。

在勒华拉杜里和金兹伯格的这些著名研究发表之后，又涌现出一大堆微观历史著作。其中最有意思的几部聚焦于某种戏剧性的意外事件，比如一场审判，或是一起暴力行为。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写过16世纪法国的一起著名讼案，有个农民被指控冒名顶替另一位男人。还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伯特兰·怀亚特—布朗受到格尔兹的启发，描述了1834年密西西比州纳奇兹（Natchez）的一桩私刑，分析了这起针对一个谋杀了自己妻子的男人的“民众司法”行为，视之为“一幕道德戏剧，其中的行动所操的语言，揭示内在激情和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当地的荣誉感（Wyatt-Brown 1982: 462—496，引自第463页）。

这种路数的另一个著名例证，出自乔瓦尼·莱维，研究的是17世纪晚期皮蒙特（Piedmont）地区一个叫作桑特纳（Santena）的小城。莱维（Levi 1985）分析了对当地教区神父焦万·巴蒂斯塔·基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审判（他被指控用非正统的方式进行驱魔），视之为一场社会戏剧，揭示了分割共同体的冲突，尤其是两大家族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争斗。他强调了其所称“非物质性承袭”的重要性，认为基耶萨的精神力量是其家族所实施的支配的另一种形式。

转向微观史学的趋势与历史学家对社会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密切相关。勒华拉杜里、金兹伯格、戴维斯和莱维都饱读人类学。微观史学的方法非常类似于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家所做的社区研究，或是40年代马克斯·格吕克曼等人探索的

“扩展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study)。第一例蒙塔尤类型的历史社区研究出自瑞典民族学家伯耶·汉森,他在50年代研究了厄斯特伦(Österlen)村庄。而《蒙塔尤》本身也有意识地仿效了对安达卢西亚、普罗旺斯和东英吉利亚等地的社区研究的模型(Hansen 1952)。

尽管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自己的著述主要关注宏大趋势流变,但他对权力的讨论不仅在于国家层面,而且涉及工厂、学校、家庭和监狱,即其有时所称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所以也推动了微观研究。福柯所描绘的这幅微观物理学图景并不只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当权力“延及个体的纹理,触摸其身体,渗入其行动和态度,他们的话语、习得过程乃至整个日常生活”,这时的权力展现出的“毛细血管”(capillary)形式或分支形式(Foucault 1980: 89; 参看 Foucault 1975: 全书各处)。上文提到的莱维的研究就为这种观念提供了生动的历史例证。

从大范围研究转向小范围研究引发了某些根本问题,我们需要在此做些讨论。不妨首先来看看其中一项指责:微观史家研究无关紧要的人的生平,或是小型社区的种种麻烦,把历史给琐碎化了。属于这类体裁的有些作品的确大致相当于讲述了新闻记者所称的有关过去的“逸闻趣事”。然而,微观史家的目标往往更具智识上的雄心。他们会像福尔摩斯那样提出,“对于琐屑细节的观察”能够得出重要的结论(Muir and Ruggiero 1991: 第vii—viii页)。即使这些史家并不妄求从一

沙一尘中揭示整个世界，他们也的确宣称要从地方素材中概括出整体性的结论。在金兹伯格看来，磨坊主梅诺其奥就是传统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华拉杜里说蒙塔尤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他通过自己有关蒙塔尤的专著，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世界。

这些主张都很成问题。个案研究相对于什么样的更大群体而言具有典型性？这种诉求的理据何在？蒙塔尤代表的是地中海村庄、法国村庄，还是只是阿列日省（Ariège）村庄？一个村庄里有那么多异教嫌疑分子，还能算什么典型？说到梅诺其奥，他很坚持做自己，似乎在自己的共同体里被视为怪异之人。问题当然不仅限于这两位史家。人类学家基于哪些手段，把自己（往往只是基于在一个村庄做出的观察）的田野笔记转化成对于整体文化的描述？格尔兹有个说法广为流传，说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庄，而是“在村庄里”进行研究。那么，他们又基于什么理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就能代表所谓“努尔人”或“巴厘人”？

不过，还是有不少理据可以为使用社会显微镜做辩护的。如果某个个例确实能以缩微的方式代表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基于其他理据）已经知晓普遍存在的某种情境，那或许有助于选择对该个例进行深度研究。同样，也有人强有力地指出，在大范围和小范围上进行研究，就会有不同类型的说明。而范围的变化使人们得以从不同的立场看社会过程，会对后者有更为生动的刻画。像布罗代尔这样更偏好望远镜的史家，往

往往会强调决定机制，而在显微镜下，更可见的是个体的自由 (Revel 1996: 87, 141)。

尽管微观史学的兴起属于针对计量方法的反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从人群中分辨出个体面容的尝试，但也有一些践行者，即相对于金兹伯格之类“文化取向”微观史家的所谓“社会取向”学派，注重分析社会网络 (Cerutti 2004)。网络的概念似乎在以下三块领域里多有应用，但各自为战：传播研究、城市研究和社会人类学。

正是这里的第三组学者，即由马克斯·格吕克曼为首的所谓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启发了毛里奇奥·格里包迪和西蒙·切鲁蒂等微观史家。他们不满于“手工业行会”“社会阶级”“通俗文化”之类的范畴，因为这些范畴不能说明特定的个体如何行事，所以这些史家力图重新构建基于自我的社会网络，以揭示人们如何界定自身，就他们的社会“策略”给个说法 (Gribaudo 2004)。

并不是所有的微观史家都关注典型性。相反，之所以选择某个个案进行研究，可能恰恰是因为它属于特例，可以展示社会机制如何失效。意大利史家爱德华多·格伦迪造出“例外的常态”(the exceptional normal)这个词，就是要讨论这种情形。多嘴的梅诺其奥因为传播异端邪说被处死，他的悲剧命运的确能够告诉我们其同时代人中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些特性。像骚乱之类的公开冲突也能够揭示一些特别的社会张力，它们始终存在，只是偶尔显露可见。

此外，像乔瓦尼·莱维这样的微观史家，会聚焦于某个个体、某桩意外或某个小型社区，以之作为一个拥有便利优势的位置，来观察大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有失统合之处，那些漏洞，那些结构的缝隙，可以让个体有那么一点自由的空间，就像两块岩石之间生长出来的植物（Levi 1985, 1991）。不过，也应当指出，社会规范之间的不相协调并不总是有利于个体。在重重岩石之间生长的植物，或许已被碾压扼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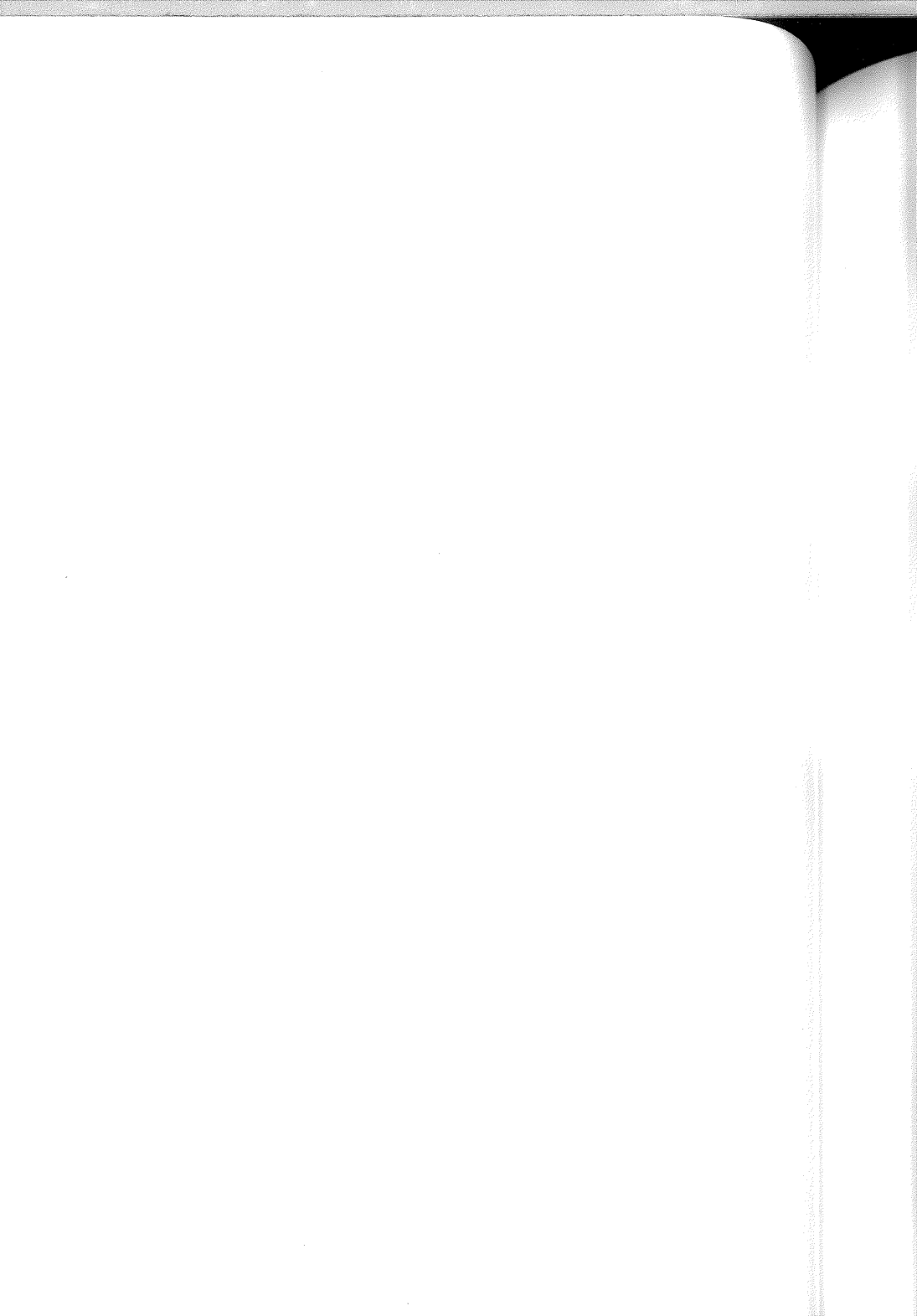
作为这一问题的示例，不妨来看看日本历史上一桩著名的意外事件。这场社会戏剧只涉及当时的寥寥数人，但此后一直被铭记至今，因为其示范价值或符号价值，多次被改编成戏剧和影视。故事里有“四十七浪人”。18世纪初，两位贵族在作为当时日本实质统治者的幕府将军庭上发生争执。第一位，浅野长矩（Asano），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用自己的剑刺伤了另一位贵族吉良义央（Kira）。由于在幕府将军庭前使用自己的剑，作为惩罚，浅野长矩被命令行切腹自杀之礼。这样一来，他属下的武士就成了无主之人，或曰浪人。这些前家臣决定为自己主公报仇。他们耐心等待，时间长到足以平息一切疑虑，然后在某个夜晚突袭吉良义央的宅所，将其处死。事毕之后，他们向朝廷投降。朝廷本身，面临两难困境。家臣们显然违背了法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行使了武士当中对于荣誉的非正式规则所要求的正义之事，根据这样的规则，对自己主公的忠诚属于最高德性之一，而幕府朝廷也支持这样的规则。摆脱两难困境的办法，就是命令这些浪人追随其主公，行切腹自杀之

礼，但也对他们表示追悼（Ikegami 1998: 223—240）。

无论彼时，还是此后，这个故事及其所引发的争论都深深吸引了日本人，这显然与它彰显（事实上是戏剧性地彰显了）根本性的社会规范之间的潜在冲突的方式有关。换句话说，它告诉了我们德川文化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微观史学思潮想摆脱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那么践行微观史学的学者就需要证明小型社区与宏观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时代，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互动（详参下文边码第 186 页）对于我们已属老生常谈，史学家与理论家都愈益自觉意识到这种需要（Hannerz 1986; M. Sahlins 1988）。

43





本章的主旨就是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如何或可能如何运用社会理论家们创造出的那些概念工具，或者，鉴于显然不可能在短短数页篇幅内考察所有概念，至少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少数几个概念工具。其中有些概念，比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早已普遍运用于史学实践，在此将不予讨论。其他一些概念，像是“阶级”或“社会流动”，史学家们固然已很熟悉，但有关其用法的诸多争议却未必为人熟知。还有一些概念，比如“霸权”或“接受”，依然令人相当陌生，通常被视为某种专业行话。

历史学家往往指责社会理论家嘴里说的，笔下写的，尽是一些难以理解的“行话”。英国知识分子相较于其他大多数人，或许更倾向于相互指责对方犯下这等罪恶，这还得感谢绅士作派业余爱好者的传统的延续。在这类情形中，“行话”无非意味着别人的概念。

我们不妨假定，对日常语言的每一点偏离都需要给出正当性辩护，因为它使得与一般读者之间的沟通愈发困难。但仍最低数量的来自社会理论的术语是大力推荐历史学家采用

的。这些术语中有些属于日常语言中根本没有对应表达，而如果找不到一个词语来指称，我们就可能无法注意到社会现实中某个特定的侧面。还有些术语的界定比其在日常语言中的对应表达更加精确，从而有可能做出更加精微的区辨，更加精谨的分析。

对社会理论的术语还有一种异议，值得更认真地考虑。一位历史学家很可能会问，为什么有必要为当时的人（理论家们会说是“行动者”）用来理解其所处社会的概念，找到现代的替代表达？说到底，当时的人是从内部出发来了解其所处社会的。17世纪法国村庄的居民对于其所处社会的理解，无疑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得更好的。根本不存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替代。

对于这一点，有些理论家至少抱有相当的同情理解。人类学家尤其强调，需要研究普通人是如何体验其所在社会的，研究他们用来领会所体验世界的那些范畴或模型（就“模型”这个术语的广义而言）。事实上，不妨认为，即便是一向关注重构往昔的立场的历史学家，也能从这些学者的巨细靡遗的态度中有所借鉴。后者就是这样重构了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当地人的观点”（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重构了他们所研究的文化或亚文化中使用的概念与范畴。他们与传统史家不同，在官方正式的范畴之外，也给予非正式的范畴同样的关注。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复原其所称的“民俗模型”（folk model）或行动“蓝图”，没有这些，大部分人类行为将无法理解（Holy and Stuchlik 1981；C. Geertz 1983：55—72）。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用现代模型取代民俗模型，而是作为补充。当时的人对于其所处社会的理解并非完美无缺。后世史家起码拥有后见之明和更具全局性的观察角度。至少在国家层面上，他们甚至可以说比农民自身更好地理解 17 世纪法国农民（姑且如此合称）的种种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自缚手脚只谈地方性范畴，将难以理解法国历史，更不要说欧洲历史了。正如前章所示，历史学家常常就特定时期广袤区域（比如欧洲）做出整体陈述。他们还进行比较。为此，他们已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些概念，如“绝对君主制”“封建主义”“文艺复兴”等等。

我愿意指出，这些概念尽管依然有用，但已不够充分。大可建议历史学家去学习社会理论的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者的多种语言。本章所提供的不妨称之为入门性的用语手册，或者换个比喻，是一个基本工具箱，适合用于历史分析中一些最常见的难点。这个比喻其实有些误导，因为概念并不是中立的“工具”。它们往往附着大量假设，需要谨慎核查。因此，本章会关注所考察的概念的原初意涵与语境。既然概念的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应用上，那么我在讨论每个术语时也都会扣合具体的历史问题。

话说回来，本章并非只写给历史学家看，也是写给社会理论家看的。历史学家有时被指控说无偿盗取理论，或是如此依赖理论家，几乎验证了斯宾塞的嘲弄之语（参见上文边码第 8 页）：历史学家负责搬砖，社会学家盖起大厦。恰恰相反（我

就持这种主张），历史学家确实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回报。

社会理论中使用的主要概念，都是出自研究19、20世纪西方社会的学人（或者在人类学这里，是研究所谓“原始”或“部落”社会的西方学人）。有鉴于此，即使措辞节制，也有很大把握说这些概念是有文化限定性的。它们往往与有关社会行为的理论相关联，而社会行为也同样是有文化限定性的。因此，要用到世界上其他地区，或是其他时期，都需要对它们加以调整，而非径直“应用”。

比如说，古典经济学的那些所谓法则，就不一定是普遍性的。亚历山大·恰亚诺夫（Chayanov 1925）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对于农民家庭不起作用，只要家庭的需求还没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不顾收益的递减，不断开垦边际土地（Kerblay 1971）。在已故的波兰经济史名家维托尔德·库拉的一部著作中，也能找到类似观点。

库拉的《封建制经济理论》刊行于1962年，研究了17世纪波兰贵族所拥有的一些大型地产。这部著作堪称建构并检验历史模型的罕见明晰的例证。库拉在书中指出，古典经济学的法则在本例中并不显效。当黑麦价格上涨，产出下降；而当黑麦下降，产出却上升。为了说明这种异常情形，库拉（Kula 1962）强调了两点因素：贵族的心态与农奴制的存在。17世纪的波兰贵族并不关心不断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是要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使自身能够以习惯的方式生活。当黑麦价格下降，他们就需要出售更多以维持生活水准，大概会让监工更严

厉地驱使农奴。而当黑麦价格上涨，每个人都会比较松懈。

如此重新解释波兰经济史，当然会引发激烈争议。但这既是对传统假设的挑战，也是一场智识上的精彩之举。爱因斯坦并没有破坏牛顿的体系，但他表明该体系只适用于某些条件。同样，库拉表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法则或许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把它们历史化了。本章随后还将讨论这种历史化处理的更多例证。

47

一 角色与展演

社会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就是“社会角色”，它被界定为社会结构中某个特定位置的占据者为人们所期待的行为模式或行为规范。这些期待往往来自其同代人，但也并不尽然。比如说，“儿童”就是由成年人的期待来界定的。自中世纪以降，这些期待在西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史家菲利普·阿利埃斯甚至提出，儿童期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根据他的讲法，乃是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他认为，在中世纪，7岁大的孩子就已经到了教会所称的“理智之年”，被期待举止行事都尽可能像个成年人一样。他或她被视作身形矮小、气力孱弱、缺乏效率、缺乏经验、幼稚无知的成年人，但就是个成年人。鉴于这些期待，我们所说的“儿童期”在中世纪的表现必然与西方人今天的体验大为不同。阿利埃斯的结论（Ariès 1960）被许

多历史学家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所谓“儿童”是一种社会角色的主张依然很有价值。

历史学家如果能相较于迄今为止的运用，把“角色”概念用得更多、更精确、更系统，会大有裨益。这样做会推动他们更认真地对待某些形式的行为，后者通常被从个体的或道德的角度而非社会的角度加以讨论，也往往遭到过于轻易或种族中心主义的指责。

比如说，宫廷宠臣常常被视为纯属邪佞之徒，对英格兰的爱德华二世和法兰西的亨利三世之类意志薄弱的国王产生了恶劣影响。然而，如果将“宠臣”（favourite）视为一种社会角色，在宫廷社会中履行着明确的功能（有必要补充一句，这种位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德皇威廉二世宫廷里的菲利普·奥伊伦堡 [Philipp Eulenburg] 的生涯就表明了这一点。¹）（Röhl 1982, 11）。统治者和其他人一样，也需要朋友。而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他们还需要非官方的顾问，如果在所处的社会里，负责官方谏议的权力被贵族垄断，就更是如此。统治者还需要某种特殊手段，绕过自己政府的正式机制，至少能应不时之需。他们还需要有一些自己能够信任的人，独立于自己身边的那些贵族或官员，可以信赖他们会对自己忠诚不贰，因为他们的位置完全取决于这种忠诚，尤其是当出了什么差错时，得有人可以怪罪。

1. 其实多有传言此人与威廉二世有染。

宠臣能满足所有这一切。有些特别的宠臣，比如爱德华二世在位时的皮尔斯·加弗斯顿（Piers Gaveston），或詹姆士一世与查理一世先后在位时的白金汉公爵，很可能成了政治上的灾难（Peck 1990: 48—53）。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可能是因为统治者被他们所吸引，比如詹姆士一世写信给白金汉公爵时称其为“我的爱儿、我的娇妻”，而不是因为他们富有才干。无独有偶，就像拜占庭帝国与中华帝国宫廷里的宦官所拥有的权力，宠臣之所以享有此等权力，也不能只从君王弱点的角度来说明（Cosser 1974; Hopkins 1978: 172—196）。宫廷体系中自有一个位置需要由君王的朋友来填补，与之相伴的，是与这种角色相维系的一套行为模式。

宠臣也面临一个问题：贵族和大臣们可不会像统治者那样看待他们的角色。对于占据某个特定角色的个体，不同群体的期待或许无法相容。这就会导致所谓的“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或“角色张力”（role strain）。比如，据说约鲁巴人（Yoruba）的神圣统治者奥巴（Oba）身边围绕着一堆酋长，他们又期待他自主决断，又指望他采纳自己的献策（P. C. Lloyd 1968）。

许多欧洲统治者与其贵族之间的关系也不妨这样来看。对国王这个角色尊崇有加，可能会抑制对于其占据者的公开批评，因为“国王不会犯错”，但这并不会防止通过别的方式攻击其政策，著名的办法就是指告其身边“佞臣”。这类指告不时发生，既间接地批评国王，又表达了对于某些谏议官员的

仇视，后者（像宠臣一样）出身并不高贵，但由于受到王室恩宠，“飞黄腾达”。从亨利一世和12世纪编年史家奥德里库斯·维塔里斯（Ordericus Vitalis）时期的英格兰，到路易十四和圣西门公爵（Duc de Saint-Simon）时期的法兰西，这类抨击始终不绝，这意味着问题其实是结构性的（Rosenthal 1967）。

49 从古希腊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在许多社会中，同时代人对社会角色都有清楚的意识。他们把世界看作一个舞台，“人人终其一生皆扮演了众多角色。”不过，社会理论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念。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一个人就是已故的欧文·戈夫曼（Goffman 1958），他着迷于其所称的日常生活“拟剧论”（dramaturgy）。戈夫曼将“角色”概念与“表演”、“脸面”、“前台区域”（front regions）、“后台区域”（back regions）、“个人空间”等概念相联系，以便分析他所说的“自我的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或“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一名历史学家去向戈夫曼取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后者的著述是基于对当代生活的观察，主要是美国，也不特别关注各种文化之间或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异。然而，我想提出，他的思路对于研究过去的地中海世界，甚至比对于研究当下的美国社会还更有用。例如，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戈夫曼的分析显然很有针对性。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的《廷臣论》的特点之一，就是指点世人，在

表演特定的社会角色时，如何给人留下一幅好的印象，按照意大利人的讲法，就是“打造美好形象”（fare bella figura）。马基雅维利的论著非常关注“名誉”或“声望”。事实上，他在某一处甚至直言道，并不一定需要真的具备一名理想统治者的素质，只需要看起来是这样就行了。就此而言，社会现实中的演员（actor）模型与晚近社会理论中的行动者（actor）模型之间，可谓颇为契合。

戈夫曼的观念也引起了另一些历史学家的兴趣，他们关注的是与文艺复兴的人或者说文艺复兴肖像画中自我的呈现一脉相承的“个人主义”。比如说，肖像画揭示了画家是如何考虑——或者他以为自己客户会如何考虑——适合于被画者的体态、手势、表情和“道具”（properties），包括为从未身赴疆场的贵族披上盔甲，为从不钻研学问的主教装点书本（Weissman 1985；Burke 1987：150—167）。在这类情况下，对戈夫曼的阅读启发了历史学家把握意大利社会的某些特征。不过，和戈夫曼不同的是，他们把关注的核心放在追问差异上。他们想知道，是否在某些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群体当中，人们会更加在意自我的呈现，是否呈现的风格会发生改变或各见其异。

对于研究 19、20 世纪的历史学家，社会角色的概念也能派上用场。例如，希特勒就被描绘成一个角色扮演者，“总是表现出比实际更甚的冷酷、严厉和决断”（Mason 1981：85）。举出更多的例子也并不难，从总是让书房的灯亮着、让人觉

50 得他彻夜工作的墨索里尼，到很清楚著名的雪茄之类“道具”（props）重要性的丘吉尔。而在集体层面上，有学者提出，在19世纪的英国，至少对于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而言，听话顺从，甚至是体面可敬，并非其社会认同的根本内容，只不过是中产阶级观众面前扮演的一种角色而已。这样的提法更加丰富了有关当时顺从重要性的持久争论（P. Bailey 1978）。

循此方向更进一步，我们就从社会“角色”推进到社会“戏剧”。“社会戏剧”（social drama）这个术语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的，用来指能够揭示整个社会中潜在张力的某种小范围冲突，它会经历四个阶段：破裂（breach）、危机（crisis）、修补（redressive action）和重融（reintegration）。在更为宏大的范围内的某些冲突中，也已辨识出这一序列。比如1647年那不勒斯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反叛，那次反叛的领导人是一个名叫马萨尼埃洛（Masaniello）的渔夫，这让当时一些观察家大出所料甚至大为反感（V. Turner 1974；Burke 1987：191—206）。

如今有一种讲法已经变得比较常见：在讨论骚乱者和反叛者时，说他们在利用一套文化“剧目”（repertoire），通过吊死代表不受欢迎的人物形象的模拟像，把自己的抱怨搞成一出大戏；或是高举棍棒游行，棍尖上戳着面包，以此抱怨食品价格高涨。上一章描述的私刑（上文边码第39页）也是利用了一出家喻户晓的剧目。有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甚至提出，骚乱之徒和私刑暴民都是遵循着文化“脚本”（scripts）。

不过，其他学者拒绝接受“脚本”这种观念，认为它太刻板，不仅不适用于骚乱的案例，连仪式的案例也不适用。他们主张，“表演”这个术语更能充分体现即兴的成分，因为事实上，“同样的”仪式在每一次实施的场合都会略有不同。我们不妨说，“戏剧”(theatre)这种模型或比喻宜于启迪思考，不宜亦步亦趋，鼓励人们做出区辨，揭启这些事件的不同特性 (Burke 2005)。

二 性与性别

第一章里提出，史学与理论的关系整体上是间接的。历史学家已经发现，理论的用益更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解答。女性主义理论就是这种概括的生动体现。如果考察有关妇女史的研究，比如娜塔莉·戴维斯的著述，或是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 (Elizabeth Fox-Genovese)、奥尔文·赫夫顿 (Olwen Hufton)、琼·凯莉 (Joan Kelly)、琼·斯科特或卡萝琳·拜厄姆 (Caroline Bynum) 等人的研究，你会发现，她们较少提及理论家们的著述，从 (例如) 51
海伦娜·西苏 (Hélène Cixous) 和露茜·伊莉嘉瑞 (Luce Irigaray)，到南希·乔多萝 (Nancy Chodorow) 和伊莱恩·肖瓦尔特 (Elaine Showalter)。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对历史的书写做出了巨大的间接贡献。妇女史就像“来自下层的史

学”，提供了有关过去的一种新的视角（J. W. Scott 1991；D. Smith 2001；Wiesner-Hanks 2001；Jordanova 2002；Miller 2003）。比如说，在一个连上帝的性别都成了争议话题的时代，一位中世纪史专家考察了耶稣作为母亲的形象（Bynum 1982：110—166）。

据说，这种新视角的结果之一，就是“质疑了被广泛接受的分期图式”（J. Kelly 1984：19；参看 J. W. Scott 1988）。毕竟这些图式中有许多在勾画时并未考虑到女性，人口史的分期是个明显的例外。女性被描述为在职业历史学家眼中几乎“不可见”（这些历史学家本身大多是男性，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相当晚近），因为她们的日常劳动和政治影响整体上都是被忽略的，而对于社会流动的讨论基本上也只是从男性角度切入的（Bridenthal and Koonz 1977；J. W. Scott 1988；有关女性历史学家，参看 B. G. Smith 1998）。在另一种令人瞩目的比喻中，女性被描述成例证了一个“缄默无言的”群体，（在许多时候、许多场合下）只能够经由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Ardener 1975）。

不过，女性主义运动及其相关的理论同时激励着女性史家和男性史家就过去提出新的问题，比如男性支配地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具体表现。父权制 / 男权制（patriarchy）是现实还是神话？在世界不同地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它是否会采取不同形式？可以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加以抵抗？女性在什么地区，什么时期，在什么领域，比如在家庭中，发挥非

正式的影响? (Rogers 1975; Segalen 1980: 158—172)

关于女性的劳动则有另一组问题。女性在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间,都在做哪些种类的劳动?自工业革命以降,甚至从16世纪以来,劳动女性的地位真的已经衰落?女性的劳动往往被男性历史学家忽略,特别是因为在官方文档中,在男性官员布置并实施的劳工调查中,这类劳动大多不被记录,这就是“不可见性”问题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例证。比如,在19世纪早期的圣保罗城,要想还原在街上卖吃的之类的活动,只能借助间接手段,特别是有关劳动期间发生的犯罪和争执的司法记录 (Tilly and Scott 1978; Dias 1983)。

52

业已有人提出,看待过去的这种新视角在重要性上堪比于“来自下层的历史”。同样不妨说,它也会面临类似的风险。为了弥补传统史学的疏漏,这两种新式史学都冒险延续了某种二元对立,一个是精英与民众之间,一个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基于本研究所采纳的视点,即所谓“总体史”的视点,更有益的角度应该是聚焦于男女两性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聚焦于什么是合适的男性特质(masculine)或女性特质(feminine)的性别界限和概念阐述。1989年创办了一份名为《性别与历史》(*Gender and History*)的期刊,就体现出这种焦点变化正在发生。

和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建构的强调一样,女性主义对性别文化建构的强调已经在史学实践中产生了可观的影响(Butler 1990)。如果说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文化性的而非自然的,如果说“男性”和“女性”都属于社会角色,在不同的

时期有着不同的界定和组织方式，那么，历史学家就需要讲清楚彼时几乎始终隐而不彰的东西，即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期，对于特定的年龄群体或社会群体，做一个女人或做一个男人需要遵循哪些准则或惯例。更准确地说，鉴于这些准则有时会相互竞争，历史学家就需要描述服饰、言谈等方面的“支配性性别惯例”。（Fox-Genovese 1988；参看 J. W. Scott 1988：28—50）

此前女性在书面历史中的缺席状况造成了一种悖谬的后果，那就是人们所称的男性这一性别的被“压抑”（Ditz 2004）。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男性特质的研究大量涌现，包括探讨诸如“有男人味儿的英国（男）人”（Manly Englishman）和“女里女气的孟加拉人”（Effeminate Bengali）之类刻板印象与对立观念的研究（Sinha 1995）。有一批专著讨论了男儿气质（manhood）是如何在某个特定社会中丧失的（比如表现出怯懦，或是遭受到侮辱），又是如何重新赢回的（比如通过决斗），强调在某些文化中，始终需要借助暴力，或至少借助可称为“侵犯戏剧”的行为，确认自身的男子气概（virility）。（Nye 1993；Mosse 1996；Hitchcock and Cohen 1999）现在的挑战在于整合这两个系列的研究，以展示一个特定文化中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观念如何形成互补对立，而一种性别里行为惯例的变化又如何表达出对于另一种性别里惯例变化的反制。

53 越来越多的历史问题被从性别视角切入来考察。现代

早期欧洲的女巫审判就是个显而易见的例证，因为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国家，被指控搞巫术的大多是女性（Thomas 1971: 568—569; Levack 1987: 124—130; Ankarloo and Henningsen 1990）。同样，将像修道院、军团、行会、兄弟会、咖啡馆和学院之类机构 / 制度（institutions）视为“男性结合”的实例——女性的对应机构相对很少（女修道院、女子学院、妇女学校之类）——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的历史。政治的历史亦是如此，学者们聚焦于女性选民，或是关注女性在不同文化中如何被排斥出所谓的公共领域（Landes 1988; Wiesner 1993）。（参看下文边码第 81 页）

性别的社会建构或文化建构过程也得到了史学的检视。对 119 名荷兰女性的研究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证，她们在现代早期欧洲像男人一样生活（特别是在陆军和海军里）。研究考察了她们如此改变生活的动机，以及促成这些决定的另类文化传统。例如玛利亚·范·安特卫彭（Maria van Antwerpen），她是个孤儿，由婶娘收养，但后者待她很不好。她先是给人做家务，但是被辞退了，于是决定报名当兵。根据她的自传，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曾经听说别的女人也这么干过，也为自己害怕被迫沦落风尘（Dekker and van de Pol 1989: 尤参第 64—65 页）。

对于性的探讨思路也大致相仿，这尤其要归功于迈克尔·福柯锐意突破的重新概念化，他甚至提出，同性恋（就像性相 [sexuality] 本身）是一项现代“发明”，一种关于人际

关系的新式话语（关于“话语”，参看下文边码第99页）。福柯拿这种话语去对比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早期数百年“哲学家与医生将性活动问题化的方式”，举证说古代文本指称的不是同性恋者，而是同性恋行为本身。

晚近有一些人类学家和古典学者尝试重新构建不同文化中性活动下潜藏的那些准则与预设，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福柯的思路。比如说，有学者提出，在古希腊人看来，快乐不是相互的，而仅限于处在支配地位的伴侣一方。其结果，性成了“强硬的”赢家与“软弱的”输家之间“（或许被建构为）零和竞争的象征”。男人之间的性关系本身并不可耻，但如果其中扮演臣属角色或“女性”角色，荣誉就岌岌可危了（Foucault 1976—1984；Ortner and Whitehead 1981；Winkler 1990；尤参第11、37、52、54页）。

三 家庭与亲缘关系

54 要说有一种制度是由一套相互依赖、彼此互补的角色组成的，家庭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例证。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家庭史成为历史研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引发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其中每个群体都从其他群体那里有所获益，也都迫使其他群体对自身的预设有所修正。

在一部早期社会学经典著作《家庭的组织》(*L'organisation de la famille*, 1871)中, 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家庭类型。一是“父权制的”(patriarchal), 如今更多地被称为“联合”家庭, 其中已婚的儿子依然和父亲住在一起; 一是“不稳定的”, 如今被称为“核心”家庭或“夫妇式家庭”, 其中所有的孩子成家后都要离开; 一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 这种类型与勒普莱的联系最为密切, 被称为“主干家庭”(famille souche), 其中只有一位已婚的儿子依然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Laslett 1972: 17—23; Casey 1989: 11—14)。

下一步就是要以编年顺序安排这三种类型, 把欧洲家庭史呈现为一则规模逐步缩小的故事, 从中世纪早期的“家族”(clan, 意思是大型亲缘群体), 然后是现代早期的主干家庭, 再到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核心家庭。这种“渐进核心化”(progressive nuclearization)理论曾经是社会学中的正统观点,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 却遭到了历史学家的挑战, 尤其是“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中的彼得·拉斯莱特及其同事们的工作, 但在荷兰之类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研究(Laslett 1972)。

该小组也提出了一个三重分类, 但与勒普莱的略有不同: 侧重于家户(household)的规模与构成成分, 区分出“简单”、“扩大”和“复合”式家庭户(family households)。他们最为人知的发现是, 从16世纪到19世纪, 英格兰的家

户规模在户均 4.75 人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指出，这种规模的家户长期以来也是西欧和日本的特征（Laslett 1972）。

家户的思路既能精确计量，又得益于人口普查记录的完好保存，比较容易得到文献。但它也有其危险所在。其中尤其有两种危险已经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体现在这两门学科之间对话的新鲜成果上。

55 首先，正如恰亚诺夫（Chayanov 1925）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经指出的那样，被描述为“复合”“扩大”和“简单”式家户之间的区别，无非是同一种家居群体的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当年轻夫妇生儿育女，就会扩大，当孩子们结婚成家搬出，又会收缩（Laslett 1972: 335—374）。

对于把家户规模与构成成分作为家庭结构指标的第二点异议，将我们带回软硬数据的问题（参看上文边码第 37 页）。我们希望搞清楚的是家庭关系在特定地点与时间的结构方式，但家户规模或许并不能揭示这种结构。家庭不仅是一种居住单元，而且是一种经济单元、法律单元，至少有时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意思是成员们认同这个群体，在情感上投入这个群体（Casey 1989: 14）。这种功能复合性引发了一些问题，因为经济单元、情感单元、居住单元及其他维度的单元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基于共同居住的指标或许无法澄清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家庭结构特征。

比如说，一项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的社会学研究指出，许多生活在不同家户的亲属可能住得相互邻近，几乎天天走动。在这种情况下，“夫妇式”家户与“扩大式”心态并存。这种并存状况的历史例证并不难找到。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贵族亲属往往住在相邻的宅邸，在家庭敞廊（loggia）定期聚会，并在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上密切合作。仅从家户的角度切入，是无法书写佛罗伦萨、威尼斯或热那亚（就不再扯到别的地方了）贵族家庭的历史的（Kent 1977；参看 Heers 1974）。

对于核心化理论的修正是由劳伦斯·斯通在一项研究中发起的，他聚焦于 1500 年到 1800 年间英国的上层阶级：斯通提出（Stone 1977），在这段时期之初，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他所称的“开放的世系家庭”（open lineage family），然后先是被“有限的父权核心家庭”（restricted patriarchal nuclear family）取代，又在 18 世纪被“封闭的习家性核心家庭”（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取代。不过，就连这种修正也遭到了艾伦·麦克法兰的质疑（Macfarlane 1979），他认为核心家庭在 13、14 世纪就已经出现。

英国的核心家庭究竟出现于何时，相关争论并非纯属稽古之癖，而是反映了看待社会变迁的不同观点。一方面，有命题指出，是经济变迁，尤其是市场的兴起和早期工业革命，重塑了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结构的面目。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具有高度弹性，整个西欧的兴起，尤其是英

国的兴起，可以用既有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契合”来说明（Macfarlane 1986: 322—323）。

这些整体性问题在第五章还会更详细地讨论。研究家庭的历史学家不管在这些问题上立场如何，现在在研究中使用的术语都比以前更为精确，相比于他们尚未关注社会理论时的状况，能够做出的区辨也更为精微。反过来，他们也会推动社会学家修正自己原先在这块领域的一些概括。

家庭结构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焦点。另一个焦点不妨称为家庭“策略”，皮埃尔·布尔迪厄从战争艺术中借用了这个术语，加以调整，用来研究法国西南部波城（Pau）的农民婚姻（布尔迪厄自己就来自那个地区和社会群体）。谁来决定谁和谁基于何种理由结婚，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中，在不同的时期里，得到的答案大相径庭。

比如，按照劳伦斯·斯通的说法，现代早期英国从父母为自己子女选择新郎新娘（子女有权否决），逐渐转到子女为自己选择对象（父母有权否决）。至于结婚的理由，斯通强调其所称的“对于家庭利益的实用主义计算”，这适用于来自有产阶级的父母，也适用于他们的子女（穷人更能自由地与自己选择的对象结婚）。（Stone 1977: 180—191）

欧洲其他区域的贵族世界提供的一些著名例证也支持斯通的主张。比如圣西门公爵就在其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当他在1694年安排自己婚事时（父亲去世），他向自己未来的岳父坦诚，自己其实就是想和他联姻。无独有偶，17世纪有一位波兰

绅士名叫扬·帕切克 (Jan Pasek)，他作为一名钻石王老五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两位绅士……都希望我入赘他们家……可我更倾心于斯拉多夫斯卡 (Sladowska)，因为我听他们说，她的地产里不仅每块田里都长着小麦，而且还有洋葱。”从某些方面来看，17世纪确实显得十分遥远。

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当我们说“父母”决定成婚伴侣时，我们是在假定某种或许并不存在的共识。理论上，在父权制社会中，是父亲拿主意，但在实践当中，事情的运作很可能不一样。而情感与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也是因人而异。历史学家只能说，“家庭利益”在婚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社会群体那里，会更加重要。

四 共同体 / 社区 / 社群与认同

57

在上一节中，家庭被描述成本质上属于一种“道德共同体”。在史学写作中，共同体这个概念也开始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截至20世纪中叶，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里，社区 / 共同体 (community) 研究已经牢固确立了地位。而在历史学当中，村史专著的传统颇为久远，但这些研究一般就是为了记录村庄历史，或是要表达地方的自豪，而不是以此理解更大范围的社会。与之相反，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 采取了更具社会学和人类学味道的思路，就像更早前

一些法国研究，强调平地（*plaine*）与林地（*bocage*）之间，换言之，宜于耕作的地区与法国西北部草木更为繁茂的农牧区之间，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有哪些差异。

针对现代早期英国的社区研究也揭示了不同环境下各种定居点类型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耕作区与农牧区之间的差异，就与识字率的差异有关联，甚至关联着宗教态度，或是内战期间彼此对立的效忠立场。比如说，林地的定居点相比于种植作物的村庄，规模较小，相互更为隔绝，识字率更低，态度更趋保守（Underdown 1985）。这类研究强调社区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力戒相伴而生的两种危险：一是将村庄视为孤岛，一是忽略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类情况，是在非常不同的另一种环境下贯彻这种思路，而在那种环境下，社区/共同体本身是否存在就是个问题，那就是大城市。更早的一代城市社会学家，尤其是格奥尔格·齐美尔，强调城市中个体的匿名性与孤立感。不过，更为晚近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把城市看成一系列的社区或“都市里的村庄”（Simmel 1903；Gans 1962；Suttles 1972）。城市史学者面临的挑战就在于考察这类社区的建构、维持与破坏，并且始终牢记，“社区”这个术语几乎像“文化”一样难以界定，但也同样难以舍弃。

晚近关于仪式和符号的研究或许有助于回应这种挑战。比如说，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进一步发展了涂尔干的一个观念，即“创造性欢腾”（*creative effervescence*）的时

刻对于社会振兴的重要性。特纳自己提出一个新词“混融”(*communitas*)，用来指自发的、无结构的社会团结形式(他举的例子多种多样，从早期方济各会修士，到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Durkheim 1912: 469, 475; V. Turner 1969: 131) 这些团结形式必然是难以持续的，因为一个非正式的群体要么逐渐消逝，要么凝聚成一种正式的制度/机构。纵然如此，借助仪式和其他被称为“共同体的符号建构”的手段，这种“混融”仍会在制度/机构中不时复活。(A. P. Cohen 1985)

譬如说，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城市里，各个教区(*parishes*)、行政区(*wards*)、行会和宗教兄弟会都有各自的年度仪式。随着城市逐渐增大，变得越来越匿名化，哪怕不是彻底如此，这些仪式的重要性也渐趋衰微，但并非彻底消失。事实上，它们还存在于有些城市，从纽约的圣帕特里克日庆典游行(*St Patrick's Day parade*)，到伦敦的诺丁山狂欢节(*Notting Hill Carnival*)，只是这些仪式现在表现和建构的不再是职业认同或宗教认同，而是族群认同。

集体认同这个概念就像族属(*ethnicity*)，在上一代人这里变得愈益重要，无论政界还是学界皆是如此。尤其是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形成这一主题，晚近激发了一批杰出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队伍，来研究国徽、国旗、国庆(比如巴士底日 [*Bastille Day*])之类的认同体现。记忆、想象和符号在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强调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Nora 1984—1993）。

另一方面，关于这些国族认同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尤其是19世纪的状况，这个问题依然充满争议。例如，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Anderson 1983）看来，创造出这些在他笔下为人熟知的“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就是宗教的衰落和（受所谓“印刷资本主义”促进的）地方语言的兴起。而在厄内斯特·盖尔纳看来，关键要素是工业社会的兴起，这创造了一种“表面上体现为国族主义的”文化同质性（Gellner 1983：39）。至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谨慎地区分了政府的国族主义与民众的国族主义，认为只是在19世纪晚期，普通民众如何感受国族特性才成为具有政治重要性的话题（Hobsbawm 1990）。

而其他集体认同的复兴或重现于政治图景也引出了类似的问题：地区性的（比如在意大利北部，或是法国南部）；宗教性的（在印度、波斯尼亚或北爱尔兰）；以及“族群性的”（在非洲或美洲）。对于族属的定义聚讼不已，但马克斯·韦伯对于族群的概括依然有用：“（亲缘群体之外的）人类群体，珍视对于其共同起源的信仰，而这种起源奠定了打造一个共同体的基础。”

要理解这些复兴，有一项重要的线索已经得到了三位人类学家的强调：皮埃尔·布尔迪厄、阿尔君·阿帕杜莱和安东·布洛克。布尔迪厄提出，“社会认同在于差异，而差异是比照最相近的东西得到确认的，最相近的就代表着最大的威

胁。”阿帕杜莱将族群暴力与“对类别的不确定性”相关联。至于布洛克，他借用弗洛伊德所谓“对细小差异的自恋”的概念，来分析北爱尔兰、波斯尼亚、卢旺达和斯里兰卡，得出的结论是，引发暴力的往往是对“即将丧失差异”的恐惧。(Bourdieu 1979: 479; Appadurai 1996: 154—155; Blok 2001: 115—131)

弗洛伊德—布尔迪厄—布洛克理论帮助说明的更早一场冲突发生在俄罗斯。1667年，东正教会分裂为两派。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上，教务会支持晚近的革新，将本地传统的支持者革除教籍，后来称后一派为“旧信徒”。在这场争论中表面上的议题乍一看似乎颇为琐屑。祷告的手势是该用两根手指还是三根手指？耶稣之名是该拼作一个*i* (Isus) 还是两个*i* (Iisus)？不难猜测日后讲求理性的历史学家会如何描述这些辩论：认为它们典型地体现了宗教思维或迷信思维，远离现实生活，没有能力区分什么是意义重大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更有启发性的思路是把这些细微的差异看作认同的符号。一方是认同整个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群体，而在另一方，俄罗斯形式的东正教是其认同的重要成分。两方都声称传统属于己方，只是有不同的传统。

与此类似，在天主教会的历史上，有时花在让不信者皈依上的能量还比不上耗在攻击“异端”上的，而后者与正统之间只是细节上的分歧（比如是圣餐同体论 [consubstantiation] 还是圣餐变体论 [transubstantiation]）。事实上，甚至早在弗洛

伊德之前，格奥尔格·齐美尔就已指出，在宗教中，“最细微的歧异”也有可能孕育出重大冲突（Simmel 1908: 43）。类似的讲法也可用于前苏联等地的共产党：做一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做一名托派分子），往往比做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危险。最常入狱甚至被处死的正是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60 相对天主教徒而言的新教徒，相对女性而言的男性，相对南方人而言的北方人，如此等等，通过与其他群体相对而言或者相反而论，来界定一个群体的认同，其具体方式在一项令人瞩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清晰呈现。该研究考察了非洲人与非裔美洲人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晚期的巴西，一些来自西非的被解放奴隶决定返回非洲，比如回到拉各斯（Lagos），这个决定意味着他们自视为非洲人。然而，他们回去之后，却发现自己被当地社群（community）视为外来者，属于巴西人（Carneiro da Cunha 1986）。这个例证提醒我们，同时从两个角度，从内视的角度和外视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非常重要。不能假定说其他人看我们的方式与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一致。

因此，“共同体/社区/社群”（community）这个术语，既很有用，又很成问题。它参与构成了涂尔干式的共识性社会模型（参看上文边码第27页），必须让它摆脱这种智识上的配套意涵。不能假设每个群体都渗透着团结；共同体必须得到建构和重构。也不能假设一个共同体在态度立场上完全同质，或

者摆脱了阶级斗争之类的冲突。有关“阶级”的问题正是下一节的主题。

五 阶级与地位

在社会分层这块领域，历史学家特别倾向于使用“种姓”“社会流动”之类的术语，却不曾意识到它们附带的一些问题，或是社会理论家业已发现必须做出的一些区分（参见上文边码第32页）。有一点发现其实毫不奇怪：正是那些关注工业社会的历史学家，觉得阶级模型最为有用，在英国尤其如此（马克思本人正是在这个社会著书立说，当时就有许多人使用阶级语言）。（Briggs 1960；G. S. Jones 1983；Joyce 1990；Cannadine 1998；Feldman 2002）阶级一向被视为理解现代英国史的密钥。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这个概念的用法也存在不少重大争议，尤其是出现了两大问题。首先，“阶级”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多广？适用于世界上多少地区，多少时期？其次，阶级是特定社会的一种客观特性，抑或只是强加给这些社会的思想范畴？第二个问题也适用于其他分析范畴，因此后文还将予以讨论（参见下文边码第175页）。这里需要先考虑第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阶级范畴就像历史学家采用的其他一些范畴，

在行动者的模型与学者的模型之间，存在着某种表面上的契合。然而，要想更清楚地看出一种模型的长短优劣，一般需要拓展其应用范围，换言之，尝试将其应用于最初设计的领域之外。有鉴于此，讨论一些从阶级角度分析前工业社会的尝试或许能说明问题。

这类分析中有一例广为人知：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波尔什涅夫对17世纪早期法国的一些民众叛乱所作的考察。当时从城镇到乡间，从诺曼底到波尔多，此类叛乱数目可观，从1623年到1648年间尤其如此。波尔什涅夫强调，这些冲突使地主与佃户、师傅与学徒、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对立，并把叛乱者表现为目标明确的人：他们想推翻统治阶级、终结压迫自己的那种“封建”体制。这本书被罗兰·穆尼耶等法国历史学家批评为时代错置，因为波尔什涅夫坚持在马克思的广义上使用“阶级”这个术语，来描述17世纪的冲突。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所谓叛乱就是抗议中央政府增税，而它们所表现出的冲突就是巴黎和外省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在地方层面上，这些抗议所揭示出的并非平民与贵族、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冲突，而恰恰是他们的关联。（Porshnev 1948；Mousnier 1967，第一编；Bercé 1974；Pillorget 1975）

姑且假定上面概括的批评意见理据确凿，阶级模型无助于理解17世纪法国的社会抗议，确切说来就是无助于理解其社会结构。那么历史学家又该以何代之呢？

按照穆尼耶的讲法，针对这一分析该使用的正确模型就是三种等级（*estates or orders*）的模型：僧侣、贵族与其他。这种模型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当时的人自己也使用，穆尼耶就广泛引用了17世纪法国一位名叫夏尔·卢瓦索（Charles Loyseau）的律师所撰写的“等级与尊严”。这种把社会一分为三的思路得到了法律的神圣捍卫。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僧侣与贵族属于特权阶级，得享免税，而没有特权的人构成了剩下的“第三等级”，穆尼耶就此声称，波尔什涅夫试图将只适用于大革命之后时期的概念，强行用于旧制度时期。

62

值得指出的是，穆尼耶并不只是从17世纪的论著中提取他的社会理论。他还读了一些社会学家的作品，比如美国的伯纳德·巴伯（Burke 1992b）。这些社会学家所处的传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区分了“阶级”和“等级”或“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 Stände*），他把前者界定为由市场处境决定生活机会（*Lebenschancen*）的人群，而後者的命运取决于其他人赋予他们的地位或荣誉（*ständische Ehre*）。地位群体的位置通常是出生时即确定的，并从法律上予以规定，但也由其“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 Lebensstil*）予以揭示。（Weber 1948: 180—194；参看 Bush 1992）

马克思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他笔下的阶级，而韦伯则近乎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界定他眼里的等级。韦伯提出，长远来看，财产会带来地位，尽管就短期而言，“属于同一等级的人，可能既有有产者，又有无产者。”（Weber 1948: 186—187）韦伯

的“地位群体”概念显然源于三个等级这一传统观念，但他进一步打磨了这个概念，使之更具分析性。如此一来，用韦伯的术语分析17世纪，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循环论证。

韦伯的模型是作为对马克思模型的替代而提出的，而马克思主义随后也回应了韦伯，比如指出“地位”之类的价值观念与其说是表达了某种整体性的社会共识，不如说是支配阶级试图强加给其他每一个人的，虽说成功程度大小不等（Parkin 1971: 40—47）。还不妨认为，关于特定社会的结构，有些同时代人的陈述不应被当作中立的描述，而应视之为特定群体的成员试图使自身的特权正当化。

比如说，众所周知，中世纪社会被区分为三个等级或三种职能：“祈祷者、战斗者、劳作者”，这看着非常像是使不劳作的人的位置正当化。历史学家乔治·杜比有一项出色的研究（Duby 1978），他谨慎借用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0: 121—173），考察了这种三重社会区分是如何在11、12世纪的法国兴起的，并从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境的角度切入，说明这种区分何以成功。

63 至于围绕17世纪法国社会的争论，不妨认为，穆尼耶过于轻易地接受了有关这一体系的官方观点。对卢瓦索这位律师，穆尼耶倚重之至，但前者并不是一位立场公允、不带感情的观察者。他不只是单纯描述自己所处时代的法国社会，而且在阐述观点的时候，是基于那个社会中某个特定位置的占据者的立场，即被册封为贵族的官吏的立场。需要将他的观点与

传统贵族的观点加以比对，后者拒绝接受官吏对高贵地位的诉求，如果可能，也要与来自下层的对于同一个社会的观点加以比对。

事实上，马克思与韦伯力图解答的不平等问题并不一样，这使得两人之间的争论更趋复杂。马克思尤其关注权力和冲突，而韦伯感兴趣的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阶级模型已经与一种特别的社会观联系在一起，后者认为社会本质上充满冲突，团结因素倒被最小化；而与等级模型相联系的社会观，则是将社会视为本质上和谐一体，将冲突因素最小化。两种模型中都蕴含着重要的洞见，但显然有着过度简化的危险。

因此，将两种互为对手的模式视为看待社会的互补方式而非对立方式，或许更为有益，它们都高光凸显了社会结构中的某些特征，其代价是使另一些特征隐而不彰（Ossowski 1957: 172—193; Burke 1992b）。等级模型似乎可能最适用于前工业社会，而阶级模型最适用于工业社会，纵然如此，将两种模型用于不相契合的情境，或许也能收获洞见。

不管怎么说，研究非欧洲社会的历史学家就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这两个互为对手的概念都源于欧洲背景。比如说，中国的士是一个地位群体还是社会阶级？是把印度种姓重新界定为一种地位群体更有用，还是把整个印度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形式更好？后一种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者是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他主张，支撑印度社会中不平等的那些根本原则，尤其是纯正的原则，与其在西方社

会中的对应原则不同。遗憾的是，杜蒙更进一步认为，印度与西方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是等级社会，后者是平等社会，仿佛欧洲从未存在过僧侣与贵族这样的特权等级（Dumont 1966, 1977；批评意见参看 Dirks 2001: 54—59）。

事实上，欧洲有时也运用纯正的概念，以使某些社会群体的位置正当化。尤其是在西班牙，想要获得高贵地位，“血统纯正”（limpieza de sangre）属于官方基本要件，而在其他地方，比如法国，贵族往往把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说成是不干净的。诸如此类概念的使用就是为了防止社会流动，只是没有成功。

64 六 社会流动与社会区隔

“社会流动”这个术语就像“阶级”，历史学家对此足够熟悉，针对这一主题，也不乏各种专著、会议以及期刊专号。但对社会学家做出的一些区分，历史学家或许就不那么熟悉了，至少其中有三种，在史学实践中自有其用场。其一，是社会阶梯上的上向运动与下向运动，因为对于下向流动的研究相对遭到忽视。第二种区分是个体一生中的流动（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叫“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与几代人之间的流动（所谓“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第三种区分是个体流动与群体流动。譬如说，英国的大学教授在一个世纪前享

有的地位要高于他们今天的处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某些印度种姓在社会维度上表现出上升势头（Srinivas 1966）。

在社会流动的历史上还有两大问题，一是流动速率的变化，一是流动方式的变化。已经有人指出，不管研究什么时期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讨厌“他们的”社会被指为封闭或不流动的社会。尽管有个拜占庭皇帝曾经下令，所有人等应当子承父业，但似乎不曾存在过哪一个分层社会有可能实现彻底的不流动，后者意味着所有孩子，无论男女，都将享有（或忍受）和父母一样的地位。顺便说一句，还可以做一种重要的区分：男性在一个父系社会里的所谓“显性”流动，女性通过改变自己姓氏的通婚实现的“隐性”流动。

要探究某个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比较性的。例如，17世纪的英国相较于17世纪的法国，社会流动（上向流动或下向流动）率是高还是低？相较于17世纪的日本呢？相较于早前或是此后某个时期的英国本身呢？比较性的、量化的思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可能存在一些陷阱。

这类陷阱有一个实例，来自对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项研究，换言之是1368年到1911年。该研究主张，中国社会比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开放得多。中国的社会流动率异乎寻常地高，科举功名录即为明证，它提供了应试者的社会出身相关信息。然而，正如一位批评者很快指出的那样，“有关统治阶级社会出身的数
65

据，并不能构成有关流动总量或低层民众生活机会的数据”。原因何在？因为必须考虑到精英集团的相对

规模。作为精英，中国的士大夫只占人口中的很小比例。即使进入这一精英集团的渠道相对开放——哪怕这一点也充满争议——商人、工匠、农民及其他一些行业从业者的后代的生活机会也依然是很有限的（Ho 1958—1959；Dibble 1960—1961）。

针对社会流动的第二点重要追问是关于其方式，换言之，是通向顶峰的多种道路，以及有潜力的攀登者一路上遇到的不同障碍（下向流动呈现出的差异或许要少一些）。如果说赢得现世地位上升的欲望是持续不变的，那么上升的方式则是因地而变、因时而异的。

回到中国，我们发现，在相当长时期内（从6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科举体系提供了通往皇家的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通往帝国的道路。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在西方社会，你可能会问一个陌生人他父亲是谁，而在中国，你会问他通过了多少考试。科举功名是进入中国官僚体系的首要手段，而在官僚体系中谋得职位，就会带来地位、财富与权力。

但实际上，这个体系并不像理论上那么唯才是举，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并没有渠道进入教授科举成功所需技能的学校。尽管如此，在前工业国家曾经发展出的量才录用的体系中，中国招录士人的体系属于最成熟精致的尝试之一，也极可能是最成功的尝试之一，它也激励了19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官制度改革。（Weber 1964：第五章；Miyazaki 1963；Chaffee 1985；Elman 2000）

在这方面，能与中华帝国相提并论的主要就是奥斯曼帝国，那里有苏丹征收的所谓血贡（tribute of children, *devşirme*），在15、16世纪尤其如此。在这种体系中，行政和军事领域的精英集团都是从基督教臣服人口中征召而来。孩子们显然是基于其能力被挑选的，并获得了充分的教育。甲等包括最聪明的男孩，加入了苏丹王室的“御内侍从”（Inside Service），可能会做到大维齐尔（Grand Vizier）之类的要职，而乙等则进入军队中的“御外侍从”（Outside Service）。所有被征召者都被要求转为穆斯林。他们皈依帝国的主导宗教，以产生与自身文化血脉断绝关联的效果，事实上也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并因此使他们更加依赖苏丹。而由于穆斯林有义务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穆斯林，精英成员的子孙如果改宗，就必然没有资格竞争官职（Parry 1969；Inalcik 1973）。

66

在前现代的欧洲，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教会。依照司汤达著名的类型划分，有才之士属于教会中的“黑色”，相较于属于军队中的“红色”，职业生涯要更为开放。农民的儿子甚至可能在教职生涯中一路做到教皇，就像16世纪晚期的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那样。顶层教士也有可能就任政府高官。比如在17世纪的欧洲，政府顶层官员中就包括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和马萨林（Mazarin）。两人都服务于法兰西国王；红衣主教克勒斯尔（Khlesl）服务于哈布斯堡皇帝；而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大主教则服务于查理一世。黎塞留来自下层贵族，但克勒斯尔是面包师的儿子，劳德

他爹是个裁缝。对于欧洲的统治者来说，任命天主教僧侣，尤其是选这类人当内阁成员，好处之一就是这些人无法生育可能要求继承他们职位的合法子孙。就此而言，西欧选用僧侣，类似于奥斯曼帝国依赖血贡、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任用阉官担当高位。他们都属于素称“阉人”（gelding）的实例（Gellner 1981: 14—15）。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另一种获得社会升迁的方式是模仿社会层级更高的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并投入人们常说的所谓“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七 消费与交换

在本章前文，我曾经讨论过库拉对古典经济学法则的批评，理由是对于有些群体，比如17、18世纪的波兰权贵，这些法则无法说明它们实际的经济行为。这些贵族并不符合所谓“经济人”的传统模型。他们既不在意挣钱也不刻意省钱，只在乎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购买法国葡萄酒之类的进口奢侈品，而这正属于某种形式的“炫耀性消费”。这个短语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

这个短语参与构成了一套理论。凡勃伦作为一名热忱的平等主义者，一个遵循着炫耀性简朴生活方式的人，认为精英群体，或其所称的“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其经济行为是非

理性的，是浪费的，只是受到“攀比”(emulation)的推动。他将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在其对于夸扣特尔人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同时应用到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夸扣特尔人最著名的制度是“夸富宴”(potlatch)，就是由酋长们破坏物品(尤其是毛毯和铜盘)。

然而，夸富宴表面上看属于浪费，内里却有着某种或可称为“潜在理性”的东西(参看下文边码第89页)。它参与构成了一套支配策略。通过对物品的破坏，来证明组织夸富宴的酋长比其竞争对手更富，从而羞辱了对方。这是一种“用财产打仗”的手段。酋长们在意的不是积累财富，而是通过挥霍财富来赢取地位和权力(Veblen 1899; Boas 1966; 参看 Codere 1950)。

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贯彻了一种类似的思路来考察消费，以之作为一项更为一般的研究的组成部分，后者探讨人们，尤其是法国中上阶级的人们，借助哪些策略，使自身有别于其他人。他像博厄斯和凡勃伦一样提出，“经济权力首先是使自身摆脱经济必需性的权力。正因如此，对财富的破坏，炫耀性消费，浪费，以及各式各样不必要的奢侈，始终都是经济权力的标志。”(Bourdieu 1979)

自布尔迪厄的著作出版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采纳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Brewer and Porter 1993)。这些研究不仅生动例示了理论，而且从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验证了理论。譬如说，历史学家业已注意到，与凡勃伦同时代的有

些人至少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也从与凡勃伦并无不同的角度做出了分析。在现代早期，有个核心概念叫做“华贵”（magnificance），这个术语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财富如何转换为地位和权力。虚构文学的作者们都很清楚地位象征的重要性，尤其是服饰。16、17世纪西班牙的“流浪汉冒险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icaresque）的焦点，就是写主人公（其实是个流浪汉，或“pícaro”）如何设法通过这些手段，乔装成一名贵族。

并不只是虚构文学作者们意识到符号象征在竞逐高贵地位的斗争中的用途。17世纪时格但斯克（Gdańsk）有位市长，甚至在自己宅第的正面刻上一句格言：“为求遭妒”（pro invidia）。大约在同时，佛罗伦萨一位作者谈到了“富人试图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人”，而一位热那亚人如此描述自己城市的贵族，说他们花钱远超自己所需，“以便让那些无法效仿的人痛苦，让他们心里难受。”（Burke 1987：134—135）

上面这些评论显然有道德化的讽刺味道。它们提醒我们，需要区分同一个社会中对炫耀性消费的不同态度。业已有学者指出，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将“华贵”视为要人之义务的观点，是与认为这例示了精神自负的理论并存一时的。现实中，炫耀性消费似乎在各个区域各不相同（比如在意大利就很高调，在荷兰共和国就比较低调），在各个社会群体里也有不同表现。长期来看也会因时而异，竞争性的消费是在17世纪达到了明显的巅峰。

进一步打磨这些概念，我们不妨说，区隔的策略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炫耀性地节制消费，某种（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事实上它不仅限于新教徒。在18世纪，一个争论“奢华”的有害后果的时代，这种选择似乎越来越流行。这种策略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逃避，以摆脱竞争性消费的自我毁灭性后果。

分析消费不仅需要从社会阶级的角度入手，也需要扣合性别的角度。在欧洲，自从18世纪英国所谓消费社会的诞生以来，甚至从更早开始，消费始终是由女性所主导的，至少在服装和家居的领域是这样（Brewer and Porter 1993：尤参第119—120、274—301页）。例如在17世纪后期的法国，一份叫做《优雅信使》（*Mercure galant*）的杂志——这或许是史上第一份女性杂志，每月刊载最新的时尚潮流。

炫耀性消费只是社会群体展示自身比另一个社会群体优越的策略之一。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行为又远不止是一种策略。理论概括的危险之一就是容易把世界看成是无非例示了理论。在这一点上，英国社会学家柯林·坎贝尔（Campbell 1987）已经抨击了相关的预设，即所谓消费者只不过想展示自己的财富与地位。他提出，人们之所以购买许多奢侈品，是因为要维护他们眼中自身的形象。他们真正购买的是认同，既是个体认同，也是群体认同（参看 Clammer 1997）。

矫正化约论倾向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求诸某种对立理论。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炫耀性消费，视之为交换或互惠

69 (reciprocity), 或许会有益处。后者出自 20 世纪 40 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的研究。波兰尼就像 20 年后的库拉, 也批评经济学家假定自己的概括是普遍有效的, 而他自己则区分出三种基本的组织形态类型。只有其中一种, 即市场体系, 受制于古典经济学的法则。波兰尼 (Polanyi 1944) 称其他两种体系为“互惠体系”和“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体系” (参看 Skocpol 1984: 47—48)。

互惠体系乃是基于礼物馈赠。波兰人类学家布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 存在一种循环交换体系。贝壳臂镯朝一个方向旅行, 贝壳项圈朝另一个方向旅行。¹ 交换没有任何经济价值, 但它维持社会团结。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在其论述礼物的名文中, 基于此类实例做出了概括, 认为这种“古老的交换形式”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与宗教意义, 并且以三种不成文的法则为基础: 给予的义务, 接受的义务, 回报的义务。根本不存在什么“免费的”礼物 (Malinowski 1922; Mauss 1925; Douglas 1990)。而波兰尼将这个概括更推进了一步, 将礼物馈赠作为其三种经济体系模型的第一种的核心特征。

波兰尼的第二种体系以再分配为基础。礼物是在平等各方之间交换, 而再分配则有赖于某种社会等级秩序。贡赋流入帝国的都城, 再流向外省。领袖们把自己从外人那里获取的物品

1. 原书作者对《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这两样东西具体是什么的转述有误, 中译做了修改。

分配给自己的追随者。而追随者则忠于其领袖，为其服务。

这些观念对关注前工业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说他们往往忽视了波兰尼在互惠体系和再分配体系之间做出的区分，而是对比了古代和现代这两种体系。乔治·杜比（Duby 1973）强调了礼物交换在中世纪早期经济的上升中所发挥的功能，而费尔南·布罗代尔对现代早期物质生活与资本主义的雄心勃勃的研究，也颇多受益于波兰尼的观念，并在文本中多次引用（Braudel 1979: 2, 26, 225, 623）。

至于 E. P. 汤普森很有影响的“道德经济学”观念，无论是否源于对波兰尼的解读，也不妨定位于这一传统。如前文所示，由一位历史学家搞出来的概念，后来被其他学科的同行人所采纳，这样的实例是比较罕见的，而道德经济学的观念就是其中之一。确切地说，汤普森在安德鲁·尤尔的《制造业的哲学》（Andrew Ure 1835）中发现了“工厂体系中的道德经济学”这一用语，而后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宗教，视之为整个体系的“道德机器”的组成部分。不过，汤普森将尤尔反转过来，用这个短语来指 18 世纪民众在饥荒时期推行的一种基于公平价格理念的道德化经济学（E. P. Thompson 1963: 第 389 页以下；1991: 第 188—258 页；有关批评参看 Stevenson 1985）。至于这些民众是否是回溯到往昔的某个黄金时代，按照汤普森的意思，还有待争论。但可以明确的是，有关其他社会的研究，其中有些远离英国，比如东南亚，已经

70

发现“道德经济学”这个概念大有裨益（J. C. Scott 1976；参看 E. P. Thompson 1991：341—349）。

文化史家和政治史家也会讨论礼物的重要性，看看是何人（上级、平级还是下级），把何物（刀剑、指环、杯子、服装、书籍、美酒、飞禽），给予何人（广义上的“朋友”），在何时（新年或婚礼），遵循何种仪式，如此等等。他们就像人类学家一样，认为礼物属于承载某种讯息的物质客体（“借飞禽传言”），可以交朋友，也维持了社会网络。他们认为，交换并不总能实现使社会关系更为和睦的初衷，但也注意到“礼物出岔子”、指控忘恩负义、利益冲突的重要意涵。礼物难以拒绝，但在17世纪，像是给法官送礼可能会导致被指控贿赂，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即属此例（Gurevich 1968；Bestor 1999；N. Z. Davis 2000；Groebner 2000）。

有关礼物交换的许多研究都假定，这只是传统社会或莫斯所说的“古老”社会的特征。但晚近一些研究强调，在工业革命之后，甚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它依然很重要。学者们区分了不同的交换类型，包括分别由男女两性给予或给予男女两性的礼物，又比较了不同文化中的交换名目（Strathern 1988；J. Davis 1992；Godbout 1992）。争论的主要领域在于给予行为的理性性质，是应该视之为利他行为，还是视作一种创造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的投资。

八 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例如，根据布尔迪厄的说法，表面上的浪费，比如慷慨的馈赠或铺张的款待，其实是一种手段，借以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社会、文化或“符号”资本。眼下的开销是为了日后获得不那么可见的利益，不妨视为一种投资。他最喜欢举的事例就是法国教育体系。布尔迪厄注意到资产阶级的子女与工人阶级的子女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他从父母遵循的“文化投资策略”的角度，比如让孩子读经典小说，带他们去听音乐会或逛博物馆，来说明前者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获得出色的学位，从而有助于自己日后的职业生涯，这被描述成将继承的资本转换成获致的资本（Bourdieu 1979: 80—83）。

这种转换就是布尔迪厄所称“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手段。这个用语指向这样一种倾向：整体而言的社会，具体而言的教育体系，都倾向于通过灌输给成长中的一代人过去的价值观念，实现自身的再生产（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0；参看Althusser 1970）。传统并不会出于历史学家有时所说的那种“惯性”而自动延续（Mosse 1996: 485—487），而是靠着父母、教师、牧师、雇主及其他社会化中介的大量艰苦工作才传承下来的。

“文化再生产”这个概念有助于提请人们关注维持现状所需付出的努力。所谓维持现状，就是使一个社会大体上还是那个样子。必须加上“大体上”这个限定条件，因为按照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观点，“文化的每一次再生产都是一次变革，因为在行动当中，编织出当下世界的那些范畴都会添入一些新的经验内容。”（Sahlins 1985: 144）即使每一代人在接受并再次传承规范的过程中都只作些微的重新解释，长久积累之下，也终将发生可观的社会变迁。

资本与投资的比喻似乎越来越吸引人。晚近的一项政治学研究也围绕着“道德资本”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对一位政治领袖（比如夏尔·戴高乐或纳尔逊·曼德拉）的声望进行投资，以求实现某项艰难任务，比如就法国而言，如何从阿尔及利亚和平退出；就南非而言，如何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Kane 2001）。

至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关注焦点的，尤其归功于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的两项研究刊行于世。他在第一项研究中指出，有些制度在意大利北方的运作要好于南方，因为北方更多合作，更少不信任。他从北方的公民传统的角度来说明这种对比。得益于这些传统，北方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就是以往所谓“公共精神”的等价物，只是被更精确地定义为“信任、规范和网络”，
72 即可以动员起来做成某事的非正式社会关联。而在第二项研究中，普特南转到美国，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

社会资本存量稳步下降，而其衡量标准就是参与志愿团体的程度。(Putnam 1992, 2000; 参看 Porres 1998; Field 2003)

普特南无论是分析意大利的个案还是美国的个案，所提出的主张都是兼顾古今的。这些主张自然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关注，1999年，《跨学科史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做了两期专号来讨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意大利的两位历史学家评论了相关观点，即所谓北方意大利人的公民精神一直回溯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独立城市国家的时代。其中一位史家提出，这些政权中的社会资本包括了“公民宗教”，换言之，是宗教与城市之间的强关联，主保圣人就是象征（威尼斯的圣马可，佛罗伦萨的施洗者约翰等等），其宗教节日成了年度重大事件之一，不仅是宗教盛会，而且是城市本身的一场庆典。因此，宗教促进了当时意大利人所说的“公民生活”(vita civile)，即一个公民政治上积极的生活。不过，另外一位史家强调了这些城市政权的弱点与局限，暗指普特南是透过玫瑰色眼镜来看待它们的。还有一位史家提出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议题，即“网络封闭”的问题，以现代早期德国女性被排斥在行会之外为例，关注那些结合和网络对于被排斥在外的人造成的伤害(Brucker 1999; Muir 1999; Ogilvie 2004)。

对于普特南的命题，还有一种可能的批评更为深刻。“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貌似中立，纯属描述，其实带有规范性，意味着西方样式的民主是最佳政府形式。普特南从“让民主运转

起来”悄然过渡到让制度运转起来，宣称制度实施的表现北方“更好”，其地方政府更为“成功”，并归功于在意大利那片区域的“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然而，如果以中立的方式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或许有理由认为，北方和南方（无论是规范还是网络）有着不同的形式，可以出于不同的目的加以动员，却有着同样的效力。在意大利南方（事实上其他许多社会也是如此），社会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有关非洲的情况，参看 Chabal and Daloz 1999）。第一种形式就是家庭。一位研究意大利南方的美国学人把那里的社会体系说成是“非道德的家族主义”，招致广泛抨击，但依附于家庭或许更该概括为“道德的”。而南方社会资本的第二种形式则是庇护关系（patronage）。

九 庇护人、受护人与腐败

普特南在讨论社会资本的时候，似乎主要想的是志愿团体，包括他广为人知的保龄球俱乐部的例子，因此主要是平等的人之间的“横向”关联。他把这些结社看成是塑造公民品质的学校。不过，他有关非正式网络也能促进有效政治行动的看法也有助于理解过去庇护关系的运作。

庇护关系可以定义为一种基于“纵向”关联的政治体系，换言之，其中的人际关系是不平等的，是领导（或庇护人

[patrons])及其追随者(或受护人[clients])之间的关系。这两方之间往往使用友谊的说辞,包括“朋友的朋友”,或者使用亲属关系的说辞,就像如今已声名昭著的“教父”。不过,更为现实的态度是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某种形式的交换。每一方都有些东西可以提供给另一方。受护人提供给庇护人自己的政治支持,以及自己的服从,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象征形式(归顺的手势、遵从的语言、礼物的馈赠等等)。而在庇护人这一方,提供给受护人款待、工作和保护。他们就这样将财富转换成了权力。

每个社会里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庇护关系,无论这社会有多么“现代”。不过,在有些文化里,当“科层”规范虚弱(参见上文边码第29页),“纵向团结”尤其牢固,就不妨把社会说成是以庇护体系为基础。话说回来,问题依然存在。如果设定庇护人与受护人之间的关联至关重要,就像“等级社会”(参见上文边码第61页)的观念一样,都会促使观察人士或历史学家忽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的横向团结与冲突(Gellner and Waterbury 1977: 7—19, 167—183)。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庇护关系的运作有很多分析,尤其是针对地中海世界的状况。他们的结论已经破坏了不妨称为“古典”政治学理论的看法,或者说将后者相对化了,其力度犹如波兰尼等人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他们指出,不能把议会民主和科层制当作是普遍的政治模型,另外的体系也自有其逻辑。这和市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仿。不能把其他的体系

看作纯属“腐败”或“前政治的”组织形式。它们都利用了表现为网络、规范、信任等形式的社会资本。

74 我们不妨以斯瓦特巴坦人（Swat Pathans）为例，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在20世纪50年代对其做过研究。斯瓦特的统治者，即所谓“瓦力”（Wali），相对弱势，允许地方“头人”或“首领”大肆发展，即所谓“可汗”（khans）。“可汗”们会竞夺土地、地位和权力。他们把自己的财富花在礼物和款待上，以便培植一批追随者。每一位“可汗”的权威都是个人性的，就是他能从自己追随者那里“抢夺”来的东西。“追随者们就是要找到能给自己最多好处、最大安全的领袖。”作为回报，他们会提供自己的服务和忠诚。如果追随者数量众多，领袖就有荣耀（izat），有权力羞辱自己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由于需要满足自己的追随者，“可汗”们不得不彼此竞争。在巴坦人的社会里，荣耀取决于外观，一个“可汗”即使经济拮据，也不会缩减自己的款待，甚至可能变本加厉，哪怕自己不得不售卖土地以投喂自己的访客和受护人。巴斯（Barth 1959）提到的其中一位“可汗”的话，集中体现了支撑这种悖论的逻辑：“只有不懈展示强力，才能让覬覦者不敢近身。”巴斯的个案研究刻画生动，分析透彻，议叙相融，综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庇护关系，鲜明例示了互惠关系的经济机制与政治机制。

如果花点时间看看15世纪的英格兰，尤其是帕斯顿（Paston）家族通信中揭示的东英吉利亚，我们会发现一个在

某些重要方面类似于斯瓦特的社会。在英格兰，获取土地同样是成年男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对于土地的竞夺有时会采取某种暴力形式，就像约翰·帕斯顿的格雷沙姆庄园被他富有权势的邻居莫林斯勋爵（Lord Moleyns）所抢取时的情形。同样是在英格兰，地方首领（“领主”或“主人”）及其追随者（被称为“伙伴”或“友人”）之间的纽带，成为社会的组织机制的关键要素。

小人物需要大人物的“好领主”之治。追随者们对首领们奉承示好，不仅用遵从的态度，而且用礼物的赠予。帕斯顿家族的某位通信者曾经指出，“两手空空，何以诱鹰？”另一方面，首领们也需要追随者以壮大自身的荣耀或“威望”（按照巴坦人的讲法，就是他们的“izat”）。因此他们始终敞门迎客，向追随者发放“号衣”，换句话说，赠予特定的衣服，颜色与领主的家族相配，穿着此衣，就表示忠诚与支持。有些社会行为，历史学家曾经解读为无非是对玫瑰战争期间中央权威暂时崩解所作出的反应，如今看来，是例证着一种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对于某些历史学家来说，庇护人—受护人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闻。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刘易斯·纳米尔提出了令世人为之一惊的观点：辉格党和托利党在18世纪政治中并不重要。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派系”，换言之，是围绕着一位庇护人的受护人群体，使这个群体结合一体的不是什么意识形态或政治纲领，而是与某位首领的共同

75

关系。

劳伦斯·斯通追随凡勃伦的思路，针对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贵族集团的炫耀性消费，做出了广为人知的阐述。他把贵族们的好客款待描写成本质上属于浪费，或是需要“证明回音震荡的大厅和豪华的礼仪房间存在的正当性，避免呆在一栋半空的大宅里而感到忧闷和寂寞。”（Stone 1965: 555）如果读一读弗雷德里克·巴斯，或是马塞尔·莫斯对礼物的论述，就会有另一种说明。要是没有这种好客款待，贵族集团的庇护网络还能维持下去吗？有些贵族就算手头拮据也敞门迎客，他们这么做，或许也是出于与试图借此驱退觊觎者的“可汗”们一样的动机（参看 Heal 1990: 57—61）。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思路在这些问题上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强调，在现代西方观察者看来往往像是无序的现象之下，其实是秩序；它注重游戏的规则，注重所有行动者都面临的继续扮演各自角色的压力，在这方面首领一点也不比追随者轻松。晚近有关17世纪法国政治的一些研究就借鉴了越来越多研究庇护关系的人类学文献。例如，这些研究指出，红衣主教黎塞留作为17世纪早期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在选择自己的下属时，如何基于个人理由，而不是什么非个人的或“官僚体系的”依据。换句话说，他并不会寻找一个最能干的候选人去就任某个职位，而是把它赐给自己一个受护人，或者用富有表现力的17世纪用语来说，给了他的一个“奴才”（creatures）。

黎塞留的选人方法与“官僚政治”模型相去甚远。然而，它自有其理由。红衣主教若非如此行事，在政治上可能维持不下来。他需要自己可以信任的下属，而除了亲属，他就只能信任自己的“奴才”，就好像君王只能信任自己的宠臣（Ranum 1963）。出于类似的理由，现代早期的教皇们既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也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身边同样是一群亲友和受护人。这种“裙带关系”到了19、20世纪往往遭到谴责，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做法的积极面向。

有关17世纪法国的另一项研究也是聚焦于庇护人、受护人，以及作者（追随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所称的两方之间的“掮客”（brokers），认为庇护关系网络与官方政治制度相互平行，构成补充，而礼物馈赠的社会仪式则履行着政治宗旨。在这里，权力同样依赖于交换。这种体系为政治整合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代价是助长了冲突与“腐败”（Wolf 1956；Kettering 1986，1988）。

所谓“腐败”的问题，已经浮出表面好几次（比如在弗朗西斯·培根的案例中），需要予以更加系统的关注（J. C. Scott 1969；Peck 1990；Chabal and Daloz 1999：95—100）。这个术语是否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评判，暗指过去某个时候道德黄金时代的标准衰微？还是说无非一种标签，供所谓官僚社会用来对组织政治生活的其他方式进行某种否定？

假设我们以相对主义的方式，把腐败这种行为界定为偏离某个公共角色的正式职责，逾越某个社会的“道德边界”

（Harding 1981）。这种行为在哪些社会情境下会兴起乃至繁盛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哪些社会情境下，人们会认为这种行为蔚然成风？如果我们这样来表述问题，就会发现，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旁观者怎么看。社会的组织方式越是正式，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就越是明确，而是否属于腐败事例也就会越清晰。

至于“宠臣”的事例（参看上文边码第47页），也有必要追问，这种形式的行为是否不仅对于所涉官员，而且对于公众，都履行了某种社会功能，比如说，它是否应当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压力群体活动。这个问题还引发出另外的问题。腐败在不同的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是否重要性不等，在（姑且说）瑞典比较不重要，在尼日利亚就比较重要？同样，腐败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否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譬如说，不妨区分官员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授予好处与售卖这类好处，后者换句话说，是遵照市场准则利用官职。后一种意义上的腐败的兴起，似乎属于18世纪以降市场社会的整体兴起的一部分。

十 权力与政治文化

有关庇护和腐败的讨论把我们带到了权力问题。“权力”这个术语如此深地扎根于日常语言——至少在西方世界是这样——以至于或许显得不成问题。然而，表面上的明晰带有

欺骗性，考察其他文化中的权力观念就会看到这一点，比如爪哇文化，那里的权力被视为一种创造性能量，竞争者们可以彼此夺取（B. Anderson 1990: 20—22）。而“克里斯玛”（charisma）的观念背后也有着类似的预设。

无论是否被视为能量，权力这个概念往往会被物化。不难假定，在某个社会中的某个人、群体或机构，比方说“统治者”“统治阶级”或政治“精英”，“拥有”这种权力，而其他个人、群体或机构都没有。美国政治科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曾经以其惯有的犀利笔调断言，“获得最多的就算精英，剩下的就是大众。”（Lasswell 1936: 13）历史学家往往会做出这种预设。

不过，最好把某个社会里存在一群权力精英看成一项假设而不是公理。围绕着美国的权力分配，曾经有一场广为人知的争论，这场争论或许能生动地体现，要验证这一假设——确切说来是界定这一概念——都涉及哪些问题。据说只有当在社会中不同群体有可观察到的利益冲突的特定议题上做出决策时，“精英模型”才能受到检验。

这样的梳理当然使讨论更加明晰和精确。但另一方面，不妨批评这种“一维”权力观过于关注决策过程，忽略了特定的群体如何能够将特定的议题或抱怨排除出政治议程（Dahl 1958; 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参看 Giddens 1985: 8—9）。但批评者们的“二维”权力观随后也遭到了批评，因为它虽然同时考虑了决策与操纵，却忽视了其他好些因素，包括

“有权力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人们的知觉、认知与偏好，使他们接受自己在既存秩序中的角色，以此防止人们……产生抱怨。”（Lukes 1974: 24）这种类型的文化“霸权”（hegemony）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参看下文边码第88页）。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提出，“社会是由社会空间里多重交叠、相互交错的权力网络构成的”。他进而区分了四种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Mann 1986—1993: i. 518—521；参看 J. Scott 1994）。曼很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比如上文提到的“知觉与认知”，这意味着研究相关话题的学人不仅要考察政治结构，而且必须考察政治“文化”。

78 这个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政治科学家的话语，在70年代进入历史学家的话语。可以将其定义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通行的政治知识、观念与情感。它包括“政治社会化”，换言之，即这种文化借助哪些方式，从一代人传承给另一代人，而无论是在家中、校内还是街上（Almond and Verba 1963: 12—26；Baker 1987；Lucas 1988）。比如，在17世纪的英国，孩子们其实是在父权制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这必然使人更容易不加质疑地接受一个父权制的社会。他们会被告知，服从国王符合《圣经》十诫的吩咐“荣耀你的父亲”（对于母亲的讨论要少得多）（Schochet 1975）。¹

1. 现代《圣经》版本此处一并提到“mother”，“当孝敬父母”。

政治文化的概念就像社会资本的概念，有时被批评说暗含有规范色彩，甚至含有种族中心论的味道。的确是有一些政治科学家基于自身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亲近来评判各种政治文化。纵然如此，父权制的例证，就像巴坦人或帕斯顿家族的例证一样，都意味着这个概念可以摆脱这种预设。不妨把它界定为关乎政治目的与手段的“一套话语与实践”（Baker 1987: xi-xiii）。就这个术语的这种意涵而言——回到普特南的例子——无论是意大利的北方还是南方，都有其政治文化。而对于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来说，问题就在于这两种文化不相契合。

以这样的思路来讨论政治，有一种言外之意，就是需要认真考虑符号象征，认识到它们在动员支持方面具有的力量。比如说，研究选举，不仅可以把它看作是选民有机会在党派之间做出选择，而且可以视之为一场仪式，焦点并非议题，而是人物，因为这样才会促成跌宕的戏剧与广泛吸引力（Edelman 1971；Kertzer 1988；O’Gorman 1992）。

晚近一些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也已采取了这种视角，将大革命的符号象征作为运动的核心而非边缘。故此，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分析革命的节日，像是同盟节（Festival of the Federation）和最高主宰节（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之类，特别关注这些庆典的组织者通过哪些方式，努力重塑参与者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还有一种系统性的尝试，要打造新的神圣空间，比如巴黎的马尔斯校场（Champ de Mars），以取代传统的天主教神圣空间。

无独有偶，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也指出，在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她强调，三色帽徽、自由帽和自由树（一种被赋予政治意义的五朔节花柱）对理论家所称的对民众的“政治动员”非常重要。截至1792年5月，已有6万根自由树树立起来。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大革命的理念与理想普遍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Ozouf 1976；Hunt 1984；参看Lucas 1988）。

新的思路实际意味着需要拓展“政治”这个术语的意涵，以便涵盖权力实施中的非正式特征。法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属于第一批倡导研究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人，换言之，研究在形形色色的小型机构/制度中，比如监狱、学校、医院甚至家庭中，权力的运作方式（参看上文边码第40页）。他说这话时这种观点还是一种大胆的提法，而今已经风头大盛，渐成正统（Foucault 1980）。

这种研究权力的广义思路还有一种连带意涵，就是如果不研究更广泛的文化，尤其是已广为人知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就还是无法领会在不同的地区或时期，特定形式的政治组织，比如说西式的民主体制，为何会走向相对的成功或失败。

十一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这个术语描述的是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宽广领

域。或者，按照盖尔纳的讲法，是“各式各样非政府机构 / 制度，强大到足以抗衡国家。”（Gellner 1994: 5）志愿团体就栖身于这块领域，“社会资本”的政治效果在这里也体现得最为明显。

市民社会是德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一项著名研究的主题，该研究问世至今已超过 40 年，探究了 18 世纪其所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Öffentlichkeit*）的转型。哈贝马斯讨论了资产阶级是如何进占了传统只限于一小群精英的公共领域，换句话说，“私人聚集成公众”。这种公众发展出自身非正式的机构，比如咖啡馆、剧院和报纸，尤其是在巴黎和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归功于这些机构，一块可供辩论的竞争领域形成了，这一领域促进批判性的、理性的思维（Habermas 1962；查看 Calhoun 1992）。

历史学家很早就已提出，18 世纪晚期是“舆论 / 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兴起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是用新瓶装了旧酒。不管怎么说，新用语“公共领域”取代旧用语“公共意见”的好处在于，传递了更多的辩论感，是一块竞争领域，而不是一种态度立场，更让人感到是展开辩论的场所。

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滞差，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话语，激励他们不仅去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的咖啡馆，而且还研究了其他非正式机构，像是学院、俱乐部与沙龙（Melton 2001）。以俱乐部为例。18 世纪末，仅伦敦一地，就

有大约 3000 家俱乐部，而它们的仪式，比如选举官员，轮流发言，做好会议记录，都是模仿了议会的仪式和规则。同样是在 18 世纪，共济会变得非常重要，既是作为志愿团体的网络，也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组织（P. Clark 2000；参看 Melton 2001：197—272）。

与此类似，戴维·希尔兹对于殖民时代美国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哈贝马斯的启发。他讨论了各种形式的社交和谈话场所，比如小酒店、咖啡馆和俱乐部（适用于男人），以及茶聚和集会（男女皆适用）。他强调了将这些话语共同体维系一体的“言语胶合剂”，他们在选择言谈风格或腔调或是交谈话题时遵循的原则，以及好的交谈所基于的礼貌（civility）与平等的理念。正如 18 世纪 20 年代刊载在《新英格兰周刊》（*New England Weekly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所表述的那样：“言谈举止要想赢得社交好感，就得把头衔和荣誉搁到一旁。”作者从言谈转到写作，又提到了“公民姐妹联谊会”（civic sorority）的重要性，这是“以文会友”结成的一种女性共同体（Shields 1997：第 xvi、287、319 页）。

希尔兹是位英文教授，进入社会文化史领域，是为了找寻当时应景诗作的背景。但他对自己研究的政治意涵非常清楚。回到社会资本这个观念，不妨说，他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civil”和“civic”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殖民时代精英们又是如何能够在美国革命期间，相互合作展开集体行动的。

在有关公共领域的阐述中都值得认真探讨的另一项制度，

就是示威游行 (demonstration)，不妨将其描述为出于非官方的、有时是反官方的目的而利用公共空间。“示威游行”这个词只是到 19 世纪早期才见诸英文记载，但其具体实践却要早得多。例如说，在 17 世纪 40 年代以及 80 年代的伦敦，平民百姓都曾游行到议会递交请愿书 (Zaret 2000)。我们需要将“民”(demo) 复归民主 (democracy)，尤其是出于两点理由。其一，这类事例属于非暴力集体行动。其二，它由游行数量或请愿书上附带的签名数量“展示”了广泛的支持。

81

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紧密地追随哈贝马斯模型的概念、方法与布局的史学研究之一，却对哈贝马斯本人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其未能讨论女性的位置。琼·兰德斯提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女性努力进入公共领域（当时在《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问世之后，迅速出台了《女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但却发现她们面临阻碍。“共和国的建立不只是没有女性的参与，而且是与女性对立。”(Landes 1988)

在更整体的层面上，哈贝马斯的阐述也遭到了不少批评。例如，他被指责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于理想化，忘记了报纸之类传媒始终通过某些方式，既报道意见，也操纵意见。还有学者提出，他对宗教争论缺乏关注，对更早的公共领域，比如 17 世纪英国的公共领域，也缺乏兴趣 (Zaret 2000)。还有人批评哈贝马斯设定一个社会中要么存在一个公共领域，要么付之阙如，比如在 20 世纪的美国就有一个公共领域，而在俄罗

斯、中国和叙利亚就没有。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远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明晰，因为对于公共与私人的分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男性与女性）大有可能划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谈论和思考这个概念时，或许不应当简单地看一个公共领域是存在还是缺失，而要看它可能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的相对重要性。如今众所周知的咖啡馆，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其角色是被小酒店、理发店或药店所充当的。

你或许预估，在强硬伊斯兰执政的政权里，女性的公共领域是缺失的。但有两部近著揭示道，女性也还享有一点政治空间，有时是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无论是阿亚图拉（ayatollahs）统治下的伊朗，还是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都是如此。比如说，所谓“赫拉特缝纫组”，¹就是妇女们在一处私宅里聚会，学习西方文学，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政治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简·奥斯汀和亨利·詹姆斯都具有颠覆色彩（Lamb 2002；Nafisi 2003）。

82 这些事例都充满悖谬，算是公共领域，却又保持秘密，规模也很小，但不应被忘却。它们促使我们去思考作为复数而不是单数存在的公共领域和公众，以福柯眼中的权力的形式，普遍渗透在文化之中。

1. 赫拉特（Herat）是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

十二 中心与边缘

中心化 / 集权化 (centralization) 的过程是一项传统的研究主题。而另一方面,“边缘 / 边陲 / 外围”(periphery) 的概念只是在比较晚近才流行开来的,还要归功于发展经济学家之间,比如劳尔·普雷维什、保罗·巴兰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一些争论。这些经济学家追随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分析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整体路线,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富足与所谓欠发展国家的贫困是一枚硬币的对立两面,这生动例示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宗主国 (metropolis) 从其附庸国 / 卫星国 (satellites) 那里盘剥剩余价值,并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这样就有了所谓“欠发展的发展”这个短语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Frank 1967)

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借鉴了这套依附理论 (dependency theory),以破解欧洲历史上一个表面上的悖论:为何在 16、17 世纪,西欧城市兴起,农奴制衰落,而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欧或“中东欧”,则是城市衰落和所谓第二次农奴制兴起,最后这个是库拉的经济封建制模型的核心要素之一(参看上文边码第 46 页)。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兴起

时更进一步，把拉美经济学家和东欧历史学家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西方经济发展的代价不仅包括东方的农奴制，而且还有新世界的奴隶制，这是“核心”与“边缘”之间新的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而在他所称“半边缘”（semi-periphery）区域尤其是欧洲地中海沿岸所发生的变迁，则参与构成了同一个世界体系。世界某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是别的区域不断加剧的“欠发展”的结果。空间性概念就此在沃勒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变迁学说的重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Wallerstein 1974；参看 Skocpol 1984：276—317）。（参看下文边码第151页）这套理论也有某种政治维度，因为边缘地区往往是由前殖民地构成的。所以，欠发展就和“殖民主义”挂上了钩，这个术语是100年前由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路易（Paul Louis）提出来的，但现在已经成了社会理论话语的组成成分。

83

中心—边缘模型也被用于其他领域，从政治到文化。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就是这样组织自己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研究的。他使用该模型卓有成效地阐述了前后几代人时期的变迁，使之成为值得更详细讨论的合适例证。麦克尼尔来自美国中西部，执教于芝加哥。他对于其所称“欧洲的草原边疆”（steppe frontier）的研究反映出他明显受惠于弗雷德里克·J·特纳。不过，对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关系的性质，他要比特纳关注得多。他的主要论点就是：“中心要想长期维持大范围内的组织化军事力量，只有掠夺边缘共同体。”如此搜刮来的战利品使政权免于压榨自身中心省份的农民。征服能够实现

财源自足。不仅如此，从被征服省份的基督教人口中征收来的所谓血贡，也促进了一种唯才是举的行政管理体系（参看上文边码第 65 页），尽管麦克尼尔并不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此，帝国就不得不进行持续的征服。奥斯曼土耳其人面临的问题在于，征服不可能无限继续，而边疆也不可能无限扩张。麦克尼尔有力地指出，必须叫停这种扩张进程，原因究其根本，乃在于后勤补给。他如此写道：“对于土耳其人力量扩张的唯一有效限制，就是苏丹的军队在作战季节能够离开其冬季驻地展开旅行的距离。”

这个限制在 16 世纪晚期达到了极限，当此之时，奥斯曼和哈布斯堡这两个互为竞争对手的帝国之间的力量均势形成了僵局。帝国之间的边疆区域自然遭受到两方的劫掠，其结果，“土耳其的野战军倾向于做出的军事行动……就是在他们行动的有效半径极限上产生了一些约束条件，阻止他们更进一步。”

一旦扩张止步，政治体系就开始解体，甚至社会结构也开始变化。士兵们定居垦田，“帝国军事精英当中谋求世袭继承的动力变得强劲。”不妨再加一句，可供招募到精英集团的基督徒子弟的供应量也可能趋于缩减。税收取代劫掠，成为岁入的主要来源，农民的负担就此加重。地方名流开始冒头，政治体系集中化趋势转弱。简言之，边缘开始的变化使中心的组织发生转型（McNeill 1964；参看 McNeill 1983）。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往往说自己生活在欧洲的边缘，他们对政治中的中心与边缘尤其感兴

趣。比如，挪威政治科学家斯泰因·罗坎就给出了一套分类体系，梳理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各地域中心及其臣属边缘之间可能有的不同关系，考察的指标是“中心独特性”（centre distinctiveness）的程度、“边缘一体化”（periphery integration）的程度、“标准化中介”（standardizing agencies）的强度等等（Tilly 1975：尤参第565—570页）。

从一对对立但互补的概念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种智识上的精致极具诱惑力。使用这些概念会推动学者们追求一种收益丰厚但却较遭忽视的历史探究路线。历史学家习惯于研究中心化/集权化，但在探索“边缘化”过程的道路上才刚起步。语言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在19世纪，英国和法国政治上愈益集权化，随后，英语和法语开始传播，而布列塔尼语（Breton）、威尔士语、爱尔兰语、奥克西坦语（Occitan）等等则趋于边缘化。这些语言并未消失，只是的确渐渐退却，不仅是说人口中操习这些语言的比例降低，而且是指被排斥出某些空间，比如说学校，或是被排斥出文学领域，有时还是政府直接行动的结果。来自主导语言或中心语言的用语往往会侵入臣属语言或边缘语言（Certeau, Revel and Julia 1976; Grillo 1989）。

另一方面，也存在反向运动，即边缘地区的语言复兴运动，比如19世纪早期奥克西坦和加泰罗尼亚的“复兴”。还出现过一种语言的地方性或殖民地形式宣布独立的情况，比如

1776年以后的美国英语，独立战争¹之后的美洲西班牙语。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都是很难有稳定的。

知识史是可以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来分析的另一块领域。信息要抵达边缘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就像西班牙的书出口到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情形。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巴西，殖民时期不存在什么本地大学。要想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就得前往宗主国（更准确地说，负笈科英布拉²）。

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也已经注意到他所称的“计算中心”的重要性，它们往往坐落于城市，从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到现代的巴黎，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汇聚于此，得到比较、评论和分类。人们将信息流与贸易流做了类比，来自边缘的“原材料”流向这些地方，以便在中心得到“处理”。不过，这消减了地方信息提供者的重要性，他们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专门具体的事项。无论他们的贡献是否得到承认，他们有时也能提供给中心的学者一些思想范畴（Jacob 1992；Latour 1996；Burke 2000：53—80）。

所谓“边缘”并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意义上的，是一种自觉意识。地方上的人往往会自感

1. 此处指 1810—1826 年拉美殖民地和巴西殖民地在圣马丁、玻利瓦尔等人领导下，脱离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战争，战后形成了拉丁美洲一系列新兴国家。
2. “Coimbra”：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始建于 1290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是巴西早期大学样板，为巴西培养了大量人才。

低人一等，苦于澳洲人生动刻画的那种“文化畏缩”（cultural cringe, Phillips 1958）。他们相信，自己的知识老旧落伍，正好像他们的衣装土味过气。比如说，在巴西人的文化史上，崇洋媚外、以洋气为时尚是反复再现的特征，尽管其他许多国家（从俄罗斯到阿根廷，或从土耳其到日本）也都可堪比拟。

话说回来，有时候，位处边缘的人们也有着自觉的地方分权主义（regionalist），可能会抵制宗主国的文化。他们的离心性、创造性和颠覆性超过了向心性。反叛和异端往往肇始于边缘，可能未曾被充分征服（就帝国边缘地带而言），对其的控制也常常比较松弛。在敌对权威之间的夹缝之中，边缘地带有时成为安全的庇护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伏尔泰决定生活在法国与瑞士两国边境的费内。¹当时图书出版在法国受到严控，全国被跨越国界的颠覆性图书所入侵，在17世纪是来自阿姆斯特丹，而18世纪是来自纳沙泰尔。²（Eisenstein 1992; Darnton 1995）

如此看来，与“中心”和“边缘”相维系的这些概念，在各式各样的分析背景下都有相当的价值。但它们也需要付出代价，比如含混性。“中心”这个术语有时是在字面意义（地理意义）上使用的，但有时又是在比喻意义（政治或经济意义）上使用的。其结果，像“法国的中心化/集权化是路易十四之

1. “Ferney”，如今叫“费内—伏尔泰村”，属于法国东南部的安省，紧邻法瑞边境，距日内瓦不到十公里。

2. “Neuchâtel”，瑞士西部一州（州府同名），与法国紧邻，隔山相望。

所为”这样的陈述，意思远不像它们乍看起来那么清楚。

事实上，有些分析，例如罗坎的分析，暗含着一种强调均衡的社会观，而另一些分析，像是沃勒斯坦的分析，强调的则是冲突。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在欠发展理论家那里，据说“剩余”这个关键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需要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边缘在政治上依赖于核心，而核心在经济上依赖于边缘。然而，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意味着应当全盘抛弃这些概念，只是要谨慎使用，区辨不同类型的中心：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

86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分析了其所称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以及被它合法化的中心制度体系。“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紧密关联着社会视为神圣的东西；它之所以是中心的，是因为它得到社会的统治权威支持。这两种中心性质势必要相互关联。它们互为界定、互为支撑。”（Shils 1975: 2）比如说，根据个体与社会的中心的接近程度，指定对其的遵从程度。希尔斯由此将涂尔干著作中的（论社会秩序的神圣性）与韦伯那里的（论克里斯玛现象）这两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主题关联起来。

在借用希尔斯观念的一众历史研究中，最为人所知的当然就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对于19世纪巴厘岛神圣王权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强调了其所称的巴厘岛国家的“表现性”，并提出“典范中心”（exemplary centre）理论，也就是说，认为统治者及其宫廷“既是超自然秩序的微缩宇

宙……也是政治秩序的物质化身（embodiment）。”统治者在宫廷典礼上端坐不动，以便“在宏大活动的中心投射一种宏大的静谧”。这种宏大活动最生动的刻画之一，就是描绘1847年一位巴厘酋长的火葬仪式结束时一场精心设计的游行，而在仪式临近结束时，酋长的嫔妃们在大约5万名观看人群的注视下，纵身跳入火海。但酋长所统治的地域其实不大，他的权力其实有限，“在表征上高度中心化/集权化，在制度上却是高度离散。”（C. Geertz 1980: 121, 122, 132）

神圣中心或典范中心的观念同样适用于欧洲。譬如在17世纪，王宫被视为宇宙的微观缩影。宫殿中各房间如群星环拱，众位先王被表征为神祇，这些都是在强化这种类比。比如西班牙的腓力四世¹，被称为“地球之王”（planet king）。他极少公开露面，即使出场，也似乎静止如雕像，或是像个巴厘酋长。而“太阳王”路易十四时的凡尔赛宫则更清晰地例证着何谓典范中心。国王的“晨起礼”（lever）（不妨描述为可类比于太阳升的“国王升”）成了某种每日仪式，他的一日三餐和夜间就寝也是相仿。廷臣们的举手投足、衣帽服饰、言谈词汇，皆成巴黎城中效仿对象，并通常在几年延搁之后，传及外省。

话说回来，如此效仿宫廷，并不意味着法国上下人人都敬仰或尊重路易十四或其所代表的政府体系。事实上，不妨更一般地说，希尔斯就像涂尔干，高估了社会共识而低估了社会冲

1. “Philip IV”，1605—1665，1621—1665任西班牙国王，1621—1640兼葡萄牙国王。在位时正处西班牙由世界强国鼎盛转衰期间。

突。与其相反，荷兰社会学家 W. F. 韦特海姆强调指出，在一个特定社会的边界之内，存在着多种价值体系，而这些体系之间有“对位”也有冲撞（Wertheim 1974: 105—120）。

另有一种批评角度：希尔斯有关中心性的分析十分出色，但他对于边缘却未能给予相对应等的关注，后者似乎几近剩余概念，成了“非中心”。借用意大利艺术史学中一项富有洞察的分析的话来说，在许多研究里，“边缘只是被呈现为一片阴影，为了烘托出中心都会的辉煌光芒。”（Castelnuovo and Ginzburg 1979）

若想用更为积极正面的思路来分析边缘，不妨比照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之后研究边疆的方式：视之为提倡自由与平等的区域，容纳反叛分子与异端人士的避难地。16、17 世纪的乌克兰就是作为避难地的边疆的上佳实例。在三大强权（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的夹缝之间，哥萨克人的平等共同体得以繁荣发展，从逃亡农奴中吸收成员。无独有偶，在 17 世纪的巴西，逃脱巴伊亚（Bahia）和伯南布哥等地甘蔗种植园恶劣条件的奴隶们，在未殖民化的内陆腹地找到了避难之处，建立了自由的定居地，史称“基隆博”（quilombos）。

如果你采取一种超然的全局观来看社会，这种边缘就像是一种抗衡（或许是一种必要的抗衡），对抗与中心相维系的正统，对抗对权威和传统的敬重。用阿尔伯特·赫希曼（Hirschman 1970）的术语来讲，边缘为抗议（“呼吁”[voice]）和遵从（“忠诚”[loyalty]）的传统选择方案之外增

加了第三种选择（“退出”[exit]）。

88 似乎有充分理由不仅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Wolf 1969：第278页以下）。比如，在16、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无论首都伊斯坦布尔还是各省中心，盛行的都是以波斯为样板的高等文化。而在边疆地区，盛行的是军士们的通俗文化，以及德尔维希¹有时属于非正统的民间宗教（Inalcik 1973）。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边界完全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事实上，边疆区域就是文化交流的场所，穆斯林造访基督教的神庙，参拜基督教的圣徒，反之亦然。波兰人与匈牙利人从自己的土耳其对手那里学来了运用轻骑兵和短弯刀，就好像美加两国开拓边疆的男人们从北美原住民那里学来了征战技能。事实上，不妨更为概括地说（一如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比利牛斯山民的情况），至少在19、20世纪集权化国家出现之前，政治边界两边的男女民众彼此之间的共性要多于他们与各自中心之间的共性（P. Sahlins 1989）。

十三 霸权与反抗

如前所见，使用“中心”与“边缘”这一对概念，引发

1. “derwiches”，即托钵僧，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教团成员。

了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互补还是冲突。而使用“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这样的术语，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可能性是用“支配”(dominant)文化和“从属”(subordinate)文化这样的术语来取代，以便从“霸权”(hegemony)的角度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某个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是否被统治者接受，这显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它们被接受，为何有那么频繁的抵抗(且不论公开的反叛)?而如果不被接受，那统治阶级何以能延续统治?统治阶级的权力是依赖于强迫还是共识，抑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什么东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提出，或许存在这类东西。他所使用的核心术语来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即“霸权”(egemonia)。(P. Anderson 1976—1977; Joll 1977; Femia 1981)

葛兰西基本的观念在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并不只是依仗强力(或者说不管怎样不是靠强力一种手段)，也要依赖说服，即统治是强力与共识的某种结合。说服是间接的：从属阶级或“臣属”(subaltern)阶级(classi subalterni)由于所受的教育，也由于自身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学会通过统治者的眼睛来看社会。

当葛兰西做出相关阐述的时候，霸权概念并未受到多少关注，但到后来，它经历了一场复兴。事实上，它已经脱离了最

初的语境，被用来分析的情境要宽泛得多，包括精英在国内和在帝国的统治，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支配，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支配（Lears 1985；Frank and Gills 1993）。就经济史而言，有两项互为补充的研究表明，1970年后的这段时期或可称之为“后霸权”时期，而1500年前可称为“前霸权”时期（Keohane 1984；Abu-Lughod 1989）。

而在文化领域，作为对这个概念的通胀或稀释的某种矫正，或有必要追问如下三个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几乎同样适用于“文化濡化”（acculturation）。

1 霸权是一种常量，还是只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运作？如果是后者，存在哪些条件？衡量其存在的指标有哪些？

2 这个概念是纯粹描述性的，还是也被视为有说明性？如果是后者，这种说明是指向统治阶级（或其中某些群体）有意识的策略，抑或可以说是它们的行动所蕴含的理性？

3 我们如何解说这种霸权的成功实现？统治阶级是将其价值观念径直强加给从属阶级，还是有某种协商？能否成功地抵抗霸权？要是没有被支配者至少一定程度上的勾结、纵容、协作或共谋，能够确立起霸权吗？共谋（complicity）不像抵抗那么有魅力，所吸引到的理论阐述未能多到应有的程度。

在过去大约20年来，对葛兰西观念最为重要也最具影响

的应用及发展出现在印度史领域，由拉纳吉特·古哈所创建的一个史家小组以“臣属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为题，出版了一系列文集。之所以创建该小组，是为了反对出于“精英主义”立场，将印度独立运动解释成只是一小群上层阶级群体的成就(Chaturvedi 2000; Chakrabarty 2003)。

与此相反，臣属史学家们强调民众的参与，尤其是在甘地时代，对于英国统治有着多种形式的民众抵抗。古哈不满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前工业社会中农民的立场描述为“前政治的”，所以尽管他关注的是抵抗而不是霸权，但他还是转向葛兰西，后者眼中“臣属群体一丝一毫的独立创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启发了这群学者(Guha 1983, 1997; Guha and Spivak 1990; Gramsci, 转引自 Pandey 1995: 282)。

臣属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尽管最初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为了解读民众抵抗(骚乱、罢工等等)，为了重建支撑这些抵抗的态度立场，也借鉴了许多后来的理论家，从罗兰·巴尔特和雅克·拉康，到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事实上，臣属研究小组是当今之世可以找到的最具理论关怀的史家群体之一。就此而言，它也激励着从爱尔兰到拉美的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

纵然如此，或许还应在古哈及其追随者之外进一步拓展，将另两个概念引入讨论，即“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和“妥协”(negotiation)。“符号暴力”是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又一个概念，指统治阶级将自身的文化强加于被支配群

体，尤其是指这些被支配群体通过怎样的过程，被迫认可统治文化为合法文化，而自己的文化则是不合法的（Bourdieu 1972: 190—197）。相关例证涵盖广泛，从语言史到民间医师的历史，前者像是持方言者面临压力，觉得自己的表述不正确；后者由于被贴上“巫师”的标签，被迫承认自己的活动其实是恶魔作法，从而变成了异端分子或犯罪分子。

至于“妥协”这个术语，起初是社会学家在字面意思上用来分析律师及其客户们接受的“控辩交易”（plea bargaining）的，后来被借用来讨论精英与臣属群体之间不曾明言的相互让步的过程。因此，有项关于英国阶级体系的分析指出，整体而言，无权无势者没有拒绝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但会“基于自身的生存境况，做出妥协或调整”（Strauss 1978: 224—233; Parkin 1971: 92）。

历史学家也发现这个术语很有用，不管是用来讨论对维多利亚时代爱丁堡技术工人“体面可敬”的价值观的重新界定，还是讨论17世纪那不勒斯官方与非官方的天主教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反宗教改革的教会谥封圣徒的过程，就是边缘与中心之间这样一种妥协过程，换言之，边缘就是对于本地英雄的膜拜不断壮大的地区，而中心就是罗马，那里的教会法学者决定是否接受这种膜拜。在传教领域，据说在19世纪的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地方，当地人口往往能影响传福音的过程。对于一则新的福音，他们是积极主动的行动者，而不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换句话说，他们所采纳的基督教的形式是妥协过程的结果（Gray 1976:

第七章；Burke 1987：48—62；Larson 1997）。

另一方面，各种臣属阶级，奴隶、农奴、无产阶级、农场工人等等，也可能选择抵抗而不是妥协。“抵抗”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即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弱者的武器”，比如“三只手、装糊涂……磨洋工……挖墙脚……偷放火、开小差”等等。捷克小说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写的书中塑造了一位“好兵帅克”，描写这位主人公如何借助一些手段来表达对军队的抵抗，此后这类“弱者的武器”也被称作“帅克作派”（Svejkism）。而另一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贝利把这些手段描述成“逃避任务、虚张声势、瞎话连篇、偷奸耍滑、诡计使诈、推卸责任”（J. C. Scott 1990：188；F. G. Bailey 1993：7—17）。

说到磨洋工，在诗人盖拉·伊耶什的回忆中，对于这个过程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伊耶什在20世纪初匈牙利式的平原或称普斯陶¹的一家大农场里长大。在普斯陶地区，农场劳工面临的劳作无休无止，无论平时还是周末，都要干很长时间的活。而他们的对策，就像农场牲畜们的对策，就是一举一动都慢腾腾的。伊耶什形容他看着罗卡叔叔以“乌龟一般的淡定从容”装着烟斗，“他摆弄着火柴，就好像自己手上的那根火柴就是点火的最后手段，全人类的命运都靠它了。”（Illyés 1967：126—127）不妨把这种作派看作是对地主和监工的过度要求做

1. “puszta”，是盐湖沼泽、季节性潮湿的草场、低矮的碱性草原、黄土草原以及裸露的泥坪等各种生态环境的复合体。

出的某种抵抗，是伊耶什所说的“本能的防御”。你不禁想知道，历史上有多少农奴和奴隶就是以这种方式干活儿的。

不仅是个体或群体的行动，而且是文化形式，都可以这样来分析。事实上，有些研究通俗文化的学者甚至将通俗文化界定为对官方文化或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的抵抗文化。这里所采取的策略是防御性的，适合于臣属的定位，是颠覆而非对峙，是游击的战术而非公开的战事——但总归还是抵抗（Certeau 1980；参看 Ahearne 1995：162—164）。

抵抗可能采取外在的遵从再加掩盖的防御形式。当殖民地种植园里的奴隶被强迫接受基督教，他们掩盖了自己的传统宗教，只摆出一副基督徒的外表，在圣徒当中为自己的神祇找到对应，这样就有了西非的神力格巴（Legba）被视同于圣安东尼、雷神尚戈（Shango）被视同于圣巴巴拉之类的例子。通过这样的方式，西非的膜拜能在新世界存活下来。

92 此外，抵抗还可能采取模仿（mimicry）这一含混形式，个中差异在上层看来或许是错误，但在下层看来却更像是戏仿（mockery）。另一种描述这类模仿的方式是“逾越式再铭刻”（transgressive re-inscription），造出这个短语，就是要提请人们关注，一个臣属群体或边缘群体（民众、女性、被殖民者、同性恋者……）是如何对更体面可敬或更有权有势的群体的词汇进行采纳和调整（adopts and adapts）或转换与颠覆（converts and subverts）的（Bhabha 1994：85—92；Dollimore 1991）。

十四 社会抵抗与社会运动

当然，有些情况下，日常的抵抗转变成了公开的反叛或其他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这个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那里开始使用，自那以后始终非常流行（Tilly 1978；Tarrow 1994；Melucci 1996）。在历史学家中率先运用的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的《原始的叛乱》（Hobsbawm 1959）就有一个副标题“19、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研究”，所涉极广，从盗匪到千禧年来临前的信徒。他的书问世之后，立即有一大堆研究千禧年运动的专著跟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有所出力。

《原始的叛乱》中有一点可能的缺陷，就是术语的用法太宽泛，涵盖芜杂，有仅仅持续数小时的骚动，也有从烧炭党到黑手党的持续性组织。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以及更一般地说“社会运动”这个术语，它们的价值就在于提请人们关注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共性，而此前这两者是被分开孤立研究的。

这些运动中有些不妨说成是“行动型的”（active），它们积极采取行动，追求明确目标，比如国族独立、废奴或女性投票权。尽管习惯上不会把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来讨论，但追随已故的罗伯特·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

1987），以这样的思路来考察其早期岁月，强调改变既存秩序的民众集体行动的重要性，或许不无益处。

93 其他社会运动最好描述为反应型的（reactive），是对已经发生的变革做出反应，试图抗御外部的威胁，维持某种传统生活方式。这类运动的经典事例像是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在回应领主提出的要求的变本加厉；又比如法国西北部的旺代（Vendée），是在对法国大革命做出反应。更具防御性的是所谓的卡努杜斯（Canudos）叛乱，它发生在1896至1897年间巴西东北部的边远腹地，是为了抗御1889年由一场军事政变创建的巴西共和国。这种反应采取的形式是“退出”而不是“呼吁”，是撤退并创建一座圣城，而不是叛乱。纵然如此，圣城还是遭到军队攻击并被摧毁（Levine 1992）。

针对社会运动可以探究不少问题，包括以下三项：

（1）首先，谁在运动？什么类型的人在领导？什么类型的人在追随？许多运动，无论是宗教运动还是政治运动，都拥有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那种“克里斯玛式”领袖，从圣方济各、马丁·路德、拿破仑到列宁都是如此。韦伯将克里斯玛界定为一种特别的品质，个体凭借这种品质，会被视为“赋有超自然的、超人的或至少是特别不寻常的力量或品质”。（Weber 1920: i, 241）

比如在卡努杜斯的事例中，克里斯玛式领袖是一位云游圣人，安东尼奥·孔萨尔埃洛（Antonio Conselheiro）。这位苦

行主义者的声名来自预言灾难即将到来，而巴西将靠着塞巴斯蒂昂国王（1578年在北非死于与穆斯林作战中）的复归得到拯救。成功的运动拥有两位角色互补的领袖，这并不罕见：其中一位是不涉俗务的克里斯玛式领袖，吸引追随者；而另一位是科层式领袖，负责组织事务。不能忘记了那些地方领袖，他们当中有在旺代和其他地方类似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教士。

已经有人批评韦伯过于强调领袖的品质，而忽视“赋予”这些品质的追随者的期待（Shils 1975: 126—184; B. Anderson 1990: 78—93）。不妨究问是哪些类型的追随者特别容易受到克里斯玛式领袖的影响，比如说年轻人。年轻人在社会运动中往往表现抢眼，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发行动的能力尚未被例行常规消磨殆尽，也因为他们在充满挫败和压制的事件中所能失去的比年长者更少。无论如何，在宗教改革运动时，在1848年的系列革命里，在1968年巴黎与布拉格的运动中，年轻人都令人瞩目（Brigden 1982）。

（2）其次，为了实现集体目标，采取了哪些手段？社会运动中不时会出现下面两方之间的冲突，一方是准备好使用暴力追求自己目标的参与者，另一方就像印度独立运动中的甘地，94拒绝使用暴力，试图找寻各种替代道路，从和平示威到抵制洋货。

依照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等人的讲法，我们可以讨论不

同运动的不同“剧目”。在和平运动中经常出现的要素就是联名请愿并呈交权威当局。另一种是绝食，争取女性选举权活动分子和爱尔兰共和军等都曾使用这一手段，以求获得政治犯地位。

即便是骚乱，无论起因是多么自发，也会调用剧目，比如某个特定文化内为人熟知的仪式，这些仪式既能将民众行动呈现为一种行进或朝圣，从而将其合法化，又能赋予其戏剧化形式，使其更具说服力。另外，它们还能采取某些传统符号，比如吊死不受欢迎人物的模拟像，或是在抗议面包价格上涨时把一条面包穿在矛尖上，从而回溯到其他骚乱。

（3）第三，是什么使得有些运动比其他运动更为成功？社会理论家搞出一个有用的概念，就是对资源的成功“动员”，这里的资源包括武器、钱财，但首先是人员（Tilly 1978：69—84；Oberschall 1993；Melucci 1996：289—312）。动员的关键之一就是克里斯玛式领袖，还有一样就是组织的缔造。比如说，在19世纪的爱尔兰，“爱尔兰自治联盟”（Home Government Association）、“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爱尔兰国民联盟”（Irish National League）乃至“盖尔人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等组织的创建，动员起了对于独立或“地方自治”（Home Rule）的支持。来自组织成员的捐赠不仅充实了运动经费，也激励了“投资者”的忠诚。

业已存在的组织得到再次发挥作用，这已是寻常套路，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些地方的社会运动更为成功，因为相较于其他地方，这些地方有一种强大的“结社文化”。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各个宗教兄弟会构成了天主教联盟的基石，而天主教联盟这个好战的反新教组织，正是16世纪法国一系列宗教战争中的重要参与者。事实上，别称“天主教神圣同盟”的联盟本身就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兄弟会。当代社会运动中最初基于既存组织的实例，像是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这家足球迷组织后来转变成了一个政党，生动展现了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

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流动性的，非正式的，特点就是维克多·特纳所称的“混融”。其结果是，它们无法以这种形式长久持续。其中有些逐渐消亡，其他有些则从自身的成功中完成转型。成长导致了“混融的例行化”，这是特纳借用韦伯的“克里斯玛的例行化”后加以调整，以更平实的方式，来描述较为持续的组织机构的发展，比如方济各会、路德宗教会和共产党。“运动”已不再运动(V. Turner 1969: 第131页以下)。

日后，当获得成功的组织找人写作自身的官方历史，这些历史往往会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觉得这些实体都是从起步伊始就精心策划、逐步实现建制化。需要小心谨慎，对诸如此类的主张保持怀疑。

十五 心态、意识形态与话语

有关支配与抵抗的政治问题将我们带回文化领域，带回有关社会风气、心态或话语的探问。我们已经看到，庇护人—受护人体系有赖于荣誉文化。前文讨论过的科层制（参看边码第29页）也取决于某种特别的社会风气，包括对界定这类管理体系的正式规则的尊重（有人或许会说是过分尊重）。同样，统治阶级的霸权也仰仗于臣属阶级一定程度的接受。无论何种情况，如果不理解参与者的态度立场与价值观念，就不可能领会体系的运作。

因此，可以不无理由地主张，没有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就不可能撰写社会史，只是要把观念史理解为书写男女众生的观念，而不是特定时代最具原创性的思想者的观念。这种广义上的观念史牵涉到两个互为对手的概念，一是心态，一是意识形态。

心态史初起之时，是以涂尔干式的思路来探讨观念，尽管涂尔干本人更喜欢用“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这个术语。涂尔干的追随者吕西安·列维-布留尔在《原始心态》之类研究（*Lévy-Bruhl 1927*）¹中发展了这一思路（*Burke*

1. 此书原名为 *La Mentalité primitive*，应为1922年出版，列维-布留尔于1927年出版的著作书名为 *L'âme primitive*，原作疑有误。

1997: 162—182)。而当代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更有可能谈论“思维模式”(modes of thought)、“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或“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

不管使用什么术语，与传统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思路至少存在三点不同。首先，强调的不是个体立场，而是集体立场，不妨称之为“信念共同体”。其次，注重的不是明言的理论，而是默含的预设，换言之，就是“常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某个特定文化中显得像是常识的东西。第三，关注的是信念体系的结构，包括用来解释经验的范畴，用来进行证明和说服的主导方法，在许多事情上可能各持己见的个体会共享这些范畴与方法。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这三项特征，与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Foucault 1966)中对其所称的思维系统或“认知型”(epistemes)的“考古学”思路，对应之处一望可知。

96

中世纪的神判法就是心态思路有助于解决的问题类型的一个例证。事实上，在中世纪早期，有罪还是无罪有时是由某种神判法决定的，比如手持一块烧红的铁，或是将嫌疑人的手浸入沸水。长期以来，这一点一直有碍于人们理解那个时代。正如18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所言，“在所有因为人类理性的缺陷才得以存在的离奇荒诞的制度当中，这种……似乎是最过分、最荒谬的。”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认真探讨神判法习俗，试图借助考察参与者所持的预设，使这

种习俗变得更可理解。比如说，古代史专家彼得·布朗（Brown 1975）就提出，神判法的功能就是达成某种共识。其他历史学家拒绝接受这个具体结论，但和布朗一样致力于将神判法重新置于其文化背景之中。事实上不妨如此概括：心态史本身已经经受住了神判法的检验（参见 Morris 1975；Bartlett 1986）。

类似的问题激发了马克·布洛赫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国王神迹》（Bloch 1924）。¹如前所论，布洛赫对涂尔干敬仰有加。他撰写了一部有关信念的历史，讨论法国与英国的国王如何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通过触碰瘰疬病患者来治愈这种皮肤病。这种力量象征着他们的克里斯玛，而后者是韦伯此前不久阐述的一个概念，不过布洛赫或许并不知晓。对御触的信念持续了许多世纪。在英格兰，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安妮女王统治期间（在她所触碰的患者当中，有一个小男孩名叫塞缪尔·约翰逊）。²而在法国，它一直延续到大革命，并在1825年由查理十世恢复施行。

布洛赫首先设定，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国王和女王们其实并不具备治愈皮肤病的力量，然后探讨为什么他所称的这种“集体幻觉”能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他强调指出，事实上，人

1. 此书法文原版名为《会魔法的国王们》，英译本名为《国王的触碰》或简称《御触》，此处据商务中译本书名。
2. 安妮女王（Queen Anne）是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代君主，1702至1714年期间在位。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传记作者和词典编纂者，幼时患有瘰疬病，1712年3月在伦敦接受安妮女王触碰，此后一生携带着女王挂在他项上的金制护身符。

们期待出现奇迹。如果疾病的症状消失了，他们就会归功于国王。另一方面，如果症状不曾消失，那只能表明，病人还需要再次接受御触。布洛赫还指出，倾向于信奉某种与经验相矛盾的事物，正是列维-布留尔所讨论的“‘原始’心态的一种本质特征”（Bloch 1924: 421 注）。

在法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心态史就属于史学实践的组成部分。不过，它吸引英国学界就相对慢一些，在成功吸引学界之前还绕了些弯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受到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启发，研究阿赞德人（Azande，生活中非）的信念体系。埃文思-普里查德以一种让人想起布洛赫讨论御触的方式，强调了赞德毒药神谕的自我确证（self-confirming）性质，而他在攻读中世纪史的学生时代，就曾研习过布洛赫（Evans-Pritchard 1937: 194）。得益于埃文思-普里查德及其他人类学家的努力，思维模式和信念体系开始引起英国史家们的关注，尤值一提的是基思·托马斯在其《宗教与巫术的衰亡》中的分析（Thomas 1971）。

心态史业已证明自己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探讨过去的思路，而布洛赫的著作只是这类经典的其中之一。纵然如此，在解决传统问题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或许可以称为“静态化”（immobilization）问题。目前看来，历史学家描述过去某一特定时刻的心态很成功，而对于它如何演变、何时演变或因何演变的说明则远为逊色（G. E. R. Lloyd 1990）。

诚如不少论家所言，福柯的《词与物》也暴露出这一缺陷。而该缺陷与这种思路的最大优点之一有密切关系，即预设一种信念体系中每一部分都依赖于其他部分。按照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说法，“在这种信念网络中，每条脉络都有赖于其他每条脉络。”这样的预设使历史学家能够说明某种心态何以长期延续，哪怕存在难以应对的经验证据。话说回来，有关心态延续的说明越是令人满意，一旦最终真的发生心态改变，说明也就越是困难。

心态史引发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不妨称为“同质化”（homogenization）问题。聚焦于集体心态，就等于忘记个体并不完全如此思考。面对这一异议，或许能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Le Goff 1974）的话来回应。他指出，“心态”这个术语只是用来描述个体与其所属群体其他人之间共同持有的信念。

事实上，研究心态的史家们很容易流于设定存在一种二元对立，即“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信念体系，等于换了一套说辞，复制了列维-布留尔所做的区分，即其所称的“前逻辑”思维和“逻辑”思维。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现代思维被视为更抽象，更不依赖于情境，也更“开放”，因为有一批相互竞争的体系可以利用，其结果，个体更容易意识到，在自身的信念之外，还存在替代可能。与之相反，再次引述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话，一个赞德男性¹是无法摆脱其“信

1. 阿赞德人是集体统称，个体单称时为赞德人。

念网络”的，因为“这是他唯一知晓的世界”（Horton 1967, 1982; Gellner 1974: 18）。

要揭示这类对立蕴含的问题，不妨做个简单的实验，接连续读该领域两部经典，一是葛兰言的《中国人的思维》（Marcel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1934），一是吕西安·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1942）。赋予传统中国人和16世纪法国人的特点似乎非常相似。它们都是通过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作对比而得到界定的，“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异使得“他者”的多样性被化减为一致性。这种化减正是结构分析的代价（参看下文边码第134页）。

与集体心态这个概念相关联的棘手之处中，有一些可以通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分析来避免。思想史的这种思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并在卡尔·曼海姆之类德国“知识社会学家”手上发展起来。曼海姆（Mannheim 1936）研究了其所称的“思想风格”（*styles of thought*），考察了不同种类的知识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纽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换言之，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兴起之时，世人对以这种思路来探讨观念也越来越感兴趣。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定义有不少，其实是太多了。有些人是在贬义上用它的——我有信念，而他（或她）有的是意识形态。其他人当它是中性的，作为“世界观”的同义词（Geuss 1981: 第一章; J. B. Thompson 1990: 第一章）。曼

海姆在两种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做出了有用的区分。其一，他称之为“总体的”意识形态观念，认为在一套特定的信念或世界观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阶级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就意味着，布洛赫与费弗尔讨论中世纪心态或16世纪法国人心态，却不探讨社会区隔，这实属错误。

99 其二，即曼海姆所称“特殊的”意识形态观念，是说观念或表征可以被用来维持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例如，有关民主制的观念可以用来“神秘化”，掩盖权力由一小群人实施的程度。此外，观念也可以使整个系统正当化（或韦伯所说的“合法化”），这往往是借助于将政治秩序表征为自然的而非文化的而实现的，比如把国王表征为太阳。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深入阐述了这些意识形态观念（Althusser 1970），将意识形态描绘成指涉“个体与其实际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性（或‘想象出来的’）关系”。意识形态不再限于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形式，变得与集体想象几乎难以分辨。

心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或许还需要一些澄清（Vovelle 1982：尤参第1—12页）。有鉴于此，回到御触问题或许是有益的。马克·布洛赫这部经典研究在探讨对御触的信念时，仿佛它是“无辜”的。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做分析，就会强调指出，事实上，正是出于王室政权的需要，普通民众应当相信国王有力量制造奇迹。克里斯玛并非法兰西与英格兰的国王们的一种自然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制造出来

的，被王袍、仪式等等生产出来的。

尽管心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比不无益处，但人们在尝试分析观念如何维持政治体系时，一些棘手之处已经暴露出来了，其与“霸权”概念所关联的一些难题并无二致（参看上文边码第88页）。意识形态往往被视为某种“社会黏合剂”（social cement），将社会维系一体。然而，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已经遭到了一系列同时抨击马克思主义者和涂尔干主义者的研究的挑战。具体而言，这些研究提出，自由民主体制的社会结合力并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换言之，它并不依赖于人们对政制中体现的根本价值存有某种共识，而在于对有关政府的种种批评尚未形成共识（Abercrombie, Hill and Turner 1980; J. B. Thompson 1990: 3）。

第三个概念所占据的思想空间，与心态和意识形态有部分重叠，在最近20年左右逐渐流行，这就是“话语”（discourse），它将关注焦点从思想本身转向表达思想的媒介：言说、意象或文本。早在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就已经在谈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指有关比句子更长的单元的研究，无论这些单元是会话的碎片还是书籍的段落。不过，只是从福柯采用这个术语开始，它才传播到多个学科。

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一书中（Foucault 1969），引入“话语”（discours）一词，作为对其笔下有关“真理”和“个体”幻觉的双重批判的一部分。他指出，一种话语“建构”了其所关注的话题，因此不同的话语中表达出不同的“真理体

制”（regimes of truth），而不是对于现实的客观描述。这个问题将在下文探讨（参看下文边码第100页）。

福柯之所以要引入“话语”这个术语，另一个原因就是批判一种常识观念：一个文本是由某个个体撰写的，表达的是他或她的观念。与此相反，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种集体建构。应当把一个特定的文本视为由多个文本构成的一个更大的系统或剧目，文本有意或无意地以之为指涉对象。文本“遵循着一组准则，这些准则标志着一种话语实践”，是从一套共同储存或剧目中挑选出来的（Foucault 1969：第二章；对语言学家和福柯的话语学说的综合论述，参看 Fairclough 1995）。

俄国文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1981）没有使用“话语”这个术语，但他已经通过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讨论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倾听文本，仿佛文本在彼此对话，相互回应。这个观点属于更整体的“对话”理论的一部分（参见 Morson and Emerson 1990：52—62；Holquist 1990）。

福柯的概念被爱德华·萨义德所采纳，他的《东方学》一书（Said 1978）将自己的研究主题界定为一种创造出“东方”的话语，也是一种制度，被“西方”用来支配近东世界。萨义德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文学评论家，他细致分析了一批讨论东方的西方文本，不管是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这样的旅行者，还是古斯塔夫·福楼拜这样的小说家，抑或是厄内斯特·勒南这样的学者。他的分析提请人们注意，这些人是如何

通过一些刻板印象，比如消极被动、耽于感官、颓废堕落，进行“对东方的图式化”（schematization of the Orient）的。通过这种方式，文本将东方人描绘成不适合统治自身，将西方的统治合法化；将东方人女性特质化，以求让咄咄逼人、彰显男性特质的帝国主义的干预正当化（Said 1978，有关批评见 MacKenzie 1995）。

如果再早一代人光景，萨义德或许还会写同一部书，只是描述不太一样。他可能会称自己的书是在研究东方学的“修辞”，甚至是“东方学学者的心态”，尽管这些概括或许无法让他凸显文本支持帝国的作用。他可能还会把东方学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话语”。

101

“话语”就像“心态”，也是个不精确的术语。而两者（就像“文化”）的魅力或许正有一部分来自这种不精确。但当你尝试用这个概念来进行研究时，这种不精确也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何时，在何处，一种话语终结，另一种话语开始？再比如，是存在一种“殖民话语”，还是说有好几种？除了依照地点和时间，根据社会群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教士与俗人、医生和律师等）来区别不同的话语，是否有用？

这种区分的过程又该止于何处呢？个体被福柯赶出了门，却又作为从某个文化剧目中进行特定选择和组合的作者，从窗户里返将回来。一位16世纪的政治文选编者曾经指出，“一切非我”，因为文本是别人写的；但又“一切皆我”，因为是他安排了这些文本，从而赋予它们以意义。

模糊并不是唯一的问题。聚焦于话语，就等于对文本（text）展开内部分析，而不关注背景（context）。而这个背景，就包括读者与听众。

十六 传播与接受

从话语再到传播¹的观念，就只有一步之遥。而后者早就成为不少学科的兴趣焦点，不妨举四个例证。哈罗德·拉斯韦尔（Lasswell 1936）从研究政治起手，曾经用他惯有的有力笔调，将这类研究的主题界定为“何人向何人说了何事，有何等效效果”（意味着这些“效果”可以测量）。雷蒙·威廉斯（Williams 1962）从文学领域出发，给出了一种略微温和的界定，它更强调形式：“观念、信息与态度在其中传输与接收的那些制度和形式”。约书亚·费什曼来自语言学领域，就该主题给出了又一种变式，提出“研究何人何时向何人说何语言”，强调有许多言说者倾向于在不同情境或“言说领域”之间转换多种语言或语言形式。戴尔·海姆斯出身人类学，看待这个话题的格局更为宽广，建议对传播事件进行民族志记录，不仅考虑讯息、发送方和接收方，而且考虑“渠道”（channels）、“符号”（codes）和“场景”（settings）（Giglioli 1972）。

1. “communication”，本节题目译作“传播”，亦有“沟通”“交流”“交通”等密切相关的意思，为求统一，牺牲了个别语境的差异。

受到海姆斯、费什曼及其同行们的激励，有些历史学家开始致力于语言的社会史，探究语言的形式演变和功能差异 (Burke and Porter 1987, 1991)。比如说，语言有如消费，成为某些社会群体在自身与其他群体之间确立区隔的手段。至于具体例证，不妨看看索尔斯坦·凡勃伦 (Veblen 1899)，他主张，有闲阶级说话的方式必须是“繁复的、老派的”，因为这类措辞意味着对时间的耗费，因此也“不必运用、不必需要直接的、强制的言说”。

对语言作为一种地位符号的用法，社会语言学家也有丰富的讨论。其中有一例非常有名，它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上层阶级与非上层阶级的英语用法 (“U”[上层阶级的]与“non-U”[非上层阶级的])，据说像“looking-glass”是上层阶级的，而“mirror”是非上层阶级的；“writing-paper”是上层阶级的，而“notepaper”是非上层阶级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Burke and Porter 1987: 4—5)。与此类似，在17世纪的法国，弗朗索瓦·德·卡利埃尔作为路易十四的私人秘书，指出了其所称“资产阶级言谈方式”(façons de parler bourgeois)与贵族特色语汇之间的差别。¹在这些例子中，对于任一特定用语的选择看似任意武断，实则是由贵族使自身有别于资产阶级的欲望所推动的，而资产阶级又会改变自己的言谈模式，以模仿贵族，后者因此不得不不断弃旧图新。

1. François de Callières (1645—1717)，法国外交家和作家，著有《外交事务》，阐明了一名理想的外交谈判人员应有的资格、责任、行为和手法。

另一种策略是某些精英日常运用外语，比如在19世纪的俄国、18世纪的普鲁士和17世纪的尼德兰，精英就会说法语。这既是使自身有别于社会等级更低的人的手段，又是对巴黎作为文化中心所表达的敬意。凡勃伦或许会再加一句，说用一种外语和说自己母语的人相交流，就是在炫耀“有闲阶级”之有闲。

行文至此，我们一直在考察传播者，考察其意图与策略。那么，受众及其反应方面又如何呢？在这个领域，汉斯-罗伯特·耀斯（Jauss 1974）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等文论家业已作出了重要贡献，强调读者及其“期待视域”（horizons of expectations，这个用语源于德国哲学传统）在意义的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看 Culler 1980: 31—83；Holub 1984: 38—63）。与之类似，法国理论家米歇尔·德·塞尔托（de Certeau 1980）强调了普通人的创造性，他们对电视屏幕或其他媒介投射给他们的讯息会积极进行重新解释。在这块讨论中的核心概念有米歇尔·福柯和保罗·利科使用的“挪用”（appropriation）、塞尔托使用的“重新使用”（re-employment）。这个过程的一种极端案例，就是上文提及的“逾越式再铭刻”（参看上文边码第92页）。

103

究竟“真实”的意义是在文本中找到的，还是被投射到文本中的，归根结底，这是个形上追问，让历史学家在这种问题上选边站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但另一方面，不同时间地点的观众、听众或读者所接收到的讯息与所传输的讯息之间的差

异，这个经验问题显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比如当德国农民宣称，由于基督为所有人受死，因此应当废除农奴制时，路德就抱怨说这是对他的教义解说的误读。

“视域”这个术语有时被批评说太含糊，不过，关注讯息接收方的期待，会和其他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史学一样富于启发。这些期待往往是集体性的，因此人们会开始使用“文本共同体”(textual communities)和“解释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pretation)之类的术语(再一次彰显了“共同体”这个术语不可或缺)。

有关接受的问题是目前所称的“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的核心。卡洛·金兹伯格在其所著《奶酪与蛆虫》(Ginzburg 1976)中有一段名文，讨论了心智“格栅”(grids)，立场异端的磨坊主梅诺其奥就是透过这种格栅阅读某些书籍的；也探讨了你对中世纪晚期宗教文献的解读与宗教裁判所的正统解读之间的分歧(参看 Foucault 1971: 11)。自承思想上受惠于塞尔托的罗杰·夏蒂埃(Chartier 1987)，以及罗伯特·达恩顿(Darnton 1991)，以这两位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在这种路数上进行了更系统的探索，集中研究18世纪的法国，通过研究评注、图书借阅记录、读者写给让-雅克·卢梭之类著名作者的信函等，重构读者对特定文本的观点。

对翻译史以及对原著与其他语言刊行的版本之间的差异，人们的研究兴趣也不断增长，这也属于兴趣点从生产转向接受的整体趋势的一部分。艺术史家也越来越关注人们对图像的反

应。比如说，反偶像崇拜（Iconoclasm）无论针对的是魔鬼的图像还是圣徒的图像，都被作为证据加以研究，使我们能够重构早已过世的观看者的视角（参看 Freedberg 1989: 378—428）。接收方与原初发送方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研究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反应的收获就会越大。

104 诸如此类的接受研究也引发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即使我们接受塞尔托所说的接受的创造性，即原作与复本之间的距离，或发送的讯息与接收的讯息之间的距离，说明这些差异的方式也不止一种。如果我们谈论“重新解释”，意思是说这种活动是有意识的。而如果我们谈论“错误解释”，意思是说这种活动是无意识的（也是没有能力的）。许多时候，要在这些替代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是不可能的。在发送方看来属于错误理解，在后人的眼中却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的调适。我们除了留意到这一事实，也难以再做什么。

在接受活动上也依然存在差异问题，在特定文本的读者的层面上如此，在整个文化的层面上亦是如此。是什么导致有些文化对外部影响比较开放（或容易遭受影响），而另一些文化更有能力抵抗这些影响——事实上，它们也没有能力做出别的反应？在这方面，非洲问题学者走得最远，他们说明了为什么有些民族，比如伊博人（Ibo），展示出了对于变革的显著接受度，而另有些民族，比如帕克特人（Pakot），却表现出同样显著的抵抗性。这些学者将两类文化相对比，一类是高度整合并往往封闭的文化，另一类是具有更多的内在冲突并因此更为开

放的文化 (Braudel 1949: ii, 704; Bascom and Herskovits 1959: 180—67¹)。

同时, 乐于接受外来影响的传统似乎是可以逐渐形成的。比如, 日本人在遭遇到西方之前, 早就习惯于对中国的观念、实践和制度作出调适, 这也有助于说明他们为何能迅速而成功地挪用西方文化的不同要素, 在 19 世纪中叶以来尤其如此。而如果从日本人的性格的角度来说明这种创新传统, 却不考察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 更准确地说, 是各个文化领域之间的差异, 或许并不明智。

有关挪用、接受与文化距离的这些问题, 正是目前被称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 的重要主题。

十七 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混生性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是一个较新的术语, 尚未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而“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 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属于左派的一种主张, 其认为“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 名过其实。就连用来描述某种政治体制的“殖民主义”这个术语, 其历史也最多追溯到 19 世纪后期 (参看上文边码第 82 页)。

1. 原书页码标注如此, 疑有误。

至于“后殖民研究”，它就像其所仿效的“文化研究”一样，也是以文学研究尤其是英语文学研究专家为主导的一种跨学科门类。这些专家转而关注前殖民地生产出的文本，也关注理论，无论是文学、语言、文化、心理、社会、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理论（Moore-Gilbert 1997；Young 2001）。至于为什么文学研究专家会在开辟这块领域时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这是个颇有意思的问题。有一种可能的回答是，相较于（比如说）历史学家，他们对待理论的态度更为开放。或者可以认为，在“典范”（canon）危机之后，也就是说，在不再盲信基于甄选绝大多数出自“死白男”（DWMs，即“已故白人男性”[dead white males]）之手的“经典”文本的教育课程体系之后，文学评论家一直在寻求一种新的活动。

无论如何，一块新领域已然面世，它将对文学文本和它们所根植其间的各种文化——包括殖民文化、新殖民文化或后殖民文化——的关注融合在了一起。被研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通常是英属殖民地，虽说也有一批关于拉美的研究，还有一些尝试要进一步拓展这种思路。承继爱德华·萨义德的路数，一般意义上的“话语”观念，以及特定意义上的“殖民话语”，已经在这些研究中占据了核心位置（Washbrook 1999）。有两个重大主题反复出现：认同/同一性（identity）与混生性（hybridity）。

是美国黑人作家 W. E. B. 杜波伊斯提出了“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这个术语，以描述自己身兼美国人和

非洲人的感受 (Gilroy 1993: 30, 111—145)。对于后殖民认同问题的研究会特别指涉文本的作者们, 并往往从“失位”(displacement) 的角度来提问。许多作者自己认同是印度人或非洲人之类, 却用自己前殖民主子的语言写作。那么这种语言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某种意义上, 他们是在自己土地上的流亡者, 或者按照爱德华·萨义德在他有关流亡的一些犀利反思中的讲法, 其实是处处皆“不在其位/格格不入”(out of place)。这个问题还有个温和一些的提法, 体现在另一些作者的作品中, 他们的母语是英语, 但英语文学传统对于他们是异在的(alien), 因为他们的居处之地离宗主国/都城如此遥远。我们又回到了中心与边缘的论题。

我们不妨以巴西评论家罗伯托·施瓦茨为例, 来看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施瓦茨探讨了19世纪小说大师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 提出“不在其位的观念”(ideas out of place) 的观念, 指出下列两方面之间的矛盾: 一是马查多所处时代受教育的巴西人对于英法理念的热捧, 一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现实。马查多是“居于资本主义边缘的主人/大师(master)”, 用葡萄牙语写作, 熟悉法语与英语文学传统, 却又面向自己国家的公众写作。他如何能够避免模仿中心的文化, 找到自己的声音? 施瓦茨建议, 不妨运用欧洲的词汇, 但用它来说些不同的东西 (Schwarz 1992: 19—32)。

106

研究文化混生性的理论家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差异。人类学

家首先讨论了他们所称的“文化濡化”，并就该过程做出了两项假设，不过后来也都遭到了质疑：其一，变迁是单向的，只有臣属文化模仿支配文化；其二，变迁采取的形式就是模仿，而不是调适。

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提出，“文化濡化”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标示，更合适的术语应当是“文化交融”（*transculturation*），这意味着文化接触是彼此影响的，就古巴而言，就是被支配的非洲文化和美洲印第安文化受到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西班牙文化也受到影响（奥尔蒂斯说服马林诺夫斯基接受了这一主张）。无独有偶，吉尔伯托·弗雷雷指出，在巴西，非洲文化与美洲印第安文化除了被葡萄牙文化影响，也影响了葡萄牙文化，这种变迁过程他称之为“文化互渗”（*interpenetration*）。（Freyre 1933；Ortiz 1940）时至今日，谈论文化“交流”（*exchange*）已属寻常。

至此，模仿这一观念已被调适所取代。调适不一定是自觉的。弗雷雷举出的例证中就有一例，说巴西的黑人木匠复制了奇彭代尔（Chippendale）式样的椅子，但由于非洲文化传统的作用，又把椅子的硬角改成曲线。尽管有些时候，调适也是一种自觉的规划。马查多·德·阿西斯和他之后的许多亚非拉作者一样，为了谈论自己国家的事情，也都借鉴了欧洲小说传统。同样，有些欧洲传教士有意遵循了他们所称的“适应”（*accommodation*）做法，换句话说，根据中国、日本、印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文化，对基督教福音做出调适。

这些过程造成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些特别的文本、宗教乃至整体文化，它们往往被描述成“混生的”或“混合的”。就宗教而言，早前一代历史学家自信地谈论“皈依”，但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基督教等宗教的地方形式除了汲取欧洲的传统，也吸收了非洲或日本的传统，就像上文所引马达加斯加人的情况。而分析宗教之间这种互动的传统术语，就叫做“调和主义”(syncretism)。

“调和主义”这个术语具有某些缺陷。它需要摆脱传教士们赋予它的贬义，后者用它来形容不成功的基督教化。作为一个非人格化的术语，它助长我们忽略个体行动者在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纵然如此，它作为一个“总括性术语”，涵盖了可以相互区别的各色过程，依然有其用处。比如，我们可以区分传教士和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行动与自下而上的行动，就像奴隶们会称呼他们的雷格巴神为“圣安东尼”(参见上文边码第91页)。或者，我们可以对比源于不同宗教的要素的暂时共存与某种正式的综合(Pye 1993; Stewart and Shaw 1994)。

在宗教领域之外，“文化混生性”属于用来描述文化交流结果的最常用术语之一(Canclini 1989)。“混生性”是个借自动物学的比喻，人类学家及其他人用它来讨论种族之间的互通繁衍，然后才用来讨论文化。它就像“调和主义”，也为缺陷所苦，即使文化接触的结果似乎是自动的，仿佛个体在此过程中无所作为。有鉴于此，采用语言学的比喻，讨论文化“转

译”(translation), 似乎更为可取 (Palsson 1993)。个体转译者根据本地文化情境对外来事项(文本、宗教、建筑风格等等)做出调适, 这些调适有时被其他人所采纳, 并最终成为地方传统的一部分, 就此而言, 颇为成功。

从混合和调适的过程中, 生发出新的文化形式甚至是新的文化。这就是米哈伊尔·巴赫金所强调的混生化面向, 他似乎是独立于人类学家而提出这一概念的。比如, 他探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方言文学的兴起, 强调它们与拉丁语的互动, 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他称此为各种语言和文学之间的“相互激活”(interanimation), 它会促使人们意识到替代选择, 从而刺激创造性 (Bakhtin 1965: 81—82; 参看 Morson and Emerson 1990: 142—145, 325—344)。

借助另一种语言学类比, “克里奥耳化”(creolization), 来描述这种创造性过程, 会很有启发, 尽管这一过程并不限于语言。基于对以加勒比地区为对象的研究所做的概括, 语言学家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一种特别的情境, 在其间, 某种此前的混杂语 (pidgin) 发展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结构。两种相互接触的语言基于其亲和性或形态一致性, 变得愈发相似, 逐渐“汇合”, 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

瑞典人类学家伍尔夫·汉内斯从这一模型出发进一步推论, 将克里奥耳文化说成是历经时日逐渐“达成一定的黏合度”, “能够以新的方式聚拢事项”。研究殖民时代牙买加的历史学家通过考察非裔美洲人的宗教、音乐、居屋、服饰和

饮食，刻画了这一重塑过程（Hannerz 1987；Buisseret and Reinhardt 2000）。

在有些情况下，研究调适过程的理论家本身也对先前批评殖民主义的诗人和小说家等使用的概念加以调适，进行再利用（Moore-Gilbert 1997：179—184）。新兴学科的发展就典型地体现出这类再利用，比如如前所述（参见上文边码第10页），在社会学的早年间，马克斯·韦伯就从教会史家那里借用了克里斯玛的观念。

后殖民主义研究更显著的一点特征在于，许多贡献来自西方世界之外的学者，即便这些学者往往已经西方化，甚至在文化上具有混生性，像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萨义德，或是移居外国的印度人霍米·巴巴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他们都亲身经历了自己所分析的那种失位过程。有关“文化交融”的开创性研究出自一位古巴人奥尔蒂斯，而有关混生性的研究则出自一位巴西人弗雷雷。弗雷雷倡导其所称的社会理论的“热带化”（tropicalization），调整那些基于太过狭隘的一部分人类经验的概括，后者主要来自温带世界。后殖民研究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机会，来反对西方理论的霸权，使其他声音得以被听到。它们所提供的环境有助于阿根廷学者瓦尔特·米格诺罗（Mignolo 2000）所称的“边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即颠覆或超越简单二分的观念。

但问题一如既往地依然存在：比如如何决定哪些文化称得上“后殖民”（这个术语有时拓展到加拿大和爱尔兰）；如何区

分较为深层的欧化形式和较为浅层的欧化形式；如何在文论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各自的思路之间做出综合（或许我们在此应当说“调和”）。无论如何，对交流和混合的聚焦使得文化史研究正焕发新生。

十八 口传性与文本性

有一种形式的混生性尚未讨论，这就是口传与书写文字或口传与印刷文字之间互动的结果。人们往往注意到，从阿摩司·图图奥拉（Amos Tutuola）到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来自非洲的小说家相较于他们绝大多数的欧洲同行，都更密切地守护着口头对话和口述传统。

109 口述交流自有其一种或多种的风格。有一项著名的谣言研究指出，在口述传输过程中，讯息是根据接收方的需要有所调适的，这个过程包含删减（“简化”），筛选（“强化”），以及将未知变为已知的同化（Allport and Postman 1947）。另一项有关波斯尼亚口传史诗的研究同样出名，其认为歌手能够即兴创作故事，要归功于使用预制的要素，尤其是“程式”（确定的短语，比如荷马笔下的“酒红色的海”[wine-dark sea]）和“主题”（反复出现的情节，比如议事会和战斗）。基于这类研究，媒介理论家沃尔特·翁描述了“基于口传的思想与表达”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冗余（redundancy）和一种让陈述彼此添加

而非相互从属的结构 (Lord 1960: 尤参第 80—98 页; Ong 1982: 尤参第 31—77 页)。

这些分析和争论对史学写作的影响有些姗姗来迟。对往昔口传文化的研究现在只是初露端倪 (Fox and Woolf 2003)。就连有关谣言的史学研究也很少, 虽说也有乔治·勒费弗尔率先垂范, 他花了整整一本书来讨论所谓 1789 年大恐慌的传播扩散。勒费弗尔 (Lefebvre 1932) 从年代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 细致入微地分析有关一场贵族阴谋和迫在眉睫的“盗匪”袭劫的谣言的蔓延, 并从经济背景、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的角度, 说明这些“恐慌”的由来, 而彼时正值面包稀缺, 异议不满逐渐酿成革命。无独有偶, 1750 年的巴黎也是谣言四起, 纷传路易十五的政府在绑架孩童, 这被解释成对政权更为普遍的不满的某种具体表达 (Farge and Revel 1988)。

对这些谣言的不同版本, 勒费弗尔议论不多, 我们还在等待有学者从“简化”和“强化”的过程, 或将晚近事件纳入阴谋、投毒、绑架等口传叙事传统主题的同化的角度, 来分析 1789 年的种种焦虑, 或是像 1678 年英国新教徒对于所谓“教皇阴谋”的担忧。从葡萄牙的塞巴斯蒂昂国王, 到墨西哥革命者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Emiliano Zapata), 或是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苏巴斯·昌德拉·鲍斯 (Subhas Chandra Bose), 有关某位消失的领袖将会复归的谣言, 提供了这类情形的又一系列的例证: 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情势下, 重新激活某则传统的民间故事, 以表达对于当下的集体不满, 对于未来的集体希冀。

尽管上一代就已经兴起了“口述历史”，但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关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口述传统，却还是比较新近的事情。在这方面，比较比利时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扬·范西娜口述传统研究专著的两个版本，会有所启发，第一版刊行于1961年，几乎完全是在讨论可信性问题，而1985年面世的第二版则更多地关注交流的形式和类型。

而学者们在考察书写时，也越来越视之作为一种具有特别性质和局限的媒介。例如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就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运用文字的后果的研究，他认为，在原始和现代这两种“心态”之间的传统对立，最好表述为两种交流类型，即口传与书写（Goody 1977）。比如说，对书写文本而非记忆文本进行重新编排，就要容易得多。所以，书写促进抽象。同样，书写还推动了对替代选择的自觉意识，从而将封闭体系转换成开放体系。就此而言，按照翁的讲法，“书写重构意识”（Ong 1982: 78—116）。与此类似，心理学家戴维·奥尔森也提出了一种文字运用理论，或至少是一系列“原则”，指出文字运用会强化言说意识，“有关预设、推论和猜想的思考，高度依赖字面意义概念的概念，都是有文化修养的（literate）话语的独特之处。”（Olson 1994: 257—282）

这些主张已经遭到批评，被指过于强调口传模式与书写模式之间的差异，忽视了口传交流的特性，以及将运用文字视作一种可脱离其背景的中立技术（Street 1984, 1993）。这些批评意见并没有颠覆核心命题，而是有所限定，意味着谈论作为

复数的“文字”或许更有益处，要考虑到字母系统、音节系统和表意系统之间的差异，以及宗教的、商业的及其他学习文字的不同背景。

有关“分水岭”的争论，以及这一结论——对于口传的与文字的文化或心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想作是一个连续统而不是一道深渊，已经为研究指出了聚焦于口传与书写两种类型之间的互动或“接合”的新方向（interface，参 Goody 1987）。比如说，无论在口传表演中，还是在书写文本里，都能找到各种程式和主题。这些程式和主题会采取不同的形式，或以不同的形式被运用吗？当一则民间故事被转写成文字，尤其是被某位精英成员转写成文字，会有什么变化？

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关注焦点，就是代写文字。比如，不识字的人会让朋友、教区牧师或职业文书代自己写信，客户要么是向写手逐句口述，要么是简单说明自己想要什么类型的信函。这种公共写手今天还能在墨西哥城的圣多明戈广场（Plaza Santo Domingo）找到，就像在17世纪时巴黎的圣婴公墓（cemetery of the Innocents），那里的墓碑被用作权宜代替的书案（Kalman 1999；Métayer 2000）。111

这场争论有一点特性令人瞩目，这就是在口传与文字之间制造明确对立，却牺牲了第三种媒介：印刷品。以已经涌现出大量例证的西非为例，在那里，文字和印刷品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因此它们各自的后果难以分解。另一方面，就欧洲而言，围绕印刷品“革命”的争论旷日持久。人们曾经只是从书籍、

观念与思潮的扩散的角度来进行讨论，但现在关注点已经逐渐从讯息转向媒介。

比如说，美国评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主张，印刷品的出现导致了重点从听觉转向视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图表使用的增多），也导致了他所称的“心脑分离”。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艾森斯坦在研究“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时，将麦克卢汉转译成学术上更须重视的形式，强调“印刷文化”的一些特征，比如文本的标准化、持续化或“固定化”（McLuhan 1962；Eisenstein 1979：43—159）。

与此类似，翁（他早期的历史研究首先激励了麦克卢汉）描述了印刷品如何引发了“从音响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变”，促进了“某种闭合感”，某种确定性文本“的感觉”，从而巩固了书写（Ong 1982：117—138）。至于那些研究通过书写进行的传输的学者，他们一直在强调那些文书抄手面对一份文本，是如何不仅任意省略，而且任意添加，哪怕在印刷年代也是如此，从而使手稿成为我们所称的“互动式”媒介（Love 1993）。

针对这种有关标准化和固定性的简单阐述，晚近的研究已经加上了不少限定条件，比如强调同一部书同一版本不同抄本之间的变异，或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或米兰等地印刷商对所谓标准意大利文不同形式的竞争（Johns 1998：尤参第10、31、91页）。对口述传播、书写传播与印制传播之间互动的关注，逐渐取代了单纯聚焦于印刷品。不过，印刷助长了标准化与“固定化”过程的提法依然有其道理（Briggs and Burke 2002：

21—22, 44—48)。

有学者提出，一份文献就是一份文本，需要以文学批评家的技能解读之。这个主张是对历史学家的又一个挑战，来自所谓的新历史主义者，比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 1988）。无论格林布拉特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特定文献的解释是否令人信服，他有关文献修辞的整体主张都值得历史学家非常认真地对待，下文将更细致地讨论（参见下文边码第126页）。

112

图像史学家，或是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视觉文化”史学家，所遵循的思路也与研究口传性的史学家相类似。文化史家阿比·瓦尔堡注意到了他所称的“情念程式”（*pathos formula*）的反复出现，即通过特定的姿态或面部表情呈现感情的某种图式。E. H. 贡布里希的经典之作《艺术与错觉》（Gombrich 1960）研究了图像表征的心理学，此书借鉴了瓦尔堡的著述，也借鉴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如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öhler 1929）的结论，后者主张，我们把握的是型构（*configurations*），而不是个别的事项。

贡布里希注重分析的是，他以多种方式称呼的所谓“图式”（*schemata*）、“刻板印象”（*stereotypes*）、“模型”（*models*）和“程式”（*formulae*），究竟是怎样塑造了艺术家及其受众的知觉，塑造了他们的视觉“期待水平”。他声称，“所有的表征都是以艺术家学会使用的图式为根基的”，并强调艺术作品中“观看者的参与”。这与口传研究及上节讨论的接受研究之间显然有着类似之处。在绘画与表演的情形中，图式都可以视为既

约束着也有助于文化建构。至于它们变迁的方式，将在下文讨论（参看下文边码第160页）。

十九 神话与记忆

将有关谣言、口传、图式的讨论稍作推进，引入“神话”这个术语，或许不无益处。实证主义史家往往用“神话”这个术语来指并非真实的故事，它与他们自己讲述的故事形成明确对比，后者被他们称为“历史”。比较这种用法与人类学家、文学理论家或心理学家等领域学者的用法的异同，会很有启发。

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就曾提出，神话是具有社会功能的故事，即便并非尽皆如此，也大抵如此。他主张，神话作为关于过去的故事，为现在充当着他所称的“宪章”（charter）。也就是说，这种故事履行的功能是证明现在某些制度的正当性，并维持这些制度的现状。他这么说的时侯，想的或许不仅仅是他笔下那些特罗布里恩岛民所讲述的故事，而且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本身讲述的故事，而这份文献数百年来被用来证明各式各样制度与实践的正当性。鉴于人们反复不断地对这份文献进行错误解释或重新解释，它总是处在与时俱进之中。历经数百年，贵族们的“自由权利”或特权转型成了全体臣民的自由权利。英国历史上更重要的与其说是大宪章这份文本，不如说是大宪章这则“神话”（Malinowski 1926）。

与之类似，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英国盛行的所谓辉格史观，换句话说，“倾向于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方写史，颂扬已经成功的革命，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其功能就在于证明当代的政治体制的正当性（Butterfield 1931：第v页；参看Burrow 1981）。

还有一种定义神话的方式，就是说它是一种具有道德寓意的故事，比如善必胜恶，故事中的人物性格被刻板印象化，无论英雄还是恶棍，都比生活本身更加放大（或简化）。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谈论“路易十四的神话”或“希特勒的神话”，因为这些统治者在他们那时候的官媒上都被表现为英雄人物，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晓（Burke 1992a；Kershaw 1989）。而有关希特勒作为恶魔般形象的替代神话也是广为流传。无独有偶，在现代早期欧洲的猎巫浪潮中，人们普遍相信，女巫是撒旦的奴仆。这种信念也不妨称为“神话”（N. Cohn 1975）。

这些实例当然也可以纳入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有关希特勒的神话将其统治合法化，而有关女巫的神话也将对这些老妇人的迫害正当化，而后人却坚信她们是无辜的。不过，有启发的界定神话的方式不能仅限于看其功能，还要研究其反复出现的形式或“情节”（plots，这是希腊语中“mythos”这个词的原意）。瑞典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称这些为“原型”（archetypes），说它们属于集体无意识的不变产物。但历史学家更有可能把它们看作是文化的产物，历经长时间而缓慢变化（Samuel and Thompson 1990：58）。

无论如何，有必要认识到，无论是口传的还是书面的，所有的叙事中都具有原型、刻板印象或神话的因素。这里包括书面历史，有人称之为“神话历史”（mythistory），也包括生命故事，叙事者视之为未加修饰的真实，其实不过就是记忆（McNeill 1986；Samuel and Thompson 1990：36—48）。就在过去几年，历史学家对于记忆的研究呈现勃兴之势。这为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心理学家之间展开合作提供了机会，少数学者已经把握先机。

114 理论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将记忆作为一种集体现象来探讨是否合法。这种思路的实例可以一直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 1925，1950）。哈布瓦赫提出，记忆是由社会群体建构出来的，或者，用本章别处使用的语言来说，是由“共同体”建构出来的。在字面意义、生理意义上，的确是个体在进行回忆，但决定什么是“值得记忆的”，又该如何去回忆，却是共同体。个体认同于对自己所属群体很重要的那些公共事件，从而对自己并未直接经历的事情也会有大量的“回忆”。

“集体记忆”这个观念是反直觉的，常常遭到有些学者的拒弃，他们宣称，只有个体才能回忆（“集体心态”这个观念也因为类似的理由遭到拒弃）。纵然如此，这种用语集中体现了有关群体对于个体之影响的重要洞见。追随哈布瓦赫的思路，有一批历史学家已经在探索相关问题，具体有“社会”记忆或“文化”记忆等多种称法（Connerton 1989；Fentress

and Wickham 1992; Assmann 1992, 1995; Burke 1997: 43—59; Confino 1997; Winter and Sivan 1999)。

对集体失忆 (collective amnesia) 的说明就属于这类问题之一。人类学家在考察口述传统中, 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历史学家是在研究大屠杀或 20 世纪在芬兰、爱尔兰、俄国、西班牙等地连串内战的事件的过程中遭遇到它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体层面记忆的丧失, 而在于某些特定事件, 或是与对事件特定解释相关的某些主要人物, 从公共话语中消失。这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被“抑制”了, 这并不一定是由于它们有创伤性, 虽说其中有许多的确充满创伤, 而是因为政治上变得不适宜谈论它们 (Peltonen 1999)。

文学领域专家的研究也已启发了一些研究记忆的历史学家。有关小说、信函或诗歌等文本的研究表明, 二战的参与者常常借助 (有意或无意) 取自一战叙述的意象来描述自身的经历。更一般地说, 我们不妨认为, 一桩实际的事件往往是从另一桩事件的角度来回忆的, 甚或是初次经历的事件, 就像《圣经》之类家喻户晓的文本中的叙述。暂且回到 1750 年传遍巴黎的有关绑架孩童的谣言, 它们呼应了圣婴大屠杀的圣经故事, 因此也暗指路易十五是新的希律王 (Fussell 1975; Samuel and Thompson 1990; Farge and Revel 1988: 108)。

同样, 瑞士新教牧师约翰·克斯勒 (Johann Kessler) 在其回忆录中复述了自己如何在耶拿 (Jena) 一间客栈里遇到乔装打扮的马丁·路德的故事。“我们问道, ‘先生, 您能告诉

我们马丁·路德博士现在是在维滕贝格，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吗？¹ 他回答道，‘我确知他这会儿不在维滕贝格。’”无论克斯勒这么说是否有意，他的故事是以圣经为原型的，即使徒在去往以马忤斯（Emmaus）的途中遇到了耶稣基督。²

同样，英雄人物有时也会在民间记忆中彼此混融，这个过程类似于弗洛伊德在分析梦时所说的凝缩（condensation）。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观察到这种“神话化”（mythification）过程在发挥作用，经由一系列有关过去的阐述，愈益接近某种原型：比如在谣言的实例中，或是在个体对同一事件历经多年数次记录的记忆中，都是如此。改变回想过去事件时所处的情境，会影响“重新回忆”（re-remembering）的过程。

有些评论家，尤其是美国学者海登·怀特，会认为书写历史本身就是前文讨论的某种形式的“虚构”和“神话”（White 1973, 1978: 121—124）。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谈论所谓“现实的文本建构”（textu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Atkinson 1990; Samuel and Thompson 1990: 28—35）。学者们有时称此为“建构论”（constructivism），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

1. 维滕贝格（Wittenberg）是德国城市，该城大学教师中包括马丁·路德和梅兰希顿。1517年路德将其《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城堡内万圣教堂的木门上，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

2. 事见《新约·路加福音》24章。

第四章

核心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其中有一些在上章已有所描述——历史学家可以从其他学科借取概念，而不必彻底改变自身的思想传统，就能增加自己分析的词汇；我们不妨期望，这也能使自己的分析更趋精致。其他观念则更为危险。它们承载着更为浓厚的哲学预设，因此，它们会抗拒被纳入某种异在的传统。事实上，它们会威胁到被引入其中的任何思想体系，使之发生转型。

本章所关注的就是这些观念，或者至少是其中某些观念。它聚焦于四组思想对立与论争：其一，从理性选择角度对人类行为做出普遍化说明与认真对待文化差异的说明之间的论争；其二，将社会视为本质上共识性的观点与认为社会充满冲突的观念之间的对立；其三，认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学者呈现有关社会的“事实”的传统预设与认为他们给出的只是某种虚构的观念之间的矛盾；最后，有关功能（或结构）的观念与有关人类行动（“行动者”）的观念之间的对峙。关键不在于企图在其中任何一项议题上作出决定性评判，那属于傲慢自负，而在于激励读者意识到不同的可能性。

一 理性与相对主义

117 要定义理性，可以从众多角度切入，比如精于计算，专注自利，批判立场，或是遵循规则。不管我们关注的是其中哪一项定义，或是个体行为或社会组织的哪一项特征，都会产生问题。首先，人类有多么讲求理性？其次，理性是一种普遍标准，还是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标准？在这个领域，一直存在一种激烈的论争，一边是普遍主义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另一边是相对主义者（尤其是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

普遍主义目前通行的形式是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詹姆斯·科尔曼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Coleman 1990）就是基于这一立场的一部教科书。观察社会的视角是基于效用最大化，遵循特定策略的个体的视角（参看上文边码第67页），即使他们是投入革命、身陷股市恐慌或参与暴力（Coleman 1990: 216—218, 220—229, 468—502）。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形式，它基于一种假设：人们是出于对某种报酬或“报偿”的期待而做出决定的。如果面临困难的决定，他们会在各种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做出“权衡”，比如买一辆车，或是投一个会增税、但福利开支又比其对手多的政党的票。简言之，理性选择理论采取一种经济模型来看待一切人类行为。

另一边我们看到的是相对主义者。文化相对主义者并不声称“怎么都行”，但他们确实主张，究竟什么称得上理性，取决于局部的情势，也有赖于更广泛的文化。他们注意到知识有其社会性的情境定位，并且指出，不可能摆脱自身的文化去研究另一种文化。他们主要的结论就在于，学者们需要避免基于自身有关理性（或道德）的标准去评判自己研究的人群，在历史学中，就是避免时代误置（anachronism），而在人类学中，就是避免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要评价这场论争，或许有必要提出如下四点。其一，自从弗洛伊德提出其观点之后，很难再宣称个体随时都保持理性了。那么群体呢？以恐慌为例。科尔曼在讨论金融恐慌时，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但（至少对我而言）并不令人信服的观点，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也试图“通过单边转让”对于自己行动的“控制而使效用最大化。”（Coleman 1990: 203）

其二，我们应当区分行动的理性与信仰的理性，前者是理性选择理论聚焦的目标，而后者是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Wilson 1979; Hollis and Lukes 1982）。比如，巫术就常常被斥之为非理性。然而，如果对于巫师的信仰属于一套统118合一体的信仰系统的组成部分，就很难被轻易摒弃。鉴于特定地点与时间中的可用信息与共有预设，对巫术的信仰往往有可能得到貌似有理的论点的支持。事实上，16、17世纪恶魔学（demonology）之所以兴起，据说就关系到“发展，事实上是‘增进’，而不是停滞与堕落。”（S. Clark 1997）

无论如何，把一整个信仰体系说成是非理性的，总有些不大对劲。当然，如果说有些体系比其他体系更为理性，理由是它们留出更大的空间给替代选择，从而使个体有可能做出自觉的选择（尽管个体也面临社会压力，要接受对特定共同体来说很重要的那些信仰），这种讲法或许不无裨益（Horton 1967, 1982）。

其三，我们应当区分个体决策的理性与某个社会或政治体制的理性。韦伯主张，自己所称的“科层制”政府体制比其前身“家产制”（patrimonial）更为理性，因为它更为稳定一致。决策是根据规则来做出的，因此类似的问题会得出类似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在科层制中，人员任命是基于考核与面谈所衡量的效能之类公共标准而做出的。这种体制是无所偏倚的，也是不近人情的，因为它忽略个体之间的差异。

另一方面，就前文讨论过的另一实例而言，红衣主教黎塞留基于私人标准来任命官员，挑选自己亲友和受护人为助手。从韦伯的角度来看，这些决策似乎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至少是无关乎理性的（non-rational）。然而，如前所见，它们自有其理据所在。在具体情势中，这里就是17世纪的法国文化体系，在其中，亲友和庇护人的忠诚被认为十分重要。有鉴于此，黎塞留找到了一种有效手段来维持自身的权力，让自己的命令贯彻执行。简言之，不同类型的理性相互冲突。就短期而言，黎塞留的行事合乎理性，但其行动的后果却是在妨碍韦伯所称政治“理性化”的进程。

最后，回到行动，理性选择理论设定，“个体评估符合其偏好与价值观的选择所产生的可能结果”，无论是种庄稼、买东西还是投选票（Popkin 1979: 31）。如此表述，这个预设听上去毫无争议，但这里至少有两个难点。第一个或第一类难点，在于评估的操作。始终是个体在做评估吗？对于家庭策略的讨论（参看上文边码第56页）表明，小群体会做出某些重要的决策。评估过程会受制于某些约束吗？是的，因为它可能基于不充分的信息，因此，有必要讨论“有限”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Simon 1957: 241—260）。对商品或官职候选人的评估也可能受制于广告之类有力说服手段的操纵。

第二个难点涉及“偏好与价值观”。实践当中，理论家集中关注的偏好和价值观范围较为狭隘，他们尤其关注与躲避恐惧、羞耻、同情他者、恪守道德规范、忠诚于组织等相对的个体物质福利。理性选择理论的极端形式，就是将社会互动化约为追求自我中心主义的自利，其所秉承的人性模型，被阿玛蒂亚·森描述为“理性的傻瓜”（rational fool，参看 Gellner 1985）。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对成本—收益分析本身来一番成本—收益分析。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清楚、明晰、严格的模式来研究个体行动。而这种模式的代价，就是忽视了人类动机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忽视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此而言，理性选择理论是化约论的。

而在另一方面，文化分析这种思路注重偏好与价值观的多

样性，凸显它们在不同文化中的独特重要性。比如，在有些文化中，避免蒙羞比获得物质酬报更为重要。计算的运作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价值评估，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个体作为理性选择理论中行动模型的核心，在有些文化里地位更为重要，在另一些文化里就不是这样。即如马塞尔·莫斯（Mauss 1938）在一篇名文中所言，有关个体的观念，或者关于人（person）这个范畴，不同文化各见差异（参看 Carrithers, Collins and Lukes 1985）。简言之，理性选择理论本身也可视为北美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尤其是它强调计算和个体。而在巴西或日本之类的地方，难以想象会孕育出这样的思路。

文化概念种种

“文化”这个概念定义五花八门，令人困窘。在19世纪，这个术语一般被用来指视觉艺术、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和音乐。与此同时，对下述现象的意识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文艺术与科学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多种方式的塑造。这种日渐增长的意识导致了有关文化的社会学或社会史的兴起。究其本质，这种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至少是有马派倾向的，因为它将艺术、文学、音乐等等视为上层结构/上层建筑（super structure），其反映着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变迁。

这种风格的一个典型范例，就是阿诺尔德·豪泽尔的名

著《艺术社会史》，比如，它将15世纪的佛罗伦萨艺术概括成“中产阶级自然主义”，或将矫饰主义（Mannerism）说成是1492年发现美洲和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之后的经济政治“危机”在艺术领域的表现（Hauser 1951: 2, 27, 96—99；有关批评参见 Gombrich 1969）。这种思路受到了两股相互关联的平行发展趋势的侵蚀。

首先，随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等拓展了各自的兴趣，“文化”这个术语也扩展了它的含义。人们越来越关注指普通民众的态度和价值观的通俗文化，以及它们在民间艺术、民谣、民间故事、节庆等领域的表现（Burke 1978）。随后，关注通俗工艺品和展演，即架上画¹、歌剧之类的民间对应物，又被批评为过于狭隘。

目前的趋势是远离对文化的所谓歌剧院定义，采纳克利福德·格尔兹等美国人类学家所偏好的这个术语的广义。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Geertz 1973）一书启发了多个学科的学者（Kuper 1999；Burke 2004c）。甚至是文学领域的专家，至少是美国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学者”，也表现出这种趋向，强调他们所称的“文化的诗学”（poetics of culture），换言之，即在不仅仅是文学文本的所有文本的意义之下，在斗鸡之类非正式展演和戏剧之类正式展演地位相当的意义之下，潜藏着的那些约定（conventions）。（Strallybrass and White 1986；

1. “easel painting”，以油画、水彩或淡彩等标准技法完成的作品，有别于壁画、装饰艺术、插图和商业广告设计之类绘画。

Greenblatt 1988）

如果我们把文化界定为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表达或具身体现（embodiment），那么文化分析就能提供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方案，至少是能提供一种必要的补充。回到红衣主教黎塞留，我们不妨说，他任命亲友为助手，在其所处的“情势”中是理性的，这样的情势包括他所属的文化中对家庭的态度和有关忠诚的规范。

121 与此类似，以18世纪英国的食物骚乱为例，历史学家曾经贬之为盲目狂乱的爆发，爱德华·汤普森称这种态度为“对于民众历史的骤发（spasmodic）史观”（Thompson 1991: 185）。理性选择理论家会拒绝接受这种骤发史观，认为群众中的个体是在追求其自我利益，之所以采取暴力行动，是为了迫使权威当局降低物价，是将暴力行动的成本（可能遭到囚禁乃至处死）与廉价面包的收益做了权衡。

这一史观当然有些道理，但似乎并不全面。在其有关“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的著名阐述中，汤普森对食物骚乱的解释着眼于“劳动民众的”价值观、心态、“政治文化、期待、传统乃至迷信”，尤其是有关互惠的道德化经济的传统价值观（参见上文边码第69页的描述）。对食物骚乱的文化阐述也会凸显其表达性或符号性的维度，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社会戏剧，借取自仪式剧目（E. P. Thompson 1991: 260；参看 N. Z. Davis 1975: 152—188）。

至于集体暴力的其他实例，理性选择理论更难以给出说

明，比如种族清洗，往往被贬之以非理性的或“不可理喻的”。如果说暴力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将“异己”族群驱除出特定地域，那种族清洗或许是理性的，但这种驱除又能带来什么收益呢？更有道理的观点似乎是把暴力看作某种符号性行动，在不同文化中采取不同形式，也针对不同的群体，换句话说，探问的是暴力对于共同体而言意义何在，而不是对于个体参与者来说有何报酬。

在诸如此类的实例中，当然有必要在考虑利益的同时考虑恐惧，在考虑有意识动机的同时考虑无意识动机。心理学家或许会讨论自我当中的进攻性部分向“异己”的投射，而研究文化的学人会聚焦于文化剧目，包括对有关冲突的传统叙事的重演（re-enactment）。（Kakar 1990；Blok 2001：108—114）

提到焦虑，就要谈到所谓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这个术语指的是另一项不适宜理性选择模型的现象。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研究了公众对20世纪60年代英国两个青少年群体摩登族（Mods）和摇滚客（Rockers）的态度，此后，该术语开始流行。按照科恩的定义（Cohen 1972），在道德恐慌中，人们辨识出某种对社会的威胁，而媒体会以夸张的、刻板印象化的方式，呈现造成威胁的个体、群体或事件。至少在短时间内，会出现相当程度的公众焦虑。

在研究过去的现象时，这个概念当然也有用武之地。不管对巫术的理解是否关乎理性，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反复出现的对所谓女巫的攻击，正是遵循着道德恐慌模型。中世纪晚期对犹

太人的指控也大体相仿，包括说他们亵渎圣饼（host），绑架孩童，并出于仪式目的杀害他们。晚近指控虐待和杀害孩童的人为撒旦崇拜者的浪潮证明，当代文化相比于早前的文化，对道德恐慌的免疫力并不更强（La Fontaine 1998）。

晚近的一些指控就属于有关犹太人和女巫的传统故事的卷土重来，这些指控从欧洲文化剧目中重新激活了某些要素。道德恐慌也会发生在其他文化中，只是采取的形式不同。比如说在中国，1768年，就有对“叫魂者”（soul-stealers）的恐慌。谣言四起，大意是人们将自己对头的名姓写在纸条上，钉在桥桩上。纸条会有助于打桩，同时也灭了受害者。故事随后被添油加醋，包括了割“辫”的主题，而辫子是清政府强制中国男性蓄的。由于这些政治上的寓意，皇帝本人对恐慌的传播和最终消亡也产生了个人兴趣。这就像欧洲有关撒旦仆从的故事，揭示了文化中弥漫的一些焦虑（P. A. Kuhn 1990）。

二 共识与冲突

“文化”常常被界定为一套共享意义系统。不过，这个概念很成问题，用诸国族之类的大型群体尤其如此。这种探讨文化的思路有着和涂尔干的社会模型一样的优点与缺陷：过于强调共识，忽视了冲突（参看上文边码第62页）。爱德华·汤普森甚至提出，“‘文化’这个术语本身就很容易诉诸共识，或

许会转移人们对社会文化矛盾的关注。”(Thompson 1991: 56; 参看 Sewell 1999) 西蒙·沙玛在《财富的尴尬》一书中(Schama 1987) 描述并解释了17世纪的荷兰文化, 特别清晰地呈现了作为共享意义的文化模型的长短优劣。

沙玛出色地探讨了荷兰人如何想方设法使自身有别于邻国, 由此建构一种集体认同。然而, 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内部, 富人与穷人之间, 市民与乡民之间, 加尔文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 荷兰人与弗里斯兰人(Frisians)之间, 社会文化维度上的种种分隔, 在他的书里却罕有呈现。《财富的尴尬》很容易遭到针对人类学角度的文化概念的批评, 因为强调共享价值至少“对于理解基于阶级的社会不很有效”, 需要由对于文化冲突的强调取而代之(Sider 1986: 5, 109)。

面对这一批评, 有一种回应或许很妙, 就是冲突这个概念也意味着团结, 批评者只不过是另一种共同体取代了一种共同体, 即用社会阶级取代了地区或国族。那该怎么办? 有一种可能性是利用社会学的“亚文化”概念(subculture), 后者被定义为一个较大整体内部享有部分自主的文化(这个概念并不带有任何低劣一等的意涵)。(Hebdige 1979)

社会学家通常研究的是比较明显可见的亚文化, 比如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 罪犯或异端分子等“偏离”特定社会中的规范的人, 以及年轻人。而历史学家也往往研究中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或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伦敦的乞丐之类的群体, 但他们并不总是关注这些少数群体的文化与周遭社会的文化之间的

关系。

有关亚文化与整体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界限的明确程度如何？亚文化是包容其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只有某些方面？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还是冲突？16世纪的两个犹太人，其中一位是意大利人，或者两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是犹太人，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共性吗？职业亚文化相较于族群亚文化或宗教亚文化，是否自主程度较低？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新群体，比如17世纪移居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法国新教徒，其亚文化的自主性能保持多久？

或许有理由认为，最重要的亚文化，也就是说各个社会阶级的文化，本身却很少得到研究。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广为人知的社会区隔（*distinction*）研究里（Bourdieu 1979），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比较这项针对20世纪下半叶的经典研究与爱德华·汤普森有关19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样经典的研究之间的异同，或许会带来不少启发。布尔迪厄研究结构，而汤普森聚焦于变迁，聚焦于“形成”。¹²⁴ 汤普森讨论工人阶级，多少是就其自身而言，而布尔迪厄则比较两个阶级的异同，两者彼此参照对方来界定自身。就此而言，他提供的亚文化研究堪称范例。

近年来，“亚文化”这个术语似乎渐渐不再流行，或许是因为它听起来有些贬义。不过，无论我们选择怎样去描述，上面讨论的问题依然存在。有一种可能性是谈论同一社会中的不同“文化”，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成问题，就像人类学家戈尔

德·鲍曼所揭示的那样，他在研究伦敦某区域的五个族群时，发现“文化跨越共同体边界”，以至于“在有关少数民族的许多公共话语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共同体与文化之间的等同关系解体了。”(Baumann 1996: 10)

三 事实与虚构

历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往往假定他们处理的是事实，他们的文本反映着历史的实在。但在哲学家们的连番攻击之下，这种假定已经瓦解，无论是否可以说这些文本“反映”了心态中更为深远的变化(Rorty 1980)。因此，有必要考虑如下说法：历史学家和民族志作者投入虚构事业的程度，与小说家和诗人一般无二；换言之，他们也是基于风格与体裁的准则生产“文学产品”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些准则）。(White 1973, 1978;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晚近对于“民族志诗学”(poetics of ethnography)的研究已经把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述描述成对现实的“文本建构”，并与小说家的作品相提并论。比如说，移居外国的波兰人布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就常常被比作他的同胞约瑟夫·康拉德，他在田野调查时就读后者的小说；而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劳(Alfred Métraux)也被说成是一位“民族

志超现实主义者”（Clifford 1988: 92—113, 117—151）。

而在历史学家方面，对传统假定的主要挑战来自海登·怀特，他指责自己的专业同行们都还活在19世纪，而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文学惯例体系还是“现实主义”，后者拒绝使用现代表征形式进行实验探索。尽管怀特这一主张早在1966年就已提出，但随后引起的一波波震荡还在不断扩散（White 1978: 27—50）。

125 怀特还仿效加拿大文论家诺思罗普·弗莱指出，历史学家和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一样，也是围绕反复出现的情节或叙事结构（mythoi），换言之，叙事图式（narrative schemata），来组织其对于过去的阐述的。比如说，“喜剧叙事结构充当着绝大多数兰克史学著作的情节结构”，因为当他在写法国内战或英国内战等内容时，讲述着一则三幕故事，其发展就像一出喜剧（或悲喜剧），“从一种表面和平的状况，经由冲突的展现，达到以真正和平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而告解决的冲突终局。”

兰克的故事也包含着一种不可化约的虚构性或创造性的成分。他那些文献并没有告诉他何时开始又何时终结他的故事（White 1973: 167, 177）。因此，就像兰克声称的那样，也是有些历史学家至今依然声称的那样，要“如实”照写，不增一分不减一毫，就等于沦为人类学家晚近所称的“现实主义神话”的牺牲品（人类学家将历史学家对于“神话”这个术语的用法巧妙地倒转来针对历史学家自身）。（LaCapra 1985: 15—

44; Samuel and Thompson 1990: 25—35)

换句话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曾经看似牢固，已经遭到销蚀（或者说，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看到，界限始终是开放的）。在这片边界区域，我们发现作者受到所谓非虚构小说的想法的吸引，比如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 1965），讲述了克拉特（Clutter）一家被杀害的故事；或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 1968），写的是目标五角大楼的一次抗议游行，其副标题为“作为小说的历史 / 作为历史的小说”。

我们也发现有小说家将文献（法令条文、报章摘录之类）融入自己故事的文本，或是探索可相互替代的过去，比如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我们的土地》（*Terra Nostra*, 1975）；或是以自己的叙事，探索获致历史真相的障碍，比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狂人玛伊塔》（*The Real Life of Alejandro Mayta*, 1984）中之所为，书中的叙事者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试图重新构建起一位秘鲁革命者的生涯，或许是要写一部小说，或许是要写一部“真正自由的年代历史”。“为何要努力找出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一位被访者如此发问，“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你所说的大写的那个‘历史’（History）……或者，历史中以假作真的东西是否和小说一样多？”

另一方面，有一小群历史学家及其他人已经对怀特的挑战

做出了回应，开始探索“创造性的非虚构作品”，换言之，从小说家或导演那里学习叙事技巧。比如说历史学家高罗·曼，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儿子，1971年出版了一部有关17世纪将军阿尔布莱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的传记，自谓乃是“一部完全真实的小说”，书中运用了意识流技巧来实现史学宗旨，提到自己笔下主人公一生中最后几个月时尤其如此，彼时将军已是重疾缠身，深以为苦，似乎在考虑改换立场。（不过，高罗·曼的注释要比其正文更符合惯例）。还有一位自觉采取文学笔法写作的历史学家值得一提，那就是卡洛·金兹伯格，他碰巧也是一位小说家娜塔丽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的儿子。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职业史家大多数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工作的诗学性质，承认自己遵循着文学的惯例。某种意义上难以否认，历史学家建构着自己研究的对象，将诸般事件归拢为“科学革命”或“三十年战争”之类的运动，这些都属于后见之明。美国文论家肯尼思·伯克在《动机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Motives*, 1950）中早就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的行动是否和人类的言说和写作一样，都遵循着修辞规则。这个观念也启发了欧文·戈夫曼和维克多·特纳等人的拟剧论视角。

同样难以否认的是“档案中”的虚构成分，娜塔莉·戴维斯在一项研究中涉及了文学评论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的一些问题，她在这项研究中就提出了这一点。她在该项研究中

分析了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pardon tales),本质上关注的是修辞和叙事技巧在建构某些文本时所发挥的作用,比如证人提供的证词,对嫌疑人的讯问,或是争取赦罪的诉求,换言之,这些文献也是实证主义史家传统上视为比较可信的证据。戴维斯在研究中开门见山,指出自己就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被教育说要“逐步剥离我们的文献中的虚构成分,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确凿事实”,然后笔锋一转,承认自己发现,讲故事的技巧本身就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研究主题。而这一发现或许正是来自格林布拉特和怀特的挑战所造成的结果(N. Z. Davis 1987: 3)。

另一方面,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怀特及其追随者们,更不用说那些叙事理论家,尚未认真探讨下述问题:历史究竟是一种文学类型还是一些自成一体的类型的聚合?是否有其独特的叙事形式、独特的修辞?惯例是否包括(当然应该包括)有关陈述与证词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有关表征的规则?例如,兰克就不是在写纯粹的虚构。文献不仅会支持他的叙事,而且会阻止叙事者做出缺乏证据的陈述。

127

针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不妨提出类似的观点。无论他们是运用文献,还是从访谈、会谈与个人参与观察中构建自己的描述,都会遵循某种研究策略,包括可信性、代表性之类的特定标准。需要讨论的是这些标准与不同文本形式或修辞形式之间的契合或冲突,而不是事实与虚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古旧对立。这种中间立场,即“对于事实表征的虚构”(fictions

of factual representation)(装作不偏不倚, 宣称占有专业知识, 使用统计数据来打动读者等等), 才刚刚开始得到系统性的探究(Siebenschuh 1983; Nelson, Megill and McCloskey 1987: 221—238)。

四 结构与行动者

人类在何等程度上做出自己的决策, 或是塑造自己的历史, 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聚讼不已。在社会理论当中, 它表现为两个学派之间的冲突, 即所谓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及其对手整体主义者, 前者将社会范畴化约为个体范畴, 后者认为, 特定的行动嵌入在社会实践的系统当中, 比如说, 对自杀的说明就是独立于自我了断的个体的。

个体主义立场的经典陈述来自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体系》。“社会中的人的全部特性, 尽皆源于个体的人性法则, 也都有可能分解为后者。”(第六卷第七章) 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也持有类似观点, 但被涂尔干抨击为“心理主义”, 后者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集体范畴或社会范畴优先于个体范畴, 以对抗他所称的“斯宾塞先生所遵循的方法”。

方法论个体主义在英语世界尤其强盛, 而大多数著名的整体主义者都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涂尔干和列维-斯特劳斯, 韦

伯与齐美尔)。如前所见,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谈的都是集体心态和集体记忆(参见上文边码第114页),而这些概念在英国往往被摒弃。个中对比如此显著,意味着我们应当从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论争本身,视之为文化的冲突。

1 功能主义

“功能”是整体主义者的社会理论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似乎足够无害,只是意味着制度皆有其用途。不过,如果更为精确地界定,这个观念就显出其锐利之处,既使其愈发有意思,也多了些危险。按照定义,一套结构中的每一组成部分的功能都在于维持整体。所谓“维持”(maintain),就是保持整体的“均衡”(equilibrium,这种从力学到生物学都包括在内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的类比颇具影响)。这种理论之所以又有魅力又有危险,就在于事实上,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说明性的。在功能主义者看来,某种特定的习俗或制度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对社会均衡做出的贡献。

对于社会均衡这一观念,历史学家并非全然陌生。早在17、18世纪,权力、财产和贸易“平衡”的观念就是政治经济分析中的核心要义。比如,当吉本从“过分庞大”的角度来说明罗马帝国的衰亡时,就是从某种平衡或拉锯态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再到晚近,巴西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弗雷雷(Freyre 1933)又从其所称的“各种对抗之间的均衡”(equilibrium of antagonisms)角度来描述自己所处的社会。这个短语他取自赫伯特·斯宾塞。另一方面,许多社会理

论家并非把“均衡”作为一种偶尔采用的比喻，而是将其当成一种基本预设，支撑着他们所探求的那类问题和视为可接受的那类答案。

功能主义常常被批评为用复杂之语道显见之理。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功能主义的说明不是在确证常识，而是在挑战常识，比如格奥尔格·齐美尔对冲突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他视之为“群体中的一种整合性力量”（Simmel 1908）。有关这类议题，最出色的讨论之一的书名特意回避了“结构”与“功能”这两个术语。这本书表面上关注的是非洲，但其间接意涵要宽泛得多（Gluckman 1955）。

129 该书作者，人类学家马克斯·格吕克曼，围绕着一系列悖论来构造全书框架。例如，有一章题为“世仇下的和平”，此章认为世仇并非如常识可能假设的那样，属于对和平的威胁。恰恰相反，世仇是一种制度，其功能就在于维护和平，维持社会结合。关键在于，个体往往发现自己由于血缘或友谊的纽带，同时与双方密切维系，这种忠诚关系的冲突使他们有利益维持和平。与之相仿，格吕克曼主张，“叛乱远非破坏既有社会秩序，它们的运作甚至能支持这种秩序。”也即是说，它们的功能就在于充当某种安全阀，维持这种秩序。再有，讨论到祖鲁人（Zulu）的某些颠覆仪式，作者提出一个观点，说每年废止某些习俗禁忌“有助于强化它们”。

如前所见（参看上文边码第12页），从大约1920年到大约1960年，功能主义思路主宰了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即便

时至今日，或许也有理由认为，功能主义传统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隐然犹存，由于多少处于不自觉状态，其甚至发挥着愈发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有吉本这样的示例，历史学家还是较晚采取这种思路的。事实上，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一些社会学家开始不满于功能这个观念时，一些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学家才开始尝试这种说明路数。

例如，基思·托马斯在其有关巫术和魔法的经典研究中提出，在英国村庄共同体中，“当其他社会经济力量协力削弱仁善博爱、睦邻互助的传统义务时，巫术信仰却有助于维护它们”，因为比较富裕的村民如果将比较穷困的村民拒之门外，不予救济，会害怕遭到后者的诅咒或魔法（Thomas 1971: 564—566）。

艾伦·麦克法兰也提出，“对女巫的恐惧充当了推行睦邻互助行为的某种约制（sanction）”，尽管说他也对另一种可供替代（其实互为对立）的功能主义说明颇为心动，以至于认为巫术施行是“一种引发深层社会变迁的手段”，即从更具睦邻互助性质的社会转向更具个体主义色彩的社会（Macfarlane 1970: 105, 196）。事实上，这些相互对立的说明都契合于同样的证据，这应当让我们感到不安。功能主义说明易于归因，却不易证明（或证伪）。

功能主义对历史学家的价值，在于它纠正了他们过于侧重从个体意图的角度来说明过去的传统倾向。传统所称的“意图

主义”（intentionalism）与功能主义产生公开冲突的一个实例，
130 就是有关第三帝国的编史学（Mason 1981）。随着研究转向各个地区，即系统的“边缘”，那些完全从元首意图角度出发，来说明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构，以及1933年至1945年期间的连串事件的努力，似乎也越来站不住脚了。出现了一种趋势：在考虑希特勒的自觉计划的同时，也考虑他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尽管这种对压力的关注或许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功能主义，但它有助于体现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史，不再局限于领袖的行动与思维。

即使说功能主义解决了问题，它也引发了问题：首先就是均衡的问题。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曾经宣称，“真实的社会从来不能处在均衡之中。”需要公允地指出，像帕累托这样的人在谈论社会时的切入角度，就从不是什么“完美”或静态均衡，而是“动态”均衡，其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如果人为受制于某种调整……立刻会发生某种反应，倾向于回复其真实的、正常的状态。”（Pareto 1916：第2068节）

第二个问题事关社会共识。一旦宣称某种特定的实践或制度的功能就在于维持社会系统，也就意味着这样的共识。考虑一个曾经在社会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概念，即“社会控制”，或许能更加凸显这一问题。“社会控制”是一个传统社会学用语，描述的是社会通过法律、教育、宗教等等对个体实施的权力。然而，它引发了一个相当大的追问：谁是“社会”？能否使用这个用语，取决于是否接受这些章节不止一次质疑过的

一种观点：存在一种社会共识，社会自有其中心。如果我们接受这些预设，不妨将社会控制界定为推行有关规范的共识，界定为重新确立受到社会“越轨者”威胁的某种均衡的机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是由彼此冲突的多个社会群体组成的，它们各自有其价值观念，那么“社会控制”这个用语就显得蕴含危险并有误导性了。

在最容易回答“谁是社会？”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境中，换言之，在分析面对面情境时，社会控制这个概念最为有用。在这类情境中，一个不遵从的人会与共同体相对峙，就像工厂的工人干的活儿比自己同事多，学生过分努力要讨好老师，或是士兵的装备过于整洁（有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但很能说明问题：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面对面情境中的“越轨者”都是在遵从官方规范）。

就现代早期欧洲而言，这种社会控制最令人瞩目的形式之一就是闹婚（charivari）。老牛吃嫩草的男人，或是被妻子打骂的丈夫，都被认为逾越了共同体的规范。因此，窗户外面的“喧闹小夜曲”，¹ 讽刺的诗句，甚至是在邻里住区结队游行，模仿取笑受害者。参与游戏的人和歌者都戴着面具，掩藏其个人身份，这也意味着他们是以共同体的名义行事的（N. Z. Davis 1975: 97—123; E. P. Thompson 1991: 467—538）。

话说回来，尽管这些事件规模都不大，但也不完全清楚，

1. “rough music”，特指在洞房外击打锅碗瓢盆等制造喧闹滋扰的声响。

究竟谁是共同体：是村庄或堂区里的每一个人，还是只是组织闹婚的小伙子们？他们真的是在表达某种共识吗？邻里住区的年长男性或女人们会以和组织者一样的眼光看待闹婚事件吗？

超出了这些面对面的情境，社会控制的概念会变得愈发难以把握。有些历史学家用它来描述18世纪英国乡绅地主强推狩猎法规来对付偷猎者的活动，或是19世纪市政议会立法，禁止在忏悔星期二¹等节庆场合，在德比（Derby）等城市的街道上举行踢足球之类的民众娱乐活动。反对这种用法的意见则认为，这个术语已经沦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之所为的标签”，将支配阶级即乡绅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当作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Yeo and Yeo 1981: 128—154）。

2 以威尼斯为例

有一桩历史实例，看上去几乎像是创造出来证明功能主义的力量的，这就是16、17世纪时的威尼斯共和国（Burke 1974）。威尼斯以其社会政治系统异乎寻常的稳定性，在当时倍受景仰。威尼斯人宣称这一稳定性是永恒的，他们根据其混合的或“平衡的”宪制来说明这种稳定性：总督（doge）提供君主制要素，元老院提供贵族制要素，而大议会则提供所谓的民主制要素，后者由大约2000名成年男性贵族组成。实际上，威尼斯是由大约200名顶层贵族（当时被称为“显贵”

1. “Shrove Tuesday”，基督教中作为大斋首日的圣灰星期三的前一日，具体日期视复活节而定。“Shrove”源于“Shrive”（忏悔），源于欧洲中世纪在大斋之前预先认罪告解的习俗。后来此节在欧洲国家具有狂欢节的性质。

[grandi])组成的寡头集团统治的，他们轮流执掌政治要职。因此，混合宪制的观念不妨称为某种“意识形态”，或是某种“神话”(马林诺夫斯基对这个术语的用法意义上)，它有助于维持系统的存在。

神话的力量不太可能大到可以凭借自身就履行这种功能，使小贵族、公民乃至全体平民相信一切都很不错，但其他制度的存在缓解了，或者用我们的核心比喻来说，“抗衡”了(counter-balance)来自这些部分的对抗。在威尼斯，就像在格吕克曼笔下的非洲，彼此冲突的效忠关系充当了社会结合的致因。小贵族被群体团结所拉扯，但又被庇护纽带(参看上文边码第73页)朝着对立方向拖拽，这种庇护纽带使他们作为个体与显贵个体紧密维系。他们身陷这种冲突，达成妥协对他们有利。

人口中其他部分又当如何？平民中最有表达能力、有可能挑战威尼斯寡头统治的群体就是公民，一个大约由2千到3千名成年男性组成的比较小的群体。他们享有某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特权，以补偿他们被大议会排斥在外的损失。管理机构中某些职位是专为他们保留的。他们的女儿嫁入贵族豪门也并非罕见之事。有些宗教兄弟会是同时向贵族和公民开放的。不妨认为，这些特权使公民们觉得自己与贵族相距不远，因此与平民的其他部分保持距离。

公民外的平民(commoners)大约15万人，就像古罗马的平民(populace)一样，靠着面包加上马戏团，就能安抚下

来。政府补贴谷物，也为壮观的公共仪式提供赞助。狂欢节在威尼斯尤其发达，在这种颠覆仪式中，人们可以多少不受惩罚地抨击权威当局，它充当类似格吕克曼分析的祖鲁人仪式的那种安全阀。威尼斯的渔民们也被允许选举他们自己的总督，后者会受到真正的总督的严肃接见和亲吻，不妨认为这场仪式发挥着特定功能：使普通民众相信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政治系统，但实质上后者是将他们排斥在外的（Muir 1981）。

133 还有一些归属于威尼斯的领地的人口，包括意大利北部相当一部分区域（帕多瓦 [Padua]、维琴察 [Vicenza]、维罗纳 [Verona]、贝尔加莫 [Bergamo]、布雷西亚 [Brescia] 等等）。这些城市的贵族们或许憎恨他们丧失了独立，但却有机会在威尼斯的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至于普通民众，许多情况下他们由于厌恶自己城市的贵族，转而支持威尼斯。因此不妨认为，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某种复杂的权力平衡，这是所谓“各种对抗之间的均衡”的又一例证。

这桩稳定性实例与功能分析方法之间似乎存在某种选择性亲和。不过，实例既可以用来展现方法的长处，也能展现其缺陷。首先是变迁的问题：威尼斯并不是整个世界，不用再往远说，就在佛罗伦萨与热那亚等姊妹共和国，冲突频仍，危机连连，难以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说明。即使限于威尼斯，系统也并非永恒不变。共和国在1797年宣告废止，哪怕在之前数百年间，它也经历了一系列导致结构性变迁的危机，比如大议会不再接纳新成员，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愈益重要，从

一个海上帝国转变为一个北意大利帝国，等等。

变迁往往是冲突的结果，别忘了，即便在其最成熟精致的版本中，功能主义思路也始终维系着一种涂尔干式的共识性社会模型。研究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创造出了“威尼斯神话”这个用语，用来指一种有关稳定、平衡的社会的意象，言外之意，这种意象属于扭曲事实。如果假定普通民众都共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或者认为他们很容易被渔夫总督就职典礼之类的仪式所操纵，其实是很不明智的。社会稳定并不意味着共识，它可能有赖于审慎或是怠惰，而不是什么共享意识形态（参看上文边码第99页）。它还得到了特定类型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协助。

总结如下：“功能”这个概念在史学家和理论家的工具箱中都是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要没有被不加分辨的滥用消耗了分析力度。它容易让人忽视社会变迁、社会冲突和个体动机，但这些诱惑都是能够抵御的。根本不需要设定，某个社会中的每一项制度都具有某种正功能，而没有任何代价（“功能失调”[dysfunctions]）。也根本不需要设定，某一制度对某个功能的履行来说不可或缺；在不同的社会或时期，不同的制度可以充当功能等价项、类似项或是替代项（functional equivalents, analogues or alternatives）。（Merton 1948: 19—82; Runciman 1983—1989: ii. 182—265）

尽管如此，不应当把功能说明看作是对其他类型的历史说明的替代，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矛盾对立，因为它们

往往是在解答不同的问题，而不是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Gellner 1973: 88—106）。在此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要历史学家抛弃意图主义说明，而只是让他们吸收一些自己毫无“功能等价项”的东西。

3 结构主义

功能分析关注的不是人，而是“结构”。实际上，已经有研究社会的不同思路运用了不同的结构概念，或许有必要区分出其中至少三种：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其中的核心是“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的建筑学比喻，而基础或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往往是从经济学角度来领会的；结构功能主义思路，其中的“结构”概念指的是一组制度丛，如家庭、国家、法律系统等等；所谓的结构主义者，主要是关注思想或文化的结构或系统。

支撑结构主义的基本模型或比喻就是把社会或文化看作是一种语言。研究语言的理论家们启发了这种将文化视为“符号系统”的“符号学”思路。在“语言”（langue，给定语言的所有资源）和“言语”（parole，从资源中选出的特定表述）之间的著名区分，被概括为“符码”（code）与“讯息”（message）之间的区分。结构主义者强调的关键在于，讯息的意义并不（或并不仅仅）取决于传递讯息的个体的意图，而是取决于构成符码的规则，换言之，取决于讯息的结构（Culler 1980）。

尤其是在法国，这些观念被许多不同领域所采纳和应用，或是调整后加以应用，促生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克劳德·列

维-斯特劳斯),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罗兰·巴尔特), 结构主义版本的精神分析(雅克·拉康), 以及结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路易·阿尔都塞)。而在俄国, 则是出现了独立的发展趋势, 从一批语言学家, 到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以及尤里·洛特曼的俄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例如, 普罗普研究了他所称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识别出 31 种反复出现的要素或“功能”, 英雄被禁止做某事, 禁令被无视, 如此等等(Propp 1928; Lotman and Uspenskii 1984)。

这一切对历史学有何影响? 结构史学(structural history) 可谓广为人知, 无论是遵循马克思的模型还是布罗代尔的模型。那么结构主义史学(structuralist history) 也同样有其一席之地吗? 似乎很显然, 与史学之间的某种对立融于结构主义的结构之中, 后者明确将结构(所谓“共时态”[synchronic]) 置于变迁(所谓“历时态”[diachronic]) 之上。然而, 绝不能夸大结构主义与史学之间的对立。列维-斯特劳斯非常关注比较婚姻史之类的话题。巴尔特进入历史学家的领域, 对历史话语进行结构主义分析。至于洛特曼, 他耗费大量时间去研究 18 世纪的俄国文化(Lotman and Uspenskii 1984: 231—256)。

还有几位历史学家, 在结构主义思路在知识界尤其是在神话研究领域大行其道的年月, 受到它的诱惑。例如, 学者们用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方式来分析古希腊神话, 强调反复

出现的要素和二元对立（Vernant 1966）。

在历史学家贯彻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构分析中，有一项是对另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弗朗索瓦·哈托格讨论希罗多德的论著，集中考察了希罗多德是如何表现“他者”，换言之，表现非希腊人的。例如，西徐亚人被表现为不仅不同于希腊人，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希腊人的反转。比如说，希腊人生活在城邦中，而西徐亚人生活在荒郊野外。希腊人文明开化，而西徐亚人尚处“野蛮”。不过，当希罗多德开始描述波斯人对西徐亚人的攻击时，由于波斯人也曾攻击过希腊人，这一事件反转了反转，西徐亚人又表现出更为可取的一面了。哈托格的作品就像罗兰·巴尔特和海登·怀特的著述，生动刻画了历史学家的文本策略，展现了怀特所称的“形式的内容”，形式对讯息所产生的效果（Hartog 1980）。

在用结构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凸显出某些问题。有些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包括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1952—1953），表达出他们不满于将意义从地点、时间、言者、听者与情境等语境中抽象出来的观念。还有些人，尤值一提的是雅克·德里达和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者”，拒绝接受并反击拆解结构主义内在的二元对立。德里达还反对结构决定论，就像反对传输方与接收方对意义均可进行自由游戏，这一点前文已经出现，下文还将讨论（Culler 1980；Norris 1982）。

普罗普所举的例证之一，或许有助于展现结构主义方法的

一些棘手之处。他比较了两则俄国民间故事，其中一则里，一位魔法师给了伊万一艘船，载他去往另一个王国；而在另一则中，一位女王给了伊万一枚戒指，结果是一样的。在普罗普看来，这些例证体现出他所称的功能 14，“一种有魔法的客体被交予主人公处置。”其实难以否认这两路情节的结构之间的相似性。这样来分析故事当然很有启发。不过，故事中有些具有显著意义的东西失落了，像一枚戒指或一匹马之类的要素被化约为代数意义的 X 或 Y，而它们在许多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联想。历史学家就像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一样，也希望留意诸如此类的客体与联想，留意故事的结构，也留意故事的表面。他们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结构主义。

136

至于这类保留的一桩非常明确的实例，我们不妨回到扬·范西娜，她甚至把结构主义说成是一种“谬误”，是一种“无效的”方法，因为它的步骤“既不可复制，又不能证伪”（Vansina 1985: 165）。我本人不会如此极端。一方面，我怀疑是否有任何对文本或口述传统的分析能像范西娜所希望的那样科学；另一方面，我继续相信，尽管二元对立不是文化中发现的唯一一类模式，但增强对这类模式的敏感性，是我们都应当感谢结构主义思潮的地方。

4 行动者的归来

在上一代人这里，出现了对各种结构说明占据主宰地位的某种反制。比如说，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Touraine 1984）就曾呼吁“行动者的归来”，提出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是

社会学的核心要务。美国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则抨击有关全球化的阐述（参看下文边码第186页），后者讨论各种文化的混合。他指出，“文化并不会流动，相互混合”，而是行动者从这些角度来看待世界（Friedman 1994：195—232）。

历史学家也对结构的观念做出了反制。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拥趸们已经受到指责——这也不是第一回了——说他们在历史中忽略了人，甚至是“非历史的”，意思是研究不动的结构，却牺牲了历时的变迁。尽管这些指责一般都言过其实，但将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相融合的尝试却引发了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显然，这类问题属于哲学上长年争论的问题，像眼前这样一本书的简要讨论是不会解决的。但不管怎么说，需要把议题提出来。

137 关联结构与行动的方式之一，就是经由个体心理学与集体心理学。迄今为止，心理学在本书中扮演的角色颇有些边缘。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开始流行一个新的术语，其标示出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思路：“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有关青年路德的研究（Erikson 1958）引发了热烈论争，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专业领袖，也让他的同行们大吃一惊，告诉他们，历史学家面临的“下一项任务”，就是要以比他们从前更加认真的态度对待心理学（Langer 1958）。人们创办了一批专发心理史学的期刊，并从这种视角研究了甘地或希特勒之类的领袖（E. Erikson 1970；Waite 1977）。

尽管如此，历史学与心理学之间广而告之的会聚却似乎被无限推延了。即便时至今日，纵然有彼得·盖伊这样的顶尖历史学家的努力（他也是史学专业极少数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人之一），它也依然是下一项任务而不是当前的工作。

历史学家之所以迟迟不愿认真应对心理学，原因除了经验主义者对理论的抗拒，当然也是因为存在各式各样相互竞争的版本，比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新弗洛伊德心理学、荣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等。另一点原因在于将弗洛伊德的方法应用于亡者，对文献而不是对人进行精神分析，显然很困难。不过还有一点是因为，事实上，历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遭遇可谓不逢其时，彼时历史学家正在逐渐远离“大人物”，把关注焦点转向其他人。当此之时，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希特勒的人格特征之类，远不如研究德国民众为何容易受到他的领导作派的影响。

那么集体心理学呢？在20世纪20、30年代，有些历史学家，尤值一提的是两位法国人，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倡导并努力践行他们所称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心理学”（historical psychology）。不过，他们的继承者作为心态史家，却一般把关注重点从心理学转向了人类学。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与心理学保持着距离。涂尔干把社会学定位为有关社会的科学，与作为有关个体的科学的心理学截然相对。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些和解的努力，比如美国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工作（包括玛格丽特·米德

和露丝·本尼迪克特），诺贝特·埃利亚斯对韦伯和弗洛伊德的综合，以及埃里希·弗洛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这种思路对历史学家的相关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所谓“基本”的人格在各个社会之间各有不同，那么在各个时期之间也必然会各具差异。“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比如它所对比的“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s）与“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s），支撑了E. R. 多兹对古希腊的经典研究（Dodds 1951），后者同时引用了本尼迪克特和弗洛姆。不过，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对史学实践显然影响甚微。

无论如何，和解之势并未持续。人类学家愈益不满于所谓国民“性格”或“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的观念，更偏向于采取更具弹性的文化观念进行研究。以这种文化观为核心，兴起了一种历史人类学，其成为晚近最具成果的跨学科发展趋势。但它的成功不应使我们无视历史心理学这一被放弃的规划的潜力。心理学理论至少可以通过三种不同方式对历史学家有所助益。

（1）首先，帮助历史学家破除关于人性的“常识”预设，这些预设由于未获注意而愈发有力，即便不符合弗洛伊德精确定义的“无意识”这个术语的意思。按照彼得·盖伊的讲法，“专业史家始终是一名心理学家，一名业余心理学家。”（Gay 1985: 6）理论（更精确地说，相与竞争的多种理论）或可揭示表面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的理性根源，反之亦然，从而防止历

史学家过于轻易地预设某个个体或群体以理性方式行事，同时将其他个体或群体贬斥为非理性的（“狂热的”、“迷信的”等等）。

（2）其次，心理学理论有助于史料考证的过程。要想恰当地利用自传或日记作为历史证据，就必须像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不仅考虑文本写作的背景文化和文体惯例，而且要考虑作者的年龄，考虑其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E. Erikson 1958: 701—702）。与之类似，有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也已提出，无论何时，我们所有人都在重新书写我们的传记，其方式宛如声名不佳的《苏联百科全书》（*Soviet Encyclopaedia*）。

口述史家也开始考虑在他们搜集的证词当中的幻想成分，以及支撑这类幻想的心理需求（Samuel and Thompson 1990: 7—8, 55—57, 143—145）。而从白日幻想到梦只有一步之遥。各种学派的精神分析学者所提供的实例或可鼓励历史学家利用一种很少被研究的史料：梦（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关梦的记录）。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处境适合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和他的统治者查理一世一样，他也是个迫害清教徒的人。劳德似乎是自卑情结的经典范例，因为他身形矮小，出身卑微，行事暴戾。但是，历史学家如何可能展示出劳德的确自卑、焦虑或缺乏安全感呢？在这一点上，梦或可告诉我们一

些事情。

从1623年到1643年，劳德在日记里记录了30起梦。这些梦中有三分之二出现了灾难，或至少是令人困窘的情境。比如，“我梦得很奇怪，国王对我很生气，不要我了，又不告诉我我是为啥。”在某些精神分析学者看来，梦见国王意味着做梦者的父亲。而在另一些精神分析学者眼里，梦里的所有人物形象都表征着做梦者本人人格的一些特征。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例梦中，很难拒绝这一结论：劳德真的对自己与国王的关系感到焦虑，当时的人抱怨过的那种傲慢自负表现出的是骨子里缺乏自信（Burke 1997：23—42）。

（3）第三，心理学家也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争有所贡献。例如，他们除了考察领袖的心理特征，还考察了追随者的心理特征，比如他们需要某种父亲形象。由此观之，上文讨论的归因于克里斯玛（参看上文边码第93页）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心理学家协助重新界定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是讨论不同文化的育儿模式，而这一讨论也会对史学问题有所启发。比如说，有一项关于殖民时代美国的研究受到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启发，区分了三种基本“性情”（temperaments），并从育儿模式角度来说明其生成原因。“福音派”（evangelicals）的特点是厌恶自我，他们是严格纪律管束的产物。“温和派”（moderates）的主要特征是自控，他们经

受过的纪律管束比较温和，其意志在儿童期受到改造但未被摧毁。最后是“优雅派”(genteel)，他们以自信为特点，在儿童时受到关爱甚至宠爱。当然，这些性格类型在其他文化中也能发现，比较研究能使画面更为细致。话说回来，迄今为止，有关儿童期的比较研究尚未引入历史维度，而历史研究中又很少有比较视角(Greven 1977)。

有一块领域中，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历史学家与研究不同说服模式的心理学家越走越近，那就是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领域。尼采曾经抱怨说，历史学家忽视了情感。费弗尔也曾敦促历史学家研究这一主题，但他的建议并未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自那以后，对爱、嫉妒、愤怒、恐惧、悲痛等的历史性的关注呈现出上升之势，几乎可以说是爆炸之势(Stearns and Stearns 1986; Naphy and Roberts 1997; Rosenwein 1998; Gouk and Hills 2004)。

有时被称为“情感学”(emotionology)的研究引发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说，什么称得上一种情感？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就曾提出，在所有文化中都有可能识别出六种基本情感：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和惊奇。而波兰语言学家安娜·维日比茨卡反对这种观点，她强调指出，把有关特定情感的描述翻译成其他的语言是很困难的，将我们自身母语的民俗范畴视为普遍通用的范畴(Ekman and Davidson 1994;

Wierzbicka 1999)。

要避免这些危险，或许最好是聚焦于不同的文化分别以哪些方式来“管理”情感。这就是历史学家威廉·雷迪的思路。雷迪 (Reddy 2003) 借鉴了人类学和心理学，试图架通两者之间的鸿沟，运用了情感“管制”(regime) 和情感“展演”(performance) 之类的概念。晚近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普遍渗透着剧场比喻：比如说“情感剧目”，特定文化中可以利用的“脚本”，以及“剧本”(scenarios)，换言之，特定情境与特定情感之间的关联（参看 Burke 2004b）。

有关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所有这些讨论，都处在自由或决定论这两种传统主张之间的某个位置。它们关注的是公共理由与私人动机或情感之间的可能“契合”。它们指出了社会施加给个体的多少难以（但不是无法）抗拒的压力。它们也注意到社会约束的存在，但认为这些约束只是减少了选择的范围，而不是要求个体以某种方式行事。无论如何，可以认为结构既约束着也赋权于个体行动者和集体行动者（Sewell 1992）。

在英国，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聚焦于社会行动者在“结构化”(structuration) 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解决或是消解行动与结构之间表面上的对立（Giddens 1979；参看第2页；参看 Bryant and Jary 1991）。而作为一种过程的结构化观念也带出了对社会变迁的探问，将会在下一章讨论。

第五章

社会理论和社会变迁



在此前的章节中，从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等各种特定的思路都因它们未能阐述变迁而一再遭到批评。那么要怎样阐述变迁的原因呢？这项任务能否留给历史学家，留给他们传统运用的概念，还是说社会理论家也能有所贡献？有没有一套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或至少是一种模型，可以运用？

讨论伊始就需要强调，“社会变迁”这个术语语义含混。它有时用作狭义，指社会结构方面的变更（比如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均势变化）；但也可能宽泛得多，包括政治组织、经济与文化。本章的强调重点将遵循广义。

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或模型就像历史哲学学说，也可以分划为多种主要类型，当然它们和这些历史哲学学说也无法完全分清。有些理论或模型强调变迁的内因，常常以“成长”（growth）、“进化”（evolution）和“衰退”（decay）之类的有机体比喻来描述社会；而另一些则强调外因，使用“借鉴”（borrowing）、“扩散”（diffusion）或“模仿”（imitation）之类的术语。有些模型是线性的，比如犹太—基督教历史哲学或“现代化”模型，而另一类模型是循环的，文艺复兴时期马基

雅维利等人重振了这种古典变迁观，亦见于14世纪阿拉伯史学大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著作中的基本理念。

142 有关社会变迁，没有任何模型会让历史学家全然满意，因为他们的职业兴趣就在于多样性与差异性。因此，即如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之所尝言，“你不打几个历史学的蛋，就做不出社会学的煎蛋饼。”不过，意识到存在替代选择就会刺激想象力，因此从围绕这些相与竞争的模型的论争之中，历史学家也能学习某些东西。

有关社会变迁的两种主要模型就是冲突模型和进化模型，或者简称为马克思的模型与斯宾塞的模型。

一 斯宾塞的模型

“斯宾塞”是一个出于方便而使用的标签，它所指的模型强调的社会变迁是渐进和累积性的（是与“革命”相对的“进化”），本质上取决于内部因素（与“外生的”[exogenous]相对的“内生的”[endogenous]）。人们往往从“结构分化”的角度来描述这种内生过程，换言之，从简单的、不专门化的、非正式的，转向复杂的、专门化的、正式的，或者用斯宾塞自己的话来说，从“不紧密的同质性”（incoherent homogeneity）转向“紧密的异质性”（coherent heterogeneity）。（Sanderson 1990：10—35；有关斯宾塞本

人，参看 Peel 1971）大体而言，这也是涂尔干和韦伯都使用的变迁模型。

如前所见（参看上文边码第 127 页），涂尔干在一些根本议题上与斯宾塞意见相违，但却遵循了他的路数，从本质上属于进化性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变迁。他强调，随着社会中的分工程度不断增长，一种更为复杂的“有机团结”，即相互补充的东西之间的团结，会逐渐取代简单的“机械团结”（换言之，彼此类似的东西之间的团结）。（Durkheim 1893；参看 Lukes 1973：第七章）至于韦伯，他倾向于避免使用“进化”这个术语，与此同时，他又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种渐进但不可逆转的趋势，它趋向更为复杂、更去个人性的组织形式，比如科层制（参看上文边码第 30 页）和资本主义。这已然证明，有可能对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变迁观念做出某种综合。

其结果，就是所谓的“现代化”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变迁过程本质上被看作是内生发展，而外部世界的进入只是提供了某种促使社会做出“调适”的刺激。该模型遵循下述脉络，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表现为两种对立类型。

（1）传统的社会阶序以出身（“先赋”）为基础，社会流动性较低。与此相反，现代阶序以成就（“获致”）为基础，流动性较高。一个由“阶级”组成的社会取代了以“等级”构成的社会（参看上文边码第 61 页），机会更为平等。再者，在传统社会中，基本单位是人人相互认识的小群体，是一个“共同

体”。不过，经过现代化，基本单位变大，变得非个人化，成了大写的“社会”。在经济领域，这种非个人性表现为市场的形式，以及亚当·斯密所称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在政治领域，它呈现为韦伯所称的“科层制”。普遍性的行为标准取代了被视为仅适用于特定群体的标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当然，面对面的群体并未消失，但它们会针对新的情境做出调适。为了对更为广泛的社会产生影响，它们采取的形式是针对特定目的的自愿结社，比如专业、教会、俱乐部、政党等等，从而生动体现出“社会资本”的兴起（参看上文边码第70页）。

（2）这些对立社会组织的形态关联着对立的态度（即使不说是“心态”），比如说如何看待变迁。在传统社会中，变迁缓慢，人们往往在变迁已经发生时感到抵触或是无所觉察（所谓“结构性失忆”，参看上文边码第114页）。而另一方面，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成员，对迅速而持续的变迁有充分的觉察，寄予期待，表示赞同。事实上，人们会以“改善”或“进步”的名义为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有些制度和观念“过时”，将更为传统的社会贬斥为“落后”。从“新”这个用语用来骂人，到它本身成了某种优点，情况就这样发生了改变。未来不是被理解为单纯的复制现在，而是为某些规划和趋势的发展提供的空间（Koselleck 1985: 3—20）。

（3）除了这些基本的对比，还可以加上其他一些。传统社会的文化往往被描述为宗教性、巫魔性乃至非理性的，

而现代社会的文化则被视为世俗的、理性的和科学的。比如说，韦伯认为世俗化和理性化都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特征。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此世苦行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 innerweltliche Askese）与“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Entzauberung der Welt）作用重大。他还认为，科层制相较于其所取代的政治组织形式，更为讲求理性。需要指出的是，使用“理性”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韦伯衷心赞成科层化。他忧虑其所称的现代世界的“铁笼”，个体在其中不得不服从于缺乏弹性的规则。

这种社会文化变迁模型与经济成长和政治发展方面某些广为人知的模型之间，有很明显的类似之处。比如说，研究经济成长的理论家们已经对下述过程作了着重分析：从一个被视为静态的前工业社会中“起飞”，趋向一个以成长为正常状况的工业社会。“复利（Compound interest）仿佛已经融入了它的习性和制度结构”（Rostow 1958）。无独有偶，讨论政治发展的理论家们也已强调了科层制的兴起，以及政治参与的扩散，并且注意到，从18世纪晚期以降，西方世界的社会运动蓬勃兴起（Lerner 1958；Tilly 2004）。

凭借其他学科的著述的协助，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对比得到了深入阐述。比如说，地理学家业已指出，现代性关系到空间观的变迁，空间开始被视为抽象的或“可抽空的”，意思是可用于各式各样的用途，而不是维系于某一项特

定功能（Sack 1986）。社会心理学家也描述了一种“现代”人格的发展，其特点是不断增强的自我控制，以及对他人的同情的能力。社会人类学家对比了传统思维类型与现代思维类型，前者比较具体和封闭，而后者更为抽象与“开放”（换言之，更能觉察到替代性观念）。（Horton 1967，1982）

话说回来，过去大约30年来，社会理论家们已经越来越不满于支撑这种模型的那些预设，比如关于落后的观念，关于某种社会变迁的必然性和好处的观念（Tipps 1973；Knöbl 2003）。即使在经济史领域，朝向一个更加富裕的社会的进步观念也已遭到挑战，有人提出了一种可供替代的生态模型，并基于这种模型来说明经济创新，认为其本质上是针对某种特定资源的消失，随之需要找到某种替代而做出的反应（Wilkinson 1973）。至于文化史家，他们反对将传统视为某种剩余概念，将其界定为不属于现代的；反对将传统看作某种共识性概念，忽略传统内部的冲突；反对把传统当成某种静态概念，忽视传统是如何针对变迁的环境做出调适的，哪怕人们并不总是承认正在发生这种调适（Rudolph 1967；Hobsbawm and Ranger 1983；Heesterman 1985：10—25）。

事实上，过去几年来，进化模型已经遭到如此猛烈的抨击，以至于只有先点出它的长处才算公平。有那么一系列社会变迁，即使并非不可避免，至少也有可能前后相继地发生，这样的观念可不是能不假思索地拒绝接受的。“进化”的观念回应了达尔文的先声，同样无法轻易抛弃。比如说，W. G. 朗西

曼就曾指出，“社会进化的过程虽然绝不能等同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但也类似于后者。”他并强调其所称的“各种实践之间的竞争性选择。”(Runciman 1983-9: ii. 285—310)大量的军事史和经济史按照这种路数来探讨就很到位，这些领域中的竞争观念最为凸显。

约瑟夫·李对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以来的爱尔兰社会的研究(Lee 1973)，又一次鲜明刻画了这种模型的长处。它的谋篇布局围绕着现代化这个概念展开，按照序言的讲法，他希望这个术语会“证明免于盖尔化(gaelicization)和英国化(anglicization)之类同样难以捉摸并且更具情绪性的概念所暗含的狭隘偏见。”在这个例子中，比较视角促成了透过特殊情况看普遍情况，就地方性/局部性(local)变迁所给出的说明，相较于地方史学者此前给出的说明，更为深刻，或者说更具结构性。

再要举一例来展现这种模型的优点，我们不妨来看德国。从托马斯·尼佩代到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这些历史学家探究过去的思路大相径庭，却都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18世纪晚期以来德国社会的变迁。比如按照尼佩代的说明，1800年左右自愿结社的增长就属于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阶级”社会的总体转换的一部分(Nipperdey 1976: 174—205)。

至于韦勒(Wehler 1987)，他以其“防御型现代化”(defensive modernization)概念，为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用这个概念来概括1789年至1815年间，在普鲁士及德意志其他各

邦实施的土地、行政和军事改革，理由是究其根本，它们都是在回应统治阶级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带来的威胁。

防御型现代化观念显然有能力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比如，“反宗教改革”这一传统观念是以“反革命”观念为模板的，意思是说天主教会在16世纪中叶实行的自我改革或自我现代化，是对新教改革做出的某种回应。同样，19世纪的一批改革运动，从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到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不妨视为是在回应西方的兴起所带来的威胁。

现在该来谈谈理论的缺陷了。现代化模型是在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国家中梳理得出的，又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充实完善，以阐释第三世界（当时被称为“欠发达国家”）的变迁。我们发现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历史学家，会觉得这个模型与他们所研究的特定社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这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他们表达出的疑虑主要有三种：
146 对于社会变迁的方向，关于社会变迁的说明，以及推动社会变迁的机制。

（1）首先，如果我们拓展视野，不局限于过去一两个世纪，就会清楚地看到，变迁并非单线，历史不是一条“单行道”。换言之，社会变动的方向并不总是愈益集中化、复杂化、专门化等等。有些倡导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比如萨缪尔·艾森施塔德（Eisenstadt 1973），也意识到其所称的“去集中化逆势”，但这套理论的矛头所指却是反向的。逆势尚未得到它肯

定需要的充分分析（参看 Runciman 1983—1989: ii. 310—320）。

历史学家非常熟悉的逆势例证之一，就是罗马帝国衰亡和所谓“蛮族”（这个范畴本身需要基于历史人类学重新考察）入侵之时的欧洲。在公元3世纪时罗马帝国爆发结构性危机，伴随着中央政府的崩溃，城镇的衰落，以及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都愈益趋向地方自治。伦巴第人、西哥特人及其他入侵者都被允许基于自己的法律生活，这就产生了从“普遍主义”向“特殊主义”的转换。而皇帝们试图确保子孙们承继父辈的位子，这意味着还出现了从获致到先赋的转换。与此同时，随着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皈依基督教，后者也就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在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甚至经济生活中，教会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世俗的立场也被来世的立场所取代（Brown 1971）。

换言之，晚期罗马帝国的实例体现出，在几乎每一块社会领域，都出现了“现代化”进程的反向趋势。这种逆势是如此彻底，不妨视为证据，表明正如斯宾塞主义者所假定的那样，不同的趋势是相互关联的，就此而言，也支持了有关社会进化的一些理论。尽管如此，人们在阐述这些理论时，其形式往往仿佛逆势不曾发生。事实上，“城市化”“世俗化”和“结构分化”等术语在社会学的语言中根本没有对立表达。这与其说告诉我们社会变迁的实质，不如说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学家的预设。

“现代化”这个术语本身就给人留下一种线性进程的印象。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代”这个词在中世纪即已开始使用，历经不同世纪，已被赋予各式各样的意涵。这一点思想史家非常清楚。兰克和布克哈特都相信，现代历史始于15世纪，但即使是他俩运用这个概念的方式，今天看来都显得出奇的老套。兰克强调国家建设，而布克哈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他俩都对工业化未置一词。这样的缺失几乎不让人意外，因为当兰克写作其《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828）¹时，甚至等到布克哈特写作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时，工业革命都尚未扩散到德语世界。

这种缺失意味着，兰克和布克哈特笔下的现代性并非我们的现代性。换句话说，现代性的麻烦就在于它变动不居（Kołakowski 1990；Latour 1993）。结果是，历史学家不得不攒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现代早期”，用来指中世纪结束到工业革命开始之间的这段时期。再到晚近，社会学家及其他学者又采纳了另一个成问题的术语，“后现代”，以描述最近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参看下文边码第172页）。

（2）其次，历史学家不太相信现代化模型中包含的有关社会变迁的说明，尤其是预设变迁是社会系统中本质内在的要素，是潜能的不断发展，是树型不断分枝壮大。如果能够将某个特定社会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分离，这种预设或许还能成立，

1. 此处有误，兰克此书应为1824年问世，另外，此书大陆中译本书名作《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

但实际上，社会变迁往往是由不同文化之间的遭遇所引发的（参看下文边码第162页）。尤其是在征服与殖民的事例中，外在于某个特定社会的一些力量会产生暴力性的影响，这使得人们不合适把它们说成单纯的刺激以引发调适，而后者是这种模型中分配给外部因素的唯一功能（Foster 1960）。

（3）如果我们想理解社会变迁为何会发生，首先考察它是如何发生的或许是一种不错的策略。不幸的是，斯宾塞模型对变迁的机制着墨甚少。这种论述欠缺助长了所谓单向运动的虚假预设，使得变迁过程就像是一系列平顺的、几乎是自动的阶段，仿佛人们所做的一切仅限于登上电梯。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对于经济成长诸阶段的研究，特别明确地例证了我们或可称为的“电梯模型”：从“传统社会”，经过“起飞阶段”，到达“高度大众消费时代”。

与此相反，经济史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迟来的工业化国家，像是德国和俄国，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模型不同。在较晚实现工业化的实例中，国家的角色更显著，赢利动机不太重要。而先发的模型之所以并不适合后来者，恰恰是因为后来者急于赶超其前辈（Rostow 1958；Gershenkron 1962：5—30）。后来者相较于早期工业化国家，优势与劣势并存。但无论长短优劣，它们所面临的情境已然不同。

荷兰历史学家扬·罗曼将后来者的诸般优势概括为一套变

迁理论，梳理了其所称的“后来居上”（retarding lead）法则，大意是一个富于创新的社会通常在其上一代处于“落后”位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跨越效应或“进步的辩证关系”，是因为一个富于创新的社会往往会倾力——既是字面意义也是比喻意义上——投入某项创新，当出现回报递减时，也未能及时调整（Romein 1937: 9—64）。西方文化史也可以说出色地例证了罗曼的理论：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这种文化不像法国人那样注重哥特建筑或经院哲学），而浪漫主义兴盛于德国（这种文化不那么投入启蒙运动）。

与此类似，经济史家 E. A. 里格利（Wrigley 1972—1973）对比了英国与荷兰的社会变迁过程。截至 18 世纪中叶，荷兰一个乡村地区费吕沃（Veluwe）的劳动人口在农业之外，也已经参与了造纸业和纺织业。这个地区并没有什么城镇和工厂，但已经出现了结构分化，绝大多数成年人都识文断字，就此而言，它是“现代”的。换句话说，费吕沃例证了没有工业化的现代化。与之相反，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北部，则是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化的例证，因为在城镇与工厂林立的同时，还存在大批文盲和对共同体的浓厚情怀。

这些例证的寓意似乎在于，我们不应去寻求工业化的后果（默认它们是普遍一致的），而要去探求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契合”或适配性。日本的例子也体现出这种趋向，它揭示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与迥异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结构之间的关联。因此，贯彻韦伯思路的社会学家会去探寻

新教伦理的功能类似项。其中有一位，美国的罗伯特·贝拉，找到了此世苦行主义（包括“tenshoku”[职业]这个概念，与“天职”[calling]概念颇为相似）的证据，尽管他也提请人们注意，在日本，“政治价值观念对经济的渗透”，与西方历史形成鲜明对照（Bellah 1957: 114—117）。

沿循斯宾塞传统的历史社会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诺贝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的进程”的研究（Elias 1939）。这项研究的命运非同寻常。1939年它以德语首次刊行，随后几十年里基本无人问津。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或者说在英语世界到了80年代），这部著作才得到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肃对待（参看Elias 1970: 158—174; Mennell 1989; B. G. Smith 2001）。

埃利亚斯的著作本意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然而，作者对历史用情至深，著述充满了具体细节。该书尤其是第一卷聚焦于西欧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定维度，特别是中世纪晚期以来的状况，就此而言，它是一部专精研究。事实上，埃利亚斯此书的第二章之细致入微，罕有匹敌。它细分为“餐桌行为”“擤鼻涕”“吐痰”等等小节，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使用手绢和餐叉之类新的物件。埃利亚斯提出，这些物件就是其所谓的“文明化”的工具，他将文明化界定为窘迫与羞耻的阈限或“边界”的变易。时至今日，物质文化史与身体史都被视为新的发现，我们有必要记住，埃利亚斯有关这一主题的论述成文于20世纪30年代。

用袖子擤鼻涕，往地板上吐痰，对中世纪贵族的这些描绘生动形象，但埃利亚斯引述它们另有用意。15、16世纪有关良好举止的论著中谴责了此类行为，据说这种态度体现出埃利亚斯所称的“西方文明的社会生成（sociogenesis）”。它也是支持一种关于变迁的整体理论。这种理论或许可以视为现代化模型的一个变种，但它不太容易遭到上文讨论的至少其中一部分反对意见的声讨。

首先，这种理论是多线的。埃利亚斯区分了其所称的“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的两种主要方向……那些趋向分化与整合的加剧的，以及那些趋向分化与整合的削弱的。”因此，将（诸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入这一模型，原则上毫无问题，虽说埃利亚斯原本可以更多地谈谈，在欧洲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无论是英国复辟时期的贵族无赖，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匈牙利贵族，他们或是渴望通过与其他贵族成员形成反差来界定自身的身份认同，或是想要确立其出身匈奴“蛮族”的主张，是如何自觉摒弃传统的“文明化”行为的（Klaniczay 1990；参看 Bryson 1998：248—275）。

其次，埃利亚斯非常关注变迁的动力机制，不仅关注“为何”，也关注“如何”。他的著作最具创见的章节，并非对于餐桌礼仪变化的生动描绘，这部分或许吸引了读者过多的关注；而在于第二卷中的观点，大意是自我控制（以及更一般地说，社会整合）的兴起，需要从政治的角度给予说明。埃利亚斯把这些变化说成是愈益集中化的国家对强力的垄断所造成的意外

后果。这种集中化或“绝对”国家的兴起将武士转变成廷臣，至于兴起的原因，又被说成是中世纪小国之间权力竞争的意外后果。

近些年来，无论在社会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埃利亚斯的作品都越来越有影响。尽管如此，它也面临着某些批评意见。埃利亚斯不像韦伯，他只是基于欧洲历史来例示其理论，这就使读者怀疑其概括性。你不禁会问，在（比如）中国或印度（两者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都成了小国之间的竞争舞台）是否可能找出类似的文明化进程。此外，埃利亚斯尽管意识到“整合削弱”，但却丝毫未提“去文明化”过程，哪怕他撰写此书正是纳粹兴起之时（埃利亚斯及其追随者后来将“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和“去文明化”[de-civilization]的观念融入其体系）。（Wouters 1977；Mennell 1990；Goody 2002）

更严重的批评在于，这项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文明”本身就成问题。如果仅仅是从是否存在羞耻或自我控制的角度来界定文明，那就难以找到有哪个社会是不文明的。事实上，不可能证明说相比于西方人，中世纪的武士或所谓原始社会的成员感到的羞耻或窘迫更少，其实这些特性在不同情境中都有展现（Duerr 1988—1990）。另一方面，如果要更精确地界定“文明”，又会出现另一种困难。如果文明的标准本身就变动不居，你又如何能够勾勒出文明在欧洲的兴起？尽管存在这些争议，但从日本武士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主题广泛的一系列晚近研究都借鉴了埃利亚斯的作品，这意味着他的研究对于任何社会

变迁理论来说都依然有着相关意义（Ikegami 1995；Volkov 2000）。

151 如果从这些五花八门的例证中可以概括出一项整体结论，那就是社会变迁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不止一条。1789年之后的法国和1917年之后的苏联都提醒我们，这些道路并不一定波澜不惊。至于强调危机和革命的社会变迁分析，我们不妨来看看马克思的模型。

二 马克思的模型

“马克思”与“斯宾塞”类似，也是一种方便起见的简称，这里将用来指恩格斯、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都有所贡献的一种社会变迁模型。简言之，可以把它描述成关于前后继替的一系列社会（“社会形态”）的模型或理论，这些社会以经济体系（“生产方式”）为基础，蕴含会导致危机、革命和断裂性变迁的内在冲突（“矛盾”）。这一理论中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之处，这使得不同的解读可以各自强调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争论究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与此相反（G. Cohen 1978；Rigby 1987）。

从某些角度来看，马克思所提供的无非是现代化模型的另一变种。就像斯宾塞一样，该模型也预设存在前后继替的一系列社会形式，从部落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

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被讨论得最为细致，实质上被界定成互为对立面，就像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马克思和斯宾塞一样，也从根本上属于内生性的角度来说明社会变迁，强调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Sanderson 1990：50—74）。不过，至少就其某些版本而言，马克思的模型的确能对抗上文概述的针对斯宾塞模型的三点主要批评。

首先，这一模型为“错误”方向的变迁留出了一席之地，比如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兴起的同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所谓“再封建化”，以及中东欧农奴制的兴起。事实上，如前所见，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强调在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边陲的“欠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之间的互赖关系（Frank 1967；Wallerstein 1974）。（参看上文边码第 82 页）

其次，在马克思这里，对社会变迁的外生性说明也有一席之地。就西方世界而言，广受认同的观点是，外生性说明是从属性的。20 世纪 50 年代，有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马派内部爆发了一场著名的争论。保罗·斯威齐诉诸外因来说明封建主义的衰亡，比如地中海世界的重新开放，贸易和市镇随之兴起，这种论调遭到了围攻（Hilton 1976）。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认为，亚洲社会缺乏内在的变迁机制。他在讨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指出，征服者的功能（或者按照他的讲法，他们的“使命”）就是摧毁传统的社会框架，就此促成变

152

迁（Avineri 1968）。

大体而言，斯宾塞的模型将现代化过程表现为不同区域的一系列类似发展，而马克思的阐述更具全局性，强调一个社会中的变迁与其他社会中的变迁之间的关联。与之相仿，如前所见，马克思主义者沃勒斯坦研究的不是个别欧洲国家或经济体的兴起，而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的兴起，换言之，是一套国际体系的兴起。他强调了变迁的外生特征（Frank 1967；Wallerstein 1974）。

第三，对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尤其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的动力机制，马克思的关注程度远甚于斯宾塞。看待变迁的角度根本上具有辩证性，换句话说，重点落在冲突，落在不仅意图之外而且与计划或期望截然相对的那些后果上。故此，曾经解放生产力的那些社会形态后来“变成了束缚”，而资产阶级造就了无产阶级，也成为了自身的掘墓人（Marx and Engels 1848；参看 G. Cohen 1978）。

至于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这一问题，马派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部落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序列显然是单线的。不过，马克思本人却认为，这种图式只针对欧洲历史。他并不认为印度甚或俄国也遵循西方的道路，尽管他也没有讲明，自己料想这些国家会走什么道路。马派传统内的某些分析坚持了多线立场。比如佩里·安德森（Anderson 1974），挑选了弹道学比喻“轨迹”（trajectory）来取代“进化”的比喻，描绘了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多重）过渡”

(passages) 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多重)谱系”(lineages), 以此强调通往现代性的可能道路的多样性(参看 Skocpol 1984: 170—210)。无独有偶, 巴林顿·摩尔(Moore 1966)区分出通往现代世界的三种主要的历史路径。一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路径, 像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例证; 一是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 比如俄国和中国的实例; 最后是保守主义革命或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路径, 例如普鲁士和日本的情况(参看 Skocpol 1984: 318—355)。

153

强调革命(上文边码第 29 页讨论过)当然是马克思的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斯宾塞的模型中, 变迁是平顺的、渐进的、自动的, 结构的进化仿佛顺其自然。与此相反, 在马克思的模型中, 变迁是骤发的, 在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进程中, 旧的结构遭到粉碎。比如说, 在法国大革命中, 君主制和封建体系被废止, 教会和贵族被剥夺财产, 用作为行政区划的省(departments)取代了过去的外省(provinces),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段相对短暂的时期之内(参看 Sewell 1996)。

在马派的体系中, 革命的经济决定论与革命的集体意志论之间的这种张力——就不说是“矛盾”了——往往被人提及, 不同的解释流派之间也就此产生论战。马克思的模型就此引出了政治事件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问题, 以及人的能动作用的问题, 概括为一句脍炙人口的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哪怕并没有解决问题。马克思的追随者们也基于对这一警句的不同解读,

分化出“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

尽管存在这些张力，或者正是由于这些张力，马克思的模型似乎比斯宾塞的替代方案更能应对历史学家的批评意见。这丝毫不令人惊奇，因为历史学家对这种模型要熟悉得多，其中许多人还对其有所修整。要想出对社会史（相对于历史社会学）的哪一项重要贡献是利用现代化作为框架的，殊非易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模型却被用于不少经典研究，比如埃米利奥·塞雷尼的《乡村的资本主义》(Sereni 1947)，此书讨论了1860年意大利统一后的那一代人；爱德华·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 1963)；莫里斯·阿居隆的《村庄中的共和国》(Agulhon 1970)，此书研究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普罗旺斯东部；以及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Wolf 1982)，此书考察了1492年以降世界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其标题（爱德华·萨义德过于从字面理解）既对比又联结了“宣称拥有自己历史的人和被否定拥有自己历史的人”(Wolf 1982: 29)。

这三部著作，以及其他一些原本可以援引的作品，都是研究马克思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纪，探讨他最熟悉也最擅长分析的那场过渡，即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或许并非巧合。至于对前工业社会的旧制度的解释，马克思的模型就远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了。

154 比如说，它未能探讨人口因素，而这很有可能是这些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变迁动力（参看下文边码第159页）。对这些社

会中的社会冲突，它也没有给出多少分析。实际上，研究旧制度的马派史家在需要一种修整版本时，使用了该模型的温和形式。例如，17世纪法国的社会冲突被说成是19世纪冲突的预现（参看上文边码第61页）。只是到了比较晚近的时候，马派史家们才开始认真阐述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团结形式，爱德华·汤普森的一篇文章“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题目不仅体现出作者喜欢利用悖论，而且展示出找到另一种概念提炼方式的困难（Hobsbawm 1971；E. P. Thompson 1991：16—91）。

三 第三条道路？

鉴于存在两种关于社会变迁的模型，每一种都各自有其长短优劣，有必要考察一下形成某种综合的可能性。这看起来像是某种炼金术般的结合，换句话说，是对立面的融合。然而，至少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两种模型是互补而非矛盾的，有一批针对具体情境的研究架通了两者。

1 一些尝试综合的文章

比如说，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阐述十分有名，他将其表现为一种催化剂，推动着早在旧制度时即已开始发生的一系列变迁，可以说这一阐述架通了进化论的变迁模型和革命论的变迁模型。同样，考察政治俱乐部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作用，意

味着强调自愿结社的角色与强调断裂性变迁取得了完美的契合。即使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虽说开篇时从整体层面上抨击了社会学，并具体批评了结构分化的观念，但仍然引人入胜地阐述了19世纪早期英国的工会和互助会的地位，“麦芽制造者兄弟会”（Brotherhood of Maltsters）、“同心会”（Unanimous Society）等的“互助仪式”，从而为它原本打算颠覆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维度提供了经验支撑（E. P. Thompson 1963: 418—429）。

有一批历史社会学家已经同时借鉴了马克思的模型和斯宾塞的模型（尤其是这种模型的韦伯形式），并试图做出综合。巴林顿·摩尔阐述了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究其根本，这一阐述具有马派取向，但融合了现代化理论的一些洞见；而摩尔从前的学生查尔斯·蒂利则是一名“现代化论者”，能够回应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思路的一些批评意见。沃勒斯坦将本质上的马派思路与自己受教育时接受的进化理论的一些要素相结合，尤其是其中强调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是牟取利润还是竞夺霸权。而西达·斯考切波在研究革命时，也承认同时受惠于马克思与韦伯。

话说回来，就算是综合马克思的模型和斯宾塞的模型，也不能应对这些模型所引发的所有反对意见，它们都有一些严重的视角局限。人们提出这两种模型，都是为了解释工业化及其后果，至于对18世纪中期以前的变迁的解释，就远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了。比如，斯宾塞笔下的“传统社会”和马克思笔下

的“封建社会”基本上都属于剩余范畴，是简单颠倒“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而形成的镜像世界。就此而言，使用“前工业”“前政治”甚至“前逻辑”(prelogical)之类术语，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它们彰显出未能扣合那些不符合某个特定模型的社会特殊性。

是否存在某种第三条道路，即一种特别的社会变迁模型或理论，能同时超越马克思和斯宾塞？20世纪8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复兴之势中，就包括一些致力于此的尝试，比如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1985)、迈克尔·曼(Mann 1986—1993)以及查尔斯·蒂利(Tilly 1990)，他们都强调政治和战争。比如吉登斯就是通过批判社会进化论来引出他对民族国家和暴力的研究的，而批判的理据就在于，社会进化论强调经济因素(“配置性资源”)，牺牲了政治因素(Giddens 1985: 8—9)。迈克尔·曼写出了一部他所称的“权力史”，并在其中提出，“按照财政来衡量的现代国家的成长，主要是从暴力的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来说明的，而不是从国内的角度。”(Mann 1986—1993: i. 490)蒂利既关注“强制”也关注“资本”，但依其自述，他之所以超越其前辈，靠的恰恰是“将强制的组织与战争的准备置于分析的中心”(Tilly 1990: 14)。

就此而言，不仅这三位社会学家都趋于一致(还包括佩里·安德森，他的著作《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对战争着墨甚多)，他们也和研究现代早期欧洲的历史学家趋于一致。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历史学家中有一群人一直在主张，16、17世

156

纪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时期之所以出现政治集权化，无非是战争需求的副产品，从而体现出本世纪早期德国历史学家推崇的一种整体理论，即“外交政策优先”学说。

这种观点的逻辑大体如下。16、17世纪属于“军事革命”时期，军队规模越来越大。要想维持这些军队的薪饷，统治者就必须通过税收，更多地榨取其臣民。而军队又反过来协助执行征税。这样就确立起人们所称的“榨取—强制循环”（*extraction-coercion cycle*, Tilly 1975: 96）。集权化国家的兴起与其说是一套计划或一种理论（比如“绝对主义”）的结果，不如说是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权力竞逐的某种意外后果。斯考切波在其关于革命的比较研究中有所弥补，相较于其前辈学人的做法，她赋予包括战争在内的国际冲突更多的说明权重。

战争与革命之类的危机充当了催化剂或加速器，加快但并非启动了社会变迁。有两位历史学家分别从交战双方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更细致地探讨了上述观念。阿瑟·马维克（Marwick 1965）提出，1914年到1918年间的诸般事件促使英国的一些社会区隔趋于“模糊”，而尤尔根·科卡（Kocka 1973）则主张，在德国，“同样的”事件却使得社会区隔愈发分明（参看 Mann 1986—1893: ii. 740—802）。这两个社会应对战争的方式截然相反，因为它们在战前的结构就大相径庭。

不管怎么说，对第三条道路最重要的贡献，肯定要算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Foucault 1975）及其他研究

中的阐述。福柯聚焦于1650年到1800年期间的西欧，讲述了一个重大转换的故事，即惩罚理论中的从报复转向震慑，以及惩罚实践中的从“景观展示”(spectacle)转向“监控”(surveillance)。作者拒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明何以废止公开执刑，就像他在讨论疯人院的兴起时也拒绝了这类说明。

福柯转而强调，从17世纪晚期以降，其所称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的兴起之势愈益显著，不仅在监狱，并且在兵营、工厂、学校也毫不逊色。他选中19世纪早期著名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规划，生动地刻画了这种新型社会。在这种理想监狱中，一名狱卒就可以照看一切，而他本人却始终不为人所见。福柯不时显得是要颠倒现代化理论，阐述的不是自由的兴起，而是规训的兴起。

福柯对社会变迁的阐述显然没有为“文明的进程”留下一席之地。埃利亚斯与斯宾塞一样被颠覆了。按照福柯的讲法，发生变迁的只是抑制的模式，在旧制度下是对于身体的抑制，而此后则是心理上的抑制。更加冰冷也更具临床意味的术语“移置”(displacement)取代了习惯使用的“进步”观念。话说回来，有关抑制性的科层社会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有些重要的相同点(O'Neill 1986)。

福柯的作品经常遭到历史学家的批评，有公允的，也有不公允的。《规训与惩罚》的结论被说成是“毫无档案研究依据”(Spierenburg 1984: 108)。历史学家对福柯的另一种批评，是集中抨击其对地方性变异缺乏敏感，往往用法国的例证来概括

整个欧洲，仿佛不同地区没有各自的时间尺度。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福柯是在提供一种简明的变迁模型，而非讲述全部的故事，那这些批评意见就几近无的放矢了。

如此重新界定作者的宗旨，还没有摆脱对福柯著述的第三种带有杀伤性的批评，指其未能讨论变迁的机制。福柯作为这股宣称“人之死”或至少是“主体的去中心化”（参看下文边码第179页）的思潮的领袖，似乎回避了通过考察惩罚改良者的意图来检验理论，证明改良导致的新体系与这些意图毫不相干，并揭示这种体系真正的成因。当然，这项任务会非常棘手，但如果有人宣称彻底清除了传统的历史说明，那指望他去履行这项任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福柯著述整体而言，以及单就《规训与惩罚》来说，最有价值的都是其破而非立的维度。经过他对传统认知的摧毁性的抨击，有关监禁、性相之类的历史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而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也是如此，因为福柯已经揭示了它与对进步的信念之间的关联，而他为颠覆这种信念付出了诸多心力。就像在尼采（福柯最喜爱的哲学家之一）那里一样，你即使拒绝接受他的答案，也依然不能回避他的问题。

158

2 人口模式种种

有关社会变迁的其他探讨与马克思和斯宾塞都分道扬镳，因为它们都不是线性论的，而是循环论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Spengler 1918—1922）与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Toynbee 1935—1961）都把历史看作是

多种文化前后继替的故事，这些文化历经成长、成熟、衰落和覆亡的同一循环。应用范围更有限的循环论学说包括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长波”，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笔下较短的循环，以及帕累托阐述的“精英循环”。

汤因比的研究体量庞大，写作前后历时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刊行篇幅超过6千页，讨论了作为历史舞台上主角的21个独立的“文明”，考察其如何作为对所处环境的“挑战”的回应而源起，又如何“成长”，但最重要的是它们遭遇的危机和衰落，在这些过程中，战争和某种无产者（包括“外来的”无产者，比如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的兴起发挥了关键作用。普遍主义的国家和教会之类的建制使得各文明有可能“重整力量”，有时还不止一次，但并不能防止“最终崩解”。这些整体性命题乃是基于一系列鲜活的例证，源于汤因比惊人渊博的历史阅读，更不用说他广泛援用的各类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尤其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了。

对汤因比最初的反应大体上是膜拜有加，但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整体设想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抨击。汤因比被指责过于强调总体图式，未能充分结合马克斯·韦伯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之类历史社会学家的观念，基本上忽视了自然科学在文明当中的位置，但首先是被指责将“文明”错当作界限确定的实体，可以逐一计数，却对它们之间的互动殊少论及。

汤因比撰写的是整部人类历史，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

南·布罗代尔则聚焦于16、17世纪。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出了一些更为宽泛的结论。他著有《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Braudel 1949)，这是20世纪刊行的最著名的往昔研究之一。布罗代尔在书中提出，历史变迁的发生速率不一，具体说有三种步调。一是长期的“地缘历史”，“持续重复的历史”；一是中期的“经济体系、国家、社会和文明”；最后是短期的事件。就前两者而言，布罗代尔倡导循环模型，将地理历史描述为“不断重复发生的循环周期”的时间，并将有利于缔造类似菲利普二世治下的大帝国的时代，比如16世纪，与推动这些大帝国分裂的时代相比照。布罗代尔的灵感来自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的著述，像后者一样，他把历史看作是扩张阶段与收缩阶段（即所谓“A阶段”和“B阶段”）的轮替。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循环论得到了历史人口学家的研究的加持，他们主张，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的增减。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曾经师从布罗代尔，在研究现代早期法国西南部的朗格多克省时(Le Roy Ladurie 1966)，借鉴了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概念。不过，在勒华拉杜里看来，社会变迁的实际推动力还是人口。他阐述了其所称“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农业大周期”的历史。基本的模式就是增长之后是衰减，然后是恢复。在扩张阶段，发生人口爆炸，随后是土地开垦，农场分家，价格上涨，出现勒华拉杜里

称之为以工资和租金为代价的“利润的胜利”，换言之，是靠利润谋生的阶级也就是企业家的胜利。然而，到了17世纪，农业生产率到达上限，结果是，所有主要的经济趋势和社会趋势开始逆转。

正如马尔萨斯所预测的那样，人口开始对生存手段形成压力。增长之后便是衰减，灾荒、瘟疫、移民、晚婚之类的多种因素开始发挥作用。租金开始战胜利润，用帕累托的用语来说，食利者（rentier）开始战胜投机者（speculator）。业已分散化的地产重新趋于集中。勒华拉杜里从整体上看待1500年至1700年这段时期，提出该地区的功能运作宛如一个“生态自平衡系统”（homeostatic eco-system），或者用一个被抽离语境而变得名声不好的词，叫做“静滞的历史”（immobile history）。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是什么因素打破了这一循环？在许多事例中，是系统外部的某种因素的侵入，即下文（参看下文边码第162页）中讨论的某种“遭遇”。

勒华拉杜里所使用的马尔萨斯模型（或者是他更喜欢称之为的“新马尔萨斯模型”）已经遭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抨击，他们认为，使用这种模型的学者低估了阶级冲突在其所研究的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过，也有一些马派历史学家，在法国尤其如此，开始修改自己的模型，更多地考虑人口学特征，运用人口趋势来解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经典问题。关于革命的研究，比如戈德斯通对现代早期世界的研究，已经开始认真探讨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如何成为国家崩溃的一项

前提条件。

在经济史中，布罗代尔有关现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史著（Braudel 1979）辨识出特定城市主宰的经济体系前后继替：威尼斯、热那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而在政治史方面，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Kennedy 1987）考察了过去五百年间帝国霸权的前后继替，从中国和西班牙到英国与美国，并强调衰落的关键因素正在于其所称的“帝国过度扩张”。他聚焦于经济体系与战略之间的互动，尤其是资源从缔造财富转向确立并维持霸权，而这种转移长此以往又会导致政治衰微。扩张会使得帝国“头重脚轻”，军队和官员太多，经济基础难以支撑。与此类似，晚近基于沃勒斯坦模型的世界体系研究也越来越关注长时段的周期及“霸权转移”，或者，有人更愿意说，不只是一个世界体系，而是一系列世界体系的继替（Abu-Lughod 1989；Frank and Gills 1993：尤参第143—199、278—291页）。

3 文化模式种种

对马克思模型和斯宾塞模型的另一种批评意见，是说它们对文化的考虑都不够充分，多少当它只是一种上层建筑，纯属装饰，而非（像今天许多学者那样）视之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一种力量。

文化模式是如何变迁的呢？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研究，堪称关于这个问题的两例著名探讨。他们都关注艺术与科学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尤

其是关注各种文化传统的历史。

如前所见，贡布里希的核心概念之一即其所称的视觉“图式”(schema)。运用图式能很好地说明艺术传统何以长期继续，但如何说明变迁呢？要解决这一问题，贡布里希引入了另一个观念，即艺术家注意到传统模型与其所观察到的现实之间的歧异，对图式做出“矫正”。但这种解答本身又引发了循环论证的问题。如果艺术家对现实的看法本身就是图式的产物，又如何能针对现实来检验图式呢？

161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可能的解答是说，至少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艺术家能自觉意识到可供替代的图式。以心态史为例（参看上文边码第95页），不妨说，自觉意识到替代的选择，就削减了传统的力量，使个体有更多的自由去做选择。来自17世纪中国的一点例证令人瞩目，可以支持对贡布里希的这一修正。那时有些中国山水画家有机会看到了基督教传教士带入该国的一些欧洲印刷品，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画风。他们并没有完全模仿西方的风格，但是意识到这有助于自己摆脱表现山水的传统方式（Cahill 1982）。

说到托马斯·库恩，他分析了其所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福柯指出了认识论上的断裂，却不曾尝试给出说明，而库恩则聚焦于变迁的过程。贡布里希讨论“图式”，库恩则采用了科学“范式”这个平行观念，即某种看待自然世界的观点，能影响其所称的“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日常实践。有一个实例一目了然，就是认为地球是宇

宙中心的传统观点，这是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相维系的一种范式。

库恩提出，科学范式上的重大变迁或“革命”是通过一系列阶段发生的。首先，个体观察者开始意识到非常态现象，换言之，意识到与范式不相符的信息。其次，要应对这些非常态，就要对范式做出修正或修补，就像将著名的“本轮”（epicycles）引入托勒密体系，以更精确地预测星球的位置。第三，具体的观察与一般的范式之间的歧异逐渐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状态。新的理论于是出现，就像认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学说。最终，通过一场戏剧性的“革命”，某种“格式塔转换”（Gestalt switch），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中有一种被科学共同体所采纳，成为新的范式。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共同体”这个术语的运用，无论其界定有多么困难（T. S. Kuhn 1962, 1974: 239—319）。

162 库恩的著述本身即代表着科学史的一种范式。有一段时间，它被批评说是一种循环论模型，无视科学的进步。库恩当然不承认科学是借助积累而发展的。但是，他也明确指出，确实存在进步，哪怕进步的道路不是线性的，而是Z字形的，逐渐趋向其所称的“对自然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精致的理解”。尽管他的观念是在严格的科学语境中提出来的，但有必要追问，库恩的范式观念是否可以用来讨论其他类型的文化变迁。比如说，在人类学和历史写作的历史中，也能辨识出库恩式的革命。就地理学而言，众所周知，哥伦布扬帆起航，脑子里坚

信三块大陆这一传统范式，当发现海地岛（Hispaniola）时，他认为那必然是亚洲的一部分。过了一些年，这个范式才得到修正，美洲被当作第四块大陆。

食人族、女巫、犹太人、疯子、同性恋，如此等等，关于“他者”的刻板印象化认知也可以有类似的讲法。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首先是一组研究范式。伯纳德·史密斯是一位秉持瓦尔堡与贡布里希传统的澳大利亚艺术史家，他提出，18世纪的欧洲人是透过经典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他们初次遭遇的太平洋诸民族的，比如高贵的野蛮人（作者在其著作的第二版中注意到，自己的主张可以转译成库恩式的用语 [B. Smith 1960]）。

这些刻板印象或偏见就像科学范式，往往充当着日常行动的基础。它们和科学范式相仿，也会遭到驳斥，有时会被调整，甚至被舍弃。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彼此遭遇时，除了其他类型的社会文化变迁，我们还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诸如此类的刻板印象的形成、调整与舍弃。当这类遭遇持续较长时间，比如征服或殖民，情况就尤其如此。

4 遭遇

马克思和斯宾塞的模型都聚焦于某个社会内部产生的社会变迁。然而，在变迁的历史中，还有好多实例是从外部启动的，是由从贸易到入侵等多种遭遇推动的。正是为了探讨遭遇的后果，尤其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的后果，人类学家引入了“濡化”这个概念，后者有时被界定为某个较为弱势或臣

属的文化对某个支配性文化的价值观的吸收，而人类学这个学科本身就是文化接触和帝国主义的背景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Dupront 1965；Spicer 1968）。

163 一代人之后，有些历史学家也采纳了这个概念。这方面的先驱是美国的奥斯卡·韩德林，他早在1941年就著成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其副标题是“濡化研究”。再到晚近，法国历史学家罗贝尔·穆尚布莱（Muchembled 1978）也采用这个术语来分析欧洲内部的文化遭遇，讨论其所称的16世纪末法国东北部“乡村世界的濡化”。他注意到，与女巫审判的兴起相伴而来的，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对“偶像崇拜”的攻击，以及识字率的普及。中心（或神职人员）在努力改变边缘（或世俗群体）的价值观。

如此拓展概念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预设神职人员与民众分属不同的文化，这种预设显然夸大其词。当神职人员中有更大的比例在神学院中接受教育时，两个群体之间的文化距离或许可能不断扩大，但这种距离不太可能像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拓殖者之间那么大。就此而言，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对“濡化”这个术语的使用具有误导性质。将在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向普通民众布道的尝试看作是不同群体之间意义的“妥协”，或许更有益处（Greyerz 1984：56—78）。

无论如何，如前所见（上文边码第106页），要想充分考虑文化遭遇的结果的复杂性，就应当在“濡化”这个概念之外，再添上“文化交融”“文化混生”和“文化转译”。讨论中

世纪西班牙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接触，就很好地展现了诸如此类的概念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学家可以说做着与人类学家同样的工作，即使使用不同的术语。人类学的概念证明其价值在于说明已发生之事，尤其是讨论社会文化变迁的机制，讨论变迁发生的具体方式（Glick and Pi-Sunyer 1969）。

而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引入丰富多样的案例，为社会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比如说，征服是不同文化间尤其戏剧性的一类遭遇，但社会理论家却很少讨论（Foster 1960）。故此，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被描述成“欧洲历史上某种陌生军事技术的突然引入导致社会秩序破坏的经典案例”（White 1962: 38）。

而在欧洲之外，西班牙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英国对印度的征服，也都很鲜明地例证了外部引发的社会变迁（这两例中也都有新型军事技术的助力）。在所有这些实例中，传统的精英都被新来者赶到了一旁。社会阶序底层的变迁其深切程度毫不逊色，并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解的结果，而这个因素在社会史领域就像无知一样，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例如，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透过英国人的眼镜来看印度的社会结构，视之为地主与佃户组成的系统。他们把“柴明达尔”（zamindars）理解成地主，而后者多少也算是收税人。用库恩的语言来说，他们抱守自己的范式，对非常态的东西视而不见。话说回来，征服的实践与科学的实践在一个关键方面存在差异。征服者有权力将柴明达尔视为地主来对待，从而将自己的认知转化为现实。我们不妨说，他们将印度社会“转译”

成自己能够解读的术语。在文化“建构”或重构的经典案例中，对社会结构的误解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Neale 1957；B. Cohn 1962）。

尽管在诺曼人征服的案例中没有那么多可用的证据，但不妨推测，1066年之后，在英格兰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诺曼人未能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复杂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地位是由不同数量的“恤金”（*wergild*）来表达的，换句话说，看的是如果不同类型的人被杀害，赔付的补偿金的数量。诺曼人由于未能理解本地的系统，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化约为一个由农奴、自由民和骑士组成的社会。就像前例一样，这一例证也意味着，在社会的文化“构成”中，有些群体或许比其他群体更为重要（下文边码第175页）。它还意味着一个较为短暂的创新期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社会将“结晶”为相对固化的结构。

法国历史学家纳坦·瓦克泰尔（Wachtel 1971）在对殖民时代的秘鲁的研究中，聚焦于西班牙的征服所激发的危机。在他对1530年至1580年的社会文化变迁的阐述中，核心的术语就是“濡化”和“去结构化”（*destructuration*，这个术语借自意大利社会学家维托里奥·兰特尔纳利）。与此类似，勒华拉杜里把18世纪初赛文山区（*Cévennes*）新教徒的叛乱（针对路易十四将新教宣布为非法所做出的回应）描述成反对“去文化化”（*deculturation*）的抵抗。

瓦克泰尔所说的“去结构化”，意思是撕裂传统社会系统

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联纽带。传统的制度与习俗历经征服而保存下来，但旧有的结构却趋于解体。比如，纳贡保存了下来，但却失去了它所属于的旧有的国家再分配系统。地方首领也留存了下来，但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联却不再是印加帝国时期的模样。传统的宗教依然存在，但如今成了某种非官方的、事实上是秘密的膜拜团体，被西班牙传教士视为“偶像崇拜”，竭尽全力予以根除。西班牙神职人员成了布尔迪厄所称的“符号暴力”方面的专家，其实肩负着社会文化变迁或重构的使命。

瓦克泰尔的濡化观有一点重要的特性，就是它不仅关注“客观的”文化接触，而且关注他追随墨西哥历史学家米盖尔·列昂—波尔提拉所称的“被征服者的视角”(León-Portilla 1959)，换言之，自下而上来看支配文化。他关注文化接触的政治背景，对两种文化的成员领会彼此的方式也很感兴趣，这就赋予了旧有的濡化模型崭新的锋芒，兼具描述性和说明性。

伴随着西班牙对新世界的征服而来的，是天花之类欧洲疾病的传播，本地人口极易遭受感染。估计数据五花八门，但一般都同意说，在墨西哥被征服之后一代人时间里，有好几百万人，或许是人口的大多数，死于传染病 (McNeill 1976; Crosby 1986)。更一般地说，重大传染病提供了外部渗透所导致的社会变迁的另一类例证。比如说，1348年，“黑死病”，由老鼠携带的一种瘟疫，从亚洲侵入欧洲，在短时间内杀死了

大约三分之一人口。随后的人力短缺导致了欧洲社会结构长期而重大的变迁。

5 事件的重要性

瘟疫就像文化遭遇与革命，令人瞩目地例证了事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过去往往否认或至少是贬低这种角色。

布罗代尔和其同胞涂尔干及西米昂一样，也认为传统的叙事史学（*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浮于表面。在布罗代尔看来，事件无非是表层泡沫，之所以还让人有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所揭示的历史的潜流。他把个人看作是命运的囚犯，诸般尝试要影响事情的进程，却最终徒劳无效。他的主要著作的“主人公/英雄”（*hero*）菲利普二世，更像是一个反英雄（*anti-hero*），无力改变历史的进程。话说回来，假设布罗代尔选择撰写列宁时代的俄国，他是否还会觉得，个体在历史中的角色是如此容易忽略？

布罗代尔既启发了他的后来者们，又激发他们反对自己的社会变迁模型。比如，勒华拉杜里在自己的历史中，为布罗代尔所摒弃的事件保留了一席之地，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社会冲突和社会抵抗，以呈现同时代人是如何领会经济社会变迁并做出回应的。在经济扩张阶段，他描述了1580年多菲内（*Dauphiné*）地区罗芒（*Romans*）的狂欢节，其间工匠和农民们宣布，本城的精英“靠着盘剥穷人而越来越富”（作者后来以这场戏剧性事件作为一项以整书篇幅呈现的微观史研究的焦

点)。而在收缩阶段，他讨论了1670年维瓦赖（Vivarais）地区的叛乱，认为其例证了“面对乡村危机更发乎本能而非出于理性的反应”。不过，“反应”（reaction）这个术语就很能说明问题。就像布罗代尔一样，勒华拉杜里假定，事件是在反映结构，而不是改变结构。

另一种可供替代的思路强调的是对变迁的所谓“经营”。来自日本史的两桩截然相对的事例或许有助于展现这一问题。显然，统治者遏止社会变迁的能力，不会超过克努特大帝（Canute）遏止海浪的能力（国王把廷臣们带到海边，其实就是想向他们证明这一点）。不过，统治者在拜占庭（上文边码第64页），在日本，确实也都尝试如此而为。在17世纪的日本，城镇不断壮大，商贸日益扩张，德川政权试图冻结社会结构，颁行政令，四大社会群体应当如此依序分等：武士、农民、工匠、商人。你或许能够料到，政令并不能防止富有的商人获致高于许多武士的非官方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在1868年取代德川政权的明治政权废除武士制度，这项政令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是意义重大。比如说，许多前武士开始经商，而这种职业生涯此前是不对他们开放的（Moore 1966: 275—290）。为什么明治政权获得了成功，而德川政权却归于失败？答案显而易见：一个政权试图抵制变迁，而另一个政权却为之助力。话说回来，或许有必要探讨，明治政权之所作所为，是否有可能并非只是为势所难免之事添上一臂之力；是否该政权关注的是对变迁的所谓“经营”——

与其说是喝令海浪，不如说是以自己喜好的方向引导潮流。

朱塞佩·德·兰佩杜萨的历史小说名作《豹》（*The Leopard*, Lampedusa 1958）设定在19世纪中叶的西西里岛，在此书中，一位贵族对另一位贵族如此说道：“我们要想一切如常，就得改变一切。”有些贵族（尤其是英国贵族）似乎拥有这种根据新情势做出调适的天分，为了有利于让家族或阶级长期维持的某种策略，不惜做出牺牲或战术退让。无论是哪一种有关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这类活动当然都应有其一席之地。

你或许还希望，理论会具体指明这种策略在哪些类型的情境下有机会获得成功。有两项对贵族行为的研究分别针对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拉贾斯坦，它们针对这样一种情境，作出了显著相似的阐述。这两项研究都描述了被撕裂成两个集团的统治阶级，其中上层集团更同情变迁，而低层集团受损更多。不过，在这两个案例中，低层集团都依据传统寻求上层集团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一个失去最多的集团去组织对于变迁的抵抗。因此，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遵循了其领导人的“调适”政策，社会变迁就这样不伴随暴力而发生了（F. M. L. Thompson 1963; Rudolph and Rudolph 1966）。

如果个体、群体和事件都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拥有重要的位置，那么需要修正的或许不仅是分析的内容，同样还包括分析的形式（无论做出分析的是社会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社会人类学家）。事实上，在所有这三门学科中，转向（或复归）叙事都成了更为晚近的讨论的对象。问题的提出或许表现为一

种困境：对结构的分析过于静态，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充分意识到变迁。而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历史叙事又不能够完全容纳这些结构。因此，要着手探寻适合社会史研究的新的叙事形式。

你或许会说这是在探寻一种“绞缠的”(braided)叙事，因为它将讲故事和分析相互交织(Fischer 1976)。或者，你也可以效仿格尔兹的“厚描”模型，说我们要一种“浓厚的”叙事，因为我们需要构造新的形式，以承担比旧有形式更重的说明分量(后者只关注杰出个体的行动)。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有些历史学家转向了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理论，以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文体形式(Abbott 2002)。

168

新的形式，至少对于历史学家算是新的形式，包括从多重视角呈现同一事件的故事(参看下文边码第179页)，或是不妨称为“微观叙事”(Burke 1991)的作品中凸显地方层面普通人体验的故事。

第二章已经讨论过微观史学转向。有时它采取描述的形式，比如勒华拉杜里对蒙塔尤社区的研究，但也可以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这类故事中最具戏剧性的一例就是马丁·盖尔¹。

马丁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农民，从家里农场跑掉了，去参加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回乡后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一个闯入者所取代，后者宣称自己就是马丁。故事是由历史学家娜

1. “Martin Guerre”，按法语发音应为“马丹·盖赫”(也是台译本的选择)，考虑到大陆中译本为《马丁·盖尔归来》，选择此译。

塔莉·戴维斯重新讲述的（Davis 1983），她不仅着重于其戏剧性的特质，而且也要揭启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的结构，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这些结构的方式。在她的阐述中，核心人物与其说是马丁，不如说是他的妻子贝特朗·德·罗尔斯（Bertrande de Rols）。她遭到自己丈夫的遗弃，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戴维斯认为，无论贝特朗出于何种缘故决定承认闯入者为自己失散已久的丈夫，这都是她摆脱这种难以承受的处境的唯一体面之道。

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历史叙事呈现复归或复兴之势，与此相伴的是承认某些事件破坏结构的力量，在革命的案例中这一点最为明显。在革命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从关注前提条件或“导火索”，转向关注诺尔·帕克所称的“革命叙事”，按照界定，“构成某一场革命的事件和行动”在这种形式“中得到解释并受其作用”。（Noel Parker 1999：111—159，语出第112页）关键在于，叙事属于行动者本身体验的一部分，然后才被日后的学者采纳并调整。它受到对事件的体验的塑造，也因此受到下一阶段行动的塑造，但又反过来塑造对事件的体验，塑造下一阶段的行动。

至少在某些案例中，过去的革命为当下提供了某种模型或范式。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在某些方面被视为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的重演，最终导致国王被砍头；而在托洛茨基及其他参与者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1789年的某种重演。就像在科学范式的案例中，人们可能觉察到非常态，视之为新事件

与旧模型之间的歧异，但即使在革命的案例中，文化传统也维持着它们的力量。

有关旧感知与新事件之间的张力，相关研究也非常少。这方面的例外之一，也是过去一代人中间涌现出的有关社会文化变迁最富原创性的讨论之一，就是芝加哥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对夏威夷的研究，研究始于1779年库克船长到达，然后从叙事转向解释，从对特定情境的分析，转向一般理论。

我们被告知，库克甫至夏威夷，受到数千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划着独木舟来见他。他被护送到神庙，参加了一场仪式，而仪式上膜拜的就是他自己。几周过后，他回到该岛，受到的待遇就冷淡多了。夏威夷人三番五次来偷东西，库克试图予以阻止，却被杀害。然而，几年之后，新的首领卡米哈密哈（Kamehameha）决定与英国实施和睦通商政策，或许也是想由此经营社会变迁。

萨林斯假设，夏威夷人看见库克，当他是他们的上帝罗诺（Lono）的化身，因为他抵达之时正是上帝预期降临之日。他以此来解释库克受到的待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这些事情的各样阐述）。萨林斯进而指出，库克遭到杀害就像他受到膜拜，都是某种仪式性行为，是在弑神。根据他的解释，卡米哈密哈作为继承了库克的神力（mana）的男人，执行亲英政策也是合宜之举（M. Sahlins 1985: 104—135；对立观点参看 Obeyesekere 1992）。

萨林斯利用这种解释，在更一般性的层面上评点了其所称

的系统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并提出两点相互补充的看法。首先，所发生的事件是“由文化确定秩序的”。夏威夷人透过自身的文化传统的透镜来领会库克，并据以行动，从而赋予事件某种独特的文化“签印”。换言之，萨林斯强调了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契合”，其方式类似于前文讨论过的接受理论家。他的讨论让人想起布罗代尔将事件看作是揭示结构的石蕊试纸，或是贡布里希对文化图式的关注。

另一方面，萨林斯又不同于布罗代尔和贡布里希，他进而指出，夏威夷文化在吸收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形象再生产出那种接触”，“并发生了彻底而决定性的改变”。例如说，首领和平民之间的张力加剧，因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隔又叠加上了欧洲人与夏威夷人之间的区隔。首领的反应就是采用英国人的名字，像是“乔治王”（King George）或“比利·皮特”（Billy Pitt），这仿佛是在说，首领之于民众，犹如欧洲人之于夏威夷人，换言之，是关系中的支配性伙伴。萨林斯在总结社会变迁或历史变迁时，描述了每一次阻止变迁的自觉尝试，甚至是针对变迁做出调适的自觉尝试，是如何引发其他的连锁变迁的，最后得出结论说，所有的文化再生产都包含改变。文化范畴在被用来解释世界的时候，始终面临着风险（M. Sahlins 1981, 1985: 第vii—xvii页，136—186页；W. H. Sewell 1996: 879）。

这些整体性观点为针对其他地方的变迁的研究提供了某种可能的范式，至少是促使我们追问，夏威夷是文化接触的特别

合适的例证还是异乎寻常的例证？而文化接触是考察社会变迁的特别合适的方式还是异乎寻常的方式？在像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或法国大革命之类远离其“田野”的背景中，萨林斯有关结构与事件之间关系的概括是否还能成立，或至少有启发意义？

6 世代

长久以来，“世代”的观念同时吸引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富有魅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概念似乎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成长体验，以集体的方式界定着与老辈人相对而言的我们。另一个原因是它希望借助从属于某个特定年龄群体的感觉，将结构上的变迁与个体和事件相关联：比如 1789 年一代（就像青年华兹华斯所言，“生命的黎明是乐园，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或是西班牙的 1898 年一代，他们体验了一个帝国的终结。

有关可称为世代的理论，有一些重要的讨论，尤其是卡尔·曼海姆强调，他所称的“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某种共同位置”，在创造某种特定的世界观或心态方面十分重要（Mannheim 1952: 276—320）。话说回来，这类理论往往不曾转译成实践，偶有少数个案研究，也主要关注艺术史和文学史（Pinder 1926; Peyre 1948; Burke 1972: 235—243; Ramsden 1974）。

这个规律有一点例外耐人寻味，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实施的对阿拉贡一座小城的人类学研究，它根据对有重大影响的——且不说留下创伤的——西班牙内战中事件的不同反应，

171 区分了三个群体，“衰落”世代、“掌控”世代、“新兴”世代。第一个群体在内战之前形成了自己的立场，第二个群体参与了战斗，而第三个群体太年轻，不记得内战。尽管这些对比大大超出了政治领域，但人们很容易从政治角度来给出说明。有一个问题存而未决：要评估1936年至1939年的系列事件对这座城镇各世代的形成的重要性，既有必要考察某种“控制组”，即未曾经历内战的类似共同体，但这种考察又是不可能的（Lisón-Tolosana 1966: 190—201）。

将世代当作国族一般的想象共同体的例证，或许不无益处。某个给定世代的成员分享着特定的体验和记忆，而这些体验和记忆有助于将他们彼此维系，形成对抗其父母世代的某种同盟，随后又是对抗其子女世代的某种同盟。他们可能不共享信念或价值，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同样的情境做出回应。

本书的许多读者无论是否乐意，都属于或可称为“后现代”的世代，其标志就是1968年或1989年的事件。接下来一章将会讨论后现代性在史学和理论中造成的后果。

第六章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如今有些分析当代社会的人士不仅把它描述成“后工业”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后现代”社会。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当中，就有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有关这个观念的历史，参看 P. Anderson 1998）。不过，自汤因比所处时代至今，历史学家不像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对有关后现代性的性质的争论贡献甚微，这令人惊讶。我说“令人惊讶”，是因为历史分期是历史学家的核心关注之一。他们能做出的贡献之一也是怀疑论性质的。在历史学家看来，尤其是对关注长期趋势的历史学家来说，“后现代”这个术语注定像是虚浮之辞的又一例证，自文艺复兴以降，一代代知识分子诉诸这些虚浮之辞，劝说别人相信，自己所处的时期或世代别具一格。要不是自己前辈留下先例，任何一代人的修辞听上去都好有道理。

无论如何，“后现代”这个概念都语义含混。有些人用这个术语与“现代”相对立，以描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另一些人却认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法语为 surmodernité）就是现代趋势的某种强化或加速，或者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

希·贝克的话来讲，是“第二现代性”（Giddens 1990；Beck 2000）。

173 不管我们使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它，无论在整体文化当中，还是在上一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间，都发生了态度上的重大转换。总的趋势是不再那么关注结构，与此相伴的是模糊而兴奋地意识到自由权利，意识到不确定和不安稳。这样的转换当然是对社会变迁加速的一种反应。随着我们认识到，安定的长期就业机会愈益减少，人员、物品与讯息跨越政治边界的移动越来越多，我们也愈益意识到萨林斯之所言，即无论在日常生活中何时运用，有些范畴都面临着“风险”（M. Sahllins 1985: 149）。诚如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2000）令人难以忘怀的讲法，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变的时代，一个“液态的”世界，即便是私人关系，似乎也不像从前那么持续稳定。

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本章所讨论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展开了他们的研究。不妨把他们对后现代性的自觉反应描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例证，就像当代大部分艺术和文学那样。不管怎么说，就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言，更精确、或许也更具启迪的是谈论“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ing）这两个孪生运动。

一 去稳定化

所谓“去稳定化”，我的意思是从假定固定性转向假定流变性，或者换一种比喻，指的是有关结构的传统观念的崩塌，无论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还是文化结构。“结构”之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流”和“转型”之类的概念所取代。

变迁的标志之一，就是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中网络分析的兴起。网络分析是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维系着有关“社会”的特定形象。网络分析学者不再是考察多少固定的社会结构，而是聚焦于以个体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其研究中经常采用“社会交换”的理论。如前所示（参看上文边码第68页），社会交换这种观念并不新鲜，但它关联着特定的社会观，认为社会是个体遵循基于回报期待的策略而展开的行动的总和。我们就此看到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复兴（参看上文边码第127页）。

比如八卦闲话就生动地例证了功能主义思路与个体主义思路的差异。对八卦闲话的功能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活动如何将某个群体的成员们维系一体，而更晚近的思路则聚焦于说闲话的个体，注重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以及如何使用这一媒介来获取信息或影响邻居（Gluckman 1963；Paine 1967）。

当撒切尔夫人宣称“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之类的东西”，她既是在表达一种老套的英国个体主义，也是在表述一种当下的潮流。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也同意说，“我会完全放弃‘社会’这个概念。”他不再使用结构或“有界总体”，而是采用网络观念，尤其是他所称的“多重互叠、相互交织的社会空间性的权力网络”。比如在讨论古希腊时，他就区分了三类网络：城邦网络，希腊国家体系网络，最后是古代的人类观。

与此类似，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也不认为存在部落、国族或“西方”之类的实体，这许许多多的有界体系，而更喜欢谈“关系丛”（bundles of relationships）或“相互关联的多种过程的总体”（a totality of interconnected processes）。（Wolf 1982: 3—7; Mann 1986—1993: i. 1—2, 223—227）至少有部分微观史学家之所以研究过去的网络（参看上文边码第41页），就是出于与曼和沃尔夫类似的原因。

这种取代或重新阐述结构观念的尝试，在社会学方面有些先例。比如格奥尔格·齐美尔就宣称，“社会只不过是称由互动联结起来的一些个体的名目。”诺贝特·埃利亚斯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如今比其在世之时赢得了更多的重视，他用其“型构”（figuration）概念发展了这一观点，即某种社会关系模型，在微观层面上以一场足球赛为范例，在中级层面上以18世纪某个宫廷为例示（这是埃利亚斯最偏爱的历史例证之一），而在宏观层面上则以某个国族为代表，不妨将国族视为许多网络组成的一个网络。在埃利亚斯看来，人们以多种方式在多种社

会中维系一体 (Elias 1969: 18, 208—213; 1970: 128—133)。

皮埃尔·布尔迪厄采取了类似的思路, 批评涂尔干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思路都过于刻板机械。他宁愿使用更为灵活的“场域”(field) 观念。更精确地说, 布尔迪厄区分出一系列的场域, 比如宗教场域、文学场域、经济场域等等。社会行动者“基于他们在这个空间中的相对位置而获得界定”, 而所谓空间, 布尔迪厄也将之描述为“包含各种力的场域”, 对进入其间的人施加特定的关系, “这些关系不能被化约为个体行动者的意向, 也不能化约为行动者之间直接的互动。”

已有学者做出耐人寻味的尝试, 利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 来分析法国作家和法国知识分子作为具备自觉意识的群体, 如何分别“诞生”于 17 世纪和 19 世纪 (在此过程中也体现出 175 界定“文学”空间或“知识”空间的困难)。(Bourdieu 1993; Viala 1985; Charle 1990) 同样, 耶稣会科学也被作为一块“文化场域”来分析, 考察话语、制度框架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这项分析的作者提出, 有时被当作是静态的话语 (参看上文边码第 99 页) “从未固定不变, 而是”在场域的压力之下, “始终处在协商、构成与重构之中”(Feldhay 1999)。

文化的建构

去稳定化的另一点特性是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都越来越

对文化或社会的所谓“可建构性”（constructibility）感兴趣。“社会—文化的”这个复合词的流传就显示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可塑造或可锻造的性质。这种趋向是把文化视为积极主动的而非消极被动的。结构主义者早在一代人以前就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向，完全可以认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通过指出真正深层的结构并不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配置，而是心智的范畴，倒转了马克思（换言之，回到了黑格尔）。

不过，时至今日，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常常因其决定论色彩而遭摒弃。重点落在了集体创造性上（Certeau 1980）。曾经被设定为客观的、硬的社会事实，比如性别、阶级或共同体，现在都被视为文化上“建构的”或“构成的”（Hacking 1999；Burke 2004c：74—99）。与结构主义者相反，后结构主义者强调人的行动，也强调变迁，强调作为持续创造的过程的重构更甚于建构。有鉴于此，“本质主义”这个术语是他们所用词汇中最严重的攻击之一。

在这方面，福柯研究西方疯癫观念的变化（Foucault 1961），性相观念的变化（Foucault 1976—1984），以及抨击忽略被想象出来的实在的贫乏的“实在”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柯的作品属于更广泛也是更悠久的趋势的一部分。例如格式塔心理学家，就把知觉看作是某种建构（参看上文边码第99页）。现象学家也一直强调“实在的社会建构”（Berger and Luckmann 1966）——人们有时会这么称呼它。路易·阿尔

都塞 (Althusser 1970) 和莫里斯·戈德利耶等“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这样一类理论家, 其强调思维和想象在生产我们所称“社会”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Godelier 1984: 125—178)。批判理论家科尔内留·卡斯托里亚迪 (Castoriadis 1975) 在这方面也深具影响, 尽管“想象界”(l'imaginaire) 这个术语的提出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示例。

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 列维-斯特劳斯及其他结构主义者的作品中隐含的文化“规则”观念过于机械, 并据此提出了批评, 方向与上相仿。作为替代选择, 他提出一个更具弹性的概念“惯习”(habitus), 它取自亚里士多德(经由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艺术史家埃尔文·潘诺夫斯基)。“惯习”被定义为一组“图式, 使行动者能够面对变动不居的情境做出调适, 生成数量不定的实践做法”(Bourdieu 1972: 16, 78—87)。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某种“受调控的即兴演练”(regulated improvisation), 这个用语让人想起上文考察过的口传诗人所运用的程式和主题(参看上文边码第 109 页)。

布尔迪厄就像福柯(以及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 破除了与笛卡尔相维系的经典的心身二分, 讽刺这种学说属于“机器中的幽灵”。他所讨论的实践并不容易归类为“心智的”或是“身体的”。比如, 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Kabyle)那里做过田野调查, 他们的荣誉体现在他们说的话里, 也同样体现在他们挺直的步态中。像罗卡叔叔这样的匈牙利

利农场工人所养成的“乌龟一般的淡定从容”，就是对权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抵抗（参看上文边码第91页的描述），就是对布尔迪厄所称“惯习”的意味的又一鲜活展现。

在文学和哲学的领域里，或是在两者之间的空间，有关文化创造性的类似预设奠立起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及其追随者所践行的“解构”，换言之，奠立起他们处理文本的独特思路：揭启其间的矛盾，提请人们关注文本的暧昧性或意义游戏，以与文本自身和作者相对的方式来解读文本。如果说对二元对立的兴趣是结构主义者的标志，那么要辨识后结构主义者，或许可以看他们是否致力于破解这些范畴，因此德里达会感兴趣“增补”（supplement）的观念，即同时对某样东西进行增添和替补（Derrida 1967: 141—164; Derrida 1972; 参看 Norris 1982; Culler 1983）。

对于这些发展趋势，历史学家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如果我们精确地界定解构、后结构主义和相关发展趋势，那么受它们影响的例证依然较为罕见。尽管“解构”这个词（就其“分解为碎片”之意而言）愈益时尚，但只有少数几位历史学家，主要是北美学者，在其实质研究中展现出德里达所给予的灵感。

例如琼·斯科特，就从“增补的逻辑”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历史与整体历史之间的关系。哈里·哈鲁图尼安也提供了一种引发争议的新方法，来解读日本德川时期的“本土主义”（换言之，认同感）话语，他运用“作为游戏形式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s as forms of play）观念，以消解将意识

形态视为社会的反映的传统观点。斯图尔特·克拉克考察了巫术的观念，这一研究异乎寻常地强调语言，注重意义的不确定性。他受到德里达的启发，提出“即使受教育的欧洲人合力将16、17世纪变成反巫魔的重大时代，他们的信念体系也必然依赖于自己力图驱除的对象。”(J. W. Scott 1991: 49—50; Harootunian 1988: 尤参第1—22页; S. Clark 1997: 143)

同样，蒂摩西·米切尔有关19世纪埃及的研究也是基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这种模式不是事物之间的区别或时间间隔，而是事物内部始终不稳定的迟延或分异”，以便重新思考关于殖民城市的公认观点。米切尔维持了一个悖论：“城市如果要将自身呈现为现代的，有赖于维持摒除他者的壁垒。这种依赖使得外部世界，东方……成为现代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Mitchell 1988: 145, 149)

除了诸如此类的少数例外，史学专业依然对后现代主义颇为怀疑，就像在1991年，劳伦斯·斯通致函著名期刊《过去与现在》，直陈那些宣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或“实在界与想象界都是想象出来的”的人正威胁着历史学。该刊在稍后一期刊发了对此函的两则回复。令人瞩目的是，回复者都来自更年轻的一代历史学家，但即便是这一世代，至少在英国，大多数也可能依然更切近斯通的立场(Stone 1991; Joyce 1991; C. Kelly 1991)。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后现代主义转向如前所述的后现代性，这个更加模糊的术语似乎适合用来描述史学实践的某些新

178 特点。例如说，有一种转向，从阿诺尔德·豪泽尔所践行的那种“关于文化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culture），转向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Chartier 1997）所描述的“关于社会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society）。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想象的”范畴的力量，比如乔治·杜比（Duby 1978）研究社会的“三大等级”的观念（参看上文边码第61页），或是晚近研究法国与印度的相关形象（Nora 1984—1993；Inden 1990）。无独有偶，晚近有关语言的社会史研究也不仅关注社会对语言的影响，而且关注相反的方向，例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类对立术语在社会群体构成过程中的重要性（Burke and Porter 1987；Corfield 1991）。

“部落”或“种姓”之类社会组织形式曾经被设定为“社会事实”，如今却被视为集体表征。例如，按照法国人类学家让-吕克·安瑟尔的看法，西非的班巴拉人（Bambara）或富拉尼人（Fulani）之类部落或族群，其实是由殖民管理官员和人类学家发明的，虽说这些用语后来也被非洲人自己所采用（有些历史学家对印度的种姓也持类似看法）。安瑟尔（Amselle 1990）本人认为“班巴拉”之类的用语是在描述文化转型体系，而非描述实体，他批评后一种观点是本质主义或“实质主义”的。他的论点是双重的，既关系到空间，也关系到时间。从空间上说，各群体之间并无任何明晰的界限，历时而变，研究者从中更有可能观察到某种“不断重新分类”的过程（有关种姓，参看 Dirks：2001）。

即使是砖瓦泥浆筑就的城市，一个曾经被视为物理实体的对象，也不再被视为社会实体了。它已经被曼纽埃尔·卡斯特的城市理论家消解了，后者指出了社会关系的消散和人员流、商品流、信息流等各种流的重要性。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城市就在任何地方，就在万物之中。”这就迫使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重新想象城市范畴。卡斯特从城市拓展开去，进而主张，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学。”如果他所言不虚，那么上文所述的网络分析就属于后现代性的症候之一，或许也是现代设置向着过去的某种投射，而我们不再能把这些设置称之为“结构”(Castells 1968, 1996: 469; 参看 Abrams 1978; Amin and Thrift 2002)。

要找寻有关文化建构过程的丰富细致的历史阐述，我们不妨回到沙玛对于17世纪荷兰的研究。沙玛特别关注荷兰人作为这一时期的新兴国族，是如何为自身塑造某种认同的。他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从清洁到抽烟，从古巴达维亚人的膜拜仪式，到荷兰共和国作为新以色列的神话，并从认同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话题。比如说，沙玛追随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犹太饮食律法的解读，提出“要保持清洁，从战斗角度来说，就是要确认分离状态。”我们离弗洛伊德有关执迷于微小差异的自恋的观念相去并不遥远(Schama 1987: 375—396; Douglas 1966)。

对于文化的研究的这种转向极具启迪，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研究文化的某些传统思路隐含着化约论，无论马克思主义

者还是涂尔干都是这样，这一点难以否认。但是，相反方向的反应也很可能矫枉过正了。当下盛行的对文化创造性，对文化作为历史中的一种积极力量的强调，需要伴之以对这种创造性在何种约束下运作有一定的认识。我们不能单纯用关于社会的文化史取代关于文化的社会史，而是需要在研究中融合并同时贯彻这两种观念，无论这可能有多么困难。换句话说，最有益的方式是辩证地看待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关系双方都积极主动且消极被动，兼具决定性与被决定性（参看 Samuel 1991）。

无论如何，文化建构不应被视为一种预设，而应当是一个问题，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你如何建构一个有关（比如说）阶级或性别的新观念？这个“你”又是谁呢？我们如何解释对创新的接受？或者，把问题颠倒过来，是否有可能说明为何在特定的时间，对于特定的人群，传统观念不再具有说服力？

二 去中心化

与对去稳定化的关注相类似，我们还发现了它在空间角度上的等价物，即失位（displacement）或“去中心化”。因此，一直以来，地理学家对后现代性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毫不为奇了（Soja 1989；Harvey 1990；Amin and Thrift 2002）。然而，去中心化并不限于地理特征。例如，它还影响

了立场。学者们往往从单一视角展开写作，但是现在他们正努力从多重视角看待自己研究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就像别处一样，诺贝特·埃利亚斯堪称先驱，他在一代人之前就主张，“社会学必须同时考虑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换句话说，既考虑本人写作的视角，也考虑被书写的人的视角（Elias 1970: 127）。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也就文本解释的语境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意识到原创写作者与日后解释者之间必然存在歧异，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某种对话思路。伽达默尔（Gadamer 1960）主张，应当允许文本本质解释者的观点，也应当允许解释者质疑文本的观点。180

某种角度上说，这一思路借鉴了一项传统。历史学家早就尝试重新建构自己所研究的特定时期的典型立场，而自马林诺夫斯基以降的人类学家也一向关注他所称的“本地人的观点”。这些立场过去往往被视为原始材料的一部分，作者会加以利用，但也会凌驾其上，就好像在19世纪古典小说中，人物角色的声音臣属于全知视角的叙事者的声音。

新颖之处在于这种学者观点的去中心化，即将其呈现为只是许多种观点中的一种。无论在世还是已故，被书写的人都渐渐不再被当作原材料，而更多地被视为伙伴。如此一来，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就可以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在所研究的文化与学人所处的文化之间，来回进退，将研究对象的理论和解释与我们自身的相互比照。学者们比过去愈发自觉地意识到卡尔·曼海姆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观点，以及更为晚近提

出的观点，即知识，包括学者自身的知识，都是处在社会情境中的（Mannheim 1952: 134—190; Haraway 1988）。因此，巴赫金提出的对话观念目前吸引了多个学科的关注（Bakhtin 1981；参看 Morson and Emerson 1990: 231—268）。

不管怎么说，埃利亚斯和伽达默尔所倡导的双重视角已经被多重视角所取代。处在被研究的文化中的人从未以单一声音发声。“自下而上”书写历史，重新构建“被征服者的看法”，或是“臣属阶级”的观点，这样的思潮将上述论点彰显无疑（参见上文边码第 89 页、164 页）。女性历史尝试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来书写历史，它的兴起更增添了视角的多样性。

有些历史学家及其他人都想尝试将这些不同视角融合一处，从而试验新的叙事形式。叙事曾经被那些希望保持“分析性”的学者所摒弃，如今重新赢得了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声望（Stone 1979; Ricoeur 1983—1985; Burke 1991）。比如说，多重视角的手法曾经在许多小说和电影中发挥奇效，像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和黑泽明的《罗生门》（*Rashomon*, 1950），人类学家理查德·普赖斯（Price 1990）对之略作调整，用来阐述 18 世纪的苏里南。他在呈现情境时，不是将个体的阐述加以并置，而是仿佛透过三位集体行动者的眼睛：黑奴、荷兰官员与摩拉维亚传教士。作者将这三种视角相互关联予以评点，但将自己的评点也只是作为另一种观点，即来自一位“民族志史家”的第四种声音（参看 Berkhofer 1995: 170—201）。换言

之，他例示了巴赫金所描述并推荐的“多重声音”或“复调”（polyphonic）叙事。

由于学术上对民众、女性和被殖民者的重新发现，上一代人业已见证了有关人类过去的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le grand récit）的崩解，究其根本，那就是启蒙运动时讲述的有关人类解放的故事。按照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描述，对这则故事是否能讲通的怀疑就属于后现代状况的一部分。“宏大叙事业已丧失可信性。”利奥塔做出这一评判有其具体语境，即讨论知识的合法化，但自那以后，他想出的这个术语，及其可供替换的表述“宏大故事”（Great Story）、“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已被广泛采用，其核心命题也有多方讨论。（梅吉尔 [Megill 1995] 区分了有关过去某个局部的“主导叙事”，关于整个过去的“宏大叙事”，以及使宏大叙事正当化的“元叙事”。）在利奥塔的理论同样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勒华拉杜里之类微观史家的研究之间，契合是显而易见的（Lyotard 1979: 37；参看 Berkhofer 1995；Cox and Stromquist 1998）。

宏大叙事的观念常常伴随着所谓“西方文明”的兴起，这个名目指的是美国一些顶尖大学里曾开设的一门必修课。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对其他大陆的发现与扩张、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传统上这些都被表述为一则凯歌前行的故事中的众多篇章。至于像是印度的历史，要么被纳入这则

故事，要么（如果它不契合于模型）“不配”得到严肃的关注（Cox and Stromquist 1998: 95—180）。按照沃尔夫对该故事刻意戏谑化的概括，“古希腊生了罗马，罗马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Wolf 1982: 5）

然而，时至今日，“宏大故事”中的所有这些故事都已经被一些学者去中心化了。例如，人们意识到其他文化，尤其是穆斯林世界，对文艺复兴贡献卓著，这就导致那场运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被“重构”了（Farago 1995; Burke 2004a）。无独有偶，有关17世纪科学革命的故事也已被重新书写。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科学革命”这个术语之所以兴起，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居功至伟，而这位学者最著名的成就是抨击“辉格”派历史解释，或基于当下思维的历史解释（参看上文边码第113页）。不过，巴特菲尔德却讲述了一则基于当下思维的故事，其将“现代科学的起源”视为一场革命，与客观性的兴起和思想的自由相维系。就连研究中国科学的史学大家李约瑟也相信，“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也只诞生于欧洲”，他之所以撰写有关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历史，除了提请人们注意到中国做出的许多成就，也是为了说明这句话为什么会成立。

与之相反，如前所见，托马斯·库恩以复数形式使用“革命”这个词，强调范式会定期被替换。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讲述更具多元色彩的故事，主张科学只是多种知晓方式中的一种，这种思维风格固然在有些时候获得了知识上的霸权

地位，但也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和时期（Butterfield 1949；J. Needham 1963；Cunningham and Williams 1993）。

1 超越欧洲中心论？

历史学家讲述过的所有宏大叙事中最宏大的一则，就是关于“西方的兴起”的故事。挑战就在于不仅要说明，欧洲人是如何（以及在何时）领先了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且要说明欧洲霸权的确立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了什么后果。毋庸多言，在后殖民主义的时代（参看上文边码第104页），这则故事已经越来越招致争议。

过去百年来，西方学者前赴后继，不断尝试破除欧洲中心论，采取比较视角，却只是反过来被批评犯下了他们竭力想避免的错误：将西方兴起的时间定得过早，预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通过（爱德华·萨义德分析的那种）粗暴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世界其他地方，或是将西方的历史作为正常状态，其他的文化都有所偏离，然后追问中国为何没有任何科学革命或工业革命这样的问题。

例如，马克斯·韦伯肯定是他那时代欧洲中心论色彩最淡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生涯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系统比较欧洲与亚洲的经济、政治和宗教诸领域，甚至是音乐领域，以此努力确定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尤其是他所称的该文明的制度化“理性”）。他尤其关注新教、资本主义和科层制在西方的兴起，主张这三项现象既是彼此类似、相互关联的，又可以与其他地方的现象作比较。

但这并没有使韦伯免于被指责持有欧洲中心论。毕竟他接受了西方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理论。他相信高加索人种居于首位的人种阶序。他还假定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在这些方面，韦伯的观点与他所处时代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并无二致。韦伯的不同寻常之处，是他系统而不懈地努力从法律、科层制和资本主义之类理性（遵循规则）形式的组织的角度出发，来说明西方的领先态势。他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论著，就是对这一更为宏大的事业的一份贡献（Blaut 2000: 19—30）。

在世界史领域读者群同样广泛的史家寥寥无几，其中之一就是阿诺德·汤因比，他的《历史研究》前文已有讨论。无论这部巨著有哪些不足——批评者们也确实已经指出了许多缺陷——它也堪称是将历史去中心化的一项重大尝试。同样，威廉·麦克尼尔也类似于韦伯和汤因比（他还写过后者的传记），属于他那一代人中欧洲中心论色彩最淡的学者之一，是一位世界史事业的斗士，也撰就了该主题最为成功的著作之一《西方的兴起》（McNeill 1963）。

麦克尼尔在这部书中提出，在两千年间（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欧亚大陆四大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均势”：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与西方文明。他写道，“西方人如此习惯于将自身的历史置于前台，或许很有必要强调，在公元前4世纪到2世纪之间，罗马历史和欧洲历史实处边缘。”只是到了1500年前后，西欧才开始领先于其竞争对手，原因

复杂多样，从航海技术和免疫力较高，到愿意借鉴其他文化。一直要到1850年左右，中华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趋于瓦解，才终结了欧亚大陆的文化均势。

但麦克尼尔本人（McNeill 1963）也被批评持有欧洲中心论立场，理由是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或哥伦布之前美洲的历史留出的篇幅微乎其微，并依然贯彻着“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而如今的学者会希望即使不彻底避免，也要有所修正（麦克尼尔开始撰述此书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就连他关注千年之间文化互动愈益频密，也遭到了抨击。在去中心化的时代里，任何想要以一条明晰的故事线书写世界历史的尝试都注定要遭到抨击（参看 Feierman 1995: 41—42）。

184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将文化中心与他所称的“周边”或“边缘”相对而论。而沃勒斯坦之类的马派倾向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所撰写的世界经济史，对“中心”和“边陲”等概念的运用程度还要深。这些理论家也有明确的故事线，即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一个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兴起，后者基于某种国际分工，导致了世界其他部分的边陲化和欠发展（Frank 1967; Wallerstein 1974; Frank and Gills 1993）。有鉴于此，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他们也被指责为持有欧洲中心论立场。

在这路传统中，最具去中心化色彩的故事当然是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所讲述的1250年至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它以中东为“腹地”，而欧洲只是作为一个“亚体系”而存在。阿布-卢格霍德指出，当15世纪中国回撤之后，印度

洋出现了经济上的某种“真空”，欧洲人才能够填塞进来。就此而言，“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Abu-Lughod 1989: 361）。

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的兴起，以及这种兴起对世界其他区域造成的后果，正是另一部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世界史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沃尔夫接受的是人类学的学术训练，他的著作中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讨论，比其他任何一位世界体系理论家都要多。按照他的讲法，那些理论家都更关注“理解中心如何制服边陲”，而不是研究边陲的人们如何被引入体系，又如何对这一过程做出回应。沃尔夫的研究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一系列的回应，但这并未使其免遭抨击，他被指为试图建构一种单一的主导叙事，不过他同时又被赞扬说提供了一种替代可能（Wolf 1982: 22；参看 Robertson 1992: 30—31；Feierman 1995: 48—49）

沃尔夫及其他世界体系理论家都聚焦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给世界带来的后果。与之相反，经济史家埃里克·琼斯和社会学家约翰·霍尔又回归了韦伯的问题，但是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他们就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方兴起的问题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明。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Jones 1981），琼斯虽然还算细致地讨论了政治，借鉴厂商理论，指出了大国所享有的“规模经济”，但究其本质，还是关注相当长时期内欧洲的经济变迁。他比较了欧洲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异同，认为工业化是“深植于过去的一种成长”。他注意到，欧洲人比其他民族更多

地努力遏制人口增长，但他对该“奇迹”的主要说明却是基于生态角度的。他的重点落在了欧洲的“地质、气候与地形多样性”上，这些多样性产生了“资源的分散分布”，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程度也因此较轻。他的书晚近被批评为“将大多数欧洲中心论立场说成是不存争议的平淡事实”，尽管其强调的并非欧洲的成就，而只是欧洲的好运气，它的生态优势（E. L. Jones 1981；批评参看 Blaut 2000：78—112）。

霍尔在其《权力与自由》（Hall 1985）一书中，说自己是一个像厄内斯特·盖尔纳和迈克尔·曼一样的当代“哲理性历史学家”，注重分析政治。他提出，在其所称的“拱顶式”（capstone）国家，例如中华帝国，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因为那里的政府君临于一系列各自分散的社会，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包括经济关联，视为对自身权力的威胁。在中国，国家太强，而在伊斯兰世界，国家又太弱，政府过于弱小或短命，无法为一个商贸社会提供所需的服务。

如果亚当·斯密（像霍尔所坚信的那样）所言非虚，“最高级的富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无非是“安定、薄税及可以容忍的司法管理”，那么欧洲就是黄金中道的范例。在欧洲，教会与帝国彼此调和，从而使相互竞争的各国形成一个“多极体系”，其既向商人们提供服务，又不过多干预他们做生意。这种国家体系去除了资本主义兴起面临的主要障碍，也说明了西方的“独特动力”。这一思路同样被指责是欧洲中心论立场。盖尔纳对此批评予以回应（Gellner 1988），认为所谓欧洲人

“构成说明其他一切的模型”的观点已经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认为“我们是某种偏离，只有通过考察其他更为典型的社会形式，才能理解我们”。（J. A. Hall 1985, 1988；斯密的话引自 J. A. Hall 1986: 154。批评参看 Blaut 2000: 128—148）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从火药到印刷术，技术创新不断涌现，这给任何试图解释西方何以兴起的人都设置了特别的难题。伊懋可是位杰出汉学家，早在一代人之前，他就提出了一种绝妙的解答，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取得突破，跃入工业革命，是因为深陷某种“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它虽不妨碍“量的增长”，却也助长了“质的停滞”（Elvin 1973: 285—316），这相当于勒华拉杜里笔下“停滞的历史”在本地的等价物。晚近这一解释遭到了来自彭慕兰的挑战（Pomeranz 2000）。他提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并非发生在众多历史学家都主张的1500年前后，而是再晚300年，本质上是欧洲掌控了美洲资源所导致的结果（Goody 2004）。

186

有关世界史书写方式的这种观点可谓意义重大。如果说西方经济体兴起的起点晚至1800年，那么去中心化的世界史就有了比之前更为确凿的理据。要想成功地去中心化，从而“将欧洲外省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就有必要汇集各大洲学者们合作写书，不仅是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史》（*History of Humanity*）这样的大型团队，也包括三四个人的小组，在其中，学者们有可能展开密切对话，或许还能实现伽

达默尔所称的某种“视域融合”(Chakrabarty 2000)。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个严重问题:如何既向读者展示“大画面”,又不重蹈欧洲中心论的“宏大叙事”。

2 全球化

世界史正变得愈益频出。在英语世界,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数十年间几乎享有垄断地位,至少在学术界如此,不过现在有了多个竞争对手。从1997年到2000年,出版了三部重要的世界史论著: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以及菲利普·柯廷的《世界与西方》,这三部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新编多卷本《人类史》大致同时问世。

无论是撰写此类论著的热诚,还是抨击它们持有欧洲中心论的热诚,都不妨认为其标志着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意思是更加自觉意识到随着洲际沟通愈益频密,世界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文化趋势延伸到史学(哪怕许多历史著作依然是从国别视角来写的),也延伸到社会理论。费雷雷有关社会理论热带化的梦想正逐步变成现实,后殖民研究就是这股趋势的显著例证。

全球化的观念就像与之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已经变成聚讼不已的主题,而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又一次扮演了相对次要的角色,至少到晚近之前都是如此,哪怕“全球化”描述的正是一场长期趋势(A. G. Hopkins 2002: 1—10)。有关全球化历史的书写才刚刚起步,接过了麦克尼尔有关趋向世界

各部分之间愈益密集互动的长期趋势的主题，但不再背负着西方何以兴起这一沉重问题。这一历史可能成为史学与理论之间愈益密集互动的竞技场，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文化的各领域理论。地理学家一直在分析新型沟通的兴起所导致的世界的“压缩”与“无场所感”（placelessness）；经济学家始终在考察跨国企业的兴起；政治专家一向在争辩民族国家的衰微和普世民主可能的兴起。社会学家也在追问，世界文化究竟是在变得越来越同质化，还是更为复杂。人类学家的传统关注对象正在消失，故此将注意力转向地方范畴与全球范畴之间的互动，或是阿尔君·阿帕杜莱所称的“流散的公共领域”（diasporic public spheres）与“大众传媒化的团结”，即遍布全球但由电视和互联网维系一体的想象的共同体（Hannerz 1992, 1996; Robertson 1992; Massey 1994; Archibugi and Held 1995; Appadurai 1996; Steger 2003 等，文献不断扩充，聊举数例）。

对于这场多学科会话，历史学家能作的贡献就是更敏锐的过程感，更能彰显当下与过去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到了90年代渐呈全球蔓延之势，但它所描述的过程可要古老得多。如果我们从全球不同区域的人之间愈益密集的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全球化，那么这个过程显然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无论它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有多大程度的加速。有些分析家，例如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贝利，将这个过程分为若干阶段，比如“古代全球化”，然后是17、18

世纪的“原始全球化”(当时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已经是跨国企业),从1800年到1950年的“现代”全球化,以及自那以来的“后殖民”全球化。一批历史学家已经强调指出,19世纪后期作为转折点,不仅在世界市场发展史上很重要,而且由于电报和电话的出现,在全球沟通传播史上也很重要(Robertson 1992: 57—60; A. G. Hopkins 2002; Bayly 2004)。

如果说历史学家对全球争论的贡献之一就是提请参与者们记住,互动过程迄今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那么另一项贡献就是指出全球化在当下所面临的限制,尤其就全球认同而言。布罗代尔喜欢强调,不同种类的变迁发生的速率也不同。如今188技术变化如此迅疾,让我们大多数人眼花缭乱。制度就有些滞后,虽然它们需要做出调适,以面对变迁的世界。而心态上的变迁就更为缓慢:情况也必然如此,因为每个个体的头两三年对于其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譬如说,在19世纪,国族的建构速度远快于国族认同。一位政治领袖评论道,意大利已经打造完毕,现在有必要打造意大利人。与此类似,创造某种欧洲认同的尝试也滞后于欧盟各项制度/机构的缔造,而在创造某种欧洲认同的难题解决之前,各种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股潮流,趋向全球化的潮流,就已经吞没了它。

我们不妨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对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一种更具全球性的思路将愈发寻常,它不仅将研究文化混生的过程,而且会成为这一过程的例证。



结 论



本篇论著刻意尝试占领大卫·休谟曾经称为“热情”与“迷信”之间的中间地带，在这里，就是对新思路的不加批判的热忱与对传统做法的盲目恪守之间的中间地带。我希望它将说服历史学家以比许多人目前的态度更加认真地看待社会理论，而社会理论家们也能对历史更加感兴趣。

经验主义者和理论家并不是两个关联密切的群体，而是一个光谱的两端，这一点即使开篇伊始并非显而易见，如今也一目了然了。概念上的借鉴往往发生在理论上的相邻学科。因此才会出现历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借鉴语言学家，而语言学家又借鉴数学家的现象。

作为回报，历史学家就像民族志学者，也提请人们别忘了人类的体验与制度是复杂多样的，而理论难免会予以简化。这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理论家的简化就是错误的。正如我在前文（边码第32页）所主张的那样，简化就是理论家的功能，就是他们对各种思路和学科之间的分工所做出的贡献。话说回来，这种多样性也的确意味着，永远也不能径直将理论“应用于”过去。

另一方面，理论所能做的就是建议历史学家针对“他们的”时期提出新的问题，或是就熟悉的问题给出新的解答。理论同样层出不穷，这给潜在的使用者带来了难题。首先，是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做选择的难题，选择的依据通常是在一般理论与历史学家脑子里的具体问题之间多少相近的契合。问题还在于将理论及其含意与借鉴者的整个概念架构相调和。本篇论著在它更具哲思性的某些读者看来，很可能像是为折衷主义提供的某种辩护，而折衷主义是在自己研究中挪用概念与理论的历史学家常常遭到的指责（有时也颇为公允）。不过，就本书而言，我拒绝这样的指责，至少如果把折衷主义界定为试图同时持有不一致的多种主张，我拒绝接受。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术语无非意味着在不同地方找寻观念，那我乐意承认自己是个折衷主义者。无论是一名好的历史学家，还是一名好的理论家，其标志或许都是保持向新观念开放，无论它们来自何方，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它们加以调整，并设法检验其效度。

用一句话概括理论的价值，可以说理论就像比较，它让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自己习惯的假设和说明之外的别样的可能，从而拓展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

书 目

晚近有两部参考书颇为有用，一是 G. Delanty 与 E. F. Isin 合编的《历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2003)，一是 P. N. Stearns 主编的《欧洲社会史百科全书》(六卷本, *Encyclopa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2001)。下列书籍与文章仅限于本书征引作品。

Abbott, H. P. (2002)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Cambridge.

Abercrombie, N., Hill, S. and Turner, B. S. (1980)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Abrams, P. (1978) 'Town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Theories and Problems', in P. Abrams and E. A. Wrigley (eds), *Towns in Society*, Cambridge, 9—33.

Abrams, 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Shepton Mallett.

Abu-Lughod, J. L. (1989)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New York.

Agnew, J. A. and Duncan, J. S. (eds) (1989) *The Power of Place*, Boston.

Agulhon, M. (1970) *The Republic in the Village*,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82.

Ahearne, J. (1995) *Michel de Certeau*, Cambridge.

Allport, G. and Postman, L. (1947)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New York.

Almond, G. A. and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Althusser, L. (1970) *Lenin and Philosophy*;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1.

Amin, A. and Thrift, N. (2002)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 Cambridge.

Amselle, J.-L. (1990) *Mestizo Logics: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English trans. Stanford, Calif., 1998.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n London, 1991.

Anderson, B. (1990) *Language and Power*, Ithaca, NY.

Anderson, P.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Anderson, P. (1976—7)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5—36.

Anderson, P. (1998)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Ankarloo, B. and Henningsen, G. (eds) (1990) *Early Modern European Witchcraft*, Oxford.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Archibugi, D. and Held, D. (eds) (1995) *Cosmopolitan Democracy*, Cambridge.

Ardener, E. (1975) 'Belief and the Problem of Women', in S. Ardener (ed.), *Perceiving Women*, London, 1—27.

Aries, P. (1960) *Centuries of Childhood*, English trans. New York, 1962.

Aron, R. (1965)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68.

Assmann, J. (1992)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s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Assmann, J. (199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125—33.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Atsma, H. and Burguiere, A. (eds) (1990) *Marc Bloch aujourd'hui*, Paris.

Avineri, S. (1968)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Aya, R. (1990) *Rethinking Revolution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Amsterdam.

Bachrach, P. and Baratz, M. S.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947—52.

Baechler, J., Hall, J. and Mann, M. (eds) (1988)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iley, F. G. (1993) *The Kingdom of Individuals*, Ithaca, NY.

Bailey, P. (1978) 'Will the Real Bill Banks Please Stand Up? Towards a Role Analysis of Mid-Victorian Working-Class Respectabilit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2, 336—53.

Baker, K. M. (ed.) (1987)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Oxford.

Bakhtin, M. (1952—3) '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 repr. in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eds),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Tex. 1986, 60—102.

Bakhtin, M. (1965) *Rabelais and his World*;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Mass., 1968.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Manchester.

Barth, E. (1959) *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the Swat Pathans*, London.

Bartlett, F. (1986) *Trial by Fire and Water*, Oxford.

Bascom, W. R. and Herskovits, M. J. (eds) (1959)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frican Cultures*, Chicago.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Baumann, G. (1996) *Contesting Culture: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Multi-Ethnic London*, Cambridge.

Bayly, C. A. (2004)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Oxford.

Beck, U. (2000) *Conversations*;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2002.

Bellah, R. (1957) *Tokugawa Religion*, Glencoe, Ill.

Bellah, R. (1959) 'Durkheim and History'; repr. in R. A. Nisbet (ed.) *Emile Durkheim*, Englewood Cliffs, NJ, 1965, 153—76.

Bendix, R. (196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repr. in R. Bendix and G. Roth (eds), *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Berkeley, 1971, 207—24.

Bercé, Y. (1974)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abbrev. trans. Cambridge, 1990.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Berkhofer, R. E, Jr. (1995)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

Bestor, J. E (1999) 'Marriage Transactions in Renaissance Italy and Mauss's *Essay on the Gift*', *Past and Present*, 164, 6—46.

Béteille, A. (1991)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sterdam.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Blaut, J. M. (2000) *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 New York.

Bloch, M. (1924) *The Royal Touch*;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3.

Bloch, M. (1928)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repr. in his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67, 44—76.

Bloch, M. (1939—40) *Feudal Society*; English trans. London 1961.

Blok, A. (2001) *Honour and Violence*, Cambridge.

Boas, F. (1966) *Kwakiutl Ethnography*, ed. H. Codere, Chicago and London.

Boer, P. den (1996)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English trans. Princeton, NJ, 1998.

Bourdieu, P. (1972) *Outlines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77.

Bourdieu, P. (1979) *Distinction*;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Mass., 1984.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C. (197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Calif.

Braudel, F. (1949)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nd edn 1966;
English trans. 2 vols, London, 1972—3.

Braudel, F. (1958) 'History and Sociology'; English
trans, in his *On History*, Chicago, 1980, 64—82.

Braudel, F. (1979)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English
trans. 3 vols, London, 1981—3.

Brewer, J. and Porter, R. (eds) (1993)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Bridenthal, R. and Koonz, C. (eds) (1977)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Brigden, S. (1982) 'Youth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ast and Present*, 95, 37—67.

Briggs, A. (1960) 'The Language of Class'; repr. in
his *Collected Essays*, 2 vols, Brighton, 1985, vol. 1, 3—33.

Briggs, A. and Burke, P. (2002)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Cambridge.

Brown, P. (1971)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Brown, P. (1975)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Daedalus, 104, 133—47.

Brücker, G. (1999) 'Civic Traditions in Premodern
Ital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 357—77.

Bryant, C. G. A. and Jary, D. (1991)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Bryson, A. (1998)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Buisseret, D. and Reinhardt, S. G. (eds) (2000) *Creolization in the Americas*, Arlington, Va.

Bulhof, I. N. (1975) 'Johan Huizinga, Ethnographer of the Past', *Clio*, 4, 201—24.

Burke, P. (1972) *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4th ed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 Cambridge, 1999.

Burke, P. (1974) *Venice and Amsterdam: 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 2nd edn Cambridge, 1994.

Burke, P. (1978)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nd edn, Aldershot, 1994.

Burke, P. (1986) 'City-States', in J. A. Hall (1986), 137—53.

Burke, P. (1987)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Italy*, Cambridge.

Burke, P. (1988) 'Ranke the Reactionary', *Syracuse Scholar*, 9, 25—30.

Burke, P. (1990)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Cambridge; 2nd edn Cambridge, 2005.

Burke, P. (1991) 'The 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P.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2nd edn Cambridge, 2001, 283—300.

Burke, P. (1992a)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Conn., and London.

Burke, P. (1992b) 'The Language of Orders', in Bush (1992), 1—12.

Burke, P. (1997)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Burke, P. (2000)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Burke, P. (2004a) 'Decentering the Renaissance', in S. Milner (ed.), *At the Margins: Minority Groups in Pre-Modern Italy*, Minneapolis.

Burke, P. (2004b) 'Is the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motions?', in P. Gouk and H. Hills (eds), *Representing Emotions*, Aldershot.

Burke, P. (2004c)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Burke, P. (2005) 'Performing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9, 35—52.

Burke, P. and Porter, R. (eds) (1987)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Cambridge.

Burke, P. and Porter, R. (eds) (1991) *Language, Self and Society*, Cambridge.

Burrow, J. W. (1965) *Evolut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Burrow, J. W. (1981) *A Liberal Descent*, Cambridge.

Bush, M. (ed.) (1992) *Social Orders and Social Classes*, Manchester.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London.

Butterfield, H. (1931)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Butterfield, H. (1949)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Bynum, C. W. (1982) *Jesus as Mother*, Berkeley.

Cahill, J. (1982) *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Cambridge, Mass.

Calhoun, C. (ed.) (1992)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Campbell, C. (1987)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Canclini, N. (1989) *Hybrid Cultures*, English trans. Minneapolis, 1995.

Cannadine, D. (1998) *Class in Britain*, New Haven, Conn.

Carneiro da Cunha, M. (1986) *Negros, estrangeiros*, São Paulo.

Carrithers, M., Collins, S. and Lukes, S. (eds) (1985)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History*, Cambridge.

Casey, J. (1989)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Oxford.

Castells, M. (1968) 'Is there an Urban Sociology?'; English trans, in C. G. Pickvance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1976, 33—59.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Castelnuovo, E. and Ginzburg, C. (1979) 'Centre and Periphery'; English trans, in *History of Italian Art*, Cambridge, 1992.

Castoriadis, C. (1975)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87.

Castrén, A.-M., Lonkila, M. and Peltonen, M. (eds) (2004)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Helsinki.

Certeau, M. de (1980)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English trans. Berkeley, 1984.

Certeau, M. de, Revel, J. and Julia, D. (1976)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Paris.

Cerutti, S. (2004) 'Micro-History: Social Relations versus Cultural Models?', in Castrén, Lonkila and Peltonen (2004), 17—40.

Chabal, P. and Daloz, J.-P. (1999)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Political Instrument*, London.

Chaffee, J. W. (1985)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Cambridge.

Chakrabarty, D.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NJ.

Chakrabarty, D. (2003) 'Subaltern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in G. Delanty and E. F. Isin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191—204.

Charle, C. (1990) *Naissance des 'intellectuels' 1880—1900*, Paris.

Chartier, R. (1987)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nglish trans. Princeton, NJ, 1988.

Chartier, R. (1997)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Baltimore, Md.

Chaturvedi, V. (ed.) (2000)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London.

Chayanov, A. V. (1925) *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ed. D. Thorner, B.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repr. Manchester, 1986.

Chickering, R. (1993) *Karl Lamprecht*, NJ.

Clammer, J. (1997) *Contemporary Urban Japan: A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London.

Clark, P. (2000)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Oxford.

Clark, S. (1997) *Thinking with Demons: The Idea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Mass.

Clifford, J. and Marcus, G.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Codere, H. (1950) *Fighting with Property: A Study of Kwakiutl Potlatching and Warfare*, New York.

Cohen, A. P. (198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hichester.

Cohen, G.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2nd edn Oxford, 1980.

Cohn, B. (1962)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repr. in his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Delhi, 1987, 1—17.

Cohn, N. (1975) *Europe's Inner Demons*, London.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Confino, A. (1997)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Problems of Metho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1386—1403.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orfield, P. (ed.) (1991)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Oxford.

Coser, L. (1974) *Greedy Institutions*, New York.

Cox, J. and Stromquist, S. (eds) (1998) *Contesting the Master Narrative*, Iowa City.

Crosby, A. W.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uller, J. (1980) *The Pursuit of Signs*, London.

Culler, J. (1983) *On Deconstruction*, London.

Cunningham, A. and Williams, P. (1993) 'De-centring the "big picture":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he Modern Origins of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6, 407—32.

Curtin, P. D. (2000)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Empire*, Cambridge.

Dahl, R. A. (1958) 'A Critique of the Ruling Elite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 463—9.

Dahrendorf, R. (1957)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English trans. London, 1959.

Darnton, R. (1991) 'History of Reading', in P.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2nd edn Cambridge, 2001, 157—86.

Darnton, R. (1995)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Davis, J. (1992) *Exchange*, London.

Davis, N. Z. (1975)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Calif.

Davis, N. Z. (1983)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ss.

Davis, N. Z. (1987)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Cambridge.

Davis, N. Z. (2000) *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Dekker, R. and van de Pol, L. (1989) *The Tradition of*

Female Transvest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Derrida, J. (1967) *Of Grammatology*; English trans. Baltimore, Md., 1977.

Derrida, J. (1972) *Disseminations*; English trans. Chicago, 1981.

Détienne, M. (1999) *Comparer l'incomparable*, Paris.

Diamond J. M.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A Short History of Every body for the Last 13,000 years*, London.

Dias, M.-O. Leite da Silva (1983) *Daily Life and Power in São Paulo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92.

Dibble, V. K. (1960—1)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 315—19.

Dirks, N. B. (2001) *Castes of Mind*, Princeton, NJ.

Ditz, T. L. (2004) 'The New Men's History', *Gender and History*, 16, 1—35.

Dodds, E. R. (1951)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Dollimore, J. (1991) *Sexual Dissidence*, Oxford.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Douglas, M. (1990) 'Foreword: No Free Gifts', in Mauss (1925), pp. vii—xviii.

Duby, G. (1973)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4.

Duby, G. (1978) *The Three Orders*; English trans. Chicago, 1980.

Duerr, H.-P. (1988—90) *Der Mythos von der Zivilisationsprozess*, 4 vols, Frankfurt.

Dumont, L. (1966) *Homo Hierarchies*;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2.

Dumont, L. (1977)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Chicago.

Dupront, A. (1965) 'De l'acculturation',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Rapports*, vol. 1, 7—36; revised and enlarged as *L'Acculturazione*, Turin, 1966.

Durkheim, E.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English trans. 1933; repr. Glencoe, Ill., 1964.

Durkheim, E. (1895) *Suicide*; English trans. London, 1968.

Durkheim, E. (1912)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English trans. 1915; repr. New York, 1961.

Edelman, M. (1971)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Chicago.

Eisenstadt, S. N. (1973) *Tradition, Change and Modernity*, New York.

Eisenstein, E.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2 vols, Cambridge.

Eisenstein, E. (1992) *Grub Street Abroad*, Oxford.

Ekman, P. and Davidson, R. J. (eds) (1994) *The*

Nature of Emotion, New York.

Elias, N. (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English trans., rev. edn Oxford, 2000.

Elias, N. (1969) *The Court Society*; English trans. Oxford, 1983.

Elias, N. (1970) *What is Sociology?*;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8.

Elman, B. A. (2000)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Elvin, M.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Erikson, E. (1958) *Young Man Luther*, New York.

Erikson, E. (1970) *Gandhi's Truth*, London.

Erikson, K. T. (1970) 'Soci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5.

Evans-Pritchard, E. (1937)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Farago, C. (ed.) (1995) *Reframing the Renaissance*, New Haven, Conn.

Farge, A. and Revel, J. (1988) *The Rules of Rebellion*;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91.

Feierman, S. (1995) 'Africa in History: The End of Universal Narratives', in G. Prakash (ed.), *After*

Colonialism, Princeton, 40—66.

Feldhay, R. (1999) 'The Cultural Field of Jesuit Science', in J. O'Malley et al. (eds),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 107—30.

Feldman, D. (2002) 'Class', in P. Burke (e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181—206.

Femia, J. V. (1981)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Fentress, J. and Wickham, C. (1992) *Social Memory*, Oxford.

Field, J. (2003) *Social Capital*, London.

Fischer, D. H. (1976) 'The Braided Narrative: Substance and Form in Social History', in A. Fletcher (ed.), *The Literature of Fact*, New York, 109—34.

Foster, G. (1960) *Culture and Conquest*, Chicago.

Foucault, M. (1961)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bbrev. English trans. New York, 1965.

Foucault, M. (1966) *The Order of Things*;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0.

Foucault, M. (1969)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2.

Foucault, M. (1971) *L'Ordre du discours*, Paris.

Foucault, M.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English trans. Harmondsworth, 1979.

Foucault, M. (1976—84) *History of Sexuality*; English

trans. 3 vols, Harmondsworth, 1984—8.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ed. C. Gordon, London.

Fox, A. and Woolf, D. (eds) (2003) *The Spoken Word: Oral Culture in Britain, 1500—1850*, Manchester.

Fox-Genovese, E. (1988) *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Chapel Hill, NC.

Frank, A. 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armondsworth.

Frank, A. G. and Gills, B. K. (1993) *The World System: 500 Years or 5000?*, London.

Freedberg, D. (1989) *The Power of Images*, Chicago.

Freyre, G. (1933) *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English tr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6.

Freyre, G. (1959) *Order and Progress*; English tr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6.

Friedman, J. (1994)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Fussell, P. (1975)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Oxford.

Gadamer, H.-G. (1960) *Truth and Method*;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5.

Gans, H.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o-Americans*, New York.

Gay, P. (1985) *Freud for Historians*, New York.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Geertz, C. (1980) *Negara*, Princeton, NJ.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Geertz, H. (1975) 'A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d Magic',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6, 71—89.

Gellner, E. (1973) *Cause and Mean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Gellner, E. (1974) *Legitimation of Belief*, Cambridge.

Gellner, E. (1981)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Gellner, E. (1985) 'The Gaffe-Avoiding Animal', in *Relativ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68—82.

Gellner, E. (1988) *Plough, Sword and Book*, London.

Gellner, E. (1994)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96.

Gellner, E. and Waterbury, J. (eds) (1977) *Patrons and Clients in Mediterranean Societies*, London.

Gers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Geuss, R. (1981)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Giglioli, P. P. (ed.) (1972) *Language in Social Context*,
Harmondsworth.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Ginzburg, C. (1976) *Cheese and Worms*; English trans.
London, 1980.

Glick, T. F. and Pi-Sunyer, O. (1969) 'Acculturation
a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in Spanish Hist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1, 136—54.

Gluckman, M. (1955)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Oxford.

Gluckman, M. (1963) 'Gossip and Scandal', *Current
Anthropology*, 4, 307—15.

Godbout, J. T. (1992), *The World of the Gift*, English
trans. Montreal, 1998.

Godelier, M. (1984)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English trans. London, 1986.

Goffman, E. (1958)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Goldstone, J. A. (1991)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Gombrich, E. H. (1960) *Art and Illusion*, London.

Gombrich, E. H. (1969) *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Goody, J. (1969) 'Economy and Feudalism in Afric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2, 393—405.

Goody, J.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Goody, J.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Cambridge.

Goody, J. (1987)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Goody, J. (2002) 'Elias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 401—12.

Goody, J. (2004)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The Great Debate*, Cambridge.

Gouk, P. and Hills, H. (eds) (2004) *Representing Emotions*, Aldershot.

Gray, R. Q. (1976)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 Oxford.

Greenblatt, S. (1988) *Shakespearian Negotiations*, Berkeley.

Greven, P. (1977) *The Protestant Temperament*, New York.

Greyerz, K. von (ed.), (1984)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Gribaudo, M. (2004) 'Biography, Academic Context and Models of Social Analysis', in Castrén, Lonkila and Peltonen (2004), 102—29.

Grillo, R. (1989) *Dominant Languages*, Cambridge.

Groebner, V. (2000) *Gefährliche Geschenke: Ritual, Politik und die Sprache der Korruption in der Eidgenossenschaft im späten Mittelalter und am Beginn der Neuzeit*, Konstanz.

Guha, R. (1983)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Delhi.

Guha, R. (1997)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Mass.

Guha, R. and Spivak, G. C. (eds) (1988)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Gurevich, A. Y. (1968) 'Wealth and Gift-Bestowal among the Ancient Scandinavians'; repr. in hi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Middle Ages*, ed. J. Howlett, Cambridge, 1992, 177—89.

Habermas, J. (196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89.

Hacking, I.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ss.

Hajnal, J. (1965)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in D. V. Glass and D. C. E.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101—43.

Halbwachs, M. (1925)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connaissance*, Paris.

Halbwachs, M. (1950) *Collective Memory*; English trans. New York 1980.

Hall, J. A. (1985) *Powers and Liberties*, Oxford.

Hall, J. A. (ed.) (1986)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Hall, J. A. (1988) 'States and Societies: The Miracl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aechler, Hall and Mann (1988), 20—38.

Handlin, O. (1941) *Boston's Immigrants, 1790—1865*, Cambridge, Mass.

Hannerz, U. (1986)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mall is Beautifu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 362—7.

Hannerz, U. (1987) 'The World in Creolization', *Africa*, 57, 546—59.

Hannerz, U. (1992) *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New York.

Hannerz, U.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Hansen, B. (1952) *Österlen*, Stockholm.

Haraway, D. (1988) 'Situated Knowledge', *Feminist Studies*, 14, 575—99.

Harding, R. (1981) 'Corruption and the Moral Boundaries of Patronage in the Renaissance', in G. F. Lytle

and S. Orgel (eds), *Patronage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 47—64.

Harootunian, H. D. (1988) *Things Seen and Unseen: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okugawa Nativism*, Chicago.

Hartog, F. (1980)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English trans. Berkeley, 1988.

Harvey, 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Hauser, A. (1951)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2 vols, London.

Hawthorn, G. (1976) *Enlightenment and Despair*; rev. edn Cambridge, 1987.

Heal, F. (1990) *Hospita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Hebdige, M.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Heckscher, E. (1931) *Mercantilism*; English trans. 2 vols, London, 1935.

Heers, J. (1974) *Family Clans in the Middle Ages*; English trans. Amsterdam, 1977.

Heesterman, J. C. (1985) *The Inner Conflict of Traditions*, Chicago.

Hexter, J. H. (1979) *On Historians*, Cambridge, Mass.

Hicks, J. (1969)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Higham, J., Krieger, L. and Gilbert, F. (eds) (1965)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J.

Hilton, R. H. (ed.) (1976)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Himmelfarb, G. (1987)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ambridge, Mass.

Hintze, O. (1975) *Historical Essays*, ed. F. Gilbert, New York.

Hirschman, A.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Mass.

Hitchcock, T. and Cohen, M. (eds) (1999) *English Masculinities 1660—1800*, London.

Ho, P. T. (1958—9)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 330—59.

Hobsbawm, E. (1959) *Primitive Rebels*, 3rd edn Manchester, 1971.

Hobsbawm, E. (1971) 'Class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 in I. Meszaros (ed.),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5—19.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980*, Cambridge.

Hobsbawm, E. and Ranger, T.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Hollis, M. and Lukes, S. (eds) (1982)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Oxford.

- Holquist, M. (1990) *Dialogism*, London.
- Holub, R. C. (1984) *Reception Theory*, London.
- Holy, L. and Stuchlik, M. (eds)(1981) *The Structure of Folk Models*, London.
- Hopkins, A. G. (ed.)(2002)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 Hopkins, K. (1978)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 Horton, R. (1967) 'African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Western Science', *Africa*, 37, 50—71, 155—87.
- Horton, R. (1982)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visited', in M.Hollis and S. Lukes (eds),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Oxford, 201—60.
- Huff, T. E. (1993)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 Hunt, L.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 Ikegami, E. (1998) *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Cambridge, Mass.
- Illyés, G. (1967) *People of the Puszta*, Budapest.
- Inalcik, H. (1973)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 Inden, R. (1990) *Imagining India*, Oxford.
- Jacob, C. (1992) *L'Empire des cartes*, Paris.
- Jauss, H.-R. (1974)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English trans. Minneapolis, 1982.

Johns, A. (1998)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Joll, J. (1977) *Gramsci*, London.

Jones, E. L.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3rd edn Cambridge, 2003.

Jones, G. S.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Cambridge.

Jordanova, L. (2002) 'Gender', in P. Burke (e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120—40.

Joyce, P. (1990)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ambridge.

Joyce, P. (1991)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204—9.

Kakar, S. (1990) 'Some Unconscious Aspects of Ethnic Violence in India', in V. Das (ed.), *Mirrors of Violence: Communities, Riots and Survivors in South Asia*, Delhi.

Kalman, J. (1999) *Writing on the Plaza: Mediated Literacy Practices in Mexico City*, Creskill, NJ.

Kane, J. (2001) *The Politics of Moral Capital*, Cambridge.

Kaye, H. J. and McClelland, K. (1990)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Kelly, C. (1991)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3, 209—13.

Kelly, J. (1984)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Chicago.

Kennedy, P.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Kent, F. W. (1977) *Household and Lineag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NJ.

Keohane, R.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Kerblay, B. (1971) 'Chayanov and the Theory of Peasantry as a Special Type of Economy', in Shanin (1971), 150—9.

Kershaw, I. (1989) *The Hitler Myth*, Oxford.

Kertzer, D. I.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Conn.

Kettering, S. (1986) *Patrons, Brokers and Clien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Kettering, S. (1988)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lientelism',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419—48.

Kindleberger, C. P. (1990) *Historical Economics: Art or Science?*, New York.

Klaniczay, G. (1990) 'Daily Life and Elit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in F. Glatz (ed.),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Hungary*, Budapest, 75—90.

Knöbl, W. (2003) 'Theories that Won't Pass Away:

The Never-Ending Story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G. Delanty and E. I. Isin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96—107.

Knudsen, J. (1988) *Justus Möser and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Kocka, J. (1973) *Klassengesellschaft im Krieg*, Berlin.

Kocka, J. (ed.) (1986) *Max Weber der Historiker*, Göttingen.

Köhler, W. (1929) *Gestalt Psychology*, English trans. New York, 1947.

Kolakowski, L. (1990) *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Chicago.

Koselleck, R. (1985) *Futures Past*, Cambridge, Mass.

Kosminsky, E. A. (1935)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English trans. Oxford, 1956.

Kuhn, P. A. (1990) *Soulstealers*, Cambridge, Mass.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Kuhn, T. S. (1974)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Kula, W. (1962)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eudal System*;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6.

Kuper, A. (1999)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Cambridge, Mass.

LaCapra, D. (1985)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NY.

- La Fontaine, J. (1998) *Speak of the Devil*, London.
- Lamb, C. (2002) *The Sewing Circles of Herat*, London.
- Landes, D. L.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London.
- Landes, J. B. (1988)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 Langer, W. L. (1958) 'The Next Assign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283—304.
- Larson, P. M. (1997) 'Intellectual Engagements and Subaltern Hegemony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gasy Christia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969—1002.
- Laslett, P. (ed.) (1972)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 Lasswell, H. (1936)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repr. New York, 1958.
-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New York.
- Latour, B. (1996) 'Ces réseaux que la raison ignore: laboratoires, bibliothèques, collections', in M. Baratin and C. Jacob (eds), *Le Pouvoir des bibliothèques*, Paris, 23—46.
- Leach, E. (1965) 'Frazer and Malinowski'; repr. in Stephen Hugh-Jones and James Laidlaw (eds), *The Essential Edmund Leach*, 2 vols, New Haven, Conn., 2000, vol. 1, 25—44.
- Lears, T. J. (1985)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567—93.

Lee, J. J. (1973) *The Modernisation of Irish Society, 1848—1918*, Dublin.

Lefebvre, G. (1932) *The Great Fear of 1789*;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3.

Le Goff, J. (1974) 'Mentalities'; English trans, in J. Le Goff and P. Nora (eds), *Constructing the Past*, Cambridge, 1985, 166—80.

León-Portilla, M. (1959) *Visión de los vencidos*, Mexico.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l.

Le Roy Ladurie, E. (1966)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abbrev. English trans. Urbana, Ill., 1974.

Le Roy Ladurie, E. (1975) *Montaillou*; English trans. Harmondsworth, 1980.

Levack, B. P. (1987)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Levi, G. (1985) *Inheriting Power*; English trans. Chicago, 1988.

Levi, G. (1991) 'Microhistory', in P.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2nd edn Cambridge, 2001, 97—119.

Levine, R. M. (1992) *Vale of Tears*, Berkeley.

Lisón-Tolosana, C. (1966) *Belmonte de los Caballeros*;

repr. Princeton, NJ, 1983.

Litchfield, R. B. (1986) *Emergence of a Bureaucracy: The Florentine Patricians 1530—1790*, Princeton, NJ.

Lloyd, G. E. R. (1990) *Demystifying Mentalities*, Cambridge.

Lloyd, G. E. R. (2002) *The Ambitions of Curiosity: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ambridge.

Lloyd, P. C. (1968) 'Conflict Theory and Yoruba Kingdoms', in I. M. Lewis (ed.), *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25—58.

Lord, A. B. (1960)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

Lotman, J. and Uspenskii, B. A. (1984)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e*, ed. A. Shukman, Ann Arbor, Mich.

Love, H. (1993)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Lucas, C. (ed.) (1988)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Lukes, S. (1973) *Emile Durkheim*, London.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Liotard, Jean-François (197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English trans. Minneapolis and Manchester, 1984.

Macfarlane, A. D. (1970)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Macfarlane, A. D. (1979)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Oxford.

Macfarlane, A. D. (1986)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1300—1840*, Oxford.

Macfarlane, A. D. (1987)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Oxford.

McIntire, C. T. and Perry, M. (eds) (1989) *Toynbee: Reappraisals*, Toronto.

MacKenzie, J. M. (1995)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

McKibbin, R. (1984) 'Why i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9, 297—331.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McNeill, W. H. (1963)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McNeill, W. H. (1964) *Europe's Steppe Frontier*, Chicago.

McNeill, W. H. (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London.

McNeill, W. H. (1983) *The Great Frontier*, Princeton, NJ.

McNeill, W. H. (1986) *Mythistory*, Chicago.

McNeill, W. H. (1989) *Arnold J. Toynbee: A Life*, New York.

Maitland, F. W. (1897)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London.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Malinowski, B. (1926)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repr. in his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York, 1954, 93—148.

Malinowski, B. (1945)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New Haven, Conn.

Mann, M. (1986—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2 vols, Cambridge.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Mannheim, K. (1952)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Marwick, A. (1965) *The Delug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rx, K. and Engels, F.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nglish trans. London, 1948.

Mason, T. (1981) '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G.Hirschfeld and L. Kettenacker (eds), *Der Führer-Staat*, Stuttgart, 23—40.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Matthews, E H. (1977) *Quest for American Sociology: Robert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Montreal.

Mauss, M. (1925) *The Gift*; English trans. London, 1990.

Mauss, M. (1938) 'A Category of the Human Mind'; English trans, in Carrithers, Collins and Lukes (1985), 1—25.

Megill, A. (1995)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151—73.

Melton, J. V. (2001)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Melucci, A.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Mennell, S. (1989) *Norbert Elias*, Oxford.

Mennell, S. (1990) 'Decivilizing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5, 205—23.

Merton, R. (1948)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 repr.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1968, 19—82.

Métayer, C. (2000) *Au tombeau des secrets: les écrivains publics du Paris populaire*, Paris.

Mignolo, W. (2000)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NJ.

Mill, J. S. (1843) *A System of Logic*; new edn. Toronto, 1973.

Miller, P. (2003) 'Gender and Patriarch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G. Delanty and E. F. Isin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337—48.

Milo, D. S. (1990) 'Pour une histoire expérimentale, ou la gaie histoire', *Annales E. S. C.*, 717—34.

Mitchell, T. (1988) *Colonizing Egypt*, Cambridge.

Miyazaki, I. (1963)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English trans. New York and Tokyo, 1976.

Moi, T. (ed.) (1987), *French Feminist Thought*, Oxford.

Moore, B.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oore-Gilbert, B. (1997)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Morris, C. (1975) 'Judicium Dei', in D. Baker (ed.), *Church, Society and Politics*, Oxford, 95—111.

Morson, G. S. and Emerson, C. (1990) *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Stanford, Calif.

Mosse, G. (1996)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Oxford.

Mousnier, R. (1967) *Peasant Uprisings*; English trans. London, 1971.

Muchembled, R. (1978)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nglish trans. Baton Rouge, La., 1985.

Muir, E. (1981) *Civic Ritual in Renaissance Venice*, Princeton, NJ.

Muir, E. (1999) 'The Sources of Civil Society in

Ital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 379—406.

Muir, E. and Ruggiero, G. (eds) (1991)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Baltimore, Md.

Mukhia, H. (1980—1) 'Was there Feudalism in Indian Histor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8, 273—93.

Nafisi, A. (2003)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New York.

Naphy, W. G. and Roberts, P. (eds) (1997) *Pearl in Early Modern Society*, Manchester.

Neale, W. C. (1957) 'Reciproc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 the Indian Village', in K. Polanyi (ed.),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 Princeton, 218—35.

Needham, J. (1963) '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repr. in *The Great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1969, 14—54.

Needham, R. (1975) 'Polythetic Classification', *Man*, 10, 349—69.

Nelson, J. S., Megill, A. and McCloskey, D. N. (eds) (1987)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Madison, Wis.

Nipperdey, T. (1976)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Gottingen.

Nisbet, R. (1966)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Nisbet, R. (1969)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New York.

Nora, P. (ed.) (1984—93) *Realms of Memory*, English trans. 3 vols, New York, 1996—8.

Norris, C. (1982)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Nye, R. (1993) *Masculinity and Male Codes of Honor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Oberschall, A. (1993) *Social Movements*, New Brunswick, NJ.

Obeyesekere, G. (1992)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Princeton, NJ.

Ogilvie, S. (2004) 'How Does Social Capital Affect Women? Guild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9, 325—59.

O'Gorman, F. (1992) 'Campaign Rituals and Ceremonies: The Social Meaning of Elections in England 1780—1860', *Past and Present*, 135, 79—115.

Olson, D. R. (1994) *The World on Paper: The Conceptual and Cognitive Implication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Cambridge.

O'Neill, J. (1986)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42—60.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Ortiz, F. (1940) *Cuban Counterpoint*, English trans. New York, 1947.

Ortner, S. and Whitehead, H. (eds) (1981) *Sexual Meanings*, Cambridge.

Ossowski, S. (1957)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English trans. London, 1963.

Ozouf, M. (1976)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Mass., 1988.

Paine, R. (1967) 'What is Gossip About?', *Man*, 2, 278—85.

Pálsson, G. (ed.) (1993) *Beyond Boundaries: Understanding,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Oxford.

Pandey, G. (1995) 'Voices from the Edge: The Struggle to Write Subaltern Histories'; repr. in Chaturvedi (2000), 281—99.

Pareto, V. (1916) *The Mind and Society*, English trans. London, 1935.

Park, R. E. (1916) 'The City'; repr. in his *Human Communications*, Glencoe, Ill., 1952, 13—51.

Parker, N. (1999) *Revolutions and History*, Cambridge.

Parkin, F.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London.

Parry, V. J. (1969) 'Elite Elements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R. Wilkinson (ed.), *Governing Elites*, New York, 59—73.

Peabody, N. (1996) 'Tod's Rajast'han and the Boundaries of Imperial Rule in 19th-Century Ind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185—220.

Peck, L. (1990) *Court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Boston.

Peel, J. D. Y. (1971) *Herbert Spencer: 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 London.

Peltonen, U.-M. (1999) 'The Return of the Narrator', in A. Ollila (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Memory*, Helsinki, 115—38.

Perkin, H. (1953—4) 'What is Social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36, 56—74.

Peyre, H. (1948) *Les Générations littéraires*, Paris.

Phillips, A. (1958) 'The Cultural Cringe', in his *The Australian Tradition*, 2nd edn Melbourne, 1966, 112—17.

Pillorget, R. (1975) *Les Mouvements insurrectionnels de Provence entre 1596 et 1715*, Paris.

Pinder, W. (1926)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 in der Kunstgeschichte Europas*, Berlin.

Pintner, W. M. and Rowney, D. K. (eds) (1980) *Russian Officialdom*, Chapel Hill, NC.

Platt, L. J. (1996)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America, 1920—1960*, Cambridge.

Pocock, J. G. A. (1981) 'Gibbon and the Shepherd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 193—202.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ev. edn Boston, 1957.

Pomeranz, K.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opkin, S.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Berkeley.

Porshnev, B. (1948)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1623—48*; French trans. Paris, 1963.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Price, R. (1990) *Alabi's World*, Baltimore, Md.

Propp, V. (1928)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English trans. 2nd edn Austin, Tex., 1968.

Putnam, R. D. (1992)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Pye, M. (1993) *Syncretism versus Synthesis*, Cardiff.

Ramsden, H. (1974) *The 1898 Movement in Spain*, Manchester.

Ranum, O. (1963) *Richelieu and the Councillors of Louis XIII*, Oxford.

Reddy, W. R. (2003)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a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Revel, J. (ed.) (1996) *Jeux d'échelle: la microanalyse à l'expérience*, Paris.

Rhodes, R. C. (1978) 'Emile Dürkheim and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Marc Bloch', *Theory and Society*, 5, 45—73.

Ricoeur, P. (1983—5) *Time and Narrative*; English

trans. 3 vols, New York, 1984—8.

Rigby, S. H. (1987) *Marxism and History*, Manchester.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Röhl, J. C. G. (1982) 'Introduction', to J. C. G. Röhl and N. Sombart (eds), *Kaiser Wilhelm II*, Cambridge.

Rogers, S. (1975) 'The Myth of Male Dominance', *American Ethnologist*, 2, 727—57.

Romein, J. (1937) *Het onvoltooid verleden*, Amsterdam.

Rorty, R. (1980)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Rosaldo, R. (1986) 'From the Door of his Tent', in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77—97.

Rosenthal, I. (1967) 'The King's Wicked Advise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2, 595—618.

Rosenwein, B. H. (ed.) (1998) *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Rostow, W. W. (1958)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Roth, G. (1976)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7, 306—16.

Rudolph, L. I. (1967) *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ia*, Chicago.

Rudolph, L. I. and Rudolph, S. H. (1966)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an Indian Feudal Orde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 93—126.

Runciman, W. G. (1983—9)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2 vols, Cambridge.

Sack, R. D. (1986)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Sahlins, M. (1981)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Mich.

Sahlins, M.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Sahlins, M. (1988)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4, 1—52.

Sahlins, P. (1989)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P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repr. with new afterword, London, 1995.

Samuel, R. (1991) 'Reading the Sig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2, 88—101.

Samuel, R. and Thompson, P. (eds) (1990) *The Myths We Live By*, London.

Sanderson, S. K. (1990) *Social Evolutionism: A Critical History*, Oxford.

Schama, S. (1987)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London.

Schochet, G. (1975) *Patriarchalism in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Schwarz, R. (1992) *Misplaced Ideas: Essays on Brazilian*

Culture, London.

Scott, J. (ed.) (1994) *Power: Critical Concepts*, Oxford.

Scott, J. C. (1969) 'The Analysis of Corruption in Developing Na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1, 315—41.

Scott, J.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New Haven, Conn.

Scott, J.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Conn.

Scott, J.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New Haven, Conn.

Scott, J. W.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Scott, J. W. (1991) 'Women's History', in P.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2nd edn Cambridge, 2001, 43—70.

Scribner, R. W. (1987)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Reformation Germany*, London.

Segalen, M. (1980) *Love and Power in the Peasant Family*;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83.

Sen, A. (1977)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repr.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Oxford, 1982, 84—106.

Sereni, E. (1947) *Il capitalismo nelle campagne*,

1860—1900; 2nd edn Turin, 1968.

Sewell, W. H. (1967) '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6, 208—18.

Sewell, W. H.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29.

Sewell, W. H. (1996)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Theory and Society*, 25, 841—81.

Sewell, W. H. (1999) 'The Concept (s) of Culture', in V. E. Bonnell and L.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Berkeley, 35—61.

Shanin, T. (ed.) (1971)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Harmondsworth.

Shields, D. (1997) *Civil Tongues and Polite Letters in British America*, Chapel Hill, NC.

Shils, E. (1975) *Center and Periphery*, Chicago.

Sider, G. (1986) *Culture and Clas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Siebenschuh, W. R. (1983) *Fictional Techniques and Factual Works*, Athens, Ga.

Simiand, F. (1903) 'Historical Method and Social Science'; English trans, in *Review*, 9 (1985—6), 163—213.

Simmel, G. (1903)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trans, in P. K. Hatt and A. J. Reiss (eds), *Cities and Society*,

Glencoe, Ill., 1957, 635—46.

Simmel, G. (1908) *Conflict*, English trans. New York, 1955.

Simon, H. A. (1957) *Models of Man*, New York.

Sinha, M. (1995) *Colonial Masculinity*, Manchester.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Revolutions*, Cambridge.

Skocpol, T. (ed.)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Smith, B. (1960) *European Vision and the South Pacific*, 2nd edn New Haven, 1985.

Smith, B. G. (1998) *The Gender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Smith, B. G. (2001) 'Gender Theory', in P. N. Stearns (ed.), *Encyclopa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6 vols, New York, 2001, vol. 1, 95—104.

Smith, D. (1991)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Smith, D. (2001) *Norbert Elia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London.

Soja, E.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Berkeley.

Sombart, W. (1906) *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 Tübingen.

Sombart, W. (1929)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 1—19.

Spicer, E. (1968) 'Acculturation',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ol. 1, 21—7.

Spierenburg, P. (1984) *The Spectacle of Suffering*, Cambridge.

Srinivas, M. N. (1966)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India*, Berkeley.

Stallybrass, P. and White, A. (1986)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London.

Stearns, P. N. and Stearns, C. Z. (1986) 'Emotionolog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813—36.

Steger, M. B. (2003)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Stevenson, J. (1985)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Myth and Reality', in A. Fletcher and J. Stevenson (eds), *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218—38.

Stewart, C. and Shaw, R. (eds) (1994) *Syncretism/anti-Syncretism*, London.

Stocking, G. (1983)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Fieldwork in British Anthropology from Tylor to Malinowski', in *idem* (ed.), *Observers Observed*, Madison, Wis., 70—120.

Stone, L. (1965) *The Crisis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Stone, L. (1977)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Stone, L. (1979)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Past and Present*, 85, 1—24.

Stone, L. (1991)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1, 217—18.

Strathern, M. (1988) *The Gender of the Gift*, Berkeley.

Strauss, A. (1978) *Negotiations*, San Francisco.

Street, B. S. (1984) *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Street, B. S. (1993) 'The New Literacy Studies', in B.S. Street (ed.),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Literacy*, Cambridge, 1—21.

Suttles, G. D. (197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Chicago.

Tarrow, S. (1994) *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Temin, P. (ed.) (1972)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Harmondsworth.

Thomas, K. V. (1971)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Thompson, E.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Thompson, E. P.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Thompson, F. M. L. (1963)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Thompson, P. (1975) *The Edwardians*, London.

Thorner, D. (1956) 'Feudalism in India', in R. Coulbo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J, 133—50.

Tilly, C. (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0*, Oxford.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lo.

Tilly, L. and Scott, J. W. (1978)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Tipps, D. C. (1973)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5, 199—224.

Tóth, I. G. (1996) *Literacy and Written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ope*; English trans. Budapest, 2000.

Touraine, A. (1984) *The Return of the Actor*; English trans. Minneapolis, 1988.

Toynbee, A. (1935—61) *A Study of History*, 13 vols, London.

Turner, F. J. (189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 repr. in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Huntington, Va., 1976, 1—38.

Turner, V.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London.

Turner, V. (1974)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Ithaca, NY.

Underdown, D. (1985) *Revel, Riot and Rebellion*, Oxford.

Vansina, J. (1961) *Oral Tradition*; English trans. London, 1965.

Vansina, J. (1985)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Madison, Wis.

Veblen, T. (1899)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Veblen, T. (1915)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edn London, 1939.

Vernant, J.-P. (1966) *Myth and Thought among the Greeks*; English trans. London, 1983.

Viala, A. (1985)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Vinogradoff, P. (1892) *Villeinage in England*, Oxford.

Volkov, V. (2000) 'Notes on the Stalinist Civilizing Process', in S. Fitzpatrick (ed.), *Stalinism*, London, 210—30.

Vovelle, M. (1973) *Piété baroque et déchristianisation en Provence*, Paris.

Vovelle, M. (1982) *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 English trans. Cambridge, 1991.

Wachtel, N. (1971) *The Vision of the Vanquished-*, English trans. Hassocks, 1977.

Waite, R. G. L. (1977)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New York.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1, New York.

Washbrook, D. (1999) 'Orientals and Occidents: Colonial Discourse Theory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R. Winks (ed.),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vol. 5, 596—611.

Weber, M. (1920) *Economy and Society*, English trans., reissue, 3 vols, Berkeley, 1978.

Weber, M. (1948) *From Max Weber*, ed.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London.

Weber, M. (1964) *The Religion of China*, English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Wehler, H.-U. (1987)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vol. 1, Munich.

Weissman, R. F. E. (1985) 'Reconstructing Renaissance Sociology: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Study of Renaissance Society', in R. C. Trexler (ed.), *Persons in Groups*, Binghamton, NY, 39—46.

Wertheim, W. F. (1974)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White, H. V. (1973) *Metahistory*, Baltimore, Md.

- White, H. V.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Md.
- White, L. T. (1962)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 Wierzbicka, A. (1999)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ambridge.
- Wiesner, M. E. (1993)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ev. edn Cambridge, 2000.
- Wiesner-Hanks, M. E. (2001) *Gender and History*, Cambridge, Mass.
- Wilkinson, R. G. (1973) *Poverty and Progress: An Ecological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 Williams, R. (1962)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 Wilson, B. R. (ed.) (1979) *Rationality*, Oxford.
- Winkler, J. J. (1990) *The Constraints of Desire: The Anthropology of Sex and Gender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 Winter, J. and Sivan, E. (eds) (1999) *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Cambridge.
- Wolf, E. (1956) 'Aspects of Group Relations in a Complex Society'; repr. In Shanin (1971), 50—66.
- Wolf, E.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Wolf, E.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 Wouters, C. (1977) 'Informalization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P. Gleichmann, J. Goudsblom and H. Körte (eds), *Materialen zu Norbert Elias' Zivilisationstheorie*, Frankfurt, 437—53.

Wrigley, E. A. (1972—3)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 225—59.

Wyatt-Brown, B. (1982) *Southern Honor*, New York.

Yeo, E. and Yeo, S. (eds) (1981) *Popular Culture and Class Conflict 1590—1914*, Brighton.

Young, R. (2001)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Zaret, D. (2000) *Origins of Democratic Culture: Printing, Petition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Modern England*, Princeton, NJ.

索
引
1

A

- 阿布-卢格霍德, 珍妮特 Abu-Lughod, Janet (1928—), 美国社会学家, 184
- 阿尔都塞, 路易 Althusser, Louis (1918—90), 法国哲学家, 62, 99, 134, 175
- 阿居隆, 莫里斯 Agulhon, Maurice (1926—), 法国历史学家, 153
- 阿利埃斯, 菲利普 Ariès, Philippe (1914—84), 法国历史学家, 47
- 阿帕杜莱, 阿尔君 Appadurai, Arjun (1949—), 印裔美国人类学家, 59, 187
- 埃里克森, 埃里克·H Erikson, Eric H. (1902—94), 德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 137
- 埃利亚斯, 诺伯特 Elias, Norbert (1897—1990), 德国社会学家, 11, 16, 137, 148—51, 174, 179
- 埃文思-普里查德, 爱德华·E Evans-Pritchard, Edward E. (1902—73), 英国人类学家, 16, 97—8
- 艾克曼, 保罗 Ekman, Paul (1934—), 美国心理学家, 140
- 艾森斯塔德, 萨缪尔·N Eisenstadt, Shmuel N. (1923—), 以色列社会学家, 16, 146
- 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 Anderson, Benedict (1936—), 英裔美国人类学家, 58
- 安德森, 佩里 Anderson, Perry (1938—), 英国历史学家, 25, 152, 156
- 安瑟尔, 让-吕克 Amselle, Jean-Luc, 法国人类学家, 178
- 奥尔波特, 戈登 Allport, Gordon (1897—1967), 美国心理学家, 109
- 奥尔蒂斯, 费尔南多 Ortiz, Fernando (1881—1969), 古巴人类学家, 106

-
1. 本索引系基于原著索引, 倒换中外文次序, 以拼音顺序编成。本书系对多学科领域的大型文献综述, 所以原作者标注出了引述到的绝大多数重要学者的国籍与专业归属。中译保持了原貌, 未对不少(本书原版刊行时尚在世的)当代学者的卒年资料进行更新。

奥尔森, 戴维·H Olson, David H. (1935—), 110

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65—6, 83, 87—8

奥祖夫, 莫娜 Ozouf, Mona, 法国历史学家, 78

B

八卦闲话 Gossip, 173—4

巴伯, 伯纳德 Barber, Bernard, 美国社会学家, 62

巴尔特, 罗兰 Barthes, Roland (1915—8), 法国文论家, 134—5

巴赫金, 米哈伊尔 Bakhtin, Mikhail (1895—1975), 俄国文化理论家, 100, 107, 135, 180

巴兰, 保罗·A Baran, Paul A. (1911—64), 俄裔美国经济学家, 82

巴斯, 弗雷德里克 Barth, Frederik (1928—), 挪威人类学家, 74

巴特菲尔德, 赫伯特 Butterfield, Herbert (1900—79), 英国历史学家, 181—2

巴西 Brazil, 15—16, 34—5, 84—5, 87, 93, 105—6

霸权 Hegemony, 88—9, 160, 182

白兰士, 保罗·韦达·德 Vidal de la Blache, Paul (1845—1918), 法国地理学家, 9, 15

鲍曼, 戈尔德 Baumann, Gerd (1953—), 德国人类学家, 124

鲍曼, 齐格蒙特 Bauman, Zygmunt (1925—), 波兰社会学家, 173

暴力 violence, 39, 52, 90, 121, 155, 165

贝克, 乌尔里希 Beck, Ulrich (1944—), 德国社会学家, 172

贝拉, 罗伯特·N Bellah, Robert N. (1927—), 美国社会学家, 25, 148

贝利, 弗雷德里克·G Bailey, Frederick G. (1924—), 英国人类学家, 91

贝利, 克里斯多弗 Bayly, Christopher (1945—), 英国历史学家, 185

贝娄, 格奥尔格·冯 Below, Georg von (1858—1927), 德国历史学家, 22

贝鲁斯科尼, 西尔维奥 Berlusconi, Silvio (1936—), 意大利政治家, 94

背景/语境 context, 101, 110

本迪克斯, 莱茵哈德 Bendix, Reinhard (1916—90), 德裔美国社会学家, 22

本尼迪克特, 露丝·F Benedict, Ruth F. (1887—1948), 美国人类学家, 137

比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 8, 21—6, 36, 64, 139, 145, 182

庇护人 patrons, 53—6

边陲 peripheries, 82—8, 105, 163, 184

边疆 frontiers, 14, 83

表演 performance, 49—50, 120, 140

波尔什涅夫, 鲍里斯·F Porshnev, Boris F. (1905—72), 俄国历史学家及心理学家,

61

- 波兰尼, 卡尔 Polanyi, Karl (1886—1964), 匈牙利经济学家, 68—9
 伯克, 肯尼思 Burke, Kenneth (1897—1993), 美国文论家, 126
 博厄斯, 弗朗兹 Boas, Franz (1858—1943), 德裔美国人类学家, 9, 11, 15, 67
 布尔迪厄, 皮埃尔 Bourdieu, Pierre (1930—2002), 法国人类学家及社会学家,
 56, 59, 67, 70—1, 90, 123—4, 165, 174, 176
 布克哈特, 雅各布 Burckhardt, Jacob (1818—97), 瑞士历史学家, 6, 27,
 146—7
 布朗, 彼得 Brown, Peter (1935—), 英国历史学家, 96
 布罗代尔, 费尔南 Braudel, Fernand (1902—85), 法国历史学家, 3, 15, 36, 41,
 69
 布洛赫, 马克 Bloch, Marc (1886—1944), 法国历史学家, 14—15, 22, 96,
 99, 137
 布洛克, 安东 Blok, Anton (1935—), 荷兰人类学家, 59
 部落 tribe, 178

C

- 策略 strategies, 42, 56, 67—8, 71, 89, 91, 102, 117, 119, 135, 167
 差异, 分化 difference, differentiation, 59, 146, 148—9, 154, 177, 179,
 场域 fields, 174—5
 臣属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89—90
 成本—收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117, 119
 程式 formulae, 109—10, 112, 亦参 图式 schemata
 耻感文化 shame cultures, 138
 冲突 conflict, 27, 43, 61, 63, 77, 85, 87, 122—4, 130, 144
 宠臣 favourites, 47—8
 传统 tradition, 1, 143—4, 160—2, 169

D

- 达恩顿, 罗伯特 Darnton, Robert (1939—), 美国历史学家, 103
 戴维斯, 娜塔莉·Z Davis, Natalie Z. (1927—), 美国历史学家, 39, 126,
 168
 单线性 unilinearity, 146, 152
 道德共同体 moral community, 55

- 道德经济学 moral economy, 1, 69—70, 121
- 道德恐慌 moral panics, 121—2
- 道德资本 moral capital, 71
- 道格拉斯, 玛丽 Douglas, Mary (1921—), 英国人类学家, 178—9
- 德里达, 雅克 Derrida, Jacques (1930—2004), 法国哲学家, 135, 176—7
- 狄尔泰, 威廉 Dilthey, Wilhelm (1833—1911), 德国历史哲学家, 7
- 抵抗 resistance, 89—92
- 地理学 geography, 8—9, 14—15, 17, 19, 57, 144, 158—9, 179, 187, 亦
参 空间 spaces
- 蒂利, 查尔斯 Tilly, Charles (1929—), 美国社会学家, 16
-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100
- 动员 mobilization, 78, 94
- 杜比, 乔治 Duby, Georges (1919—96), 法国历史学家, 62, 69, 177
- 杜波伊斯, W. E. B. Du Bois, W. E. B. (1868—1963), 美国社会学家, 105
- 杜蒙, 路易 Dumont, Louis (1911—98), 法国人类学家, 63
- 对替代选择的意识 alternatives, awareness of, 98, 142, 144, 161, 189
- 对细小差异的自恋 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 59, 179
- 多尔, 罗纳德 Dore, Ronald (1925—), 141—2
- 多线性 multilinearity, 149—52
- 多元组 polythetic groups, 31
- 多重视角 multiple viewpoint, 179—82
- 多兹, 埃里克·R Dodds, Eric R. (1893—1979), 意大利古典学家, 138

E

- 儿童期 childhood, 47, 139

F

- 发明 invention, 1, 178
- 凡勃伦, 索尔斯坦 Veblen, Thorstein (1857—1929), 美国社会学家, 23, 66—
7, 75, 102
- 范式 paradigms, 161, 168
- 范西娜, 扬 Vansina, Jan (1929—), 比利时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 110, 136
- 方法论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ical, 127—8
- 防御型现代化 defensive modernization, 145

- 非洲 Africa, 24, 48, 60, 97, 104, 108, 128—9, 178
- 费弗尔, 吕西安 Febvre, Lucien (1878—1956), 法国历史学家, 14—15, 98, 137—8
- 费雷雷, 吉尔伯托 Freyre, Gilberto (1900—87), 巴西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 15—16, 34—5, 106, 108, 128
- 费什曼, 约书亚·A Fishman, Joshua A. (1926—), 美国语言学家, 101
- 封建制/封建主义 feudalism, 4, 24—5, 46—7
- 冯特, 威廉 Wundt, Wilhelm (1832—1920), 德国心理学家, 8, 13
- 弗格森, 亚当 Ferguson, Adam (1723—1816), 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学家, 3—4
- 弗莱, 诺思罗普 Frye, Northrop (1912—91), 加拿大文论家, 125
- 弗兰克, 安德烈·贡德 Gunder Frank, André (1929—), 美国经济学家, 82
- 弗雷泽, 詹姆斯 Frazer, James (1854—1941), 英国人类学家, 8, 25
- 弗里德曼, 乔纳森 Friedman, Jonathan (1946—), 美国人类学家, 136
- 弗里曼, 爱德华·奥古斯特 Freeman, Edward Augustus (1823—92), 英国历史学家, 6
- 弗洛姆, 埃里克 Fromm, Eric (1900—80),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 137
- 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8, 115, 179
- 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德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1694—1778), 法国评论家及文人, 4, 85
- 符号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90, 165
- 符号学 semiotics, 134
- 福柯, 米歇尔 Foucault, Michel (1927—84), 法国哲学家, 40, 53, 79, 96, 100, 103, 156, 175
- 腐败 corruption, 76
- 复调 polyphony, 181

G

- 伽达默尔, 汉斯-格奥尔格 Gadamer, Hans-Georg (1900—2002), 德国哲学家, 179, 186
- 盖尔纳, 厄内斯特 Gellner, Ernest (1925—95), 英国哲学家及人类学家, 17, 28, 58, 79, 185
- 盖伊, 彼得 Gay, Peter (1923—),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 137—8
- 戈德利耶, 莫里斯 Godelier, Maurice (1934—), 法国人类学家, 176
- 戈德斯通, 杰克·A Goldstone, Jack A. (1955—), 美国社会学家, 23, 29, 160

- 戈夫曼, 欧文 Goffman, Erving (1922—82), 美国社会学家, 48—9, 126
- 革命 revolutions, 23, 29, 111, 151—3, 156, 160—1, 168, 182
- 格尔兹, 克利福德 Geertz, Clifford (1926—), 美国人类学家, 16, 39, 86, 120, 167
- 格里包迪, 毛里奇奥 Gribaudi, Maurizio, 意大利历史学家, 41—2
- 格林, 约翰·理查德 Green, John Richard (1837—83), 英国历史学家, 6
- 格林布拉特, 斯蒂芬 Greenblatt, Stephen (1943—), 美国文学史家, 111—12, 126
- 格伦迪, 爱德华多 Grendi, Edoardo (1932—99), 意大利历史学家, 42
- 格吕克曼, 马克斯 Gluckman, Max (1911—75), 南非人类学家, 40—1, 128—9, 132
- 格申克龙, 亚历山大 Gershenkron, Alexander (1904—78), 俄裔美国经济史家, 147—8
- 格式塔 Gestalt, 112, 161, 175
- 葛兰西, 安东尼奥 Gramsci, Antonio (1891—1937),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 88—90
- 葛兰言 Granet, Marcel (1884—1940), 法国汉学家, 98
- 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23, 147—8, 155, 184
-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79—82
- 功能主义/功能 functionalism, functions, 12, 19, 25, 112—13, 128—34, 148, 173
- 共时态 synchronic, 135
- 共识 consensus, 27, 62—3, 87, 96, 99, 122—4, 130, 144
- 共同体/社区/社群 community, 40, 55, 57—60, 95, 103, 114, 123, 131, 143, 161, 171, 187
- 贡布里希, 恩斯特·H Gombrich, Ernst H. (1909—2001), 奥地利艺术史家, 112, 160—1
- 古迪, 杰克 Goody, Jack (1919—), 英国人类学家, 24, 110
- 古哈, 拉纳吉特 Guha, Ranajit (1923—), 意大利历史学家, 89
- 固定性 fixity, 173
- 管理/经营 Management, 140, 166—7, 169
- 惯习 habitus, 176
- 规训/纪律 discipline, 156

H

- 哈贝马斯, 尤尔根 Habermas, Jürgen (1929—), 德国哲学家及社会学家, 79—

80

- 哈布瓦赫, 莫里斯 Halbwachs, Maurice (1877—1945), 法国社会学家, 15—16, 114
- 哈拉姆, 亨利 Hallam, Henry (1777—1859), 英国历史学家, 25
- 哈鲁图尼安, 哈里 Harootunian, Harry (1929—), 美国历史学家, 177
- 哈托格, 弗朗索瓦 Hartog, François, 法国历史学家, 135
- 哈谢克, 雅罗斯拉夫 Hašek, Jaroslav (1883—1923), 捷克小说家, 91
- 哈伊纳尔, 约翰 Hajnal, John, 匈牙利裔英国人口学家, 24
- 海姆斯, 戴尔 Hymes, Dell (1927—), 美国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 101
- 韩德林, 奥斯卡 Handlin, Oscar (1915—), 美国历史学家, 163
- 汉内兹, 伍尔夫 Hannerz, Ulf (1942—), 瑞典人类学家, 40
- 汉森, 伯耶 Hansen, Borje, 瑞典人类学家, 40
- 行业黑话 jargon, 2, 44
- 豪泽尔, 阿诺尔德 Hauser, Arnold (1892—1978), 匈牙利艺术史家, 120, 177
- 合法化 legitimation, 94, 99, 112—13, 181
- 赫克舍尔, 埃利 Heckscher, Eli (1879—1952), 瑞典经济史家, 28
- 赫克斯特, 杰克 Hexter, Jack (1910—96), 美国历史学家, 22
- 赫希曼, 阿尔伯特·O Hirschman, Albert O. (1915—), 美国经济学家, 87
- 赫伊津哈, 约翰 Huizinga, Johan (1872—1945), 荷兰历史学家, 16
- 亨特, 林 Hunt, Lynn, 美国历史学家, 78
- 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 181
- 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135, 173, 176
- 后来居上 retarding lead, 148
-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104—8
- 互惠 reciprocity, 68—9, 74
- 话语 discourse, 19, 99—101, 175
- 怀特, 海登 White, Hayden (1928—), 美国历史学家及文论家, 115, 124—6, 135
- 辉格史观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13, 181
- 混生性 hybridity, 106—8
- 霍布斯鲍姆, 埃里克 Hobsbawm, Eric (1917—), 英国历史学家, 1, 58, 89, 92
- 霍尔, 约翰·A Hall, John A. (1949—), 英国社会学家, 17, 184—5

J

- 吉本, 爱德华 Gibbon, Edward (1737—94), 英国历史学家, 5

- 吉登斯, 安东尼 Giddens, Anthony (1938—), 英国社会学家, 140, 155
- 集体传记分析 prosopography, 35
- 计量史学 cliometrics, 35
- 计算中心 centres of calculation, 85
- 记忆 memory, 112—15
- 家产制 patrimonialism, 29—30, 118
- 家庭 family, 54—6, 72—3, 168
- 缄默无言的群体 muted groups, 51
- 建构 construction, 53, 100, 126, 164, 175—9
- 剑桥小组 Cambridge Group, 54
- 交换 exchange, 68—9, 73
- 阶级 class, 18—19, 32—3, 60—3, 123—4
- 接受 reception, 103—4
- 结构 structures, 14—16, 19, 28, 54—6, 82, 127—8, 134—6, 140, 167—8, 172—4
- 结构化 structuration, 2, 140
-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134—6
- 结合 cohesion, 99, 129
- 结晶 crystallization, 164
- 解构 deconstruction, 176
- 金兹伯格, 卡洛 Ginzburg, Carlo (1939—), 意大利历史学家, 39—40, 103, 126
- 进化 evolution, 7—8, 25, 142, 144—5, 152
- 经济学 economics, 4, 7, 10—11, 17, 35—6, 46—7, 68—9, 82, 117, 143—4, 158—60
- 竞争 competition, 145, 161
- 局部主义 parochialism, 2, 145
- 剧目 repertoire, 50, 94, 100—1, 121—2, 140
- 决定论 determinism, 15, 41, 135, 140, 153, 166, 175
- 均衡 equilibrium, 12, 85, 128, 130, 185

K

- 卡斯特, 曼纽埃尔 Castells, Manuel (1942—), 西班牙社会学家, 178
- 卡斯托里亚迪, 科尔内留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22—97), 希腊政治理论家, 176

- 康德拉季耶夫, 尼古拉 Kondratieff, Nikolai (1892—1931?), 俄国经济学家, 10
 苛勒, 沃尔夫冈 Köhler, Wolfgang (1887—1967), 德国心理学家, 11, 112
 科层制 bureaucracy, 22, 29—30, 65, 118, 143
 科恩, 斯坦利 Cohen, Stanley (1942—), 英国社会学家, 121
 科尔曼, 詹姆斯·S Coleman, James S. (1926—95), 美国社会学家, 117
 科卡, 尤尔根 Kocka, Jürgen (1941—), 德国历史学家, 156
 科斯敏斯基, 伊夫根尼 Kosminsky, Evgenii (1886—1959), 俄国历史学家, 32
 克拉克, 斯图尔特 Clark, Stuart, 英国历史学家, 177
 克里奥耳化 Creolization, 107—8
 克里斯玛 charisma, 10, 77, 93, 95—6, 99, 139
 克罗齐, 贝内代托 Croce, Benedetto (1866—1952), 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 7
 刻板印象 stereotypes, 100, 112—13, 121, 162, 182
 肯尼迪, 保罗 Kennedy, Paul (1945—), 英国历史学家, 160
 空间 spaces, 19, 78, 81—2, 144, 178—9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 法国社会学家, 3, 7—9
 恐慌 panics, 117, 121—2
 控制 control, 130—1
 口传性 orality, 108—12
 口述史 oral history, 109, 138
 库恩, 托马斯·S Kuhn, Thomas S. (1922—96), 美国科学史家, 160—2, 182
 库拉, 维托尔德 Kula, Witold (1916—88), 波兰历史学家, 46—7
 库朗日, 努马·德尼斯·甫斯特尔·德 Fustel de Coulanges, Numa-Denis (1830—89), 法国历史学家, 6, 9

L

- 拉策尔, 弗雷德里希 Ratzel, Friedrich (1844—1904), 德国地理学家, 8, 13—15
 拉德克利夫-布朗, 阿尔弗雷德·R Radcliffe-Brown, Alfred R. (1881—1955), 英国人类学家, 11—12
 拉康, 雅克 Lacan, Jacques (1901—81),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 134, 176
 拉斯莱特, 彼得 Laslett, Peter (1915—2001), 英国历史学家, 54
 拉斯韦尔, 哈罗德 Lasswell, Harold (1902—78), 美国政治科学家, 77, 101
 拉图尔, 布鲁诺 Latour, Bruno (1947—), 法国社会学家, 85
 莱维, 乔瓦尼 Levi, Giovanni (1929—), 意大利历史学家, 40, 42
 兰德斯, 约翰 Landes, Joan, 美国历史学家, 81
 兰克, 利奥波德·冯 Ranke, Leopold von (1795—1886), 德国历史学家, 3, 5,

- 14, 125, 146—7
- 兰佩杜萨, 朱塞佩·托马齐·德 Lampedusa, Giuseppe Tomasi di (1896—1957), 167
- 兰普雷希特, 卡尔 Lamprecht, Karl (1856—1915), 德国历史学家, 13—14
- 兰特尔纳利, 维托里奥 Lanternari, Vittorio (1918—), 意大利人类学家, 164
- 朗西曼, W. G. Runciman, (1934—), 英国社会学家, 144
- 劳埃德, 乔弗里·E. R. Lloyd, Geoffrey E. R. (1933—), 英国历史学家, 134
- 勒费弗尔, 乔治 Lefebvre, Georges (1874—1959), 法国历史学家, 109
- 勒高夫, 雅克 Le Goff, Jacques (1924—), 法国历史学家, 97—8
- 勒华拉杜里, 埃马纽埃尔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29—), 法国历史学家, 39—40, 57, 159, 164, 166
- 勒普莱, 弗雷德里克 Le Play, Frédéric (1806—82), 法国社会学家, 54
- 雷迪, 威廉·M Reddy, William M., 美国历史学家, 140
- 类型 types, 26—33
- 礼物 gifts, 69, 74
- 李, 约瑟夫 Lee, Joseph J. (1942—), 爱尔兰历史学家, 145
- 李普塞特, 西摩·M Lipset, Seymour M. (1922—), 美国社会学家, 16
- 李约瑟 Needham, Joseph (1900—95), 英国科学史家, 90—1, 182
- 里格利, E·安东尼 Wrigley, E. Anthony (1931—), 英国历史学家, 148
- 理性 rationality, 89, 96, 116—19, 138, 143, 182
- 利奥塔, 让-弗朗索瓦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25—98), 法国哲学家, 181
- 利科, 保罗 Ricoeur, Paul (1913—), 法国哲学家, 103
- 利奇, 埃德蒙 Leach, Edmund (1910—89), 英国人类学家, 130
- 利益 interests, 33, 56, 116—19
- 例行化 routinization, 95
- 例外的常态 exceptional normal, 42
- 量化历史 quantitative history, 34—8, 54—5, 64
- 列昂-波尔提拉, 米盖尔 León-Portilla, Miguel (1926—), 墨西哥历史学家, 165
- 列维-布留尔, 吕西安 Lévy-Bruhl, Lucien (1857—1939), 法国哲学家, 8, 15, 97—8
- 列维-斯特劳斯, 克劳德 Lévi-Strauss, Claude (1908—), 法国人类学家, 127, 134—5, 175—6
- 流/流变性 Flow, fluidity, 173, 178
- 罗宾逊, 詹姆斯·哈维 Robinson, James Harvey (1863—1936), 美国历史学家, 14
- 罗伯逊, 威廉 Robertson, William (1721—93), 英国历史学家, 96

- 罗坎, 斯泰因 Rokkan, Stein (1921—79), 挪威政治科学家, 84
 罗曼, 扬 Romein, Jan (1893—1962), 荷兰历史学家, 148
 罗斯托, 沃尔特·W Rostow, Walt W. (1916—2003), 美国经济学家, 147
 洛德, 阿尔伯特 Lord, Albert (1912—91), 美国斯拉夫研究专家, 109—10
 洛特曼, 尤里·M Lotman, Juri M. (1922—93), Russian semiologist, 134—5
 略萨, 马里奥·巴尔加斯 Vargas Llosa, Mario (1936—), 秘鲁小说家, 125

M

- 马尔萨斯, 托马斯 Malthus, Thomas (1766—1834), 英国人口问题作家, 4, 159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83), 7, 27, 32—3, 62—3, 82, 151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1, 18, 62, 98, 120, 151—4, 159—60
 马林诺夫斯基, 布朗尼斯罗 Malinowski, Bronislaw (1884—1942), 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 11—12, 45, 69, 106, 112—13, 124
 麦考莱, 托马斯·巴宾顿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59), 英国历史学家, 6
 麦克法兰, 艾伦 Macfarlane, Alan (1941—), 英国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 24, 55, 129
 麦克卢汉, 马歇尔 McLuhan, Marshall (1911—80),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 111
 麦克尼尔, 威廉·H McNeill, William H. (1917—), 美国历史学家, 83, 183, 186
 曼, 高罗 Mann, Golo (1909—94), 德国历史学家, 125—6
 曼, 迈克尔 Mann, Michael (1942—), 英国社会学家, 17, 77, 155, 174, 185
 曼海姆, 卡尔 Mannheim, Karl (1893—1947), 匈牙利社会学家, 98—9, 170, 180
 梅迪克, 汉斯 Medick, Hans, 德国历史学家, 19
 梅特兰, 弗雷德里克·威廉 Maitland, Frederick William (1850—1906), 法学家及法律史家, 9, 31
 梅耶, 安托万 Meillet, Antoine (1866—1936), 法国语言学家, 22
 孟德斯鸠男爵, 夏尔·德 Montesquieu, Charles baron de (1689—1755), 法国思想家, 3—4
 梦 dreams, 138—9
 米德, 玛格丽特 Mead, Margaret (1901—78), 美国人类学家, 137
 米勒, 约翰 Millar, John (1735—1801), 苏格兰法学家及历史学家, 3—4
 米切尔, 蒂莫西 Mitchell, Timothy (1955—), 美国历史学家, 177

- 民俗模型 folk models, 32, 45, 61, 140
民族志/民族学 ethnography, ethnology, 亦参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模仿 mimicry, 92
模型 models, 26—33, 45, 82—3, 141, 151, 157
摩尔, 巴林顿 Moore, Barrington (1913—), 美国社会学家, 16, 23—4, 152, 155
莫斯, 马塞尔 Mauss, Marcel (1872—1950), 法国社会学家, 69, 119
默泽尔, 尤斯图斯 Möser, Justus (1720—94), 德国官员及历史学家, 5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73), 英国哲学家, 127
穆尼耶, 罗兰 Mousnier, Roland (1907—93), 法国历史学家, 61—3
穆尚布莱, 罗贝尔 Muchembled, Robert (1944—), 法国历史学家, 163

N

- 纳米尔, 刘易斯 Namier, Lewis (1888—1960), 波兰裔英国历史学家, 27, 75
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34
尼佩代, 托马斯 Nipperdey, Thomas (1927—92), 德国历史学家, 145
拟剧论思路 dramaturgical approach, 39—40, 126, 140
逆势 regression, 146
年鉴学派 Annales School, 14—16
凝缩 condensation, 115
挪用 appropriation, 102—4
女性 women, 50—3, 68, 70, 72, 80—1, 168, 180
女性主义 feminism, 51

P

- 帕克, 罗伯特 Park, Robert E. (1864—1944), 美国社会学家, 11—12
帕累托, 维尔弗雷多 Pareto, Vilfredo (1848—1923), 意大利社会学家, 9, 130, 158—9
派系 faction, 75
叛乱 revolts, 61—2, 92—4, 120—1
培根, 弗朗西斯 Bacon, Francis (1561—1626), 英国法学家与哲学家, 18, 70
彭慕兰 Pomeranz, Kenneth L., 美国历史学家, 185—6
皮亚杰, 让 Piaget, Jean (1896—1980), 法国心理学家, 11
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143, 146

- 普赖斯, 理查德 Price, Richard (1941—), 美国人类学家, 180—1
 普雷维什, 劳尔 Prebisch, Raúl (1901—86), 阿根廷经济学家, 82
 普罗普, 弗拉基米尔·J Propp, Vladimir J. (1895—1970), 俄国民俗学家, 134—6
 普特南, 罗伯特·D Putnam, Robert D. (1940—), 美国社会学家, 71—2, 94

Q

- 齐美尔, 格奥尔格 Simmel, Georg (1858—1918), 德国社会学家, 11, 57, 59, 127—8, 174
 恰亚诺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维奇 Chayanov, Alexander Vasil'evich (1888—1939), 俄国农业经济学家, 28, 46, 54
 前工业社会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155
 前逻辑思维 pre-logical thought, 98, 155
 前政治立场 pre-political attitudes, 89, 155
 欠发展 underdevelopment, 82—6
 切鲁蒂, 西蒙 Cerutti, Simone, 意大利历史学家, 41—2
 亲属关系 kinship, 54—6
 情感 emotions, 139—40
 琼斯, 埃里克·L Jones, Eric L. (1936—), 英国历史学家, 184
 区隔 distinction, 123
 屈维廉, 乔治·麦考莱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 (1876—1962), 英国历史学家, 6
 去结构化 destructuration, 164
 去文化化 deculturation, 164
 去文明化 decivilization, 150
 去中心化 decentring, 179—83
 权力 power, 40, 67, 73, 76—9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186—8

R

- 人口 population, 4, 17—18, 24, 159
 人类学 anthropology, 8—9, 11—12, 16—17, 38—42, 57, 60, 69, 73, 75, 97—8, 101, 106—8, 110, 112, 114, 123—4, 129, 137—8, 144, 162—3, 169—70, 178, 180—1, 184, 187
 认同 identities, 58—60, 68, 122, 178, 188

- 认知地图 cognitive maps, 95
认知型 epistemes, 96
日本 Japan, 23, 25—6, 42—3, 104, 148, 166—7, 177
荣格, 卡尔·古斯塔夫 Jung, Carl Gustav (1875—1961), 瑞士心理学家, 113, 158
荣誉 honour, 40, 53, 62, 74, 95, 176

S

- 萨林斯, 马歇尔·D Sahlins, Marshall D. (1930—), 美国人类学家, 17, 71, 169—70, 173
萨义德, 爱德华 Said, Edward (1935—2003), 巴勒斯坦裔美国评论家, 100, 103, 108, 153
塞尔托, 米歇尔·德 Certeau, Michel de (1925—86), 法国杂家, 91, 102—3
塞雷尼, 埃米利奥 Sereni, Emilio (1907—77), 意大利历史学家, 153
三个等级 estates, three, 61
桑巴特, 沃纳 Sombart, Werner (1863—1941), 德国经济史家, 14, 22, 28
森, 阿玛蒂亚 Sen, Amartya (1933—), 印度经济学家, 119
沙玛, 西蒙 Schama, Simon (1945—), 英国历史学家, 122—3, 178
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55, 71, 82, 133, 141—71
社会的想象 imagination, social, 58, 99, 176—7, 187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3, 78
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 64—6
社会戏剧 social drama, 39—40, 42—3, 50, 121
社会资本 capital, social, 70—3, 94
神话/迷思 myth, 112—15, 125, 132—3, 135
神秘化 mystification, 99
生态学 ecology, 57, 144, 184—5
施莫勒, 古斯塔夫 Schmoller, Gustav (1838—1917), 德国经济史家, 7, 11
施瓦茨, 罗贝托 Schwarz, Roberto (1938—), 巴西评论家, 105
识字(率) literacy, 37, 108—12
史密斯, 伯纳德·W Smith, Bernard W. (1916—), 澳大利亚艺术史家, 162
世界的祛魅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143
世界体系理论 world system theory, 82, 89, 160, 184
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79
事件 events, 9—10, 14, 19, 165—70

- 视角 viewpoints, 11, 45, 179—80
- 视觉文化 visual culture, 112
- 视域 horizon, 102—3, 186
- 监护人 clients, 73—6
- 双重意识 double consciousness, 105
- 斯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 Spengler, Oswald (1880—1936), 德国历史哲学家, 158
-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 英国社会学家, 7—8
- 斯考切波, 西达 Skocpol, Theda, 美国社会学家, 23, 29, 155
- 斯科特, 琼·W Scott, Joan W., 美国历史学家, 51, 177
- 斯科特, 詹姆斯·C Scott, James C., 美国人类学家, 30, 91
- 斯克里布纳, 罗伯特·W Scribner, Robert W. (1941—98),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 92
- 斯梅尔塞, 尼尔 Smelser, Neil (1930—), 美国社会学家, 18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90), 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 4, 28, 143, 185
- 斯莫尔, 阿尔比昂 Small, Albion (1854—1926), 美国社会学家, 11
- 斯通, 劳伦斯 Stone, Lawrence (1919—99), 英国历史学家, 55, 75, 177
- 斯威齐, 保罗·M Sweezy, Paul M. (1910—2004), 美国经济学家, 152
- 索姆, 鲁道夫 Sohm, Rudolf (1841—1917), 德国教会史家, 10

T

- 汤普森, 爱德华·P Thompson, Edward P. (1924—93), 英国历史学家, 1, 18, 69—70, 121—4, 153—5
- 汤普森, 保罗·R Thompson, Paul R. (1935—), 英国历史学家, 35
- 汤因比, 阿诺德·J Toynbee, Arnold J. (1889—1975), 英国历史学家, 26, 158, 172, 183
- 特纳,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1861—1932), 美国历史学家, 14, 83
- 特纳, 维克多 Turner, Victor (1920—83), 英国人类学家, 50, 57, 94—5, 126
- 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 143, 146
- 滕尼斯, 费迪南 Tönnies, Ferdinand (1855—1936), 德国社会学家, 8
- 体系/系统 system, 亦参 结构/信念体系 structure, belief system
- 田野调查 fieldwork, 11—13
- 调和主义 syncretism, 106—7
- 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88, 91, 120
- 图海纳, 阿兰 Touraine, Alain (1925—), 法国社会学家, 136

- 图式 Schemata, 100, 109—10, 112, 125, 160
- 涂尔干, 埃米尔 Durkheim, Emile (1858—1917), 法国社会学家, 9—10, 21—2, 27, 57, 95—7, 127, 137, 142, 165
- 托德, 詹姆斯 Tod, James (1782—1835), 东印度公司官员, 25
- 托克维尔, 阿列克塞·德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05—59), 法国社会理论家, 7
- 托马斯, 基思 Thomas, Keith (1933—), 英国历史学家, 97, 129
- 妥协 negotiation, 90—1, 163

W

- 瓦尔堡, 阿比 Warburg, Aby (1866—1929), 德国学者, 112
- 瓦克泰尔, 纳坦 Wachtel, Nathan (1935—), 法国历史学家, 164—5
- 外因性变迁 exogenous change, 162—5, 169
- 网络 networks, 41—2, 72—3, 75—6, 173—4, 178
- 威廉斯, 雷蒙 Williams, Raymond (1921—88), 英国文学史家, 101
- 微观史 microhistory, 38—43, 168, 181
- 韦伯, 马克斯 Weber, Max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 10, 14, 22, 25, 27, 29, 58, 62—3, 65, 93, 95—6, 118, 127, 142—3, 157—8, 182
- 韦勒, 汉斯-乌尔里希 Wehler, Hans-Ulrich (1931—), 德国历史学家, 19, 145
- 韦特海姆, 威廉·F Wertheim, Willem F. (1907—98), 荷兰社会学家, 87
- 维诺格拉多夫, 保罗 Vinogradoff, Paul (1854—1925), 俄国历史学家, 31
- 维日比茨卡, 安娜 Wierzbicka, Anna, 波兰裔澳大利亚语言学家, 140
- 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 Wittgenstein, Ludwig (1889—1951), 奥地利哲学家, 31
- 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 100
- 文化 culture, 119—22, 160—2, 169, 175
- 文化交融 transculturation, 106, 163
- 文化脚本 script, cultural, 50
- 文化濡化 acculturation, 106, 162
- 文化失忆 amnesia, cultural, 114, 143
-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105
- 文化再生产 cultural reproduction, 71, 169—70
- 文化转译 cultural translation, 107
- 文论 literary theory, 19, 167—8
- 文明 civilization, 149—50, 157—8, 181, 183

- 问卷调查 questionnaires, 12, 16, 34
 翁, 沃尔特·J Ong, Walter J. (1912—), 109, 111
 沃尔夫, 埃里克 Wolf, Eric (1923—99), 奥地利裔美国人类学家, 16—17, 75—6, 153, 174, 181, 184
 沃勒斯坦, 伊曼纽尔 Wallerstein, Immanuel (1930—), 美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 82, 152, 155, 184
 误解 misunderstanding, 104, 112—13, 164

X

- 西格弗里德, 安德烈 Siegfried, André (1875—1959), 法国政治地理学家, 9, 16
 西米昂, 弗朗索瓦 Simiand, François (1873—1975), 法国经济学家, 10, 159, 165
 希尔斯, 爱德华 Shils, Edward (1911—95), 美国社会学家, 86
 希尔兹, 戴维·S Shields, David S., 美国文学史家, 80
 希腊人 Greeks, 53, 135
 希罗多德 Herodotus, 135
 夏蒂埃, 罗杰 Chartier, Roger (1945—), 法国历史学家, 103, 177
 现代化 modernization, 143—8, 155, 157
 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 29
 相对主义 relativism, 116—19
 消费 consumption, 62, 66—70, 147
 心理学 psychology, 7—8, 11, 15, 113, 115, 121—2, 127, 137—40, 144, 175
 心态 mentalities, 15, 46, 95—8, 144
 欣泽, 奥托 Hintze, Otto (1861—1940), 德国历史学家, 13—14, 22
 信念体系 belief systems, 96—7, 118, 177
 行动者的归来 actor's return, 136—40
 行动者的模型 actor's models, 32, 45, 61
 型构 figuration, 174
 性别 gender, 50—3
 熊彼特, 约瑟夫·阿洛伊斯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883—1950), 奥地利经济学家, 10, 16
 休谟, 大卫 Hume, David (1711—77), 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学家, 188
 虚构 fiction, 124—7
 叙事 narrative, 124—7, 135—6, 167—8, 180
 循环(周期) cycles, 10, 55, 107, 141, 156, 158—9, 161

Y

- 亚文化 subculture, 123—4
谣言 rumour, 109, 122
耀斯, 汉斯-罗伯特 Jauss, Hans-Robert (1921—97), 德国文论家, 102
一元组 monothetic groups, 31
伊懋可 Elvin, Mark, 英国历史学家, 185
伊瑟尔, 沃尔夫冈 Iser, Wolfgang (1926—), 德国文论家, 102
伊耶什, 盖拉 Illyés, Gyula (1902—83), 匈牙利作家, 91
仪式 rituals, 50, 57—8, 78, 80, 94, 132, 154, 169
意识形态 ideologies, 98—9, 132
意图主义 intentionalism, 129—30
印度 India, 25, 89—90, 164
逾越式再铭刻 transgressive re-inscription, 92
语言 language, 84, 102, 178
语言学 linguistics, 15, 22, 99—101, 107
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 33
原型 archetypes, 113
阅读 reading, 103

Z

- 再封建化 refeudalization, 151
遭遇 encounters, 162—5, 169—70, 亦参 征服 conquests
增补 supplement, 176
榨取-强制循环 extraction-coercion cycle, 156
战争 war, 156
哲学性的历史 philosophical history, 4—5, 17, 185
征服 conquest, 83, 147, 163—4
整体论 holism, 127—8
政治/政治学 politics, 71—82, 89, 92—5, 99, 100—1, 129—30, 143—4, 150, 160, 185
政治文化 political culture, 77—9
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82—3, 100, 104, 亦参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中国 China, 22—3, 64—6, 104, 122, 161, 182, 185—6

- 种姓 caste, 64, 178
- 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25
- 重新使用 re-employment, 94, 103
- 重演 re-enactment, 121, 168
- 朱格拉, 克里门特 Juglar, Clément (1819—1905), 法国经济学家, 158
- 专业化 / 职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 6, 12
-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14, 24—5, 28, 56, 82, 143, 153, 160, 183—5
- 自愿结社 associations, voluntary, 73, 79—80, 94, 143, 145, 154
- 宗教 religion, 10, 37—8, 59, 72, 88, 90—5, 106
- 族属 ethnicity, 58, 178
- 罪感文化 guilt cultures, 138

译后记

本书英文原版虽已出版多年，但作为引用率奇高的大型文献综述，纵横多个学科，梳理详略得当，依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我素来景仰的刘北成老师多年前组织姚鹏、周玉鹏、胡秋红、吴修申等四位研究生翻译，并亲自校阅，推出了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并在原作者出了增订新版后做了校订，完成了新的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在国内同类译作中，本书中译质量肯定算是不错的。

因此，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问询我此书再版是否有意翻译时，我颇为意外，也很是忐忑。由于自己多年前先后读过原版两个版本，并在电脑中留下数万字的笔记，想想工作量应该不太大，也顺便再温习一遍，冒冒失失不顾手头其他各种任务，就接下了这项活计。事实证明我比预计多花了一倍时间才完成。

读书笔记甚至片段摘译完全不同于全文翻译，电脑里的数万字并没有节约我什么时间。现在这部译稿，几乎每个字都是

重新键入的，层出不穷的术语的译法也都经过了重新斟酌；与此同时，每一段译完后也都核对了现有的中译，这个过程帮助我解决了不少疑难，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所以我必须在此向刘老师和四位译者致以谢意。

抛开行文习惯和选词偏好导致的差异不谈，目前的译文与旧有中译的差异主要出自三点原因：一是原译者出身历史学，而我或许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术语敏感性更高，学科译名习惯也有一些不同；二是不少局部行文属于英文旧版有而新版删去，中译校订在增添新译的同时未能删净旧文；三是对原文词意理解和句子结构分析的一些不同。总的来说，我可能意译的分寸拿捏更为保守一些，为此可能牺牲了一些中文的流畅性。

本书学科多元，人物繁多，术语驳杂，又大多一笔带过，读着容易，译起来并不轻松。本人学力有限，一定还有不少疏失。好在英文包括电子版不难找到，以及我也保留了许多术语的原文，敬请各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多加比较，不吝赐教。

李 康

2019年7月10日

于京北西二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英)彼得·伯克
(Peter Burke)著;李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思想剧场)

书名原文: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SBN 978-7-208-16090-3

I. ①历… II. ①彼… ②李… III. ①史学-关系-
社会学 IV. ①K061②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0845号

责任编辑 陈佳妮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思想剧场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

[英]彼得·伯克 著 李康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3
字数 241,000
版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090-3/K·2893
定价 52.00元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Copyright © Peter Burke 2005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Polity Ltd., Cambrid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